

征编领导小组

组 长：侯继唐

副组长：刘伯华 刁立山 谢玉琳

组 员：王廷正 王同山 吕保明

魏尚宏 张家训 周大全

编 审：侯继唐 刘伯华 刁立山

主 编：吕保明 王立军

副主编：栾居瑞 阴元昆

编 辑：白士英 田宝英 赵广善

马子江 崔保峰 朱成震

张金洪 马世翔 冯文德

杜富贵



▲ 日本侵略军狞笑着挥刀把一位农民的头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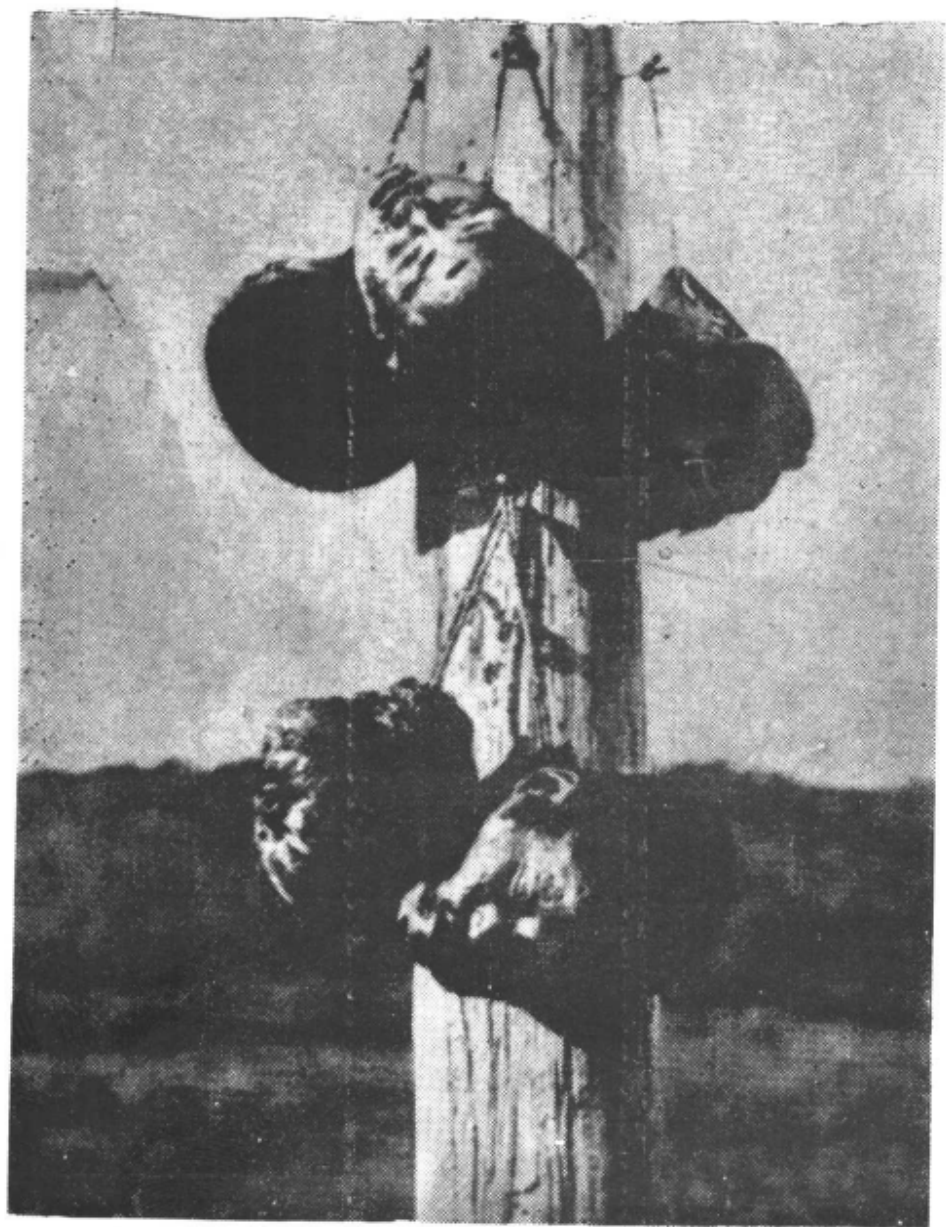
▼ 被日军屠杀的我国同胞。





▲ 侵华日军屠杀我国同胞。

◀ 日本侵略军屠杀我国人民后，把首级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编者的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友好源远流长，但是在中日友好交往的长河中，也出现过使人痛心的曲折。尤其是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给鲁西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历史是我们的昨天，只有了解昨天，才能更珍惜我们的今天，更热爱我们的今天。回顾日本侵略者在鲁西北犯下的罪行，永远牢记历史教训，并把血的历史事实记载下来，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加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这一真理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聊城地区现辖八个县、市，在抗日战争期间分属冀鲁豫边区和冀南区两个抗日根据地（俗称鲁西北地区），“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先后被日军侵占，华北、山东大片国土相继被日军践踏，当年11月日军侵占鲁西北地区。由于中共鲁西北地方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服了山东省第六游击区司令官范筑先拒绝乱命，向全国发出“皓电”，决不南渡黄河，与共产党合作坚持敌后抗日，誓与鲁西北民众共存亡，共同创建了驰名国内外的华北敌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后，加强了对鲁西北地区的侵占、“扫荡”，对这一地区军民实行疯狂的屠杀，残害妇女、枪杀儿童、烧毁房屋、抢掠财物，其手段之残忍，都是前所未闻的。对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鲁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抗击。其后，日本侵略者在鲁西北地区实行野

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无数次大小惨案。为了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他们还大力培植为其效命的伪军，日、伪军的相互勾结，进一步加深了鲁西北地区人民的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编印《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一书，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今人和后人了解，并永远记住这段血和泪的历史，使人民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国家必须富强，人民必须团结，落后了就要受欺侮，不团结就没有力量。从而激发起崇高的革命爱国热情，鼓舞起坚强的斗争意志，加强团结，励精图治，认真执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聊城地区的振兴和发展，不断做出新贡献。

目 录

日伪军在鲁西北地区罪恶活动的始末	(1)
日军占领观城三天，无辜群众惨遭劫难	(38)
徒骇河畔血泪仇——东节村惨案	(54)
濮县血案	(66)
日伪军血洗刁坊	(68)
“血水井”惨案	(70)
南彦寺惨案	(77)
冠县王二寨惨案	(80)
下堡寺惨案	(83)
英烈屯惨案	(86)
我所目睹的范八里惨案	(88)
骇人听闻的尖庄惨案	(90)
南镇惨案	(92)
李九祸殃房庙于庄	(95)
殷楼惨案访问记	(99)
阿城二月二惨案	(102)
沙河崖惨案	(108)
血染聊城	(110)
张家楼惨案	(114)
在平城南“六·二七”惨案	(138)
枣棵杨惨案始末	(142)

恶贯满盈的汉奸——刘二金岭	(158)
莘县日伪县长——刘仙舟	(164)
罪恶累累的齐子修	(169)
齐子修在冠县的罪行	(175)
吴连杰覆灭记	(177)
王来贤的罪行	(181)
祸国殃民的伪军头目冯寿彭	(184)
清平县伪军头目沈凤舞	(186)
日伪团长郭进诚	(188)
罪恶昭昭血债累累——郭隆元	(196)
阳谷伪县长董政华的罪行	(207)
伪军头目李洪图的罪行	(210)
伪军头目刘继春的罪行	(211)
伪区长孟宪章的罪行	(213)
杀人魔王栾省三	(215)
赵振华及其罪恶	(220)
傅崇鲁罪恶的一生	(224)
茌平县伪军头子李歧山及罪行	(228)
博平县伪军头目罗兆荣及罪行	(231)
罪大恶极的汉奸冯太恒	(234)
十恶不赦的汉奸刘德超	(239)
日伪军在茌平残害抗日干部群众罪行录	(241)
日伪军在博平残害抗日干部群众罪行录	(244)
日伪军残酷围剿大吕庄	(249)
大刘庄血案	(251)
日伪军在冠县的残酷统治	(253)
日伪军三次袭击官庄村	(258)
日伪作恶郭铁村，群众受尽阎王罪	(260)

疯狂的“四·二九”大扫荡	(262)
日伪军在阳谷的残酷统治	(265)
日军在阳谷罪行录	(278)
日伪军在聊东南的罪恶统治	(283)
日伪军在堂邑迫害抗属罪责难逃	(287)
日伪军在堂邑残害无辜群众的罪行	(289)
日伪军在高唐推行“强化治安”维护反动统治 的部分罪恶事实	(292)
日伪军在高唐进攻抗日武装、摧残进步力量的 部分罪恶事实	(297)
“九·二七”大扫荡概述	(302)
北杨集七英烈罹难记	(307)
回忆堂邑“无人区”	(313)
目不忍睹的灾荒年“无人区”	(315)
屠杀抗日志士的魔窟——冠县日伪警察所	(318)
日伪朝城县特务系的罪恶活动	(320)
东阿的日本特务组织及其罪恶活动	(324)
日伪时期的聊城县特务组织	(328)
堂邑县新民会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调查	(331)
日伪在临清推行奴化教育的情况	(334)
日伪新民会在莘县	(336)
冠县日伪政权的苛捐杂税	(340)
日伪在高唐横征暴敛掠夺经济的部分罪恶事实	(345)
罪大恶极的日伪据点——影庄	(350)
临清县七区伪据点——台庄	(352)
花牛陈日伪据点	(354)
附：阳谷、茌平等十一县八年抗战损失表	(357)
日伪军在鲁西北据点明细表	(359)

日伪军在鲁西北地区

罪恶活动的始末

吕保明 邓愧余 白士英整理

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我北平（今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发动突然进攻。7月29日、30日相继攻陷北平、天津。8月13日进攻上海，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驻卢沟桥和上海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从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战伊始，日军节节进攻，铁蹄所至，版图易色。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官员大部抢渡黄河南撤，群众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团结抗日，与国民党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鲁西北主动争取爱国将领范筑先合作抗战，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华北大地。

日军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从1939年到1942年对我抗日根据地连续三次推行“整肃治安计划”、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以强化其统治。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伪军曾两次侵占鲁西北地区。第一次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日伪军先后一度侵占高唐、临清、馆陶、

冠县、濮县、范县、观城、茌平、博平等县城。占据时间多则半年，少则一、二日。第二次自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至1945年8月16日。日伪军相继占据聊城、高唐、临清、馆陶、清平、博平、茌平、堂邑、莘县、冠县、寿张、阳谷、范县、朝城等县城和大部农村。曾在鲁西北设有日、伪、顽军据点457个。临清驻日军联队，聊城、高唐驻日军大队，除观城、范县外其他县城驻日军中队，共驻日军5000余人。伪军驻有师部1个，旅部5个，团部10个，营部16个，共有伪军20000余人。日军宣布投降后，在鲁西北的日军于1945年8月上旬开始撤往德州、禹城及济南等地；伪军大部被我抗日军民歼灭，一部被收编为所谓“国军”。

本文分三个阶段简要介绍日伪军在鲁西北地区活动的始末。

一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兵分四路向南进犯。沿平汉铁路的日军1937年10月10日攻陷石门（今石家庄），相继占领顺德（今邢台）、邯郸、彰德（今安阳）和新乡。沿津浦铁路的日军第二军第十师团等部于10月3日侵占德州，继占平原、武城、高唐等县。10月27日占领济南，31日占领泰安。1938年1月攻陷兖州、济宁，5月占领菏泽。鲁西北陷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际此国难当头，临清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各县国民党官员、军警搜刮民财、携眷南逃；地方民团、土匪武装、散兵游勇蜂拥而起，司令多如牛毛各霸一方。群众背井离乡，纷纷出逃，城乡一片混乱。

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山东省委领导下，争取团结聊城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合作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助鲁西北建立抗日政权，组建抗日武装，开展群众救亡活动。党中央、山东省委多次派遣党务、军事、政治干部来聊

开展工作。为加强鲁西北抗战的领导，省委先后派组织部长张霖之、省委委员赵健民来鲁西北领导抗日斗争。抗日武装发展到35个支队、3路民军，近6万人，多数县、乡、村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政权，初步形成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20日（农历10月18日），驻邢台日军派遣二七五一联队副司令官高桥率日伪军400余人侵占临清县城。同年11月22日日酋高桥派出一支30余人的骑兵侦察小队，从临清出发经堂邑到聊城进行侦察骚扰。当日下午2时行至聊城西门外遭我驻聊城部队迎击，向北逃窜至堂邑梁山镇时，受到范筑先带领的传令队（警卫队）、政训队六七十人阻击，毙敌数人，其中有敌小队长1人；缴获战马4匹，其余日军狼狈窜回临清。

驻临清日军遭受打击后，高桥恼羞成怒，于11月24日亲率骑兵、炮兵、步兵共300余人开往聊城进行报复。当日军行至堂邑柳林以北、界牌西南的大杨庄时，再次受到范筑先组织指挥的保安第一、二营及其传令队、政训队的阻击。激战四五小时，毙、伤日军80余人，并缴获一批战利品，当日高桥率残部仓惶逃回临清。次日，高桥率部到大杨庄残杀群众48人。11月23日，驻临清日军一部占领馆陶县城（今冠县北陶镇）。11月29日，驻馆陶日军派出20余人出城侦察骚扰，在返回途中受到北田平游击队、段辛庄红枪会的伏击，当场击毙日军4人、伤5人。次日，驻馆陶日军对段辛庄进行报复，杀害群众5人，烧房500余间，烧死耕牛50余头。1938年1月29日（农历腊月28日），驻临清、馆陶日军侵占冠县县城，至2月4日被迫撤回临清、馆陶。

1937年11月15日，驻德州日军松井部由平原出发进犯高唐。当日下午行至高唐县城北崔庄一带，遭受共产党员金谷兰领导的冀鲁边区游击第七大队和地方武装截击，日军被迫夜宿崔庄。第二日，日军在支援部队10辆坦克的掩护下向高唐进行猛烈进攻，经过双方激战，当日下午占据高唐县城。数日后，高唐日军派出

通讯兵8名，先后在高禹公路解庄一带架设电线，受到我游击队袭击，击毙日军1人，缴获摩托车1辆。次日，日伪军一部对解庄进行疯狂报复，杀害群众5人，烧毁民房100余间。12月16日，驻高唐日军侦悉高唐县抗日政府驻在县城西南之签庄等村庄，派日军一个中队对我县政府机关进行偷袭。在县政府人员突围时，被日军打死我干部、战士50余名。12月26日，驻高唐、禹城日军约600余人，企图经茌平、铜城，从滑口渡黄河进袭泰安，以钳制济南。当日军行至高唐、茌平、博平三县交界处南镇时，受到范筑先部队及三县地方武装3000余人阻击。经过三天激战，在南镇、徐河口、周老庄、周小庄一带毙伤日军100余人。日军于28日晚撤回高唐。此次战斗粉碎了日军渡河南下的军事计划。日军被阻南镇期间，大肆屠杀村民，焚烧民房，制造了“南镇惨案”。

1937年12月10日，驻安阳日军派出飞机数架到观城、朝城、莘县地区进行空中侦察，并对三县县城狂轰滥炸，仅朝城县城即被炸死伤群众70余人，炸毁民房40余间。12月13日（农历11月13日），日军土肥原师团一部从安阳方向出发进犯观城，其先头部队行至观城附近小王庄，遭到国民党二十九军某团三营伏击，日军伤亡惨重。日军在小王庄、吕庙、岳坊等村，对群众进行残酷的烧杀掠夺。次日日军占领观城县城，除杀戳抗日官兵一部外，屠杀群众158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观城惨案”。15日日军撤出观城。

1938年3月初，驻黄河以北、平汉铁路沿线地区的日军土肥原师团，为配合徐州会战，抢占黄河渡口，以便渡河南下，切断徐州中国守军向西的退路，抢先占领开封、商丘地区，派大乌联队长率近千人占领濮县，以控制黄河渡口，保证濮县至濮阳交通线畅通。大乌联队在濮县大肆烧杀，残害无辜群众1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濮县惨案”。3月19日，又派出伪军300余人进占范县县城（今莘县古城镇），21日在范筑先部队围攻打击

下，日军撤回濮县。24日晨，从鄄城一带窜来日伪军200余人，乘范的主力撤离之际，再度侵占范县县城。范筑先闻报率部急返范县，经激战一天，日军遭到重大伤亡，残部于次日凌晨撤出范县向濮县逃窜。26日，范筑先调集所部6000余人围困濮县之敌。

4月2日拂晓，驻濮县日军300余人和伪军一部，在3辆坦克掩护下出北门向范部袭击，行至葛楼南，坦克陷入范部反坦克壕内，被范部队从左右两翼向敌冲击，毙伤日伪军近70人。27日上午，驻濮县日军赶着200余匹战马到麦田放牧，受到范部伏击，当场毙伤日军30余人、军马30匹，缴获战马30匹和枪支、弹药一部。

5月9日，濮县日伪军出动300余人偷袭范部驻地七里堂，受到范部队阻击，击毙日伪军50余人。中旬，在濮县城西毙伤日军运输队100余人。6月8日，在濮县以西的石墓头，日军运输队再次遭我伏击，击伤敌20余人，击毁敌汽车数辆。13日，濮县日军被迫撤往大名。

高桥部队占据临清县城期间，以汉奸胡乾一、刘彝臣为首成立临清县地方治安维持会，由胡、刘二人任正、副会长，下设秘书、交际、钱粮、总务四处，积极为日军服务，为虎作伥，欺压百姓，残害抗日军民，为鲁西北地区第一个汉奸组织。

抗战初期这一阶段，为了抗击侵略，冀鲁豫边区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大力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和恢复鲁西北特委、直南特委、冀鲁豫边区省委，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并与范筑先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加强抗日斗争，1938年1月15日，由陈再道、李菁玉率领的一二九师东进支队进驻河北省南宫地区；2月15日，以东进支队一部组建津浦支队开进鲁西北地区高唐、夏津、恩县、武城地区；同时，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徐向前、刘志坚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五支队先后到达南宫。为消灭临清、威县至邢台一线的日伪军，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于5月10日奉命袭入

威县县城，歼灭日军100余人，震慑了邢（台）临（清）公路沿线的日军。占领馆陶、高唐的日军，在鲁西北地区抗日军民打击威胁下，于1938年2月分别撤至临清和禹城。占据临清的日军在八路军主力和抗日军民的威胁下，亦被迫于5月13日撤往邢台；其中一部百余人行至临清县城西老官寨，被我抗日军民截击歼灭。至1938年6月，山东省第六区的聊城、阳谷、寿张、范县、濮县、观城、朝城、莘县、冠县、堂邑、博平、茌平等县，第四区的临清、馆陶、邱县、清平、高唐等县和东阿、平阴、肥城、东平县黄河以北地区，近一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鲁西北地区已无敌踪，所有进犯之日伪军在我抗日军民的有力打击下，均被驱逐出境，使鲁西北地区一度出现空前繁荣高涨的抗日局面。

二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严重地威胁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在此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为对国民党政府、军队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集中兵力对付在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一切抗日力量。至此，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为巩固后方，确保华北，从华中、华南抽调兵力加强华北军事力量。1938年底前后，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达到15个师团，9个独立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占其侵华总兵力30个师团（不含关东军）的半数以上。日军在冀鲁豫三省边区亦加强军事部署。在邯郸、安阳地区驻有第一独立混成旅团；在新乡、开封地区驻有第三十五师团；在豫东地区驻有第十四师团；在徐州地区为第二十一师团；在济南、德州地区驻有第一一四师团。1939年5月

在济宁、兖州地区驻有第三十二师团。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1938年11月中旬，驻山东日军第一一四师团由济南、禹城、德州分三路进攻鲁西北地区。11月14日，驻济南日军千叶联队于东阿渡黄河进攻聊城。其先头部队平田大队率步、炮兵500余人，汽车、坦克10余辆，并有飞机配合。于15日拂晓，在两架飞机掩护下猛烈攻城。范筑先指挥守城部队奋勇抵抗，毙敌1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城门，范筑先和姚第鸿、张郁光等700余将士壮烈牺牲，聊城失陷。同时，由禹城出发的日军丁田联队1000余人，侵占高唐县城；驻德州日军出动500余人（内骑兵100人），经武城向临清地区进犯，17日占据临清县城。当日下午，驻临清日军派出20余人乘船沿卫运河去馆陶县孟口进行侦察骚扰，行至尖庄受到范筑先旧部民军一路二团战士30余人的伏击，击毙日军16人，其他日军跳水逃走。19日，日军数百人对尖庄进行报复，屠杀群众367人、伤残7人，焚烧房屋2000余间，制造了“尖庄惨案”。驻临清日军鉴于冀南、鲁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强大，于同月下旬撤出临清返回德州。

聊城失陷后，鲁西北特委召开两次紧急会议。决定掌握和扩大武装部队、坚持鲁西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会后将派往范部的军政干部和共产党员除一部分派往冀南、直南地区外，大部分充实加强第十支队（后改名为筑先抗日纵队）、新组建的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和派往各县发动群众组建武装进行抗日。

为支持冀南和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亲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大队一部，于1938年12月14日、21日先后到达冀南、鲁西北地区的南宫、威县、邱县、馆陶、冠县、朝城一带。在威县落户张庄召开冀南、鲁西北地区军政干部会议，传达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确定依靠群众、依靠农村，巩固冀南和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会后在冠县组建先遣抗日纵队，统一指挥鲁西北地区的抗日部队，以坚持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8年11月17日（即聊城失陷第三天），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长、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及原第六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王金祥等顽固分子，唆使莘县反动分子杀害共产党员、县长吕世隆，捣毁抗日县政府及群众救亡团体，制造“莘县事件”。同时，支持国民党朝城县长张守忠解散抗日团体动委会，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支持观城县国民党顽固分子强迫共产党员、观城县县长张舒礼和群众抗日团体撤出县城。同月27日，王金祥调集军队3000余人突然袭击我第十支队机枪营；随后，王金祥利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其为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名义，收容范的旧部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等支队盘据朝城、阳谷、范县、濮县、观城、莘县等地区；以第三支队司令齐子修为首收容第四、十九、二十九支队盘踞寿张地区。同年秋，第三支队齐子修趁日军扫荡之机，窜至茌平、博平、高唐一带抢占地盘，扩充势力，经王金祥报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批准，被提拔为第六区保安副司令，又进驻清平、堂邑和聊城西北，冠县东北、莘县北部地区。1940年春，在我讨逆战役中李树椿、王金祥被驱逐鲁西北地区后，齐子修继任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其指挥机关由茌平、博平一带迁至堂邑梁水镇附近的蒿庄，与日军暗地勾结，打击我抗日力量。范筑先旧部第十六支队吉占鳌，盘据临清西部地区，民军一路王来贤退至曲周、临清、馆陶三县边境；其他支队除被日军击溃和被红枪会消灭外，余者各据一方。以后齐子修、王来贤等大部投降日军，与抗日军民为敌，鲁西北地区再度出现混乱局面。

1938年12月24日，陈赓指挥六八八团，与第十支队配合，一

举歼灭盘据在曲周县东吕寨的王来贤部1000余人。1939年1月10日，陈赓率六八八团，津浦支队、青年纵队三团夜袭高唐县城，经过三小时激战，毙日军10余名，缴获步枪10余支，俘伪军10余人。2月10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补充团各一部和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在曲周（今属邱县）香城固全歼日军一个机械化加强中队，毙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200余人，俘日军10余人，缴获一四一式山炮一门，九二式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烧毁汽车8辆。3月初，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第一、二营进至鲁西地区。杨勇率六八六团直属队大部 and 第三营及张国华、匡斌率一一五师特务连、担架连在运西，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开辟运西抗日根据地。由此，不仅壮大了抗日力量，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而且也粉碎了顽杂部队切断我鲁西北与冀南之间联系的企图，初步稳定了鲁西北地区的形势。

1939年2月3日，日军一一四师团二三五一部队一部，在莲花、冈村率领下再度侵占临清县城。至此，占领聊城、高唐、临清的日军在驻济日军一一四师团的统一指挥下，对鲁西北各地逐步进行侵占，以实施其野蛮的统治。

聊城日军（初为联队，后为大队）：1939年2月16日出动日伪军400余人，侵占博平县城（今茌平县博平镇）。18日，驻聊城、博平一部日军占领茌平县城；由聊城出动日军100余人，伪军400余人，乘汽车10辆侵占莘县；另一个小队50余人侵占堂邑县城。3月22日（农历2月2日），驻聊城日伪军1000余人袭击驻阳谷阿城之国民党二十九军第四旅冯寿鹏部。经激战冯部溃退，日军在阿城杀害群众112名，制造了“二·二阿城惨案”。当日，日军经张秋镇侵占寿张县城，不久撤走。5月13日，日军酒井率部再占寿张县城，旋即撤走。7月5日，日军酒井率日伪军1000余人占领寿张县城。8月间，日军占领阳谷县城。

高唐日军（初为联队，后为大队）：1939年1月20日派出日

军1个中队100余人，占领清平县城（今高唐县旧城乡）。

临清日军：1939年2月中旬，出动日伪军一部占领馆陶县县城。17日，出动日伪军1000余人侵占冠县县城，19日撤出。6月3日，日伪军再次占领冠县县城。

1938年11月至1939年8月期间，日军在鲁西北地区驻有3个联队、10个中队约5000余人。大部驻于各县县城，部分驻防重要集镇及交通要道据点。

日军占领鲁西北大部县城后，为继续侵占农村，巩固其统治区，以军事讨伐为主要手段，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力量；并从1939年以后对抗日根据地三次推行“整肃治安计划”、五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度，扩编伪治安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经济掠夺。在此期间，鲁西北日军与山东省、河北省邢台、邯郸、大名、河南省安阳、新乡、开封等地日伪军配合对鲁西北地区进行数以千次的“扫荡”，其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其中两地或两地以上日伪军联合“扫荡”达243次，仅聊城日军即出动“扫荡”100余次。

日军的“扫荡”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利用汉奸、特务侦探我抗日军民及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活动情况，采用快速偷袭予以毁灭性的打击。1939年3月初，鲁西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奉命赴泰西开辟根据地。3月5日行至茌平县北部琉璃寺（今属高唐）一带，被禹城、高唐等地日伪军突然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赵伊坪重伤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先遣纵队二团团长荆维德、政治部组织股长申子君及担负掩护党委机关突围任务的连指导员苏广珠所率一排战士，全部光荣牺牲。1940年6月14日，日军探获中共运东地委机关驻茌平县城南张小庄后，驻济南、茌平等地日伪军数百人乘汽车偷袭。在突围战斗中，地委书记刘培桐、组织

部长董景平（又名尉景平）等干部、战士36人壮烈牺牲，地委党校教务主任秦怀玉等30余人被俘。6月25日，莘县、冠县、堂邑日军获悉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二团二营驻朝北耿楼后，出动日伪军3000余人将该村包围，在战斗中击毙日伪军100余人。我二十二团政委史钦琛及战士127人壮烈牺牲。

（2）集结大量兵力，由“分进合击”进而“铁壁合围”，由线式“扫荡”进而纵深“扫荡”，推行“三光”政策，进一步加强对根据地的屠杀和“扫荡”。1941年1月中旬，日军从津浦、陇海、平汉铁路线调集第二十一、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一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伪军3000余人，配备汽车300余辆、坦克、装甲车20余辆，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由济宁、菏泽、临清、大名等地出动，分六路对鲁西根据地中心区范县、观城一带进行“扫荡”。17日，鲁西军区特务营掩护区党委、军区机关转移突围后，遭受日军包围，我指战员126人牺牲。1942年9月27日，日军调集第三十二、五十九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和伪军共1万余人，坦克10余辆，分八路对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在战斗中，鲁西军区及第八分区的后方机关、学校和地方武装伤亡279人、被俘116人、失散873人；地方干部伤亡、失散552人，群众被抓走600余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杨静斋、孙仰周、陆军中学教育处长孙厚甫、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三、教导第三旅民运科长陈伟、南进支队敌工科长冉士英等领导干部牺牲。1943年6月10日，临清、馆陶、冠县、堂邑、聊城、阳谷、莘县、寿张和河北省大名、南乐等10县日伪军出动14500人，分15路对冠（县）南、朝（城）北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其中一路日伪军经过冠县李赵庄时，将15名群众杀害，把20余名群众投入水井活活淹死，制造了“血水井惨案”。1944年6月27日，聊城、茌平、博平、东阿、阳谷等县日伪军出动数千人，对聊（城）茌（平）

阿（东阿）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筑先（聊城）县委、政府、县大队干部、战士和群众134人，被日军集体枪杀在茌平县城南张会所村村外田野上。

（3）在进行大规模“扫荡”、偷袭的同时，日伪军与汉奸特务、反动地主配合残害我抗日军民。1940年春，聊城日伪军在地主、伪村长翟万成勾结下袭击北杨集村，逮捕共产党员、农会积极分子60余人，杀害村干部赵春华、赵春湖等7人。1942年1月，筑先县委书记李苏（原名李朝杰）在东阿农村养病，被汉奸特务暗杀。1943年10月26日，观朝县委书记裴奇在小周庄指导工作，遭到汉奸特务枪杀。

日军在“扫荡”时，为避免遭受我方打击，减少损失，一般在行进时避开森林、青纱帐等隐蔽地，来回不走一条道路，以防我方伏击；战斗时首先进行火力侦察，再分成小部队徐徐接近阵地；同时各兵种、部队之间取得密切配合和支持，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机敏神速的进攻和偷袭，使我方得不到喘息机会，以达其逐步削弱并最后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

驻鲁西北各县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在各地网罗汉奸、反动势力建立县、区、乡、村伪政权；收容国民党和地主、土匪武装建立治安军、警备队等汉奸队伍，以确保其占领区的“治安”，实施其“以华制华”的野心。

日军占领初期首先在各县建立“地方治安维持会”（简称县维持会），由附敌的汉奸任正、副会长。维持会设秘书、交际、财粮和总务四个处。1939年秋冬在此基础上组建伪县公署，即伪县政府，由各地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充任汉奸县长。其一切决策由驻县公署的日军顾问决定。伪县公署下设承审处、秘书处、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宣传科、司法处、收发处、金库及警察所等。各设处（科）长1人，日军顾问1人及办公人员若干人。有的县另设工商科、税务科或政治部，编制约六七十人。与此

同时，日军在其所占领的区、乡及大部分村庄，建立各级伪政权。1941年后，伪县公署内设防共委员会（后改为剿共委员会），由伪县长兼任主任。下设军事、情报及宣传部。伪县、区、乡政权的任务是推行日军的“东亚共荣”策略，宣传“中日亲善”，进行奴化教育，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强化保甲制度，肃清所称“不稳分子”，向群众进行强征暴敛，搜刮民财，以维护其统治的所谓“新秩序”。

日军在拼凑各县、区伪政权的同时，积极进行伪武装的建设。各县建保安大队（后改为警备大队），由伪县长兼任大队长，另设专职副大队长2—3人，下设中队、小队。每中队有伪军100余人。多数县有10个中队，约1000余人；少数县有中队15个以上，约2000人左右；个别县3至4个中队，约500余人。同时建公安大队，每县约100至150人左右。各区、乡建伪区、乡分队，约50余人。以上伪武装一切军事行动听从各县日军司令部指挥。伪军来源主要是国民党顽军及其溃兵败将，各地地主、恶霸及其反动武装、地痞、流氓、土匪和强征当地的农民等，鲁西北地区齐子修、文大可等顽军10000余人投降日军。在鲁西北地区的各类伪军共约20000余人（不含各伪区队）。

日军为侦察、控制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在各地设有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机关。（一）各县设新民会指挥部（简称新民会），初为皇军宣抚班，1940年改为县新民会，1941年改为新民会县总会，1943年改为县新民会军事部。其任务是通过多种渠道向群众进行反共宣传和奴化教育，并利用开办县区青年训练班、物资配给班等手段培植反动势力，搜集根据地党政军民抗日情报，并配合日伪军下乡“扫荡”。各县新民会由伪县长兼任会长，另设专职副会长1至2人，由日军任顾问。一般下设总务、厚生、组织、宣传、配给股。清平县新民会设总务、民众、劳动、经济四个股。茌平县、博平县设总务、组宣、

合作、青训等室。各县新民会军事部时期，下设三个科。一科负责人事、合作、应事；一科负责经济配合、宣传；一科负责情报、保安等事项。（二）各县设宪兵队，分别隶属济南、德州等地特务机关，同时受各县日军指挥。宪兵队设正、副队长，若干班级宪兵，翻译2人、宪兵30余人。下设政治、军事、时事、事务四个系及监狱室。其任务是搜集根据地的军政情报，进行反派遣活动，对根据地地进行控制封锁，分化瓦解抗日力量，收买贿赂抗日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和政治、经济犯罪人员等。（三）各县设警察所（初为警察局），1939年成立设所长1人，所员、警官、书记员若干人。各县人员不等，多者六七十人，少者三四十人。下设司法、保安、特务、经济等系，后增灭共班（后改为剿共班）。在日军占领之部分区、乡及重要市镇设有警察分所。警察所任务是搜集抗日情报，对根据地经济进行封锁，配合日伪军下乡清剿，逮捕和刑讯抗日人员等。（四）各县伪县政府顾问室（初为指导官情报室）1941年成立。设情报主任（或主任）1人、情报员若干人。一般县有15人左右。由日军任情报主任、指导官。该室主要任务是：以高薪为诱饵在伪军中发展特务组织，刺探抗日根据地军事情报。另外，临清县设有：一是中村部队（又称北支派遣军）由驻临日军联队中村中队21人组成的情报班，均系华籍日人；二是日伪一八四九部队，1939年9月成立于天津。其任务是了解抗日根据地的军事、经济情报。三是日伪海员党部，1937年成立于天津。开始任务是担负子牙河、海河、南运河的河上运输，后为汪精卫派往各地的特务组织，任务改为搜集共产党的情报。此外，莘县伪县政府内设特别工作队，实为特务组织。该队设正、副队长，队员二三十人，全为便衣，配备手枪、自行车，专门刺探抗日党政军民情报。东阿伪县政府设执法队（实为剿共班），隶属东阿县宪兵队，初有20余人，后发展到200余人。

驻鲁西北地区的日伪军为加强其占领区的统治，扩大伪政权势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进攻和掠夺、攫取物资，从1940年开始修筑各县和据点之间的公路要道。至1942年底，日伪军占领的县、区均通汽车，各据点之间有公路连接，并在公路要道修筑碉堡，以“步步为营”向根据地进攻。纵横交错的公路分割了我根据地并切断我方联系，给抗日军民的活动造成严重的困难。

日伪军在修筑公路方面采取各种毒辣手段。一是修筑沟、墙、路相结合的公路。日军于1940年开始将横穿鲁西北地区的邢台至济南、邯郸至济南的公路，1942年先后修筑的朝城至南乐、阳谷郭店屯经寿张至郓城等公路，附设宽6米、深4米的深沟及丈余高的墙。墙后为公路碉堡。邢济、邯济两公路不仅把冀南分割为三块，还将鲁西北地区的临清、清平、冠县、堂邑、博平和茌平分为两半；朝城至南乐、阳谷七级至聊城沙镇的公路把我濮范观抗日中心区和鲁西北、运东、运西地区隔开，切断了我方的联系。二是修筑放射性的公路。即以某县城或中心据点为中心，修筑公路伸向四面八方，条条通往外地，以掩护其诡密的军事行动。驻东阿日军从1940年下半年至1942年以陈店子日伪据点为中心，向外修筑公路数条。一条经归德铺、王小楼、东庄至聊城；二条经张汉英、铜城、张大人集、曹孟庄、东庄至聊城；三条经黄圈、牛角店、旦镇至齐河。另外，还修筑白东庄经官庄、陶庄、孙郭、小赵、陶祝铺至张秋通往阳谷；从铜城经洼李、教场铺至茌平；从牛角店至杨柳等公路。至1942年底，日军在聊城东部地区设据点、碉堡38个、修公路3条，大部据点安在公路沿线上。第1条公路从谭庄起，经周店、魏庄、界牌至东阿；第2条从聊城县城经王古庙、军王屯、顾官屯至铜城；第三条从王古庙经张货郎庄、花牛陈至周店。三是修筑平行公路，即从某地到某地修筑数条平行公路。如驻清平日军从1940年至1943年，以康庄为中心修至各

区的公路7条，以避免我方破坏和伏击。四是修筑环形公路，即围绕县城或据点修环状公路，将广大农村纳入县城或据点圈内，有的根据地村庄亦被圈在公路以内。日伪军在环状公路上加强巡逻，以保证占领区的安全。

日军除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据点为锁，辅以封锁沟、墙的“囚笼”政策，对我根据地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外，积极进行所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体战”。

在经济上，日军在鲁西北地区实行疯狂的掠夺，对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实行“抢光”；在其占领区则强取豪夺，搜刮人民财富，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策略。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计有民团费、建设费、支应费、情报费、日军娱乐费、子弹费、壮丁费、联合费、买兵费等名目不下数十种，而且层层加码，如地亩费，每亩县派捐1元，区、乡加为3至5元，村则增至7至9元。高唐县伪合作社在1944年强迫农民每种1亩棉花，交籽棉40斤，全县128000亩棉田，即被强夺籽棉512万斤运往日本。对老百姓日常所用的食盐、煤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严格控制物资外出。每次“扫荡”时带着人马车辆，凡见到的物资能抢的就抢，能运走的运走，不能运走的一律烧光毁掉。同时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对抗日军民所急需的医药、布匹及食盐等日用品严格控制，企图困死我抗日军民。

在文化上，日军在鲁西北占领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各县城设初中、简易师范和完全小学，大部分农村设小学。各类学校成立思想指导委员会，其任务是鼓吹“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等。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修身课”、“日语课”和“军事课”。

“修身课”以恢复东方固有伦理道德为幌子，以“中日唇齿相依、敦睦邻邦”为中心课题，大肆贩卖“亲日至上”、“日中亲善是生存的唯一保障”等货色；“日语课”美其名曰“中日同文同

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胡说什么“学日语是日中睦邻友好、携手御敌的重要武器”，“军事课”教师由日、伪军、警察担任，叫嚷日军的操练方法是最科学、最先进的，要以日军为榜样，一丝不苟地去学习、演练，一旦发现有的学生动作不够规范，除拳打脚踢外，还加以“对日本友邦不尊重”的罪名。其他课程亦根据其政治需要讲授，在历史课中删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闪烁着民族光芒的“五四”、“一二·九”等爱国运动。在数学课中亦加杂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应用题。如从中国某地到日本旅行所需时间的计算题等。体育课和运动场上常让学生做“三足竞走”的游戏，说这犹如中日同呼吸、共命运，两者血肉相连的关系，美其名曰“中日亲善竞走”。此外还大力向学生灌输“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帮助建设中国，不是侵略，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论调，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在政治上，日军在各地的伪政权拼凑成立后，于1941年开始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发放身份证，扩编伪治安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推行“配给制”，肃清“不稳分子”及对我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妄图以此实现其变华北为“大东亚圣战”兵站基地的阴谋。为强化对其占领区的统治，实行保甲制。即户设户长，5户为邻，10户（两邻）为甲，5甲为保，设邻、甲、保长；25户为闾，设闾长，两闾为1坊，设坊长。一人有事（指从事抗日活动）全家受累，一户有事有5户担保，一邻有事10户受到株连，一甲有事全坊承担。这种“连坐法”是强制各户互相监督，相互告发，以此强制老百姓服劳役，征抽壮丁和接受奴化教育，以及承担各种苛捐杂税等。实行这一制度，日本宪兵队经常出动抓人，抓进宪兵队则是九死一生，搞得老百姓人人自危。以此高压手段达到其政治上控制、思想上统治、经济上掠夺的侵略目的。

在此期间，在鲁西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军有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和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四专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辖部队。两股顽军积极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六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政策，蓄意制造矛盾，破坏抗日活动，同时到处骚扰百姓，抢劫民财。1940年春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被我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九师主力一部驱逐出冀鲁豫边区濮阳、濮县地区；当年该部在日军配合下再次进驻濮阳、濮县地区；是年12月1日，石友三及其胞弟、三十九集团军教导师师长石友信因投降日军被该集团军副总司令高树勋处死后，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率部3000余人投降朝城日军，编为伪军第三十一师，由文大可任师长，在朝城各地修筑据点80余处，长期与我抗日军民为敌。

原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王金祥，在范筑先牺牲后，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命为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盘据莘县、朝城、观城一带，从事破坏抗日活动，唆使国民党顽固分子和地方反动势力，杀害、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公然宣布共产党抗日活动为非法，并勒令解散动委会等抗日群众组织。王金祥亲率顽军3000余人进攻驻莘县的第十支队机枪营，收拢原范部第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支队残部，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六、八、九旅，1940年3月被我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筑先纵队驱逐出鲁西北地区。

原范部第三支队司令齐子修，由王金祥任命为国民党第六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并收拢原范部第四、十九、二十九支队残部编成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七、十一旅，原据阳谷、寿张一带，后据茌平、博平地区，又西进占据聊城西北部和堂邑、冠县、莘县结合部地区。1940年秋，齐子修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其指挥机关迁至堂邑县梁山镇附近之蒿庄。时辖9个旅约万余人。开始时与日伪军暗地勾结，和平共居，各不相扰；1941年在日军占领之聊城县城设办事处（一说联络处）；当年冬所部

先后公开投降日军。齐部先后投降日军的有：保安第九旅副参谋长王克庄、营长赵振华、朱耀武、侯宗鲁约300余人；保安第八旅团长田福洲两个营600余人；×团团长郭培德100余人；1942年日军“九·二七”扫荡后齐子修率部公开投降，被编为伪中央第五十七军。翌年夏齐子修与日军发生矛盾，被日军扣押解往济南。与此同时，原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溃军吴连杰收拢国民党的游兵散勇和地方武装，盘据堂邑强征暴敛，搜刮民财，抓丁拉夫，欺压百姓，时而为土（匪）杂（牌），时而为伪顽军，后被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三十一旅，吴连杰任旅长。

国民党山东省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武装有山东省保安第二十二旅，由专员袁聘之、滕梅五、张××先后兼任旅长。初辖3个团、1个特务营共约8000余人，驻临清、清平等地。1942年底，滕梅五带两个团1000余人投降临清日军。同时，在高唐境内还有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七旅，旅长袁采蓉；保安第二十三旅，旅长邓协臣；保安独立第五团，团长陈胜堂和第七团，团长云茂才。这些旅、团，时而姓蒋，时而姓汪，与当地土杂和日伪军相勾结，各霸一方，残害百姓。

以上国民党顽军或与日军暗地勾结，或公开投降日军，成为鲁西北地区伪军中一支重要力量，对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重大威胁。

从聊城失守至1942年，鲁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机动灵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同时取得讨伐国民党顽军石友三及王金祥等战斗的胜利。1941年、1942年，日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占领区，对鲁西北根据地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体战”，频繁地进行残酷的扫荡。经过鲁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奋勇抵抗，有针对性地开展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在1939至1942年

四年中，在各次战斗中共击毙日伪军2543人，内日军382人；击伤日伪军1665人，内日军29人；俘日伪军3217人，内日军16人；缴获各种枪支1351支，炮2门；拔掉了部分日伪据点，杀掉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和我方缺乏斗争经验，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不适应等，于1942年底，鲁西北地区抗日形势发生空前恶化。临清、清平、馆陶、高唐、博平、茌平、聊城、东阿、阳谷、朝城、堂邑、寿张等县大部地区被日伪军占领，一部或一小部村庄为游击区或半游击区。仅濮县北部、范县大部、观城大部、朝城西北部、冠县南部地区为抗日根据地。我冀鲁豫、冀南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运西、鲁西北地委、专署、军分区集中活动在这东西五六十华里、南北百余华里这一小块土地上。鲁西北平原在一个时期“抬头见岗楼，行走跨路沟，烧杀遍地是，狼烟冲云头”，加之灾荒严重，我抗日军民的衣食、弹药极其匮乏，鲁西北地区抗日斗争处于极其艰苦的相持阶段。

1943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仍处于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根据“大东亚战争”的需要，将在中国的日军分为野战、守备两种。野战军驻防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守备军分驻在其他占领区。驻鲁西北地区的日军为守备军。其任务是继续推行以军事为主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体战”。同时，加强伪政权，扩充伪武装，以维持“治安区”的社会秩序；对农村加紧掠夺粮食、棉花等战争物资；大肆抓丁、逮捕抗日军民送往东北给日本充当劳工，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华策略。为此，（一）扶植各级伪政权，调整职能部门，由日军充任顾问，加强机构的监督指导，进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野蛮的经济掠夺。鲁西北地区各县伪政权在辖区内竭力推行1943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五大决战目标，即集中物资、精神两方面“总力战”，加强国民组织，提高国防意识，开发增运战时重要物资，

保护资源，妄想确保其占领区和经济掠夺，让中国人为日军侵华战争效劳，甘当亡国奴。（二）扩大伪军，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接替日军防务。1943年5月将各县伪警备队改为保安队，这是伪军人数最多的一年。仅莘县伪保安队就有15个中队，伪军达2800余人；清平县伪保安队人数最少，尚有5个中队，伪军1000余人。一般县有10个中队左右，伪军2000人上下。1943年底，鲁西北地区各县伪保安队伪军达30000余人。（三）加强反共领导，各县建立区、乡、村四级剿共委员会。该会为县政府、新民会和军方三位一体的组织机构，由伪县长、区长充任两级剿共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由同级军、政、新民会负责人为代表或选拔适于“总力战”的人物担任。各乡、村亦设剿共委员会，为直接担当剿共工作的下层组织，亦由伪乡、村长任主任委员。（四）增设特务机关，加强思想控制，搜集抗日情报。1943年春，日伪一八二〇部队在天津成立，该特务组织派往临清便衣特务22人。其任务是保护临清以南和天津、临清间卫运河日伪军物资运输的安全。同年9月，在临清县建立北特警大队，为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的下属组织。其任务是侦察、摧毁中共在各地的秘密组织，下设对共调查班、科学侦察班、特别侦探队和临时特别情报队，隶属华北特别警备队第二大队和驻济日军第十二军军部。（五）组织群众团体，实行反共，破坏抗日活动。1943年9月在各县成立华北民众反共大同盟的下属组织——县、乡反共大同盟支部，并成立反共工作团，利用所谓群众团体专门从事反共工作。（六）各县新民会改称新民总会，增设自卫科、训练科；组织社会、宗教、文化和青少年等十几个团体，为其外围组织。其工作纲领是“发扬新民精神，实行和平反共，完成国民组织，团结东亚民族，建设世界新秩序”，实行反共卖国、助纣为虐的汉奸路线。

同时，各地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小规模“扫荡”以抢粮棉、抓壮丁为主；大规模的“扫荡”，仍以围

剿、合围、偷袭等战术疯狂进攻我抗日党、政、军机关和中心根据地。1943年4月17日，驻冠县、馆陶、临清等13县日军1500人、伪军3000余人，突然对冠、馆、临三县结合部地区实行“铁壁合围”，企图一举消灭我开辟卫东根据的部队。6月，临清、聊城、冠县、莘县等10县日伪军14500余人，对朝北、冠南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10月3日，驻济南日军五十九师团从济南直奔濮范观抗日中心区进行“扫荡”，7日在返济途中与聊城、在平日伪军配合，对茌南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10月12日至14日，济南、济宁等地日伪军出动15000余人，在飞机、汽车、坦克配合下，分13路，对濮范观中心区进行反复“扫荡”，妄想消灭和摧垮冀鲁豫边区的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此时，朝城、寿张等地日伪军乘“扫荡”之机在一些村庄安设据点，不久即被我军拔掉。10月下旬，临清、清平伪顽军肖健九勾结聊城、临清日伪军数千人合围冀南七分区基干团驻地清平县陈官营村，在突围中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肖永智等70余人壮烈牺牲。日伪军在每次“扫荡”中屠杀群众，奸淫妇女，抢夺财粮满载而归。

在1943年中，鲁西北地区各地党组织和广大军民认真总结作战经验，在军事上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开展民主民生和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全民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加强敌伪工作，对日军及伪军家属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以争取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在这一年里，运西地委、军分区组成昆山支队，深入黄河两岸昆山地区，采用大胆穿插的战术，灵活机动地阻滞了日伪军向我中心区的“蚕食”进攻，吸引日伪军东调，减轻了中心区的压力。同时，摧毁部分伪政权、伪组织，镇压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叛徒、特务等反动势力。至当年夏秋，昆张地区基本上恢复了抗日秩序，巩固扩大了濮范观中心区。泰运地

委、军分区组建了104个小支队和武工队，带领广大群众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不仅恢复了茌南根据地，还恢复了茌（平）齐（河）禹（城）边和聊（城）阳（谷）阿（东阿）边两块根据地，泰运地区基本恢复了“九·二七”大“扫荡”前的抗日形势。鲁西北地委、军分区派遣5支小分队深入冠（县）堂（邑）公路两侧、卫河以东和朝城周围等伪军占领区发动群众，实行民兵联防，制止了齐子修、文大可部对根据地的“蚕食”，从而巩固了朝北冠南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与此同时，冀南三分区主力部队、冀南四分区东进支队和鲁西北军分区主力开进卫河以东的馆陶、临清、冠县、堂邑结合部和清平南部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当地反动势力。

同年7月上旬，运西军分区与有关军分区配合发动了朝南战役，打击了伪军第三十一师文大可部，俘虏其旅长以下官兵732人，毙伤伪军1000余人，攻克据点77个，迫使文部伪顽龟缩在朝城县城附近的8个据点内。11月，为粉碎占据濮阳、濮县一带的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向我濮范观中心区“蚕食”，冀鲁豫军区组织有关军分区部队采用“掏心”战术，袭入该军总部驻地八公桥，歼灭其总部及1个多团2152人，俘其总参谋长甄纪印等高级军官多人，彻底粉碎其“蚕食”中心区的阴谋。鲁西北地区抗日军民在这一年内拔除日伪据点、碉堡127个，在与日伪军作战中，毙、伤、俘虏伪军3819人，投降、起义的伪军1500余人。此时，鲁西北地区与运东部分地区、运西黄河以北与中心区已经连成一片，大部农村成为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基本上恢复到日伪军“四·二九”、“九·二七”“扫荡”以前的抗日形势。

至此，鲁西北各级党组织在新恢复的地区组建各级抗日政权，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加强对敌斗争。慑于八路军的声威，各地据点的伪军已不敢轻举妄动，日军大规模的“扫荡”次数亦少了。除小股日伪军到游击区抓丁抢粮外，未敢再向我根据地进犯。至

此，鲁西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

三

进入1944年后，侵华日军被迫对抗日根据地由攻势转为守势。促使这一战略方针转变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人民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已在困难中崛起，显示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不可战胜的伟大气势；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于1943年底开始从中国战场抽调出部分精锐兵团，削弱了在中国日军的军事力量；三是日本侵略者兵力匮乏，战线过长，新补充的兵力缺乏训练，战斗力差。为此，在华日军从1944年起陆续将驻防鲁西北周围铁路线的日军第三十二、三十五、一一〇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及独立第一混成旅团调走，遗防仅由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新编第一一七师团及独立步兵第一旅团等部接管，兵力明显减少，且多系新征之老年和少年士兵，厌战情绪严重，战斗力顿减。此时驻鲁西北日军亦大为减少，仅由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的两个大队驻防。临清县原驻日军一个联队，现仅一个大队，由1000人减为300余人；高唐、聊城原为大队，现为中队，由300余人减为100余人；其他县原为中队，现为小队，由100余人减为50人左右。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在伪县公署、保安队、新民会等组织中担任顾问、指导官等职务。1945年夏，日军为阻止美国军队进攻日本本土，加强中国东南部地区的防御，又将驻山东省德州、济南、泰安一线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调出，由日军新编第四十三军驻防济南和鲁西各地。这时鲁西北地区仅临清、聊城各有日军100余人，其他县多是日军顾问和指挥官。不少县日军仅有数人或20人左右。1944年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为加强鲁西北治安，派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军（辖三个团）约3000人。其中两个团分别驻在聊城、阳谷；一个团分别驻在冠县、清平、临清

等地，集团军并在临清设治安军第四〇〇部队驻临电台办事处，活动在临清日伪军队内部。为加强对根据地党政军情报控制，进行突袭和破坏，在临清加强北特警特务组织；同时驻各地日军、特务机关及宪兵队配备科学探测器，及时掌握我党政军动向，有针对性地向根据地发起进攻。

此时期，驻鲁西北地区日伪军的主要任务为确保占领区治安，加紧掠夺战略物资运往日本，支援“大东亚圣战”。为此，在军事上将分散的日伪军适当集中在重要县城、集镇和交通要道的据点，放弃一部分偏远的小据点。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机动讨伐和组织小部队挺进、奇袭作战，达到骚扰、破坏根据地的目的。扩大县、区保安队，强化村级政权及自卫等。在经济上在占领区大办“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强征抢收粮棉，严格控制生活必需品外流，大肆抢掠搜刮中国财富运回本国，强抓壮丁送往东北和日本，以弥补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政治上加强扶植伪政权，将伪政权人员、军警人员推到前方。以中国人治中国人，日军充当后盾，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同时继续向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宣扬“中日亲善”、“东亚共存共荣”支援“大东亚圣战”等。

至1945年夏，在鲁西北地区的日伪军进行“扫荡”和偷袭63次。1944年2月21日，冠县日伪军300余人对祭庄集一带进行“扫荡”，抢走粮食28万斤、耕牛40头，抓走群众140人。2月间，馆陶县日伪军400余人对驻在卫东吴寨的东进支队进行袭击，我32名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4月19日，临清、威县、邱县、馆陶日伪军1000余人，对临清西部根据地进行“扫荡”，将下堡寺一带共产党员、村干部、民兵、群众28人，活活投入下堡寺村东北角水井内。4月间，东阿县刘旺山伪据点的伪军抓民兵3人，施用刺眼、割耳、砍手、剥足等酷刑，惨不忍睹。6月9日，聊城、临清、堂邑日伪军2000余人，对驻在临清、堂邑结合部的

大界牌村的东进支队进行合击，并向群众抢粮，队长夏金亮等100余名指战员在护粮战斗中牺牲。6月27日，聊城、东阿、阳谷、茌平、博平日伪军数千人，对聊、阿、茌结合部地区“扫荡”，聊城（筑先）县委、政府机关和县大队部分人员被围困于张会所村以南、顾官屯以北的田野里。聊城县委敌工部长于化民、武装部长韩效民和干部、战士、群众134人，被集体枪杀，7月7日，堂邑县王二大寨反动地主张九槐（外号六猪头）勾结馆陶县影庄据点日伪军200余人偷袭该村，将藏在地道内29名群众杀害，有三户被杀绝。1944年至1945年，博平县伪自卫总团团长罗兆荣杀害抗日家属300余人，致使400余户抗日家属2000余人被迫离乡背井，逃往异乡。1945年2月19日，聊城、东阿、茌平日伪军500余人，对东阿枣棵杨一带进行“扫荡”，杀害该村党员、干部、群众31人，打伤致残28人，抓走15人，烧毁房屋120间。3月29日，茌平、聊城、临清日伪军和驻聊城治安军等3700余人，围攻茌平抗日模范村张家楼，激战三日，日伪军攻入村内杀害党员、村干、民兵、群众等333人，打伤271人，抓走264人。此时期，日伪特务机关及日伪军偷袭抗日机关、杀害基层抗日人员和群众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1944年春，临清、冠县日伪军数百人，对鲁西北地委驻莘县河涯村借粮试点工作组进行偷袭，将工作组长、莘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桂栖和工作组成员靖瑞图等5人杀害。1月间逃往阳谷县城的朝城伪县长刘金岭派伪军队长吴玉章率伪军200余人，偷袭朝城四区区委机关、区委书记万守仁等4人在突围中牺牲。是春，刘金岭与莘县杜庄汉奸勾结，派伪军夜袭杜庄，杀害我自卫队长和民兵6人。3月，临清、馆陶日伪军数百人，在一天拂晓突袭聊南工委、办事处驻地靳屯村，将工委书记刘洪源、办事处秘书韩伟抓走。4月21日，临清日伪军一部偷袭卫东五区交通站驻地石佛村，站长李道光 and 敌工人员沈汝界等8人被捕，不久被杀害在临清县城大街

上。

从1944年以后，鲁西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方针和“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总结过去作战经验教训，改变战术，把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壮大军事力量，大打人民战争。同时，在根据地进一步贯彻落实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建政及减租减息等党的十大政策，要求广大干部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斗争。从1944年至1945年日军投降，鲁西北地区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根据冀鲁豫分局、军区的指示，先后向驻鲁西北地区的日伪军发起了1944年春夏和冬季攻势和1945年春夏局部反攻，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壮大了抗日力量，扩大了根据地。从而改变了鲁西北地区的抗日形势，为全面反攻，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条件。

在1944年对日伪军攻势作战中，2月11日，冀鲁豫第一分区（泰运）三团在聊城、阳谷县大队配合下进攻聊城县东北杨集据点，歼灭伪军100余人。当月，对在聊城至阳谷公路上“扫荡”之敌伏击三次，毙伤伪东阿县大队长刘德超以下伪军400余人。3月，分区三团和阳谷县大队在聊（城）阳（谷）公路郭槐陈一带袭击聊城治安军，歼灭伪军60余人。当月，分区二团在东阿县大队配合下，先后袭击杨柳、铜城伪军据点，歼伪军200余人。4月，分区一、二团和东阿县大队在刘致远司令员指挥下攻克牛角店、湖溪渡等据点，歼伪军数百人。至同年7月底，日伪军在东阿县黄河以北地区40余个据点先后被我军攻克，这一地区全部收复。同时在7月初，分区二团和博平县大队攻克张营据点，

歼伪军100余人，并伏击外出抢粮的博平伪军罗兆荣部伪军200余人。当日在聊禹公路博平县内与路过的日军8辆汽车相遇，经过激烈战斗，歼日军100余人，汽车8辆全被我缴获。6月19日，我第一分区一、二团，第四分区十一团，第六分区十九团和清平、博平、聊城、齐禹等县大队一部，在刘致远司令员统一指挥下，对盘据在清平、博平交界大马丁村的伪军赵廷柱团、莱屯徐冠五团进行围歼，经过激战，全歼赵廷柱团400余人，歼灭增援的伪治安军第二十四团一个营，俘伪团长以下100余人。当年秋冬，分区主力一部和阳谷县大队在刘致远司令员指挥下先后攻克古柳树、朱庄等伪据点，歼伪军500余人。聊城县武工队夜间潜入聊城城内，活捉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军第十七团副团长张建洲。茌平县大张楼村群众奋起打死、打伤前来进犯的李岐山部伪军250余人，被群众誉为“英雄村”。分区二团和茌平、博平县大队攻克伪军李岐山部郝楼据点，歼伪军一部；同时毙、俘由聊城前来增援的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军团长田森以下伪军180余人。冀鲁豫第七军分区部队在1944年春夏与各县大队攻克一部分伪据点，歼灭部分伪军，并伏击了抢粮的日伪军，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8月1日，以七分区二十二团、基干团为主，配合莘县、朝城、冠县、聊堂县大队，由分区赵健民司令员统一指挥，在打入莘县伪军内部的共产党员范永堂等人策应下解放莘县县城，活捉伪县长刘仙洲，歼伪军20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机枪12挺等武器。同时一举扫除莘县县城周围西关、燕店、马厂、王化、张屯、玉皇庙、十八里铺、豆村、后姜庄等伪据点。8日，驻聊城日军1000余人再次占领莘县县城，并在杨庄、高庙安设据点，不久被我莘县抗日武装拔掉。至11月18日，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驻莘县日伪军被迫放弃县城，逃往聊城、堂邑。至此，莘县全境被我收复。同年秋冬，七分区在馆陶、冠县地区伏击抢粮、抢棉的日伪军，毙伤日伪指导官川崎、顾问滕泉以下伪军10余人及伪馆

陶县长张呈瑞以下伪军政人员数百人，堂邑温集等伪据点被迫撤离。攻克被伪顽吴连杰盘据多年的吴海子、邓庄两据点，毙、俘伪军团长宋凤岐以下伪军200余人，伪顽旅长吴连杰被迫率残部逃往临清。冀鲁豫第八分区部队在朝城、观城及范县县大队配合下，于1944年1、2月间先后攻克朝城县境内伪军据点，伪军一部被歼，一部逃回城内。2月28日，朝城县城的伪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文大可、伪县长刘金岭等，在我运西地区抗日军民不断打击和强大军事压力下，被迫弃城东逃。至此朝城地区全部解放。4月，八分区七、八团、昆山支队一部和一分区部队一部，在曾思玉指挥下围攻张秋，激战一天，扫清张秋附近据点，占据四关，歼灭伪军1000余人；后因阴雨连绵，围攻部队撤离，张秋伪军在聊城伪军接应下逃往阳谷。至此，张秋地区解放。11月25日，驻寿张县城日伪军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下，日军逃往郛城，伪军逃往寿张至阳谷公路上的徐楼伪据点；27日，在驻阳谷县日伪军协助下寿张县伪副大队长刘得志率伪军600余人，再度占领寿张县城。12月5日，以八分区第七团、炮兵团、特务团为主，与寿张等县地方武装配合，在曾思玉司令员统一指挥下，再度解放寿张县城。伪军除少数溃逃阳谷外，歼伪军副大队长刘得志以下伪军400余人；同时将寿张至阳谷公路上的后周家、费楼、徐楼等伪据点拔掉，歼伪军数百人。至此，寿张县全境解放。与此同时，冀鲁豫第四分区在临清、馆陶县大队配合下，攻击一部伪据点和伏击了外出抢粮的日伪军。

1945年春夏，鲁西北地区军民遵照党中央关于“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的指示，冀鲁豫第七、八分区部队及观城、莘县等县大队参加了南乐战役；七分区部队参加了安阳战役。同时，各分区部队根据所辖区敌我情况主动地向当地日伪军开展了攻势。5月间，一分区部队及聊城、阳谷、东阿县大队，与第七分区配合对聊阳公路两侧

沿线日伪军发动攻势，先后攻克朱庄、陶楼、安乐镇、定水镇等16个伪军据点，歼伪军1000余人，破坏公路60余华里，斩断了聊城与阳谷日伪军的联系，使阳谷县城的伪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7月21日至26日冀鲁豫军区第一、七、八分区部队及第四分区一部约6000余人，与寿张、濮县、范县、朝城等县大队配合，在宋任穷、杨勇领导指挥下，发动了阳谷战役。八分区部队为攻城部队，向盘据在阳谷县城的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军第九团及阳谷、朝城、寿张、莘县等县伪县政府、警备大队发起猛烈进攻；一分区部队担负阻击聊城南下增援的伪军及解放聊阳之间的伪军据点；七分区部队担任围攻堂邑、沙镇之伪军；四分区部队一部在临清西部负责打击日伪、钳制临清日伪军。经过6天激战，解放阳谷县城，共毙、伤、俘伪治安军中校团长、伪县长、伪县大队长等以下伪军政人员3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5挺、步枪3000余支、迫击炮2门、战马100余匹及粮食300万斤。至此，阳谷全境解放。

与此同时，四分区部队攻克临清西部的花牛、马店、洪官营、白庄、台庄、龙潭、高村等日伪军据点；一分区部队攻克阳谷郭店屯以北聊阳公路两侧的部分伪军据点；七分区攻克沙镇、田庄等伪军据点，除配合阳谷战役外，在所辖地区发起了以歼灭日伪军主要力量、夺取重要城镇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攻势。7月9日由七分区副司令员白云带领二十二、二十四团及马颊河、武训独立团等武装夜袭堂邑县城，当夜占领堂邑四关，进而攻入城内，将伪军压至许家大楼，伪军一部被歼，一部反正。10日，在阻击聊城增援堂邑之日伪军战斗中毙伤日军8人及伪军一部。当日下午驻聊城日军出动100余人、伪军500余人增援堂邑守敌，分区部队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于11日晨撤出堂邑县城。在此次夜袭战斗中毙伪军1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伪军反正、起义150余人。当月21日，分区二十二团、马颊河支队及冠县、莘县、朝城县大队，在司令员赵健民指挥下，激战数小时，再次解

放堂邑县城。此次战斗毙伪军20余人、俘20余人，伪县长胡玉南、伪保安大队副车农青等军政人员200余人被迫宣布投降，同时攻克道口铺伪军据点。当月11日、28日，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驻冠县、馆陶县日伪军分别弃城逃往临清。冀鲁豫第一分区部队于同年5月参加东平战役时围攻东阿县城（今平阴东阿镇），经过激烈战斗攻入城内，拔掉伪军东城据点；虽经三日激战，日军占据之西城未克。19日，泰安、平阴日伪军增援，我为避免损失，主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消灭日军20余人，毙、伤、俘伪县长乔迪之以下官兵700余人。

这一时期，鲁西北地区党政军进一步加强了敌伪工作。在我军反攻胜利形势下，伪军不断向我军投降和宣布起义。1944年2月，阳谷县阿城据点3个中队伪军起义；5月间，东阿县伪军15个中队1000余人起义；6月，堂邑北部伪顽军吴连杰部驻斗虎屯的程子芳团起义；同年秋，博平伪五区150余名伪军起义；12月，清平县伪二区杨华亭团特务连起义；1945年6月，卫东彭庄据点伪军120余人起义；7月1日，高唐伪五区伪顽军350余人起义；8月初，高唐县伪尹楼区尹传业团起义。此期间，鲁西北地区伪军起义14起，1990余人。

经过1944年春夏季、冬季作战攻势和1945年春夏局部反攻，鲁西北地区以冀鲁豫一、七、八分区部队为主力，配合各县武装，先后解放朝城、莘县、寿张、堂邑、冠县、馆陶和阳谷7座县城，攻克日伪军据点近100个，毙、伤、俘日伪军12170人，内日军30余人，缴获炮16门、机枪28挺、步枪4900支。同时，各县、区抗日武装攻克伪据点44个，歼敌690人。合计解放县城7座，攻克日伪据点140个，毙、伤、俘日伪军12860人，缴获炮26门、机枪52挺、步枪7690支及一大宗物资。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境内扔下两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挺进中国东北；10日

至11日，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先后发出向日伪军占领区进军，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夺取抗日胜利的指示。14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诸项规定；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鲁西北地区驻聊城、临清等地的日军于8月15、16日分别逃往济南、德州、禹城等地。嗣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为抢夺鲁西北抗战胜利果实，任命王金祥为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到聊城后将聊城、博平、高唐等地伪、杂（牌）、土（匪）军改编为国民党保安部队。聊城伪军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四旅，任命伪军头子赵振华、郭培德为正、副旅长；博平伪军改编为保安第×旅，任命罗兆荣为旅长；茌平伪军改编为保安第二十二旅，李岐山任旅长兼茌平县长；高唐伪军、杂军为保安第×旅，分别由庞炳中、郭进诚为旅长。此时，国民党山东省第四区专员熊纪明进入临清，将临清、清平一带伪、杂、土军收编为保安第三十九、四十旅，由伪军头子张敬斋、肖子玉为旅长；盘据在夏津、高唐边界的伪军张栋臣（外号张八师）、高唐伪县长李彩题等亦摇身一变，成为“国军”山东省保安师、旅、团长，继续盘据鲁西北各县与人民为敌。

鲁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关于反攻的指示和冀鲁豫分局、军区的作战部署，鲁西北军分区及所辖县大队兵分两路，以分区第二十四团、永智大队、卫东、清平县大队和冠县、堂邑民兵营为北路军，负责扫清聊城至临清一线、临清至高唐一线的伪军；分区马颊河支队、独立团、莘县、堂邑县大队为东路军，与泰运军分区一团、聊城、东阿等县大队及部分民兵包围聊城。北路部队8月18日攻克清平县康庄，歼伪军70余人；19至27日先后攻克清平县的王集、杨存庄、松林、姚楼、柏庄等伪军据点，歼伪军一部；同时扫清临清县城南、北、东三面外围伪军，临清县城之伪军处于我包围之

中。至8月底，为有利国共谈判，围困聊城部队奉命撤离。8月31日，第一军分区二、四团，第四军分区十一团，第六军分区十九团，第七军分区二十四团以及第四军分区东进支队、西进支队、独立营和清平、堂邑、冠县等县民兵约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指挥下发起临清战役。经激战一昼夜，9月1日解放临清县城，毙、俘伪军6000余人，活捉伪军头目肖子玉、吴连杰、郑延绍、吴作修等。缴获机枪30挺、炮3门、步枪4000余支、汽车2辆、战马170余匹等战利品。同时，攻克清平县的双井、宋窑、包庄、五龙党庙等伪军据点，歼伪军一部。8月14日，泰运军分区的二、三、四、五、六团和部分县大队武装，在刘致远司令员、政委邓存伦指挥下，对东阿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驻东阿日军30余人、伪军500余人仓惶逃往济南。至此，东阿全境解放。17日，在平阴、长清县大队配合下收复平阴；23日，收复长清县城及一部伪军据点。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投降书上签字正式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鲁西北地区日军撤退，所有临清、馆陶、冠县、堂邑、莘县、阳谷、寿张、朝城、东阿等县城和聊城、茌平、博平县大部农村收复，获得解放。但仍有一部名曰“国军”、实为伪军还占据着聊城、博平、茌平县城及部分农村；占据着高唐县城及大部农村。

日军投降后，鲁西北地区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关于收复失地的指示及冀鲁豫分局、军区作战部署，9月3日，泰运军分区部队收复齐河县城，扫清齐（河）禹（城）一带伪军据点，歼伪军一部。18日，以军分区二、三、四、五、六团为主，与茌平、齐禹、东阿等县大队配合，在刘致远、邓存伦指挥下，向茌平伪军发起进攻；19、20日扫清茌平县周围伪据点，及四关伪警察所和保安队；22日解放茌平县城，击毙李岐山、李长禄等伪旅、团长及伪县长以下200余人，俘伪旅参谋长李子方等以下

1900余人，缴获炮3门、机枪16挺、步枪3000余支。至此，除伪顽军云茂才、吴春阳等仍盘据在高唐、茌平、禹城结合部的据点外，茌平其他地区均被我解放。参与临清战役的部队一部，在临清解放后，挥师东进，9月4日，收复夏津、清平县城，歼伪军一部。6日，第六军分区十九团、运河支队、鲁西北、泰运军分区二十四、二团等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夹击驻高唐境内之伪军，先后攻克邱庄、打渔李、姜家铺、齐天庙、刘凹、蒋官屯、杜庄等17个据点，俘伪团长贺兴奎以下570余人，缴获机枪16挺、步枪580余支。同日，对高唐县城实施围攻，激战一日，城内伪顽杂军头子张栋臣、李彩题等2000余人于翌日（9月7日）上午弃城北逃德州、平原等地，高唐县城遂告解放。在解放高唐的同时，鲁西北军分区独立团等部队对盘据在高唐县城西郭庄据点伪军郭进诚部进行围攻。郭庄据点设有电网，工事坚固，防守严密，伪军装备优良，实力较强，经我围攻多次未克。至12月5日，在独立团及高唐、冠县、莘县、清平等县大队配合围攻下，伪军物资供应断绝，军心动摇，郭进诚被迫率伪军100余人东窜，歼伪军1000余人，郭庄被我攻克。至此，高唐县境内除县城东南徐官屯、李明桥、朱双槐庄、牛官屯、五里铺、三官庙、小刘庄等伪据点外，其他地区均为解放区。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毫无和平诚意，《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即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为制止内战，收复腹地，被伪顽军盘据的聊城、博平，于1945年12月22日决定组织聊博战役。以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为主，配合冀鲁豫军区第四、六团、冀南军区第二十四团、冀中军区第十六团和地方武装配合，在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统一指挥下实施此次战役。12月31日，由二纵四旅、泰运军分区部队和茌平、博平等县大队围攻伪顽军罗兆荣盘据之罗庄、谢以海占据之博平县城及县城周围的张营、小刘庄、李明还等29个伪军据点，

经过激战，歼伪军一部。罗兆荣、谢以海等在我军强大军力震慑下，于1946年1月1日夜间率部逃往禹城，其他伪军相继投降。至此，博平县全境解放。1945年12月31日至1946年1月12日，由二纵五、六旅和冀南、冀中部队围攻聊城，均因城高梯矮，伪顽负隅顽抗，我军主动撤下。1月10日，国共两党签定停止军事冲突的停战令于当月13日午夜生效，我军围城部队为昭示信义，于13日下午大部撤离，只留冀南军区第二十四团和冀鲁豫军区部分武装驻防聊城四关，围而不打，严密监视城内伪顽军的行动。

聊城城内伪顽军王金祥、赵振华部无视停战协定，经常四出骚扰百姓，袭击我围城部队。在停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用活埋、凌迟等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革命干部60余人。对城内居民更是肆意抢掠，任意屠杀，致使横尸街头，比比皆是。我军鉴于城内居民断粮缺柴、生活困难，曾多次将粮柴送至城门均被伪军抢去，并用枪托、棍棒毒打、驱散前来领粮的群众。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发起全面内战。晋冀鲁豫军区命令冀南军区鲁西北军分区第二十四团、冀鲁豫军区泰运军分区第一、六团等部队，全面围困聊城县城之伪军，待机歼灭之。此间，王金祥、赵振华等伪顽头子等曾多次寻机逃跑，均遭我迎头痛击龟缩城内；由于围城部队军事和政治的攻势，城内伪军官兵时有越城出逃或向我投降，一年之内伪军减少一半，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减。12月18日，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以第七纵队为主，冀南、冀鲁豫地方部队配合，由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指挥收复聊城。22日解放聊城战斗开始，连续猛烈的炮火攻击，使伪军受到重大损失。28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派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企图经齐河向聊城接应聊城伪军逃窜，受到我军阻截痛击。王金祥等在我军沉重打击下，于12月31日夜率残部一部弃城向东北方向出逃，经由高唐窜至晏城。余部相继被我击溃、消灭，或向我军投降。1947年元旦聊城光复。解放聊城战役中，毙、

俘王金祥、赵振华部伪军及济南国民党援兵700余人，缴获炮2门、机枪4挺，汽车11辆，电台3部，步枪1500余支及大批物资。

与此同时，冀南军区独立旅、第二、四、五军分区部队、渤海军区第七、十一师、第二军分区部队、冀鲁豫军区泰运军分区部队和高唐、茌平、齐禹等县大队配合，对占据高唐、茌平县结合部地区的伪、顽、杂、土匪军发起攻击。至1947年1月，先后攻克邓协忱盘据之朱双槐庄、庞炳申部盘据之徐官屯、牛官屯、五里铺等村，云茂才部盘据之云庄、三官庙、郭庄、鲁酒庄，陈圣堂部盘据之小刘庄，及郭广仁、王葦子、杨敬斋部盘据之杜庄、前杨、李副大屯等伪据点。毙、伤伪、顽、杂、土匪军1000余人，俘1200余人，投降100余人。仅徐官屯战斗即缴获炮5门、掷弹筒31个、机枪100余挺，步枪2000余支；马、骡240匹及汽车6辆等。至此，鲁西北地区全部解放。

为向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提供证据，1946年3月，鲁西北地区筑先（今聊城市东南部地区）、阳谷、寿张、张秋（今阳谷县张秋镇一带）、东阿、茌平、博平、朝城、观城、濮县、范县等11个县成立敌灾调查委员会，对八年日军侵华战争给这一地区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进行了调查，情况如下：

被日伪军杀害47335人，日伪特务杀害1518人，日伪军施用细菌武器，制造瘟疫造成病、残、死亡319162人，被迫流亡、失踪13913人，被抓壮丁充当劳工69605人，合计451533人，占当时这11个县总人口1967755人的23%。1946年春仍有病残者40126人，妇女被日伪军奸淫者染病者2295人，无家可归、少衣缺食者333512人，被日伪军打伤致残者4263人。日伪军毁坏耕地10285亩，荒芜土地12805亩，合计523090亩，占总土地5897458亩的10.28%。损失牲口69763头，占原有牲口210521头的33.1%、损失大车13345辆，占原有大车62384辆的22.1%。损失房屋476706间，占原有房屋2622538间的18.1%。

在八年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将侵华兵力的75%、63%集中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并且积极扶植伪政权，组织伪军队，对根据地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鲁西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人民惨遭涂炭，日伪军所犯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全区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附记 本文简要介绍八年抗战时期日伪军在鲁西北地区活动的始末。这不过是日伪军在全国暴行的缩影。当然尤有甚者，如南京大屠杀、东北万人坑等更是惨绝人寰、骇人听闻。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鲁西北地区广大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在将过去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所遭受的苦难介绍给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将会认识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加深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真谛。

本文由吕保明根据《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冀鲁豫边区大事记》、《鲁西北革命史》和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料《华北治安战》（上、下册）、《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等书及聊城地区各市、县民主革命时期大事记、征集整理的有关日伪军资料整理而成。白士英核对，邓愧余充实修改。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难免出现一些缺点错误，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1992年6月

日军占领观城三天 无辜群众惨遭劫难

王协振 陈海林 马世祥整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肆南侵。12月，日军铁蹄踏进鲁西北，观城县国民党县长牛功勋带领政府人员携款闻风而逃。日军得知观城是一座空城，十分高兴。12月12日，日军华北军司令土肥原师团先头部队1000余人从朝城大摇大摆地向观城推进。此时，从卢沟桥南撤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保安旅（亦称手枪旅）正在清丰。下午4时左右，保安旅某团三营300余人在营长周树义带领下开进观城。进城后便关闭三门（观城无北门），布置防务，并派出一个连在鲍连长带领下到城北小王庄设伏。晚8时许，日军四路纵队毫无顾及地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数挺机枪一齐开火，毫无防备的日军被打得鬼哭狼嚎，死伤一片。当日军清醒过来组织反击时，三营已经撤退。因天黑不辨敌我，日军前后队互相射击，伤亡惨重。

日军遭到猛烈伏击，恼羞成怒，遂开进小王庄村，满街搜索。日军在一个草堆里抓到了没有来得及逃跑的50岁农民王新章，即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拳打脚踢，然后拉到村边一水洼处，用刺刀扎死了。敌人没有捕捉到伏击部队的踪影，即将为其带路的远庙村农民郭连齐严刑拷打，又用刺刀挑破胸腹，露出内脏，流出肠子。其凄厉的哀号声，在沉沉夜空中回荡，躲在数里远的

群众听得清清楚楚，一个个吓得毛骨悚然。

日军遭到伏击，黑夜不敢进城，当夜就驻进观城周围的远庙、桥下、三里庄、焦村、岳坊等村庄，对未逃出群众进行了无端惨害。

在岳坊村，十几个日军抓到青年农民白六的妻子，兽性大发，拉到一麦秸垛前轮奸。白六3岁的儿子，紧抱着妈妈的腿大哭，被一日军连踹两脚，顿时昏死过去。白六见妻子受辱，儿子被害，怒火中烧，赤手空拳和日军拚命撕打，被众日军团团围住，用刺刀活活扎死。白六妻虽奋力抵抗，但终被强捺于地，糟踏的昏死过去。日军在村里翻箱倒柜，大肆洗劫，当发现一顶国民党旧军帽时，向为其挑水喂马的青年农民吕福亭头上一扣，不问青红皂白，把吕福亭捆起来，用皮鞭、木棍拷打。吕福亭被打得死去活来，忍无可忍，挣扎着站起来，猛然用头向一敌人撞去，日军杀猪似地尖叫了一声，举起洋刀，将吕福亭的右臂砍下。接着，日军把他捆到一棵榆树上，开排枪射击后，又用刺刀挑开肚子，扒出肠子和内脏，砍掉左臂和头。就这样，一个年轻的中国农民，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变成了一堆目不忍睹的血肉。

在吕庙村，日军将60多的老人“搭拉”（小名）、“二憨子”（小名）、吕“二嘟噜”（小名），用洋刀劈得脑浆迸裂，身首异处。65岁的农民吕迷路被抓住后，让他供出抵抗部队的下落，他决不吐露。日军就用刀把他的嘴豁至两耳旁，又割断了他的喉咙。老人嗓子里呼噜呼噜地冒着血沫，疼得到处乱跑。

13日上午10时，日军从东、南两路向有二十九军驻守的观城内攻击，古老的观城遭到空前的劫难。东、南城门楼被日军炮弹击中，土石飞扬，坍塌崩裂。城内群众在极度恐慌中，争相逃命，但城门已被封锁，部分群众只好用绳索坠下城墙，涉过冰冷刺骨的护城河水，向城外逃去。日军一面向守城部队疯狂攻击，一面追杀四散逃难的群众。东关5名男女群众刚出家门不远，就被机

枪打死。28岁的农民姜银海，外逃中被打断下肢，当他拖着断腿，爬到桥下村头，被一日本兵赶上，照后心就是一枪，当即毙命。

下午4时左右，观城被日军攻破，守城官兵向清丰方向撤退。日军象野兽一样，从东南角蜂拥而入，见门就砸，见人就杀，对二十九军遗弃伤兵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对无辜群众大逞淫威，残暴屠杀，整个观城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在东城门附近，8名伤残中国士兵被搜出，日军把他们脱光衣服，刺刀戳，棍棒打，踢睾丸，大肆侮辱后，挨个用刺刀挑死。日军在西街一屋的炕上发现一名哀号呻吟的二十九军伤员，一拥而上，用刺刀、洋刀、砖头砍砸成肉泥，血浆、碎肉溅了满屋满炕。

南街30多岁的范宗胶，又聋又瞎，跌跌撞撞地到南门去找老母，被一阵乱枪打死；在街上讨饭的乞丐名叫傻牛，藏在一个草堆里，屁股露在外边，被鬼子的刺刀扎得满是血窟窿，活活疼死；裱糊匠李留成一家3口，未及躲避，被活活枪杀于街头。日军杀红了眼，连妇孺老幼也不放过。西街80岁的老汉王大个子，给砸门的敌人开门时，被迎面劈死。东街王兴法的母亲，怀抱不满一岁的孙女，躲在一小院的磨盘后，日军发现后，将孩子从怀中拽出，攒在地上，祖母见状，痛不欲生，扑在孩子身上，高声叫骂，随着两声枪响，祖孙二人被夺去了生命。时至今日，70多岁的王兴法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悲愤满腔，涕泪俱下。

当时，未逃出城的群众多躲在为防日军飞机轰炸而挖的地洞里。日军进院后，发现地洞就用机枪扫射，威逼群众出来，稍有怠慢，即被杀死。北街青年农民赵石滚、岳铁炮从洞内被掏出后，日本兵看他两人年轻，似有当过兵之嫌，不问青红皂白，拽至东街的一堵墙下，将枪抵近心口窝处，当即进行枪杀。日本兵在南街小高庄子，发现藏有男女群众的两个地洞，先向藏有妇女孩子的洞里打机枪，将20多个妇女威逼出来，带到一处供他们蹂

躏取乐。而后又向另一洞里开枪射击，当场将躲在洞口处的两个青年农民的腿打断，致使血流如注，惨叫不止。东街的薛东坠、史广彦等10人，眼见在地洞里躲避不下，抱着“当顺民”、“谁来给谁纳粮”的愚民心理，手执小纸旗，出洞迎接日军，结果一群日军团团围住，拳打脚踢一顿之后，用绳索串在一起。

就这样，日军在观城四街杀害群众有62人之多，街头、巷尾尸首横卧，血流遍地。下午5时左右，日军把从洞内逼迫出来的70余名群众，分别用长绳拴住左臂，连成数串，押往城南6里的郭连庄。

这时的郭连庄，已被日军糟踏得不成样子。这个只有200来人的小村庄，房屋被烧近100间，两名40岁未逃出来的妇女，被日军轮奸几乎致死，村内一片片浓烟烈火，日军把从观城抓来的部分群众，押至郭连庄村后的一个大场边，一溜站开，挨个搜查，当搜到掌鞋匠薛东坠时，发现了一个旧子弹壳，日军吼叫一声，不容分说，将他和后边的近20人拉到大场内，先把薛东坠等5人刺死。其余难胞看到日军用刺刀挑人，一阵骚动，有的想挣扎逃脱，这时，日军像饿狼一样扑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数十把刺刀在慌乱的人群中乱捅乱砍，18名群众挣扎着、哀叫着，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

与此同时，日军将另一伙50余名群众押至前郭连庄，为其挑水、喂马、烧火、做饭。之后，又挨个捆起来连成一串。难胞们被带到村中间一矮胖日军军官前，日军军官正对着水壶喝酒，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对请示的士兵把头一摆，什么话也没说，立即有一大群日本兵拥上来，把遇难群众押到村东老爷庙前的大洼坑北沿，面朝北被踢倒跪在地上，四周布满了岗哨和机枪。

夜幕已经降临，浓雾弥漫。村内燃起的熊熊大火映出日军狰狞的面孔。“日军要行凶！”一股不祥之兆袭上人们的心头。当

人们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扑哧”、“扑哧”刺刀穿破皮肉的声音传来，靠西头跪着的几个难胞哼都没哼一声，一头扑倒在地。此时，24岁的青年农民张聿哲，偷偷挣开绳索，眼见刺刀就要戳到自己后心，猛地站起，对着跪在东侧的难友大喊一声：

“日军要杀人了，快跑！”趁着夜雾和凶手的惊慌未定，转身从日军缝隙中冲出。刚跑出十几米，身后就响起机枪声，他随手甩出破羊皮袄，飞一样消失在旷野中。随着张聿哲这一声喊，面临死亡来临，求生的欲望使难胞们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纷纷站起来，高声叫骂着，向凶手撞去，踢打、撕咬……然而，赤手空拳，又被绳索连串在一起，难胞怎能抵住这嗜杀成性的日本兵，在阵阵撕裂心肺的惨叫声中，有的被刺破头颅，流出脑浆；有的被挑开肚子，流出肠子；有的被连刺数刀，血肉模糊……大洼坑死尸累累，血水横流。

3天后，日军撤离观城，四出逃难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古老繁华的观城已是满身疮痍，面目全非了。鸡、鸭、鹅、牛、羊、猪尽被吃光，桌、椅、床、大车、门板尽被焚烧，粮食、衣物被抢掠一空，饭锅有的被砸坏，有的被厕上屎尿。街上尸体横陈，血迹遍地。残存的南城门上悬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东城门里一大堆灰烬，灰烬里三四具被烧得焦黑的尸体。西街一个粪堆里，被扔进了7具尸体。子寻父，妻寻夫，人们恸哭着寻找自己失去的亲人。西街杨永可找到父亲的尸体时，尸体已残缺不全，头颅不知去向，上身被刺刀扎得稀烂，仅剩下两条腿没有伤痕。一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目睹这凄惨的场景，观城人民无不捶胸顿足，恨得咬牙切齿。

被日军杀害的有据可查的观城无辜群众中，有老人，也有婴儿；有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也有学生和出家的道人。仅南街被杀绝的就有4户人家，张显密一家就被害8人。给观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37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是观城人民的忌日。每年这天，人们都要为遇难同胞祭奠、扫墓，教育后代永远不忘遭受异邦侵略的深仇大恨。

附件一

血和泪的控诉

——观城惨案幸存者和遇难亲属的控诉

张聿哲：

我叫张聿哲，1913年生，观城南街高庄子人。日军攻打观城那年，俺全家都没跑出去。11月11日，鬼子围住了观城，我带着俺世清、二儿和俺世清娘往南门去了两次，也没有逃出城，我就带着他们躲到邻居三豁子叔家的地窖子里。他家有俩个洞，俺男的在南边洞里，女的在北边洞里。约摸过了一个钟头，鬼子就进了院，先往北边洞里打了一阵机枪，吓得里面的妇女孩子齐哭乱叫。妇女被鬼子逼出地窖子，拢到一块弄走了。后来听说年轻的妇女都叫鬼子糟踏了。把妇女逼出洞后，鬼子又朝俺这个洞打枪，躲在洞口的二黄病（小名，姓张）和二丙（小名，姓张），一个被打断了腿，一个被打折了胳膊，洞子里淌得都是血。鬼子把着洞口，叽哩哇啦地喊着，用机枪把我们逼出洞，一出洞，就用一根大绳一个挨一个地捆上了。在俺这个绳子上，共捆了20多人，都是从南街地洞里逼出来的。鬼子把俺这些人押到郭连庄后，就放开了，让给他们挑水、喂马、抬桌椅板凳、烧火。干了没多大工夫，鬼子又用大绳把我们一个个捆起来，带到村中间。在路北头，有一个矮胖鬼子军官，正对着水壶咕噜咕噜地喝酒。我心里想：看你们官咋着，还能把俺老百姓怎么样。等了一会儿，那个鬼子军官把头一摆，啥话也没说，鬼子兵向他施了一个礼，就把俺们

给牵走了。来到村东老爷庙大洼坑前，让俺一拉溜东西跪下，前后支上机关枪，东面和西面是拿步枪的鬼子把守。我一看，心想坏了，接着我就听到西边有“扑哧扑哧”的声音和人倒地的声音，鬼子用刺刀杀人了。我心里想：不能在这里等死，得逃。到鬼子杀到离我还有四五个人的时候，我把绳子偷偷挣开（只捆左胳膊），把身上穿的小羊皮袄的扣子解开，当鬼子快到我跟前的时候，我猛地站起来，喊了一声：“快跑哇，杀人哩！”扭脸从拿步枪的鬼子缝里挤出来向东跑去，我只听身后响了一阵子机枪，便把已披在身上的皮袄一甩，后面才不响了。我一口气跑到保安寺村朋友家，住了一夜，等了两天，又跑到下堤葛庄。后来听说，我喊了一声后，我东边跪着的人都没反应过来，只有俺街的王景明跑回来了。事后，有人拣到我的皮袄，上面被枪打的有窟窿，大概是我甩出皮袄，鬼子以为把我打死了，才没有再开枪。

史广彦：

我叫史广彦，观城东街史家拐人，1900年生。日军打观城的时候，俺家的人都躲到俺叔家的地窖子里了，天快落太阳的时候，鬼子攻进了城。当时俺想，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啥军头都兴过，咱老百姓反正是谁来了给谁拿粮，鬼子来了又能把咱咋着呢。俺十几个人就商量着，用红纸糊了个小旗，出洞去欢迎。刚出洞不远，就看见一群鬼子走过来了，俺还没走到跟前，就有一个鬼子过来，一把夺过小旗，给扔到地下。鬼子把俺十几个人带到翟家坑边上，五六个人一伙，五六个人一伙，面对着小坑，拉成一趟，听着鬼子拉枪栓，要杀我们了。正在这时，从北边过来一个拿太阳旗的鬼子，对着要打我们的鬼子用小旗一摆，又呜哩哇啦的说了几句话，鬼子就把子弹退出来了。俺十几个人被鬼子带着到南门，让俺给他扛着二十九军士兵丢下的枪。俺史家拐的10个人，被带到后郭连庄村后的一个场北边，一拉溜站着，鬼子

一个一个地搜我们身上。我是第五个被搜的。当时，我身上带了一个钥匙，被鬼子搜出扔了。接下去搜的是掌鞋的薛东坠，他不知道怎么搞的，身上带了一个子弹壳。鬼子一翻出来，用刺刀在他脸前晃了晃，就拉走了，后边的4个也被拉走了。这时候，鬼子又把俺5个朝前郭连庄带，路过那个大场的时候，才知道薛东坠和俺二黑叔他们让鬼子杀害了。俺二黑叔身上穿着棉袄，脚朝西北，头朝东南躺着，心口窝里黑乎乎的都是血。鬼子把我们5个带到前郭连庄一个院子里，给他退鸡毛、做饭。夜里，鬼子在前边烤火，我们想，反正也是死，跑吧，我跟我广林兄弟连跳了3道墙头跑出来了。

俺史家拐被抓到郭连庄的共有10个人，被鬼子杀了5个，他们是薛东坠、俺二黑叔、史五、史广殿、史彦华。我和史广然、史广林、史广勤、史广卫逃出来了。俺逃出的5个人中，现在就我一个活着了。

王锡田：

我叫王锡田，观城南街小高庄子人，1922年生。日本鬼子是1937年阴历11月11日下午3点多钟攻进观城的。俺高庄子一共20多户人家，在观城惨案中就被杀了28口，其中张显荣一家4口；小名叫黑文的一家4口；张显明一家两口全被鬼子杀绝了。

为啥俺高庄子死的人这么多，这么惨哩？因为高庄子靠南城门很近，国民党二十九军的部队在南城门的东南角抵抗，鬼子攻了3次也没攻开，伤亡很大。城破后，鬼子在南街、高庄子，不管老少见人就抓，没有来得及逃出的人都给捆了。

打仗的时候，我和父亲、母亲、舅舅都在地窖里藏着，鬼子进城以后，从里边给拽了出来，双手背着全都捆在一条绳子上，顺着南街向北走。路上，这条绳子上又先后捆了马连三、龙丙申、李大车等十几口人。我还看见有几口人也被鬼子捆在一条绳

子上。正走着，有个鬼子想抓鸡，看着我年龄小，就放开我，和一个小名叫片儿的孩子给他抓鸡。趁抓鸡的功夫，我躲在一个秫秸堆里藏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被捆走的人，大部分在郭连庄被刺刀扎死了。

鬼子走了以后，我去郭连庄找父亲和舅舅的尸体。到了郭连庄一个大坑沿上，看到了一堆堆被扎死的人，在泥水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每具尸体上都有不少刀口。我的一个小伙计，小名叫“怀起”才15岁，被刺刀扎在肚子上，肠子淌出一嘟噜，我还给他往里塞了塞。还有两个小伙计“三狗黑子”、“邓臣”也都才十五六岁，也被活活扎死了，我翻了几个尸体才找到舅舅，他身上被扎了三四刀，血都淌没了。

没找到父亲尸体，我就赶紧回城里。在南城门口，看到挂着一个人头，也不知是谁。进了城，在南门口的一个大坑沿上，看到有十几个人的尸体，我挨个看了看，没有父亲，这些人有用刀扎死的，也有被枪打死的。有一个60多岁姓董的老人，一个胳膊被洋刀削掉了，还有一个没有头的，他是西街姓杨的。

我父亲被敌人捆走，在去郭连庄的路上被鬼子在额头上扎了一刀，后来给他们抬东西，半路上逃跑了，才没有惨遭毒手。

王兴法：

我叫王兴法，观城东街人，1915年生。1937年阴历11月11日，日本鬼子进攻观城。那一天早晨，雾气特别大，对面不远看不见人影，城里的男女老少冒着严寒纷纷外逃。我父亲、母亲还有几个叔叔带着孩子们也准备出南门躲避。俺一大家人走到南城门的时候，鬼子大炮把南城门打得乌烟瘴气，俺二叔领着俺四叔的一个孩子离城门很近，很快就跑出城了，家里其他人都失散了。俺母亲抱着我的二闺女躲到小十字路口东面的小院里。这时候枪炮声越来越厉害，我心里又急又怕，不知咋办好，就在十字路口的

南面躲了起来。到了下半晌天傍黑的时候，我听到街上有“出欢迎旗，欢迎”的喊声，我不知咋回事，就出来了。走到十字街上，一个喝醉了酒的鬼子看见了我，让扶着他走到南关城外，就把我放了。我回到南城门外，看见满街的桌椅、门板全都堆着烧了，鬼子们围在那里烤火。我向北一拐刚想躲开，一群鬼子看见了，叽哩哇啦地喊起来，又把我捉住捆起来。我被捆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鬼子要离开了，看到我和西义的一个老乡捆在那里，就围上来又踢又打，又拧又掐地侮辱了一阵子，我真是又羞又恼，要当了亡国奴，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哇！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有两个鬼子就把我带到城南的大刘庄去了，在那里碰到了一个翻译说通了话，还有一个熟人证实我是城里开饭馆的，鬼子就把我放回来了。

因为我在南关被捆时，俺婶子和俺孩子娘出南门外逃看见了，俺孩子娘哭着告诉我：没有咱娘了。还抱着小二妮被杀死院里了。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进城找俺娘和孩子。在俺娘躲藏的院里，我看见她是被枪打死的，我不满一岁的二闺女死在她怀里。孩子看不出咋死的，血肉模糊，惨极了。我也找不着别的人，就把母亲和孩子的尸首拉到屋里。后来我出了西门，听说三叔在车川口，我就找去了，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到了保安寺俺姥娘那里，在那里见到了二叔和二婶子，他们见我没事，都松了一口气。正说话的功夫，不知哪里刮来的信，说日本鬼子走了。鬼子走了，我得赶紧进城。到了城里，在南街碰到了父亲，俺父子一见面，抱头大哭了一场。日本鬼子撤走几天后，俺一家才知道失散了的有四叔的二孩子，小名叫“八”，被鬼子捉到郭连庄用刺刀扎死了，那年他才16岁。

就这样，在日本鬼子制造的观城惨案中，俺一家被害了3口，这血海深仇，俺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哇！

杨永雨：

我叫杨永雨，观城西街人，1919年生。11月11日本鬼子围城后，城里就出不去人了，我藏在地窖里。仗打了一天，到了下半晌三四点钟，二十九军守城的部队撤退，我就随着他们跑出了城外。我出城后，父亲不知道，就到外面去找，结果碰到进城的鬼子，被杀害了。后来母亲也找我，到郭连庄看了看被抓去杀的人没有我，就回来了，在东城门碰见我，把父亲被害的信给我说了，还让我赶快跑。就这样，3天后，我回家，才知道父亲已经埋了。

听说，父亲的尸体是一个叫张宪寺的人先看见的。他给俺爷爷说：在场院死了一个人，快去看看吧！到了那里一瞧，才知道就是我父亲。他死的真惨呀！头被割掉不见了，上身子也被砍得残缺不全，只剩下完整的两条腿。爷爷和叔叔哭着埋了父亲。鬼子撤走几天后，在另一个场院里发现了一个人头，看牙齿像我父亲，收敛后埋葬了。

附件二

铁证如山

——观城惨案见证人的证词

范宗尧：

我叫范宗尧，观城南街二队人，1921年生。日本鬼子进城前，先是飞机轰炸了3次。城里人躲飞机，有的吃了早饭出去，吃午饭回来，有的就没回来，还有的没有出去躲，挖个地洞子藏起来。我也出城到了嫂子的姐姐家去躲避。11日那天，守城的二十九军就和日本鬼子打上了。

日本鬼子进城后，杀了很多，光俺二队这个地方就死了不少。我哥哥范宗胶又聋又瞎，因找俺娘在南门外被鬼子打死了。还有这里的姚心田，开饭馆的谢贵臣。富户张二桃家的女佣人，躲在地洞里，被鬼子发现后，用机枪打死了，事后我回来，还看到洞口不远遍地都溅满了血。俺街上有一个旧军队遗弃下来的兵，博平人，又傻又呆，都叫他傻牛，经常要饭，也帮人干些杂活。鬼子进城后，他吓得钻到一个麦秸垛的小洞里，结果屁股被扎得稀烂，活活疼死了。还有一个60多岁姓王的老长工，留在城里给人看家，也被鬼子扎死了。张家六爷张一魁在南门里被刺刀挑开了肚子，肠子都淌出来了，我和他是邻居，帮着收了他的尸。西乡李家庄有个叫李发兵的，经常住在城里卖菜，那天鬼子抓住他和街上的王光喜一块捆到郭连庄用刺刀扎死了。俺大队妇联主任靳永兰的舅，叫崔金，被鬼子刮光了脸上的肉，尸体是在一家饭馆找到的，看个头就是他。

史广亮：

我叫史广亮，观城东街史家拐人，1919年生。日本鬼子打观城那年，我18岁。鬼子进观城的前两天，我出城到乡下亲戚家躲避，家里留有爷爷看家。在亲戚家，听说观城被打开了，鬼子杀了很多，我不放心爷爷，鬼子撤走刚到西门，我就从东门进了城。哎呀！观城已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了。东关大街上，粮食、马草、马粪掺在一起，这里一个堆，那里一个堆；烟卷、包袱扔得到处都是；店铺上的门板，户家的窗户、门、桌椅，全被劈烂烧掉了。路过东门时，焦糊味、腥臭味呛得出不来气。东门里面我看见有一间房子大的一片灰，灰里有三四具被烧焦了的人的尸体，四肢卷着和小烧鸡一样，吓得我不敢多看，赶紧溜回家，那是个什么样子呀！家里的门窗、桌椅被劈了烧了，大锅砸了，小锅里还屙了一堆屎。爷爷看见我大哭说：咱史家拐十几个人被带到郭连庄杀了，柴延庆他爷爷让鬼子打死了，刘过代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你亏了逃了，不然也被鬼子杀了。爷爷还对我说：鬼子还没走远，不知还来不来，你快走吧！我怕鬼子再进来，又急忙跑到乡下去了。

李发起：

我叫李发起，观城北街人，1921年生。那时候，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俺附近的几家子在俺院里挖了一个大洞。11月11日那天，鬼子攻城攻得很紧，俺几家40口子男女老少都躲在大洞里。约摸下午4点来钟，从东北角的城墙上下来一部分鬼子，走到洞口，用刺刀逼着让都出来。鬼子把妇女留在家里，用刺刀押着我们18个男的向东门走。快到东门时，就让一拉溜地向北跪下，对面有一群鬼子，他们叽哩呱啦说了几句话，就有一个鬼子出来，到跟前抓起赵石滚（小名）就往外拖，把他推到十几米的一堵小墙边，对着心口开了一枪，赵石滚没哼一声，就倒在墙

头上了。这个鬼子回来又抓岳铁炮(小名)，把他打死在墙头上。石滚和铁炮在俺18个人中是年轻的，刚30多岁，杀他俩的鬼子又要来抓人的时候，恰好东城门坍下来一堆土和砖头，鬼子的炮车进不来，他们也不杀我们了，就让我们去抬搬砖头和瓦块。这时候雾气很大，天也快黑了，鬼子看得也不紧，我们就四散跑出城门逃命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经历和见到的。

刘登山：

我叫刘登山，1919年生人，1937年阴历11月，日本鬼子攻打观城时，俺村除年老和有病的少数几个人外，都外出逃难了，我逃到南岳庄。家里只留下70多岁的祖母，3天后，听说鬼子撤走了，我惦记祖母，急忙赶回家。路过前郭老爷庙大坑时，看到那里死了好多人，横七竖八地躺着，都是让鬼子用刺刀挑死的，有的光着膀子。由于死人多，小坑里的水都是红的。俺村逃难回来的人，有胆大的数了一下，大坑里共有42具尸体

回到家，我祖母见到我大哭，家里让鬼子给折腾得乱七八糟，鬼子把柜、门和所有木器都烧光了。祖母告诉我说，俺屋后大场里还死了一些人。我跑去看，有的已经把死尸用红薯秧子盖上了，场里共有死尸18个，有的双手还捆着红薯秧子，有的捆着绳，都是用刺刀挑死的。

鬼子在俺村住了3天，把俺村给糟踏苦了，鸡、鸭、鹅、牛、羊全部吃光了；房子烧了100多间；两个未逃出去的40来岁的妇女，被轮奸，很长时间不能起床。其中一个有胃病，疼得不能走路，被强奸后，没有几个月就死了。

鬼子的滔天罪行，俺郭连庄村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李景云：

我叫李景云，1910年生，观城镇前郭连庄村人。1937年鬼子

进攻观城那年，我27岁。那时，俺村是一个不到百人的小村庄，村周围都是洼坑芦苇。阴历11月11日，鬼子打开了观城，俺村的人都跑光了。我是吃过晌午饭跑出去的。我恋家，不愿跑远，只是在孙庄村后看着。太阳快落的时候（那天雾很大，但只能望见太阳），就看见鬼子骑兵从观城向俺村过来了，我一看要进俺村，就跑到离俺村4里远的道士路村，跟俺村的五六个人住进老葛家。上半夜时，碰上观城街里史家拐的史三瘸子两人，我问他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说：“不得了啦，俺史家拐十几个人被日本鬼子抓到您郭连庄，杀了5个，俺5个跑出来了。”听到这讯，我就更不敢进村了，又跑到史楼我姑家里住了两天。离家三天后，我打听鬼子走了，就回到村里，路过村东老爷庙时，看到庙前大洼坑北沿有三四十个死人，南沿也有七八个。那个坑是我家的，共三亩八分，西沿是一片芦苇。当时洼坑里水不多，死人横七竖八地躺着，什么样子都有。坑里的水都是红的。这些死人，有观城街里的，也有四周村里的。几天后，死尸陆续的被人认领走了，但也有没认走的，到过了年正月十五时，狗还从坑里拉出一个死人腿。

徒骇河畔血泪仇

——东节村惨案

王协振 陈海林 马世祥整理

莘县境内徒骇河发源处以北40余里的河东岸，有一个300多口人的村庄——东节村。由于该村处于山东与河南的交界处，对沟通南乐与朝城的联系有重要作用，所以敌我双方对这里都十分重视。1942年夏初，日军为切断我抗日联系，扼杀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与发展，在东节村，修筑了南北两座日伪军分别据守的炮楼。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东节村民兵与南乐县大队相配合，利用内线关系，巧扮民工，借加修日军南炮楼之机，一举歼日军7人，缴获长短枪9支，机枪一挺，指挥刀一把，子弹一部，并焚烧了炮楼。事后，日军恼羞成怒，从南乐县、千口镇出动大批日伪军、宪兵、特务对东节村及附近村进行报复性扫荡，自7月12日始至8月中旬，先后捕我抗属和无辜群众200余人，利用活埋、枪杀、狗咬等手段进行残暴屠杀，制造了这起令人闻之悚然的血案。

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中午12时许，东节村日军一个小队驻守的南炮楼腾起浓烟烈火，我焚烧炮楼的民兵在县武装的掩护下安全撤离。为防止日军报复，东节村群众也纷纷扶老携幼离开村庄四下躲避。

下午，南乐县千口镇方向开来两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杀气

腾腾向东节村扑来。由于东节村群众早有防备，致使敌人扑空。日伪军在日军宪兵次长尚江，小队长新井和汉奸翻译张风舞的指使下，如同发了疯的野兽，在东节村点起熊熊大火，烧毁房屋200余间，并在村外四处追逐捕杀无辜群众。那时，枪声、鸡鸣犬吠声、狼嚎般的吆喝声充斥了徒骇河畔。东节村附近的邱寺、肖屯、杨寨等村庄陷入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邱寺刚过门的新媳妇18岁的赵胖妮未及躲避陷入魔掌，在押往东节村的路上，日伪军撕破了她的衣服，百般凌辱。她性情刚烈，不甘受辱，拼命撕咬，被打得皮开肉绽。途中，她凄惨地哭喊着：“亲娘啊，女儿再也见不上您了……。”邱寺任万江75岁的老娘被抓后，骂不绝口，被日军拳打脚踢，折磨得满地打滚，几次昏死在路上。不到两天功夫，日伪军共抓无辜群众40余名，押至东节村北炮楼。残暴的敌人对被抓群众进行严刑拷打，逼问是谁烧的炮楼，谁是抗属？人们不畏强暴，据理相争，敌人苦于没有证据，日军小队长和汉奸张风舞黔驴技穷，就计谋用抽签的恶毒手段虐杀无辜。群众不从，就放狼狗咬，棍棒打，结果有6人抽到了该杀的短签，6人中，有年轻的妇女，也有年逾花甲的老人。65岁的老先生赵荣福抽到短签后，面对死亡，刚强不屈，大骂日军汉奸残忍无道，被绑住双腿，任凭狼狗撕咬，鲜红的肌肉一条一条被扯下来，老人疼得晕死过去。受难群众目睹惨状无不咬牙切齿，掩面闭目。之后，日军将抽到短签的6名群众拉到炮楼东侧50米处一预先挖好的土坑内进行活埋。遇难者拼命挣扎、叫骂。凶残的刽子手就用刺刀乱扎乱捅一气，鲜血顷刻间染红了坑底。在邱寺住娘家的东节村姚步奎的妻子，身子怀着孕，还带着两个未成年的男孩，当被带到埋入坑前，孩子们哭喊着：“娘啊，娘呀”，姚妻悲痛而绝望地看着跟上来的孩子，泪如泉涌，她还未来及叫一声儿子，就被一脚踢入坑底，接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也被狂笑的日军用刺刀挑着，狠狠扔到坑底妈妈的身边。

日军活埋 8 名无辜群众（包括两个孩子）后，还不甘罢休，一面强逼大批民夫重修被焚烧的南炮楼，一面施展诡计诱骗东节村群众回家，并在炮楼院内挖了 3 个能盛下百余人的大坑，上面用树枝、门板掩盖。将抓到的人放在里面扣押，几日后，东节村部分群众返回村庄，日军见阴谋得逞，趁群众不备，突然包围东节村。民兵姚富增的哥哥姚六被抓起来，在群众面前用皮鞭、木棒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谁是八路军，谁烧了日军的炮楼，姚六至死不说，几次被毒打得昏过去，用凉水泼醒后，架起来继续逼供，一直将姚六折磨得浑身鲜血淋漓，奄奄一息。接着日军在人群中拉出了姚庆保一家老小 6 口及姚同印、刘氏（寡妇）、张狗思等 14 口，指为抗属和嫌疑分子，押至村东南 300 米处一坑内进行活埋。泥土埋至胸部，遇难者被憋得眼球暴突，口鼻鲜血喷吐，惨叫声、呻吟声不绝于耳。野兽般的日军一边填土，一边用刺刀、铁锹砍刺，埋平后又乱脚踩实。

事隔一日，第三天夜间 12 时，穷凶极恶的日军，又从千口镇调集伪警备队、特务队再次袭击东节村，将尚在睡梦中的男女老少 40 余口押至千口镇伪警备所。采用棒打、火烧、水灌等残忍手段进行严刑审问，受害者无一不被摧残得皮焦肉裂。一位 60 多岁姓姚的老人，被火烧去胡子眉毛，又被扒去衣服，用慢火熏燎前胸，直燎得皮肉焦裂，惨叫不止。3 天后，日军一无所获，又将人押至东节村炮楼，全部关进大坑。在此期间，日伪军出动 400 余人日夜外出扫荡，在佛善村、苏海、小屯、郭坊、沙河、袁庄等村庄抓人、放火，十余天的工夫，押人的 3 个土坑塞满了近 200 名无辜群众。

8 月 7 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晨，日军逼迫民夫在村北挖掘埋人坑。下午 4 时，将 20 余名男女群众从大土坑内拉出来，用绳索捆住一条胳膊连成一串，押往村北。这时，死亡的阴云已笼罩着每个受难者的心头，但每个人都显得异常的镇静，他们默默

地向大坑内的难胞告别。60多岁的薛秋来老人出坑后，看到被日军抓来的儿子薛连登在不远处泪水满面地看着自己，他只是遥遥与儿子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从容地将一杆烟袋插在身后腰间，那是示意儿子，要记住这是爹遗留之物，找到它就找到了爹的尸身。暮色垂临，20余名群众被敌人押去，他们在凄厉的乱枪声中，横七竖八地扑倒在埋人坑边。日军行凶后，唯恐有生还者，又残忍地用刺刀逐一刺杀，至直腹开膛裂，肝胆涂地。当夜，有的死者亲属去起尸，看到的是面目皆非的脸孔，摸到的是残缺不全的尸首。时至今日，70多岁的薛连登老人提起此事，还声泪俱下，痛不欲生。

被扣押在炮楼大土坑内的群众，先是男女混杂挤一块，坑小人多，人们一个紧挨一个，时值七八月间，天气溽热没有水，日伪军就用水桶从顶上往下泼，人们只得用嘴接漏进来的水滴，人多水少，其渴难忍，仅十几天就有7人活活渴死。没有厕所，人们只好在里面解手，腥臭味窒人鼻息。天一下雨，人们泡在里面，其惨状目不忍睹，不几天，人的脸上，身上就长满了疮。即是这样，被押群众还是无有一日不被毒打摧残，特别是青壮年每日放风一次，日军就用轿杠进行毒打，有的脊梁都被打开了花，有的被日军反复往地上攒摔，直至鼻口出血。40多岁的张春过头上蓄的头发较长，一汉奸就抓住他的头发打坠，直拽的头皮脱落，血流满面。寨节村的张随合、张登安父子二人关押在土坑内数日，实在忍受不了这非人的虐待，张随合就哀求儿子用腰带将自己勒死，幸被人发觉没死，事后，父子二人抱头痛哭。日伪军将男女分开后，关押妇女的土坑，其惨状更是苦不堪言。日军对妇女大肆凌辱，有十几名年轻妇女惨遭蹂躏后，又被强逼与伪军成亲，不从者即用棍棒毒打，甚至活埋。每到夜间，悲惨的厄运降临，妇女坑内凄惨的哭叫声在茫茫的旷野里回荡，令人肝裂肠断。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被关押在炮楼大土坑的200余名无辜

群众，除被活埋、枪杀者外，非人的折磨致死20人之多。东节村炮楼每日毒打声、哀号声不绝，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吃人魔窟。

8月上旬，日军放出了关押在土坑内的东节村、寨节村、西节村3个村庄百余名无辜群众后，将40余名奄奄一息的男女群众继续押在大土坑内，并丧心病狂地讹诈受难者家属，每人用两袋谷子赎回。绝大部分被赎回后，留下了佛善村潘林、潘树林的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和杨庄妇女杨氏，东节村姚六、张二大肚子、郭氏共6人，日军便将其从坑内拉出，押往村北埋人坑活埋。在绝望中，这最后一批遇难群众高声叫骂，极力挣脱绳索，冲撞残暴的凶手，终因寡不敌众，被推入坑内活埋致死。至此，东节村大血案自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始至8月上旬，历时一个多月，先后死难群众70余人，分别被埋在村东、村东南、村北5个坑内，日后，尸体腐烂，野狗撕咬，数年后在东节村四周仍有白骨骸骨，历历在目。

日军在东节村制造大血案后，东节村房屋被烧300间以上，群众被迫离乡逃散，至1944年春，群众陆续返回家园，从血案前的380余口人减至250口，1400余亩土地全部荒芜，全村变成瓦砾场，东节村除遇害群众外，改嫁、饿死、失踪者达150余人。

附件

抹不掉的罪行

——有关东节村惨案的控诉、证词和审讯笔录

（一）受害人的血泪控诉

张兰芝（女，1918年生人）：

我叫张兰芝，娘家是东节村，婆家是千口村。节村的炮楼被烧后，日本鬼子先后3次到俺千口抓人，第一次是6月初6，第二次是6月12日，第三次是6月18日，我是6月12日那次被抓到节村炮楼里去的，6月29日出来，在炮楼地洞里被关了17天。那里共总3个洞，东西一个，南北两个，开始男女混杂，后来分开了。洞有三丈多长，一丈七八尺宽，一丈深。顶棚用拆屋子的梁、板、门、树枝子盖着，出口挖的是土梯子。

地洞里有百余入，其中有11名年轻妇女。他们准备把长得好看的霸占为妾，不同意就用木棍打，结果强迫成亲的有7名，有一名不愿意被活埋，另外3名不知下落。每天傍晚放风一个钟头，每天往洞里送两桶凉水，两个糠菜团子，天热水少，我亲眼看到渴死7人。后来我被他们弄到东节村一家后威胁嫁给王翻译，结果王翻译的老婆不同意，又让我嫁给马班长。

他们将男女分开的目的，是晚上便于强奸那些年轻妇女。

张志才（男，1921年生人）：

我叫张志才，寨节村人，我是6月18日那天被鬼子汉奸抓进炮楼地洞里的，被关了40多天，8月初才出来。

那一次鬼子汉奸共抓了60多人，赶进炮楼南边的地洞里。这些人吃、睡、拉屎、撒尿都在里边，还经常挨打，我的脊梁都被打烂了。俺村的张登安和他爹张随合一块被抓进去了。张随合实在受不了那个罪，就叫儿子用腰带把自己勒死，结果勒住脖子后发出了声音，惊醒了别人，被大家救下了，父子两人抱头大哭。

后来鬼子汉奸放三个节村的人，但又要其中一个人出面担保。先从地洞里叫出一个人，让他担保，他朝洞外一看，当院里放了一个桌子，鬼子队长挎着洋刀，几个日本兵站在两边，拿着枪，掂着木棒子，伪军一大片，旁边还蹲着一只狼狗，就吓坏了，哆哆嗦嗦的不敢出去。有人就说让我去，说你多少识几个字，你去吧。我想，豁上了，就出来了。日本翻译问能不能担保，我说“能”。他们让我按了手印。这时有个伪军报告说我父亲干公事（指为八路军做事），于是他们一下子把我拉到壕边，要杀我，其中一个问我，你父亲干啥，我撒谎说：“干啥公事，那不是昨天还给你们送粮食，是你们的村长。”他们一听，又把我拉回去，并让我保证村里不出事，我答应后，他们就开始放人。他们还说：村里人跑了就杀死我。我把节村人一个个地点清出来了。走到西节村，大家问我怎么办，我说咱们跑吧，大家一哄而散，各自跑了。

（二）见证人的证词

薛连登（男，1916年生，东节村人）：

日本鬼子把俺爹杀死了，这深仇大恨，俺永远也忘不了。鬼子的炮楼烧了后，有一天俺爹上地里锄地，大清早去的，快半晌了，还不见回来，家里人想，可能是刚下过雨，地好锄，顾不得吃饭了。我就去送饭。到地里一看，人没了，光地头上扔着鞋。我一打听，才知道被抓到炮楼里去了。刚开始不敢去送饭，后来听说让送，我就送去了。我爹说：再送的时候，多送一个，还有

二邦家娘哩。阴历六月廿五六的时候，炮楼里的人要人给他干活，我去了。就看见鬼子汉奸押着一大串人出来了，都用绳子捆着，向西北方向去。我见有俺爹，他的一个胳膊被绳子捆着，与其他人串在一起，他可能也看见我了，但谁都没敢言语。我看见他用另一只手向腰里掖烟袋。鬼子汉奸把这些人押到西北地里，用机枪点名全杀死了。隔了一天，俺弟兄俩和我表弟推着小车去起尸，见有两间屋子个大坑，都是死人，有男人，也有妇女，有的是机枪打死的，也有用刺刀挑死的，一个个血肉模糊，辨不出模样来了，我翻腾了好几个尸体，凭着那杆烟袋，才找到俺爹。

张维增（男，1921年生，东节村人）：

鬼子炮楼点火后，我也跟着人跑了。第三天偷偷地跑回家里。俺家院里住了好多民工，是从城西抓来给鬼子修炮楼的。他们告诉我说：炮楼让八路军端了后，鬼子恼了，在周围村到处抓人，在炮楼东边的一个大坑里，鬼子汉奸一下就给埋了22口群众。人都被捆着，鬼子往坑里推人，伪军踩着，让民工朝里填土，民工不填，日伪军就用枪托揍，那惨景就别提了。最惨的是姚步奎的媳妇，肚里怀着孩子，还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人抱着娘的一条腿哭，鬼子嗷嗷地叫着，先把媳妇推进坑里，又把孩子用刺刀挑进坑里，鬼子挑了一个，伪军挑了一个，嘴里还叫唤着：“找你娘去吧”。人都被埋一尺厚的土了，坑里还咕嘟咕嘟的冒土哩。

张银增（男，1921年生，东节村人）：

鬼子的炮楼点着后，我跑到城里躲了七八天，眼看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就趁太阳快落时溜到俺地里钎高粱。俺的高粱地在鬼子炮楼东南300多米处。我钎着钎着，脚底下被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个人头，可把我吓坏了。当时想，反正是俺的地，

是啥样也得看看，硬着头皮往里走，看到在两片坟地中间有两个南北坑，都一米来宽，一丈多长，四尺来深。两个坑都让狗扒开了，坑外边是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尸体，有的没了头，有的只剩了半条腿。后来听高庄的人传说，埋人时他们跟着去了，鬼子把人捆住手扔到坑里让汉奸和民工朝里边填土，鬼子在上边踩，看见哪里咕嘟土，就用刺刀朝下扎。俺那地里大约埋了40人。解放以后，还经常看见狗从那里衔着骨头出来。

（三）参与杀人者的供词

全国解放后，带日军制造东节村惨案的张凤舞、吴思俭等人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归案。下面是我司法机关对凶犯的审问笔录、凶犯的供词和对凶犯的法庭调查（摘自南乐县公安局《反革命杀人犯张凤舞、王俊久的材料》）：

审问笔录

被审问人：张凤舞

问：你把东节村杀人的事说一下。

答：在东节村杀人时，我在场。日本人（尚江队长）要6人，不知谁叫出来6个上年纪的人，日本人说不行，要年经的，有力气的人。我就对马志善、周福学说，叫谁呢？马志善说，有办法，抽签，就这样杀了6个人。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日

被审问人：万廷选

问：埋人时都怎么说的？

答：在埋人这天，有日军先给翻译官说，后来翻译官张凤舞叫给警备队，将人集合到坑处。张凤舞拿着名单，我们当兵的拿着绳子，张向外叫，我们就绑，绑了近20余人，日本人和张凤舞比划着，带这些人到我们挖的那个坑里，有日本人用枪刺死这

些人全死后，我们就回来了。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四日

供词

……7月23日夜12时，宪兵队长尚江、翻译官张凤舞命警备队长王延志，带领警备队包围村庄，不许放走一人。进村捕人分3班……到天快明进村，分头乱扯，不论男女共捕40名，到早饭后才离村把人带到千口扣押。在审问时，尚江队长、张凤舞为主，用刑者有李世俨、蒙恩甫、吴思俭、宋崇礼等。问的话主要是：为什么携带便衣队不报，打炮楼，百姓谁动手杀日军。用的刑是火烧、棒打。我用火烧了节村一个老头的胡子眉毛，并烤前胸，用棒打、水灌有10余人。于26日早饭后，翻译官命周学福带民工到节村炮楼附近挖坑。特务队长候其荣押解犯人，并将我村潘林之父，潘书林之母，袁庄一个一块押去。到了坑边，宪兵队长尚江和张凤舞指挥机枪射击，但有未死的，在特务科长李世俨、特务队长候其荣的率领下，全体特务科特务动手进行活埋。

吴思俭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八日

证词

我证明日伪时期，东节村炮楼被烧，张凤舞为主在东节村杀人情况如下：

于1942年6月间，东节村日军炮楼被抗日军民烧毁。当时有宪兵队长日本人尚江和翻译官张凤舞带领周学福以下20余名伪兵向东节村出发，目的是抓人，放火，抢东西。据我听说，到节村后，周福学带着人向东节村周围一带日夜出发，抓无辜男女100余名，扣押在东节村炮楼内，挖了3个大坑，上边用木板棚。当时有日本人和张凤舞将无辜群众由坑内叫出来。叫被扣的群众抽

签子，抽到长签的站一边，短签的站一边，后将抽短签的群众由伪军捆好，由日本鬼子带到炮楼北面用枪杀死，下余拿长签的群众扣押在炮楼内的大坑里。这是我在干口伪警所听说的。6月中旬后，那里还押着60多名群众，后由日本人下令，张凤舞、周福学向维持会说，每个群众拿两口袋谷子换回。最后剩了六七个群众，内有佛善村两名没有谷子，当时张凤舞在场，由伪军和日本人从坑里将这些群众叫出来，带到炮楼北面，用枪杀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在维持会门口站着。分谷子时班长一口袋，会长两口袋，下余的派车辆送到南乐城里，交给张凤舞。

证明人：李桂芳，1894年生人，日伪时期在东节村维持会当办事员。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

法庭调查

杨双印谈：东节村炮楼被烧后，当天下午，清丰、南乐的日本人和张翻译（凤舞）都到东节村去处理这个事件。到了第二天就出发抓群众，到了第三天，日本小队长与张凤舞二人在北边伪军炮楼一起商量杀人，结果用抽签的办法，用刺刀在炮楼东南角刺死五六人。

韩丰年谈：我当时在日本特务队当兵。东节村日本炮楼被烧后当天下午，日本人和张凤舞都去东节村，我是与张凤舞一同去的。第二天就抓人。到了第三天用抽签的办法将群众刺死五六人（内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还跟着一个小孩，这两个孩子不包括五六个人内）。在他们商量和抽签时我没看见，刺杀时我去啦，在刺杀时，日本小队长、张凤舞都在场都是日本人下的手。

李桂芳谈：我当时在干口给皇协军警察所做饭。杨双印回家以后，叫我转到东节村去做饭（维持会负责做饭）。我见日本人

和张凤舞在炮楼北面枪毙了6个人（有杨庄一个妇女，佛善村一个妇女，一个男的，东节村3个男的），在枪毙时，日本人和张凤舞都去了，他俩怎么商量我不知道。原因是来了被押的群众共有40余人，每个人两袋谷子，因这6个人后送谷子，结果被枪毙。

李会斋谈：我当时在东节村炮楼警备队当兵。日军炮楼被八路军烧毁后，待了10多天，炮楼北边，由日本兵下手用枪杀人，打不死又用刺刀刺死，杀了十四五人（东节村一带的人，没有妇女），过了几天，在炮楼东南角，由日本人亲自用枪打，后用刺刀刺，又杀了十七八个人。这两次杀人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东节村头一次杀人我没见，我上千口去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五日

濮县血案

张瑞霞 马世祥整理

1938年初，侵华日军派遣精锐部队矶谷、坂垣两个师团，由山东南下向徐州进攻。日军坂垣师团进攻临沂，两战皆败。于是，日军矶谷师团急忙策应坂垣师团，侵占滕县、临城（薛城），然后以主力沿临台公路东进，企图抢占台儿庄，以便渡运河袭击徐州。此时，国民党军队则自徐州北上。渡过运河，进入鲁南，先日军占领台儿庄和运河渡口。在安阳一带，日军土肥原部为配合徐州会战，首先占领了河北大名，继而又南犯清丰、南乐，3月初，为抢占濮县李桥、董口、彭楼一带黄河渡口，并保护作为其后方基地，以渡河南进切断陇海路钳制徐州，派联队司令大岛率近千入向濮县进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濮县血案”。

日军先从城东，城北打数百发大炮，使县城遍地起火，一片火海。接着日军进城，一些天主教徒，耶稣教徒和一些善良的平民，认为日军不敢得罪外国传教士，就躲进濮城北街德国传教士办的天主教堂里，以求保佑“平安”。凶神恶煞的日军哪管这些，他们从两个教堂里将人赶出来，把男人用铁丝拧住，赶到北关王广禄家的院子里。王家当时卖劈柴为生，院里堆满梁、檩和劈柴，院内靠东有个大坑。日军逼着一个个无辜群众躺到坑里，又在上面架上梁檩、劈柴，浇上汽油，纵火燃烧。听到受难者撕肝裂肺的呼叫声，日军又将靠近坑边上的土墙推倒盖上，就这样先烧后焖。到后来人们收尸时，已是一坑脱骨的肉糊，王广禄数

了数有63个头盖骨和两具血肉模糊的男尸。日军把躲进教堂里的妇女污辱玩弄够后，又捆绑起来赶到东关张华斋的院子里，强逼她们躺下，在她们身上压上门板、木材、浇上汽油，放火烧起来。扯心裂肺般的痛叫声，躲在三四里外的人们都能听得清。据张华斋的二儿子张德羽回忆，扒出87具尸体，有的和孩子紧紧抱在一起。在街上，日军对一些跑不动和来不及跑的人们，见人便杀，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刺刀砍、削、捅、挑，使街道遍布尸首，其惨状令人毛骨悚然。

与此同时，日军在渡口附近的浹河村屠杀70多人，又把只有30户人家的小梅庄除外出者，全部杀光、烧光、抢光。城西南仅有3户人家的小白庄被他们一把火烧光，城西巩庄一次烧毁300间房子，洪尧村的村长和农会长被活埋在巩庄村中水井旁，4个青年妇女被日军堵在巩庄村前园屋里轮奸。濮城西北王刀村一青年妇女被日军逮住，扒光衣服、用刺刀逼一中国男人奸污，他们围观取乐，然后他们再轮奸。

5月17日范筑先将军亲率第二、五、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共8个支队，一举攻克濮县城，盘据濮县无恶不作的日军仓惶溃退。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有1000多人被无辜杀害，被奸污糟踏的妇女达四五百人，烧毁的房屋、粮食财产不计其数。日军凶残、狠毒、淫乱的暴行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濮县人民、特别是目睹惨状的老年人，仍铭刻在心，切齿痛恨。

（本文参阅范县党史资料）

日伪军血洗刁坊

马世祥整理

1944年2月28日，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朝（城）南战役，朝城县伪县长刘金岭残部逃至阳谷，朝城县全境解放。阳谷县最西部的于楼伪据点直接暴露于我军的打击之下。于楼据点位于朝阳公路朝城、阳谷交界处，是阳谷县的西大门。7月5日夜于楼伪据点被我朝城县大队一举拔除。这一据点受袭，使得阳谷的日伪军如坐针毡，他们扬言要血洗朝阳边与阳谷相毗邻的刁坊村，以示报复。

7月7日凌晨，驻阳谷日伪军步骑兵200余人和汉奸刘金岭的一部分队伍，从谢集、张楼、八里庄、许楼一线对朝城东部地区展开了拉网式“扫荡”，黎明在刁坊收拢，把仅有78户，四五百人的刁坊村团团围住。未逃出的村民全部被驱赶到村头一个大场里，由日伪头目轮番训话，强令说出八路军的去向。场上鸦雀无声，连怀抱中的孩子也没有一个哭闹的。敌人反复追问无效，便兽性大发，下了毒手。他们首先把50多岁的顾玉环拉出来，连挑了几刺刀，老人当即倒下，血流满地。群众敢怒不敢言，只有以沉默对待。见恐吓无效，凶残的敌人一拥而上，二三十个日伪军一齐动手，接连挑死了15个人。这15人的名字是：刁坊的杨玉香、杨士元、顾可见、顾成义、顾马水，八里庄赵长春、赵福臣，许楼的许双成、许德林、许福臣，谢集一个扛活的和桃园等村的4人。前刁坊村的李洪恩和后刁坊村的顾成仁被挑了七八刺刀，饶

幸未死，后被人抢救出来。

敌人挑死16人，挑伤2人后，又对其他人施行毒打。一个外号“二瞎子”的农民被敌人把头按进麦糠水里，差点闷死。敌人行凶之后，又到各家抢劫，临走还抓走100多人。敌人走后，村内衣物遍地，牲畜乱跑，一片哭叫喊骂声，惨不忍睹。

血水井惨案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1943年6月初，日本侵略军对冠南、朝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大合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冠县“血水井惨案”。

冠县南部的白塔集，赵庄一带20多个村庄是冠县抗日根据地中心，也是鲁西北党政军机关和抗日武装的常驻地。这里的干部群众早在抗战初期怀着救国、救亡的民族精神，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在冠县首先组织起青抗先组织。青抗先队员们为打击敌人，夜间割电线、拔电杆、破坏敌人的交通，袭扰敌人的据点、炮楼，搞得敌人日夜不安。

1943年6月10日，敌人集结邱县、冠县、馆陶、临清、聊城、堂邑、寿张、阳谷、莘县、南乐、大名11个县15000余人的兵力，调集了22辆汽车、200匹战马以及坦克等，兵分15路向我冠县南部白塔集一带发动了大围剿，妄图一举扑灭革命根据地的火焰。上午9时左右敌军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将周围村的群众合围在前李赵庄村内。接着这场大逮捕和烧杀抢掠把整个村子弄得一片混乱。10时左右敌人发现躲藏在村西头李长山家的20名男性群众，搜捕中发现一人操外地口音，打扮不像农民，引起了敌人的警觉。经盘查他是一名医生，名叫廉吉章，50余岁，因手上没有老茧，并装有冀南纸币，认为是抗日的重要干部。中午12时左右，100余名日伪军端着刺刀把廉吉章和另外十几名无辜群众赶到一水井旁，惨无人性地把他们推进了井中并疯狂地朝井内开枪，扔

手榴弹，最后又把一块磨扇掀进井内……。直到下午3时，日军才离开前李赵庄。

冠南合围敌人在这里制造了一场灭绝人性的血水井惨案，同时在村内抢杀了12名群众，抓走几十人给他们送运抢劫的财物，有的至今没有下落。11日下午前李赵庄村民李佃俊、李金钟发现井中有人，便回村找来李惠泉、李金忠、李惠昌、李亭志等人一起打捞，一个个不像样的尸体捞上来，有的头部只剩下嘴巴，有的肠子流出体外，有的脑浆迸裂，血肉一块，没有一具肢体不残没有弹洞的。村里群众看到这目不忍睹的惨状，看到自己的亲人同胞被惨害到如此地步，又看到水井已变成血水井，无不悲痛欲绝，义愤填膺。

解放后，为纪念被日本侵略者残杀的同胞，血水井被列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每年清明节，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列队在血水井旁，悼念死者，控诉日本侵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

附件一

目睹者证明材料

李金忠（白塔集乡前李赵庄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至1949年任本村民兵班长、区青救会委员，1950年至1958年在本村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至1984年任民兵连长）：

1943年6月10日敌人合围时，我被赶到王六庄南边，在那里看到了我军与日军作战而牺牲和负伤的16名战士，我和伯父李佃俊及贾六庄的李林风将他们抬到王六庄村边柳树下，把3个还活着的战士交给李林风我就回家了。在来到我村西南包袱地里时（离血水井三四百米），发现井周围有很多日伪军，并听到机枪响和炸弹爆炸声，那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干啥哩。第二天（即6月11日）下午两三点钟，我伯父李佃俊和我正在井西边的瓜地里压瓜，这时从东边走来3个马河支队的战士，对我伯父说：“老大爷，听说那个井里有人，有没有呢？”我伯父说：“不知道”，其中一个战士对我伯父说：“你拿绳子来，咱捞捞吧”。我伯父就到家拿来一根绳子和一把三齿，战士接过绳子捆好三齿，下去就捞上来一个，这个人没有头了，只剩下嘴巴。第二次下去又捞上来一个，这个人比第一个人年轻点。这时已到下午四五点钟，那3个战士听我说王六庄村南还有死伤的八路军战士，就匆匆往西南走了。天黑时，我和李惠泉就将捞出的这两个人暂时埋到井北边50米处坑沿上的土井里。第三天（即6月13日），我和李亭志、李惠泉、李惠昌、李长岭、李学元等几个人就用辘轳绞水捞人，绞上来的水都是红的。当尸体露出来时，李亭志（井的主人）下到井里边，用绳子套住尸体，我们几个人在上边拉。这样，又

捞出来18个，加上头天捞出的那两个共20个人。这些人浑身都有刀伤、弹伤，有的头上一个弹洞，有的没头，有的肠子露出体外，还有的全身上下没有衣服。当死者家属听说后，就把尸体拉走了。

李惠泉（白塔集乡前李赵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过农会长，现务农）：

日伪军大合围那天中午，敌人在村西头的李长山家搜出20名群众，把他们赶到村西边去，后来我也被敌人抓到村西边，让我提着壶给他们送水，井北边一大片都是被敌人赶去的群众，东边是日伪军，我当时离水井有三四十米远，只听到那边的人嗷嗷乱叫，还听到日军拍着巴掌狂笑，因为围着很多敌人，始终不知道他们在干啥哩。后来才知道那20个人被敌人填到井里。

杨风恩（白塔集乡杨胡町村人，务农）：

日军大合围那天，我被逮住了。一个人（这个人没穿军装，也没带枪，后来考虑可能是吃二馍的）把我带到前李赵庄村西（血水井西边四五十米远），那里还有很多被赶去的群众，日军给俺这些人开会讲话，讲的啥也没听清楚。在这里开会的时候就看到东边井上围着很多人，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干啥哩。开完会后，带我来的那个人，从我头上摘下毛巾，撕成两块，分别捆在我和二哥杨风玉的胳膊上，然后带着俺俩向东走。当走到井北不到10米远的地方，让俺俩站了一会儿。这时我看到，三四个日伪军推拉一个人，前面的人拉，后边的推，推的推，拉的拉，硬往井里填！我亲眼看到有五六个人被填到井里，他们每填几个人就朝井里打一阵机枪，并把点着的麦茬往井里扔，井里顿时冒出黑烟。

附件三

受害者家属控诉

李盈宽（白塔集南街人，1962年以前曾在河南省洛阳市粮食局工作，后回家支农。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在白塔集南街开西药铺）：

我是前李赵庄“血水井”惨案受害者李盈祥的哥哥。我弟弟当时才17岁，是白塔集的青抗先队员。在1943年日伪军铁壁大合围时，我弟弟和廉吉章以及白塔集的十几名群众，都被日军围在前李赵庄李长山家里，就在那一天，我弟弟和其他十几名群众被日寇残杀在前李赵庄的一口水井里。这就充分暴露了日军惨忍的本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李新魁（白塔集南街人，在家务农）：

1943年6月10日，日伪军对我们这一带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大合围，那天，我的哥哥李新志被围到前李赵庄。听人说，敌人将他带到井边，硬把他们推到井里。随后又往井里打机枪，投手榴弹，使他惨死在水井里面。日本鬼子是多么疯狂和毒辣！我要永远记住这血海深仇！

附件三

受害者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籍 贯	政治面貌	备 注
李邦教	男	53	白塔集街 南	一般农民	李邦叶的哥哥
李邦叶	男	45	同上	同上	李邦教的弟弟
李新志	男	17	同上	青抗先 队 员	李邦教、李邦叶的 侄儿
李盈祥	男	17	同上	同上	
于文德	男	18	同上	同上	于进河的侄儿
岳代成	男	18	同上	同上	
王保成	男	17	同上	同上	
王金顶	男	17	同上	同上	
于进河	男	54	同上	一般 农民	于文德的叔父
王金库	男	44	同上	同上	
段保兰	男	25	白塔集街 北	同上	曾当过游击队员
郭长发	男	30	同上	同上	在白塔集街上卖大 碗茶
岳朝银	男	20	白塔集街 西	一般 农民	
杨西瑞	男	18	同上	同上	
廉吉章	男	54	河北武安	医生	在白塔集开中药铺

姓 名	性别	年龄	籍 贯	政治面貌	备 注
李新起	男	18	前李赵庄		曾当教师、曹保庆的哥哥。
杨玉成	男		杨赵庄	一般农民	
曹玉美	男	43	刘寺地	一般农民	
杨怀成	男	32	同上		
曹保庆	男	27	同上	青抗先队员	曹美玉的弟弟。

南彦寺惨案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馆陶县八区南彦寺村，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模范村庄，全村200多户，1000余人，有民兵两个班共计24人，每人一支本地造枪。南彦寺村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维翰的家乡，日军久已恨之入骨。这里距离日军南馆陶据点10多华里，时常有敌人来骚扰。

194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军300余人，伪军200余人，来到南彦寺。敌人还没进村，村里绝大部分人早已转移了，民兵们在村外远远朝敌人的队伍打了几枪，也很快离开了。日军进村扑了一个空，就放火烧掉了村长的房子，杀死没有跑出去的几个人，然后离开了这里。跑出去的人又慢慢回到村庄。这次扫荡过去了，南彦寺损失不大，村里的人还暗自庆幸。附近村庄的人，也有跑到南彦寺，躲避日军扫荡，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日军从一个地方扫荡过去，一般不再返回这个村庄。

日军扫荡的队伍离开南彦寺后，向北走了10华里，驻在浅口一带。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夜又突然返回南彦寺，黎明前把村庄包围起来。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慌忙向村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日军用机枪向跑在前头的人射击，武天志、武进代父子跑到村东头被击中死亡；张三义、张永治、武天聚在村西头中弹毙命；范树江、师聚成在村北不远的田

野里中弹死亡。慌乱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从村南跑了出去，绝大多数人又返回村庄。20个民兵看到众寡悬殊，打只能暴露力量，根本保不住群众，所以也隐蔽起来。

东方发红的时候，敌人进了村，一场疯狂的搜查和屠杀开始了。日伪军挨家挨户搜查，所有藏起来的人，没有一个躲过敌人的眼睛，都被查了出来。查出来的成年男子，有的被杀，有的被打，无一幸免。日军杀人打人，有的不问什么，也不说要什么，随意杀人，随手打人。范成波在村南被抓住，带到村中张保善的院子里，捆到磨棚的柱子上，日军没问一句话，拿起木棍就打，一下打断手臂，几下打昏过去。成波醒来后，又被脱光衣服。日军从屋中搬出桌子、椅子砸坏了在院子里烤火，烤了一会，拉过范成波问冷不冷，范说：“冷”，一个日军提起一桶凉水拍到成波头上。张永高从屋子里被拉出来，他怀中还抱着自己的小儿子，日军一声没吭，一刺刀把他刺死。张永江藏在红薯井里也被搜了出来，日军用刺刀一连在他身上刺了十几下，死后又扔到冰窟里。他母亲看到日军的兽行被活活气死。一群年轻妇女躲在张立材的堂屋里，日军发现后，要拉出两个姑娘强奸，张三财70岁的老母亲阻拦了一下，立刻被敌人拉到院子里扔进红薯井里，日军看到她并没有死，又搬起旁边一块锤布石，把她砸死在里面。

除了在搜查其间被杀害者外，全村所有男女老少都被赶到村中央的大坑里。日军先是对全村百姓进行玩弄和侮辱。他们强迫一部分青年男子脱光衣服，也强迫一部分年轻妇女脱光衣服，在众人面前出丑。接着刑训和屠杀开始了。为了威胁众人，先从人群中拉出师鸡换，把他推到坑沿上，敌人抽出指挥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又有十几个人被拉出来，分3处严刑拷打：张永春和师国录2人被拉到王培材的院子里，先是张永春被扒去上衣，仰面被捆绑在床上，床下用火烧，逼问谁是民兵，谁是村干部。捆绑的绳子烧断两次后，永春也没有说话，虽然他自己就是民兵。

日军没有办法，把他扔到一边。又把师国录同样捆到床上，往鼻子里灌凉水。无论怎样折磨，师国录也没有开口。张永良、张永申、张登朝、师国光等几个人在北街中央也同样捆绑在床上用火烧，用水灌，几死几活，却没有开口。

张廷俊在南街经不起敌人拷打，屈服了。日军把他带到大坑边全村人面前，人群中的几个民兵被他认了出来，告诉了敌人。民兵范树奇（村长）、武进安、范树伍、范成发、范成普立即被捆了起来，先是关到范树宗家的东屋里，日军临走时把他们带到村中央全部刺死，扔到张廷梅家的红薯井里。

开明地主张寿山是村中一个间长，他同情革命，支持抗日，我党政领导人常住在他家。日军把他抓住后捆到树上，下面用火烧，逼问谁是村干部，枪支藏在哪里，张寿山宁死不屈。他的老父亲苦苦求饶，残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哪会为之动情。张寿山被烧得满身焦肉，几天后便离开人世。为了纪念张寿山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我抗日政府把南彦寺改名为寿山寺。

日军在这里整整折腾了一天，直到半夜以后才离开村庄。走时把村中青年男子抓走41人，十几天后，用钱赎回。一天之中13人遭杀害，6人伤残，妇女25人被强奸。日军走后尸横街头凄惨可怖。有的人气疯了，有人吓呆了，掩埋死者的人已难以找到。附近村庄的亲戚们赶来埋葬了死者。全村房屋被烧、牛羊被抢走，人民财产遭到空前的洗劫。

冠县王二寨惨案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1945年6月2日夜幕降临，日本侵略军100余人、伪军500余人在大地主张九槐（外号六猪头）勾结下，偷偷开往王二寨村，经过一番烧杀，3日凌晨，穷凶极恶的敌人发现村里的地道。敌人施尽鬼蜮伎俩，点燃麦秸、辣椒朝洞里灌，熏死、烧死革命群众23人，3户被杀绝，房子70余间被烧掉，制造了冠县王二寨惨案。

抗战初期王二寨村只有45户人家，125人。这个村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较早地建立了党组织，并成立了农会、抗日自卫队、模范班、儿童团。为了进一步动员人民抗日，改善人民的生活，巩固抗日新政权，1944年在党的领导下，王二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增资、增佃运动，成为全县的抗日堡垒村，同时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这一带的日伪军活动十分猖獗，东北张官寨就驻扎吴连杰一个团；西边甘屯驻扎一个营；东边王信、里庄、三合庄常有伪军出来骚扰；北面有日军据点，因此，王二寨及周围一带村庄经常受到日军、伪军的摧残。为了坚持抗日斗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王二寨村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抗日政府号召，开展挖抗日沟、挖地道，不久就挖成200多米长的主道及数条分道，道内设计有隐蔽室、堵卡。多次同日伪军展开了地道战，致使日伪军几次扫荡都扑了空。1944年8月10日，日军100余人、伪军700余人，将王二寨村团团包围，由于干部群众及

时转移入地道中，敌人找洞、抓人都未得逞，只抢走粮食7000余斤。

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1945年6月2日夜，日伪军700余人偷偷包围了王二寨村，区妇联主任马淑青得知敌情后，立即带领村里武装和一部分群众转移到地道内。但是由于敌人早摸清了洞口的位置，因而敌人进村很快找到洞口并用机枪封住了洞口，之后强迫邻村四五百人用三齿和铁铤把地道横截11道，逐一挖透。地主张九槐让儿子张书修下到一个洞口喊话，张书修还没喊出声来就被洞里模范班开枪击毙。敌人恼羞成怒，点燃了麦秸，木柴和辣椒用碾米的风车使劲地朝着洞口煽。洞里的干部群众被烟呛得喘不出气来，一部分昏死过去，但同志们忍耐着，相互照顾没有一个屈服。这时模范班长张书善和张景胜、张景贤纵身跳出烟洞，想打开一条出路，但因敌众我寡，3同志不幸壮烈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敌人用刺刀把他们的生殖器割下，“六猪头”恶狠狠地说：“我叫你再当模范班……”一边用三齿扎在3同志的尸体上。在这个小秘洞里隐蔽的区妇联主任马淑青和张书善等15名干部群众，有的被烈火烧死，有的被敌人的刺刀刺死。张景河为了隐蔽同志，怕6个月的女儿哭喊声被敌人听到，暴露目标，忍痛将其掐死。另外躲在大洞里的村民张书禄的妻子和其14岁的一个儿子、五六个月的小儿子，模范班战士张九兴的爱人和两个不满10岁的女儿，农会长张书春以及张景华、张九鹏、张李氏、张陈氏、张东华等12名村民，全部被敌人烧死。敌人仍不罢休，又把妇女会长张许氏的母亲（双目失明）推进屋子，然后点燃树秸，再把她的只有8岁的外甥张景论掂起来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当从火堆里扒出来时，他的姥娘还死死抱着那可怜的孩子，但都被烧得成了灰骨架。

日伪军的这次暴行给王二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极大损失，但是英雄的王二寨人民没有被日伪军的屠杀所吓倒，反而更加坚

定了他们抗日的决心。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亲人的尸体又投入新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涌现了一批张书栋等为代表的杀敌英雄。

下堡寺惨案

赵广善整理

1944年4月19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军血洗我抗日根据地——临清县下堡寺一带，将十几名无辜群众残杀于下堡寺村东水井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井”惨案。

4月18日，日军调集阳谷、威县、卫东（现临清）等县的日伪军，对临清县下堡寺一带进行残酷的扫荡。当晚9时许，胡庄党支部首先接到情报，威县大寨、麦子乌营等据点的敌人明天可能前来扫荡。消息传开，群众纷纷坚壁清野，做好了躲避扫荡的准备。刁庄（我四专属、四分区的堡垒村，大批粮食、布匹、枪弹都藏在这里）党支部接到情报后，支书丛步月、村长刁春河等村干部紧急组织党员、民兵及进步青年丛俊峰等，连夜把当天运来的十几万斤粮食分头坚壁起来，整整忙活了一个通宵。

19日拂晓，日军从西南、西北、东边等方面往下堡寺一带扑来。当敌人距下堡寺七八里路时，将队伍一字散开，采取了拉网方式，间有骑兵迂回。群众闻讯顿时大乱，四散奔跑。敌人开枪射击，随之枪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后包围圈越来越小，群众越聚越多。

在马庄村前，敌人围住了刁庄往往平卖废品的丛林贵、丛林风、丛金明等人。走在前面丛林贵兄弟2人当即被日军绑了起来，丛金明等4人也被另一伙日军捉住。然后把他们带到马庄，扔到两人多深的水坑里。日军以砖相击，进行戏耍，其中3人游到

坑中一棵柳树前因抓住了树枝未被淹死。丛金明水性差，又穿着棉衣，在水中挣扎了一会儿就沉没了。

7 时左右，日军把聚在下堡寺窑场的西高尔庄的青壮年十余人集合起来，带到高尔庄村前的干水坑内，让他们排成一行，逼问排在前头的刘明甲有没有枪。刘说：“没有”，日军上去一刺刀把他挑死。当问到排在第三的刘明柱时，他为了挽救乡亲，说：“有”。就带着日军串家找枪，一连几家没有找到，最后来到自己家里，刘明柱说：“我是老百姓，真的没有枪”。气得日军大声嚎叫，一刺刀扎进他的胸膛。躲在屋里的老母和十几岁的儿子听刘明柱的惨叫声，哭着冲了出来，日军上去一脚把老太太踢倒，又一刺刀捅在刘明柱儿子的腰部，其子也当场毙命。9 时许，六七百群众先后被敌人围拢到下堡寺村东窑场（此时已有五六名群众被挑死在窑道里），窑顶上的日军架着 3 挺机枪，四周是三四百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其余的日伪军则涌到下堡寺村进行抢掠。

在窑东南约 3 米处有一口水井，丛林贵、丛林风等十余名青壮年被带到井的东边。有几名日军和一个翻译官走了过来，一个日军举着东洋刀指着丛林贵等人说：“你们的起来，枪的有没有？”丛林贵说：“我们都是老百姓，枪的没有”。日军说：“你的说谎，死了死了的！”几个日军上去拉出丛桂锋，反剪二臂推到井里。丛林贵也被活活扔下去（丛林风由于绳索被挣断幸免遇难）。下堡寺村的牛广弟和一名群众被一条绳子捆着，日军用脚把他们踢到井里。胡庄村自卫队员刘玉珍被日军拉出来，几个伪军上去把他打倒，并用刺刀猛戳他的脖子，鲜血顿时喷了出来。刘破口大骂，凶残的敌人又把他抬起来扔到了井里。胡庄村党支部书记董付元同志惨遭毒打以后，也被推到了井里。被踢到井里的群众哭嚎叫骂，丧心病狂的日伪军揭起井盖，遂又往井里扔砖头。

敌人残酷的杀害，不但没有吓住群众，反而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和仇恨，仓上村的董桂生被打得遍体鳞伤，当日军把他架

到窑下准备剖腹时，他满怀仇恨，突然挣脱敌人，光着膀背飞速往下堡寺村奔去，日军开枪射击，但没有击中，又出动骑兵追赶，结果董桂生被惨杀在下堡寺村孙恩禄家里。胡庄村的陈文玉被敌人拉出来后，他同敌人进行扭打，一个日本兵拔出刺刀劈面砍来，陈上去抓住刺刀用力夺了过来，手被割得鲜血直流。另一个日军在背后一刺刀刺中陈文玉，陈文玉倒在血泊中。这时刁庄村的丛金豪、丛俊峰被拉了出来，受到严刑逼问，但他们拒不告诉敌人枪和粮食藏在什么地方，以及谁是干部、共产党员。为此丛金豪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有两个日军端起刺刀刺穿了他的胸膛。丛俊峰面对敌人的酷刑，表现得非常坚强，一个伪军用铁锹砸在他的头上，立时昏死过去。待他醒来后，敌人继续追问，他看了村长、自卫队长一眼，摇了摇头，一个日军又一刺刀从他的锁骨处扎了进去，丛俊峰也倒在血泊里。当日军点到自卫队长丛金来并让其提供情况时，他更是什么也不说，伪军拿杠子劈头盖脑地乱打，丛瘫倒在地，被日军一刺刀戳在脸上。

日军法西斯的暴行没有征服群众，到了中午，日军残暴地把井口封住，带着掠夺的财物撤走了。

后当乡亲们扒开水井时，13名遇难者全部含恨离开人世。此次扫荡共有28名无辜的群众惨遭杀害。

面对日军的惨杀、掠夺，我抗日根据地军民个个义愤填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万众一心，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干扰、抗击敌人的围剿，使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

惨案发生后，刁庄村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青年，每人买了一斤烧纸，悼念为保护干部和财产而英勇献身的丛金豪、丛俊峰同志。并对2位烈士的亲属从生活上长期给予照顾。县区党政领导同志赈济、慰问了遭劫和受害人的亲属，看望了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丛金来、陈文玉等同志，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

（原载《临西党史资料》第21期）

英烈屯惨案

赵广善整理

1944年2月中旬，馆陶县日伪军三四百人，对我卫东抗日根据地薛店一带进行扫荡。由于我事先得到了情报，群众和重要物资进行了转移，使日军扑了空。但是日军并不死心，遂在吴寨安驻下来，准备进行新的扫荡。

正在影庄（距吴寨10公里左右）休整的八路军东进支队指战员，面对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敌人，万分气愤，决心对敌人进行突袭。17日（古历正月二十四日）深夜，张襄基参谋长率东支七连指战员赶至吴寨“霍家老坟”。拂晓，我军对大小吴寨发起攻击。激战两小时后，由于敌众我寡，大吴寨没能攻下，反之，敌军见我势孤，遂调兵出东门对我实施迂回包围。在我军的英勇打击下，100余名日伪军当场毙命，敌人复又撤回村寨固守。

为了彻底消灭这股敌人，我军决定对村寨进行强攻，遭到我军重创的敌军狗急跳墙，拚死向外冲击，后终于从南门冲出逃窜。在攻城和激战中，我军指战员牺牲36人，伤32人。为了纪念死难烈士，不久卫东县政府作出决定，将吴寨改名为“英烈屯”。

“二·一七”英烈屯战斗以后，驻馆陶日伪军变本加厉，又于1944年3月26日（古历三月初三日）、5月1日（古历四月初九）、10月19日（古历九月初三日）连续3次对英烈屯进行报复性袭击，其中尤以第二次袭击最为严重。

1944年5月1日深夜，日军采取惯用的“铁壁合围”战术，突然将英烈屯团团围住。拂晓，把群众赶到一个场院里，四周架起机枪，逼问群众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村干部，要乡亲们交出子弹，不然统统枪毙。全村男女老幼强忍怒火、谁也不吭一声。日军中队长见状，气势汹汹地把霍路存从人群里拉出来逼问，霍一句话不说，日中队长上前一刀将霍的头颅砍下。接着，敌人又拉出李孟芹来，李还是什么也不说。日中队长又用手枪将孟芹击毙。就这样，一连杀死五六名群众，敌人还是什么也没问出来。日中队长气急败坏，立即下令：“开枪！”，随着一阵枪声，又有36名无辜群众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敌人终于一无所获，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我所目睹的范八里惨案

赵五桂

我名叫赵五桂，今年64岁，离休前任临清市公安局副局长，至今，我对抗战初期日军制造的范八里惨案仍然记忆犹新。

1938年11月18日（古历九月二十七日），日本侵略军第二次进犯临清。这股日军是从城北武城县方向过来的，途中经过临清县五区的范八里庄。当时那里驻有范筑先所属十六支队的的一个武术连。黎明时分，在村口站岗的哨兵发现从北面影影绰绰走过来一支队伍，立即发口令询问，见对方答不上来，遂对空鸣枪警告，令对方停止前进。日军发现这里驻有中国军队，马上将村庄包围，并用火炮和机枪对村庄进行轰炸扫射。遂后敌人冲进了村庄。由于我武术连战士多系徒手，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结果很多人当即在日军的枪口下毙命。后来，日军又将武术连的营房放火焚烧，风助火威，村内与营房相连的许多民房也很快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我家住临清县五区贺庄（现属河北省临西县），这里距村西的范八里庄只有一华里。当时，我是被日军的枪声从梦中惊醒的。我赶忙穿衣下床到门外一看，只见村西头的范八里庄火光冲天，枪炮声响成一片。不一会儿，我村的群众差不多都起来了，纷纷站在村西头观望和打听消息。天亮以后，一个背着粪筐前去打听消息的群众跑了回来，他气喘吁吁地说：“快跑，是日本鬼子来了！”群众听罢，顿时慌乱起来，一个个拚命地往村东方向

跑。我们刚跑出村不远，日军的先头骑兵部队就到我村了，敌人架起机枪，对着旷野的群众疯狂地进行扫射，有几名群众当即倒在血泊中。这时幸亏有一个在东北挑过土篮会说几句日本话的赵继才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日本人说：“太君，他们的不是胡子（东北人称土匪为胡子，日本人称抗日联军为胡子），是苦力！”日本人听罢，一个个才骑上马奔临清城内去了。

待日本人离去后，我们到范八里观看时，只见十六支队驻处被烧得一片焦土，横躺竖卧的尸体有100多具，臭气、腥气熏天，其惨状目不忍睹。特别是到了晚上，猫头鹰飞来飞去叫个不停，令人毛骨悚然，村里的老百姓都不敢在那里经过。直到解放以后，我在五区当财粮助理，参与在此重建区公所时，仍可看见在残垣断壁上遗留下来的斑斑血迹，使人不寒而栗。

骇人听闻的尖庄惨案

赵广善整理

尖庄位于卫运河畔临清县境西侧。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水旱码头和大集镇。抗战初期，已有3000余人口。平时过往舟船和车辆在此停歇，老百姓来这里赶集，做生意，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1938年11月17日，日军第二次侵占临清。驻城内日军为了便于控制卫河两岸的人民，决定在尖庄以北的大营渡口用船架一浮桥，遂派人到沿河渡口抢掠船只。18日（古历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日军20余人乘坐从冯圈至孟口抢来的船只，经尖庄到大营时，遭到了由民军一路二团团团长姜宦臣率领的30余名士兵的伏击，击毙日军16人，余者跳水逃走。

19日上午8时许，从临清出动的日军二三百人分乘16辆汽车、4辆装甲车突然向尖庄扑来。群众闻讯纷纷向村外逃离。当向村北逃出的群众刚到村头，便与迎面而来的日军相遇。日军用机枪、步枪疯狂地向群众扫射，顿时尸横遍野，包袱、行李、牲畜、车辆遍地皆是。在日军密集子弹的封锁下，一部分群众又撤回村子里。旋即，乘车的日军从村东、村北、村南三路包围了村庄，并逐渐缩小包围圈。被围困的群众纷纷向东面大堤上跑，布防在大堤上的日军立即向群众开火。很多无辜群众当场毙命。只有极少数人冲出了包围圈。杀人不眨眼的日军对群众穷追猛打，又有一些人被打死或用刺刀戳死。河堤上、河坡里到处是被打死

的尸体，其惨状不忍目睹。

随着包围圈的缩小，日军一部分冲进了村庄，不管男女老幼，见人就杀，逢房就烧。顿时，整个村庄大火冲天，浓烟滚滚。没有跑出去的群众被日军堵在赵家胡同。敌人先是用机枪扫射，打不死的再用刺刀挑，有的被挑死在树杈上、墙头上。赵习田怀有身孕的妻子死得更惨，胎儿和肠子流在地上。顿时，小胡同内尸体成堆，血流遍地。仅此一处日军便杀害无辜群众46名。与此同时，兽性大发的日军在其他巷子里也杀了许多人。谷东阳和赵锋两家老少共8口人，被日军堵在一间屋里，全部被活活烧死。鲍广生的哥哥等11人在村北被日军用刺刀挑死。躲进天主教堂的14人也未能幸免，被日军抓住后，先以铁丝穿进锁骨把众人捆在一起，然后拉到大街上浇上汽油，再放火烧死。丧心病狂的日军甚至把尸体排列在墙上，尔后再以火烧。

日军的暴行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恨和反抗。有的以木棍、铁锨与敌人拚命，有的赤手空拳与日军搏斗。躲在厕所里的闰孟芳的父亲被日军发现后，便猛然以砖头将敌人砸昏，转身跑到另一个小院子里。

惨无人道的日军在尖庄烧杀3个多小时，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焦土。黄昏时分，幸存下来的人们回到了村庄，面对到处是尸体、鲜血、瓦砾，胸中无不燃起仇恨的怒火。

日军在尖庄的这次大屠杀，共残害无辜群众367人。其中4户被杀绝，重伤7人，失散婴儿2名，烧死牲畜13头，房子2000余间。这是日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南镇惨案

林金祥

日军侵华时，在高唐县南镇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血案。这一惨案的背景和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10月开始，日军相继侵占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德州和禹城。经过两次犯境侦察之后，于11月16日侵占了高唐县城。11月18日，侵占高唐县城的700多名日军，往南进犯侵占了南镇。日军此次犯南镇，拉民夫，掠民财，横行乡里。当时，由于百姓初次见到日本侵略军，处处躲避着。还没有组织起来抗日武装。日军于11月26日晚奉命撤往禹城。

1938年1月27日，一支120多人的日军从禹城出动，当天晚上骚扰践踏张大屯，28日上午约10时侵入南镇。

从日军第一次侵占南镇到这次再度入侵，虽然只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形势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共鲁西区委的领导下，在范筑先通电全国，守土抗日的影晌下，广大人民群众觉醒了，许多村庄都组织起了抗日自卫武装。日军入侵南镇之前，南镇村自卫队得知消息便主动撤出了村，留下一伙夫负责摸清日军的人数、武器装备和住处。摸清情况后，自卫队很快与范筑先部和茌平民团武装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了当天晚上摸营的战斗计划。按照计划，茌平县公安局长丁宗义带领茌平民团在南，南镇自卫队长殷兆立、张秀冠带南镇自卫队在北，王子范带本村民团在东，韩风文带韩庄民团在西，四面同时行动，一起往村里包抄。按预定时间，大约刚过半夜，南镇自卫队从北门摸进了村，很快

爬上了邢天成家住日军的房顶。自卫队员杨胥金倒趴在房檐上（两人按住脚），双手使枪封住门口；其他人在房顶上挖开洞往屋里投手榴弹。日军被炸死30多个，剩下的十多个屁滚尿流般鼠窜到街上。此时，村南头与村北头的日军，都认为是自卫队，用机枪对射，除跑出的日军全部被打死外，南北双方各有十多个日军毙命。

这时，摸营的东西南3路，由于地理不熟，行动迟缓，被日军阻之村外。丁局长亲自率领南路队伍几次向日军发起冲击，打死打伤许多日本兵，但没有冲进村。我方也有较大伤亡，丁局长不幸牺牲。

由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悬殊较大，我方强取不下，便撤离了南镇。

29日清晨，日军便对手无寸铁的南镇无辜百姓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大屠杀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日军首先杀了郭邢两家10口人。日军先怀疑住日军的郭景一、邢天成两家与摸营人相通。他们把郭家在内的郭景一的父亲郭佩德、两个哥哥郭景家与郭景东和一带工等4人，用绳子捆起来，让4人都跪在地上进行毒打。日军逼着郭佩德往刺刀尖上磕头，郭不磕，便强按着头磕，待双眼全被枪刺戳瞎后，与其他3人一起被枪杀。

邢天成院里在家的6口人，被日军捆起来推到杜景武家的猪圈里，用排枪全部打死。邢天成12岁的孙子——长顺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日军接着分伙到各胡同杀人。发疯似的日军在各个胡同见人就杀。有的将一个胡同的人集中到一起，在地上跪成一行，日军先用枪将人打倒，再用大刀往头上砍，最后使枪戳胸。仅殷兆灿住的胡同就被打死11人。殷兆灿全身多处惨遭刀枪伤害，昏死后又苏醒过来，幸免一死。后来全身留下十几处疤痕。王贵生躲藏在柴垛里，日军发现后，把刺刀插进他的屁股里，活活将

他捅死。郭金连的肚子被日军打了个大窟窿，肠子也被打破了，红萝卜馅从肠子里冒出来。

第三阶段，日军对全村搜查后进行集体屠杀。日本兵在各胡同砍杀一阵之后，便挨门挨户进行大搜查，将搜出的200多人集中到郭景一家的大院里。日军强迫群众一排排地跪在地上，低着头不准直身，3挺机枪对着群众。几个日军在人背上走来踏去，还将人拉出来当凳子坐。日军逼问群众谁与自卫队有联系，往人脖子里放烧红的木炭，还在刚剃过头的人头顶上划开十字形大口子，鲜血顺着头往下流，人头成了血葫芦。日军将邢占元脖子后面的3条筋腱用刺刀割断，活活折磨死。逼问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日军在群众中挑出了40多名身强力壮的男人，捆起来用绳子连在一起，谎称带走去出劳工。结果，把这些人带到村北头的古灵城墙边上，用机枪扫射，进行集体屠杀，除白永祥一人身遭数弹倒在死人身下没死外，其余的人全部遇难。

此次惨案，被杀害的南镇村民83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近30人。加上在南镇的外乡人，惨遭杀害的共有100多人。日军逃离南镇时，还将民房倒上气油点着，全村燃起了大火。

至此，日军制造惨案的过程结束了。但惨案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却是深重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二天就是春节，南镇人无不是在极度惊恐，万分悲痛之中度过的。更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

李九祸殃房庙于庄

朱学温

我是房庙人，李九（李采题）打房庙于庄时，我在家，目睹和经历了他们的这次暴行，下面仅将我回忆起的有关情况介绍给读者，请指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北平市政府、机关、学校师生，市民纷纷南逃，华北大地人心惶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入。9、10两月日军两次袭击高唐，驻守高唐的鲁西北第四行署专员兼民团指挥赵仁泉，率众南逃，但日军并未占领县城。此时，六专区专员范筑先，拒不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过河（黄河——编者注）南退，坚持在鲁西北收拢各县抗日武装，守土抗战。范接收了赵仁泉的残部，派员收拾高唐残局，先派六专区政训处干事张承先（共产党员，北京某大学学生），以及县长周子明（共产党员、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生），赴高唐工作，年后2人奉命调回聊，又改派旧职员周景芝任高唐县长。当时，高唐已有些爱国志士，如城北共产党员金谷兰，城东北抗日先锋吴子杰、崔子固、刘嘉义，城里的杜文会，城南的韩风文（以后参加共产党）等，不甘心做亡国奴，积极组织武装，领导民众抗日自卫。有的也从保护一村一乡的局部利益出发，联合邻村，抗击日伪的侵扰。以宋长立（曾为红枪会联庄会会长）为首的城西邱、辛、安庄、十里铺、袁庄、房庙、于庄、田楼、三里岔、田马庄等十余村的群众，就曾联合起来，进行武

装自卫。那时，多年逃亡在外的土匪头子李采题，乘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机，暗通日军，返回老家打渔李庄，成立所谓的自卫团，过去一直不敢抬头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便依附其下，某些胆小的地主还畏其权势，自动给李九送枪送粮，为虎添翼，壮其威势。李九又勾结邻县日伪王化三（外号高粱楂）、张栋臣（外号张扒皮）、王春喜等，侵入高唐城内，县长周景芝受其势力包围，遂倒向日伪一方，高唐县城即为日伪土匪占领。1938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八），张八、李九等，在城东一里庄杀害了吴子杰、崔子固、刘嘉义等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当时吴子杰已受范筑先编为高唐抗日游击营营长，兼高唐县大队队长。李九一伙继而向高唐城南推进，但遇到了城南抗日武装韩凤文及赵仁泉余部的有力反击，李九北归，回到高唐城西北一带，欲驻房庙于庄。我村的房兆兴，在民初匪祸猖獗时期，即为本村红枪会首领，土匪曾几次试图进村祸害，但在房兆兴的抵制下，均未得逞。其因，我村群众不畏强暴，习性强悍。值此国土沦丧之时，李九恶势力又丧心病狂地兴风作浪，民众对其倒行逆施，早就倍加仇恨，甚至某人出面振臂一呼，即得群众相呼应。于是，房庙和于庄建立了共同防御阵线，坚决不让日伪军李九匪徒进驻房庙于庄。村民们还严加盘查给李九送给养的车辆，同时又与西南各村宋长立、田传策（田楼人，后投敌当了伪区团长）商议，一村有事各村支援，击鼓为令。村民斗志昂扬，自卫队队员们以少量快枪和红樱枪、大刀片为武器，日夜站岗放哨，严阵以待。晚上村外悬挂红灯，以张眼目，并在要道口拴上绊马绳，以防伪匪夜间偷袭。

汉奸李九，得知房庙于庄武装自卫的情况后，气急败坏，仇恨在心，即令其驻杨庄的外甥董洪珠率领匪众于1938年3月31日（农历二月三十日）拂晓前，先向于庄发动了进攻，于庄群众奋起还击，激战约半小时，董匪部弃尸一具丢枪一支，仓惶逃窜。

于是李九不甘罢休，又重新部署再次攻房庙于庄，他勾结城内张扒皮、高粱楂、王春喜及驻西南乡的冯二皮（即冯寿彭）等，四面合围房庙于庄。是日午后，枪声四起，鼓号齐鸣，房庙于庄自卫队挥刀舞枪赤膊上阵，从城里逃往我村避难的群众，也脱掉棉袄，加入了抗击伪匪的行列。当时有句口号是“打起仗来认光脊梁不认人”。所以大家都光着膀子挥动刀枪，迎战匪伪，颇有英气逼人之慨。这时，宋长立派来的援助力量，在袁庄遭到冯二皮的阻击，十里堡、袁庄也被冯匪焚烧。田传策明通房庙于庄自卫队，暗勾李九匪帮，背信弃义，闻鼓不动，袖手旁观，故房庙于庄成孤军奋战，虽然敌进几出，但终归势单力薄，寡不敌众，3点钟以后，于庄被董匪攻进，村卫队被迫撤向房庙，4点钟以后，房庙东南角也被匪部突破，进村之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顿时全村火光冲天，哭喊惨叫声不绝于耳。下午5点钟后，天色渐暗，匪以为短兵相接与其不利，便收兵撤退。村民们把殉难者草草收敛，计伤亡者有房兆兴、房兆贺、朱景绪等20余名，于庄有七八名。李善厚的母亲被匪剖腹后，又被歹徒用内脏污血擦洗子弹——他们传言红枪会有神仙符体，刀枪不入，用污血洗子弹，可驱鬼神。

房兆兴一死，群龙无首，村民们执意由村卫队掩护村里的妇幼老弱出村到安全的地方去，而后再回村坚持斗争，可是出村虽未遭匪伏击，但亲朋故旧坚决不让卫队队员们回村遭难了。次日上午，李九匪帮先在村外做试探性进攻，当发现无人抵抗时，便蜂拥进村，再次进行了疯狂地烧杀抢掠，扁负车载连续数日。据不完全统计，歹徒们烧房430多间，有25户被烧光，于庄较轻。抢走棉花6万多斤，牲口38头，铁轮车、四轱辘头车30多辆，粮食，衣服不计其数。面对这惨遭劫难的故乡，村民们只得投亲靠友，四处避难，而在外村又不敢说自己是房庙于庄人，以避遭横祸，忍气吞声地熬日子。

不久，房庙朱玉如（后改名朱玉轩），被李俘去罚款300元获释回村，他受李九胁迫通知房庙于庄给李九交罚款10000元（银元），以赔偿子弹费，否则谁也不准回村种地。可是，当交上罚款回村时，村里已是一片废墟，到处残墙破壁，弹痕累累，烟熏火燎，目不忍睹，许多人家四壁无存，难以栖身。

殷楼惨案访问记

殷凤鸣口述 张巍整理

我叫殷凤鸣，是殷楼惨案幸存者之一。

一提起殷楼惨案，心情无比沉痛。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战争的败局已定，傀儡伪军，失去靠山，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何去何从，难以难定。我鲁西北人民游击队，为减少人民受战乱的痛苦，进行争取伪军中部分人的起义投诚工作。当时我八路军在博徐宝壁支队内，有一个共产党员周荣祥，系日伪军团长殷传业的外甥，他奉命做殷传业投诚的工作。殷传业其团，有人约500，枪支有300，团部主力驻守天宫庙王庄，其余小部分驻高庄、殷楼等据点中。殷传业经周荣祥的争取，决定向我军投诚后，他便把其大部分兵力，从各据点抽回天宫庙王庄，只留少数人，看守据点，以待起义。

距殷楼不足10华里的徐官屯，是日伪军团长庞长申的大本营，有人2000余，枪支约1000，是我县日伪军兵力较强的据点。且庞长申其人，性情颠预，凶狠毒辣，为人狡猾，诡计多端。在群奸中，一向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素有吞六国而独霸的梦想。对处其唇下的殷传业团，早就有消灭吞并之意，只因为当时的伪县长李采题（外号李九），是殷传业的妹夫，碍于情面，也不得借口，对这块嘴边肥肉，虽垂涎三尺，始终没有动手。

殷楼李文清在庞团任营长，侦知殷传业有投八路军之嫌，便向庞告密。庞为吞并殷传业，正苦于无机可寻，得此借口，便于

194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夜，倾其全力三营之众，偷袭殷楼殷传业据点。李文清点主攻，庞长河营绕南镇东下，断殷楼退路兼阻天宫庙王庄之援，庞世忠营殿后，向左翼推进，以防县城李九支援。殷楼群众，以防匪伪之袭扰，经常守夜，打更护寨自卫。因李文清主攻，李氏群众不抵抗，西门失去了屏障。殷姓群众武装，在村内逐院逐屋和敌人拼搏，巷战至天明，因寡众悬殊，实在难以在村内继续抵抗，乃转入殷传业的据点内，继续抵抗待援。至下午弹药用尽，仍以刺刀肉搏，敌人虽百般威胁利诱，仍是拼命抵抗，直到黄昏，终因人少不支，被敌人攻入据点，全部被俘。

此时我游击支队徐宝璧部，到天宫庙王庄策应殷传业部起义，闻殷楼被围，随率部赴援，当部队赶到时，敌已绑架殷楼群众急急逃过徒骇河西去。我援军见我众寡悬殊，如孤军深入，定遭敌算，故未穷追。敌人把所俘殷楼群众等38人，押到牛官屯东门里一人家关押起来，可能是慑于伪县长李九的权势，并借以向李九献媚，接着就把殷传业的哥哥殷传海夫妇2人放了，未几，又把殷传业的卫士，夹滩的范金贵也放了。这时，我的一个仁兄弟赵希银，正在庞团当兵，他听说我也被捕，就顾不得细问许多，急忙去求他的表弟牛献之向庞说情，因牛献之是庞长申的妻侄，一说就准了，我以留庞部当兵为条件，被释放。当牛献之见到我，知道我父亲和二弟也被关押时，又急速向庞去说。谁知正当此时，被俘者有人挖开后窗逃走，被房上的卫兵发现，有两人当场被打死。其余又都被捉了回去。因此，惹起了庞长申的兽性，一怒之下，就把他的卫队连集合起来，下令把这32人全部杀掉。并说：“谁要说情，就和这些人一律同杀。”因此，我父亲和二弟都没能救出来。庞怕这些人再行暴动，也怕惊动周围群众，假说转移地方，分批押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并决定不管老少，一律用刀杀头，推到一个坑里埋了。

为了向死难家属敲诈勒索，不准家属收尸。按情况交钱收

尸。当时死者已身首异处，一坑乱埋，加之天热腐烂，蛆生狗啃，血肉模糊，极难辨认。尸场上，儿哭娘嚎，呼天唤地，如癫如狂，捶胸顿足。找到了胳膊，又错了头，找到了头又错了身躯，惨痛悲愤之状，难以言喻。就是这样，豺狼成性的庞长申，嫌臭气熏人，影响卫生，用武力驱逐死者家属离去。

这次死难34人，据我记忆，殷楼20人，傅桥2人，祝庄2人，南镇6人，还有4人是哪村的已记不清了。其中年纪最大的，已70岁，是殷传德老人。最小的，是殷传德的孙子，只有12岁。有一户死绝了的，一户父子死了5口的，还有死了祖孙三代人的。这些遗孤寡母，如不欣逢全国解放，其生活前景，实不堪设想。这次抗击庞长申的袭击，是殷楼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而自发组织的。在力不胜敌而不得已时，才退到殷传业的据点里。万没想到庞长申正是为吞并殷传业的力量，而专来攻其据点的，故而成为殷楼之一大惨案。

阿城二月二惨案

崔衍峰整理

农历二月初二，是农村旧习俗围囤的日子，以祈求好收成、好年景，但这个美好节日却成了阿城人民深受灾难的一天。

1939年农历二月二日拂晓，勤劳的阿城人民早已开始了传统的围囤活动，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的喜庆活动之中，突然，“叭叭”的枪声从四周响起，不一会，激烈的枪炮声就响起一片，原来，日伪军从东西北三面向阿城进犯而来。

当时，驻守阿城镇的是原国民党二十九军第四旅冯寿彭的部队，战斗刚打响，冯寿彭就携带家眷及大部人马南逃而去，只剩下少数兵力坚持战斗，由于日伪军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再加上飞机的增援，不多时，就突破了阿城驻军的防线，占领了阿城镇。

野兽般的敌人面对赤手空拳的群众开始进行疯狂的屠杀。穷凶极恶的日军像是输红眼的赌徒，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阿城镇到处火光冲天。北门外东义和村只不过七八户人家，就有11人被杀死，陈赞臣的大哥被敌人抓到后，当练刺杀的靶子，凶残的敌人轮番穿刺，达十几个洞之多，整个人成为一血人，其撕心裂肺的惨叫，让人耳不忍闻；其二哥也被日军挑死。农民刘佃忠，早晨上街卖豆腐，战斗打响后藏到了北门桥下，被日军发现后拉上来，用刺刀从他嘴里捅进，将头部搅烂，满脸是血，搞得面目全非，若不是身上有记号，连自己的亲人也难以辨

认。北门里朱学智家的房子被战火烧掉，其兄弟朱学礼祖孙三代（祖父朱长法70岁，父亲朱金海50岁）藏在地窖里，被日军用毒气熏上来后又被刺刀劈死。有的人给前面的日军哀求，后边的日军就用刺刀从肛门里刺进，痛得满地打滚，惨叫连天；有的被日军剖腹后，挑出肠子挂在树上。刘集一位姓杨的雇工，被日军抓到后强迫带路，到阿城时几个日军被冯军打死，丧心病狂的日军拿他出气，把他绑到树上，一刀一刀地活剥了。没有逃脱的妇女们，成了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她们被强奸后，又被用刺刀捅小腹致死。更令人发指的是，凶残的日军连呀呀学语的小孩也不放过，有的被用刺刀挑死，有的被蹬着双腿活活劈死，其状惨不忍睹。

经过一上午的屠杀，此时的阿城镇到处尸骨累累，血流成河。这场惨案计有群众112人被杀，全家被杀绝的有十几户，其他损失不计其数。下午，日军南下。

时至今日，每到二月初二，日军的暴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呈现在眼前。阳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家仇国耻的日子。

附件一

我所目睹的阿城二月二惨案

时效民

农历二月初二，农村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家家户户“围囤”，象征今年大丰收。1939年农历二月二，鸡叫两遍约凌晨4点我们全家就起来了。我家住在阿城镇西3里的王家庄，我和老人正紧张地干活，忽然看见一队日本兵从西边向我们走来，其中几个兵正在踢打姓汪的邻居。汪是个精神病患者，经常在拂晓前大喊大叫，日本兵可能认为他是给驻阿城的部队发信号。我和父亲吓得藏了起来，躲在一个破房子里，还不时偷看这队日本兵想干什么。只见他们分成三三两两，到各家农户抢东西。忽然从东边响了一枪，紧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的冲锋枪声。日军赶忙从各家匆匆出来准备战斗。我趴在村东一个壕沟里，亲眼看到驻阿城的部队和日军厮杀的情景。开始日本兵很傲慢，指挥官举着指挥刀，士兵端着枪，挺着胸脯往前冲。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后，他们便趴在那里利用地形地物掩藏着。日本兵使用的是三八大盖，歪把机枪，小掷弹筒，没有大炮。我看到日军向前冲了几次，都没有突破阿城驻军的防线。一直打到太阳出来1丈多高，约9点钟左右，忽然来了一架飞机，“嘟嘟嘟”地进行低空扫射。我是第一次见飞机，开始很害怕。但飞机转了几圈，又没在我上空射击，也就不大害怕了。可能阿城守军缺乏防空经验，日本兵很快冲了上去。日军冲进去后，我虽然看不见了，但枪声、

手榴弹的爆炸声、有时还伴随着小孩的哭叫声，听得清清楚楚。大概持续了两顿饭的功夫，就听不见枪声了，只见有的地方浓烟滚滚，是日本人在烧房子。事后得知，阿城守军被日本兵四处包围，寡不敌众，往东南方向突围，日军也往东南方向追击下去了。

阿城镇是一个大镇，有近千户人家。日军攻入后，见大人孩子都杀。过后我也想去看看，老人怕我见了害怕，没让我去。听从镇上回来的人说，大街小巷、院落都有尸体，有的一家5口被杀死在一个炕上，有的被捆在树上杀死，日军杀人除了个别是用枪射击外，大部分是用刺刀捅死的。有几个年轻妇女被强奸后，又被用刺刀捅小腹致死。连吃奶的孩子也未幸免。有的尸体还被肢解，挂在树上。被烧的房子则更多了，大的店铺、好的院落、和尚住的庙宇，几乎都被烧过。究竟有多少人受难，烧了多少房屋，那时兵荒马乱，无人统计。

附件二

阿城镇北村民李健成谈

二月二惨案情况

那天，“冯二皮”的兵在北门里住着，一早正在出操。我们“围囤”都起得很早，听当兵的刚喊了一、二、三，没喊“四”的时候，在西南的日军就打上了，听说是从聊城来的，上面有飞机。打到七八点钟，日军冲进街了，从整个北面突进去了。当时日军是三面包围，留了个南面，冯二皮的兵往南逃跑。我那年15岁。我村伤亡了几个人。被刺死的有林炳冉，开始一刺刀没刺死，日本兵回来又刺了一下子。我知道的有打死的杨庆文爷俩，在北洼楼里藏着，被敌人冲进去用刺刀挑了。还把骡子、马打死了几个。朱家爷仨、齐家爷仨都是被捅死的。我看到日本兵也死的横七竖八，把几个死、伤兵抬到小东关烧了。抬兵时看到我村在菜园剗地的老头林世琪被日本兵一枪把他胳膊打伤了。

附件三

阿城村雷学英谈当时情况

我那年22岁。日军打阿城镇的时候，我和老公公、婆婆、小孩都躲在家里，把大门插上。这时日本兵要跳墙进来，叫给他们要搬凳子。我公公程魁廷刚给他们搬凳子时，一枪打过来，把我公公打死了。日本兵冲进屋来，我抱着孩子说：“你看看吧，这是我们的孩子，没别人。”日本兵就走了。

沙河崖惨案

崔衍峰整理

抗日战争中，沙河崖这个远近闻名的抗日堡垒村，曾多次受到县领导及人民群众的称赞和表彰，在他们的带领下，周围的村庄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运动。

伪县政权的头目们，对此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对沙河崖人民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密谋要偷袭，以扑灭我抗日爱国及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热情。

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夜晩，一张黑网撒向沙河崖村。阳谷县日伪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刘继春带领牛贯一、刘继梅、席连成3个中队近300人，悄悄地将沙河崖团团围住。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伪军们首先扑向村干部及民兵家中，由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没有任何准备，还没来得及反抗，村民兵队长蒋广友、农会长蒋少仁、民兵蒋广汉、蒋广化、蒋景省5人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残的敌人并没就此而罢休，他们将村党支部书记李永清、民兵李永福、蒋景乐等7人及村民蒋广明等29人抓去。

审讯室里，支书及民兵7人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老虎凳、辣椒水等牢房内的所有酷刑都尝过，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审讯的结果，只是得到一阵臭骂，气极败坏的汉奸们，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7名勇士枪杀于县城西南。

这次事件，共有12人牺牲，抢去枪枝32条、牲畜及其他物品，并放火烧毁民房42间。敌人的暴行，更加激起沙河崖人民的革命斗志，他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在解放战争中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血染聊城

冯文德整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南侵，于当年11月开始侵占鲁西北地区。由于鲁西北地方党统战工作的成功，说服山东省第六游击区司令官范筑先拒绝乱命，并向全国发出“皓电”，决不南渡黄河，坚持在聊抗战，誓与聊城共存亡。在中共鲁西北地方党的领导下，于华北敌后创建了驰名国内外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为此，日本侵略者把聊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坚持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11月中旬，日军分3路进攻鲁西北，中心目标是聊城。11月13日，日军第一一四师团秋山旅团干叶联队从东阿渡过黄河进攻聊城，其先头部队是平田大队，约有步炮骑兵300余人，汽车、坦克十余辆，并有两架飞机配合向聊城进犯。

13日上午，范筑先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迎击日军的作战方案。政治部的姚第鸿、张郁光、张霖之、袁仲贤、赵伊坪等参加了会议。张霖之等人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应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应把部队转移到城外和日军打游击。范筑先同意了进行游击战的意见，决定把各机关、学校全部移到农村，枪支弹药由袁仲贤负责运往城西南堂邑县的张炉集，并鸣锣动员群众出城。采用在威县徐向前所介绍的席卷战术，任命军法处长刘佩芝

任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为副司令，率领游击营和第二支队的两个连担任城防，待日军进攻聊城时，范筑先在城外调集大军夹击敌人。会后立即开始行动。

14日上午9时，日军已逼近聊城近郊。范筑先布置完战斗任务，正准备撤退出城时，李树春突然乘车从临清赶到聊城，和范筑先商谈整编部队问题，一直到下午4点方才离开。这时，日军的火力已封锁了出路，使范筑先失去了出城指挥作战的时机。原在城东关布防的民军第一路很快放弃阵地逃回曲周县东目寨。王金祥趁机以追赶民军第一路和调集部队为名，从北门带着游击营的一个连溜到城北的辛闸。此时范筑先已无法出城，便和张郁光、姚第鸿率少数部队守城作战，以待外援。下午4时以后，日军首先从南门方向攻城，游击营同日军展开激战。在日军爬城的危急时刻，范筑先、姚第鸿、张郁光等率手枪连和传令队50余人赶来增援，连续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毙伤日军数十人，守城部队也伤亡30余人。

黄昏后，东关失守。日军在猛烈炮火配合下由东门等3个方向爬坡。范筑先、姚第鸿急率传令队赶到东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退日军3次爬坡。这时各县电话尚未切断，范筑先用电话令各县派部队火速来援。但是东南的第五、六、二十一支队均被寿（张）、阳（谷）、东（阿）边的“忠孝团”的部分反动武装所阻止；高唐的驻军由于日军的围攻，也不能来援；在大峰山活动的第十支队二团接到“聊城危急，火速来援”的急信后，由刘致远率5个连火速奔赴聊城，一时还未到达；驻冠县的第十支队奉命在金滩镇阻击大名的日军。15日，攻城日军增至7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向东门守军发起猛攻。范筑先和姚第鸿带传令队急赴东门督战，打退日军的几次攻击。激战中，范筑先左臂被炮弹炸伤，陆子衡等30余人壮烈牺牲。上午9时，日军用大炮平射将东门打开后，蜂拥入城。但在日军飞机扫射时，范筑先又被

打断腿骨。在送往天主教堂医院的路上，范筑先壮烈殉国。随后守城部队陷入混乱状态。郑佐衡等率130多人从西门突围失败，伤亡严重。剩下30多人退到西门瓮城和日军展开肉搏战，全部战死。下午5时左右，聊城完全被日军占领。在守卫聊城的战斗中，范筑先将军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及聊城县县长兼城防司令郑佐衡、秘书长赵玉坡、经理处长崔乃德、警察局长林金堂等守城健儿700人左右壮烈殉国。

吕祖庙是聊城西关一座较大的庙宇，位于城西外200米处，南北两面都是宽而深的湖水，只有一条东西来向的道路穿过，宽阔的水域从庙前通过，将城里与城外连接起走。11月15日上午，当日军攻破东门时，有部分群众闻讯弃家向西门和北门外出逃，200多人出西门后，跑在前头的刚越过吕祖庙，就被从西堤外包抄过来的日军截住，日军的几挺机枪同时向群众射击，当即就有40多人被打死在吕祖庙西的路上，后面的群众见状就回头又向城内跑去，但届时西门上已被敌人占领，见群众进城，就关闭了城门，使百余群众无路可逃，被围困在吕祖庙间。有几个会水青年跳水夺路而逃，也都被打死在湖中，剩下的群众都被赶逼进吕祖庙内，开始捕杀，日军见人，距离远的用枪打，距离近的就用刺刀捅，最后剩下百余人，被逼到一个角落处，日军架上机枪向人群射击，百余人顿时中弹身亡。在通往西堤数百米的路上200余人的尸体横陈、鲜血顺堤而流，印红了路堤的土地，染红了两边的湖水。

日军占领聊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全城性的大捕杀。他们挨家清查，把逮捕到的范筑先部下的30多名文职人员和100多名士兵，全部集中到西北大操场上（现在的地区粮局驻地），用刺刀捅、战刀砍、枪毙等手段，全部杀死，其惨景难以言状。

在光岳楼南街，日军逮捕了36个市民，把他们当作抗日嫌疑犯押到南门外水桥旁，分3排站立，先抓出几名青年拷问后，就

被刺刀捅死，其余人见状刚想反抗逃走，被周围的日军一阵枪弹打死，无一逃脱。

当时在聊城有个叫韵开哲的民族败类，日军进城后，他制作了一些日本国旗，挂在自己的门前，并手持“太阳旗”站在门前以示欢迎，日军便把他当作“良民”作为向导，到处搜查民宅，最后把数百名市民抓到西北角大操场上，让韵开哲辨认所谓的真假“良民”，结果有70多人被韵开哲指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大捕杀后，日军在聊城县城附近村庄上抓来20个农夫，用刺刀逼着他们搬运城内的尸体，打扫街道上的血污，在聊城的“维持会”的主持下，把尸体有的就近扔到湖里，有的被运出城来，埋在南、北、西关附近，西关埋的最多，有的一个坑就埋近百人。日军攻占聊城后，据当时聊城“维持会”“商会”统计，在城内掩埋的尸体达1200多具，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鲁西北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张家楼惨案

姜军洲整理

1945年农历二月十八日凌晨，日伪军在洗劫张家楼时，除烧光房屋、掠空财物、打伤530多名群众外，并有333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如今提及此事，被害家属痛哭流涕，幸存者无不切齿痛恨。

这起惨案，是日军驻在平顾问井上和伪县长李歧山共谋及其亲自指挥的一次血腥屠杀。

1944年农历七月间，张家楼人民不堪于日伪军横征暴敛，成立了有300多名青壮年参加的抗日联防队，加强了防范。从此，张家楼不再向日伪军缴纳任何粮、款，不负担任何公差。于是，该村被县、区各级反动政权的贪官污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45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日，井上、李歧山带领的3700余日军伪军和“治安”军，于拂晓前包围了张家楼。敌想从张家楼北门打进，往南围歼村民百姓；指挥所设在村东北徐家林。一场屠杀即将开始，上午8时许，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北门，在敌人的号声中，日、伪军齐拥进村，四面的围敌集中火力，向村内发动了猛烈地袭击。敌攻上寨墙后，机枪、步枪等轻重武器组成了密集的火力，射向村内抗日群众和房屋；从北门进村的敌人见人就杀，遇柴就点火，见房就烧。刹那间，火焰四起，狼烟滚滚。

村内百姓手持大刀，红缨枪、铁钎、土枪虽拼命抵抗，但终抵不过敌人火力，又听说日军从北门打进来，便扶老携幼纷纷离村逃走。当30多名青壮年男女从南门下的地道逃出洞口后，恶狼

似的日伪军调转机枪扫射起这些无辜百姓，顷刻间，群众象谷个子一样倒下了，有三四个死者压在一起，有的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死者的身上，脸上流满了鲜血。幸存者张同禹说：“当时有好几批群众从地道里往外逃，都遇难了，在地道内外被日军打死的有64人，我的侄张承新就是被日军残杀在地道内的。”据守东门的百姓，见日军进寨，一看无力抵御，有的跑进院内，有的当场被杀害。王长新、徐奉森因当时子弹打尽，来不及往家跑，便一同躲在寨墙洞里，日军发现后当即扔进一颗手榴弹将他俩炸死。有7名村民想从南寨墙跑出去，在从寨墙垛口往下滑的过程中，又先后死在敌枪弹中。在世的张同恩拄着双拐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那时刚滑到寨壕里后被日伪军的手榴弹把我的右腿炸掉的。当时我昏过去了，好长时间醒来后才知道少了一条腿。这时，日军已走了。”西排（张家楼当时曾将全村划分为西、中、东3个排）的群众闻讯日军从北门打进来，20多名男女老幼想从西门、南门外逃。但寨门上都被日、伪军的机枪封锁着出不去，再想跑回家时，却被敌人残杀在街道上和胡同里。小顺的曾祖母、祖母和姑母从家跑出去，刚出大门便倒在敌人的枪弹下，曾祖母、祖母已死，姑母一边呻吟一面打滚，万恶的日军和汉奸又将其姑母一枪打死。百姓们面对被杀的亲人、燃烧的房屋和日伪军的嚎叫，想跑再也逃不出去了，于是，有的躲在旮旯里、夹道里，有的钻到柴垛、草堆里和土井里。

9时许，日伪军为了发泄他们对我抗日群众的刻骨仇恨，由进寨到街内屠杀，转向由巷到院挨家挨户的搜索残害。敌进院非杀即绑，非掠即抢，这样，又有大批群众被日军刀挑、枪杀在血泊中。整个张家楼完全笼罩在血腥恐怖气氛中。

小顺全家14口人，除躲藏的外，父亲、叔父、曾祖母、祖母和姑母已先后被日、伪军杀死在南寨壕和大街上。日军进院后，母亲紧紧把小顺抱在怀里，1名日军和1名伪军问其母：“土八

路的有？”其母说：“我家没有八路”，日军一枪托子将娘儿俩打倒在地，母亲随即趴在8岁的儿子身上不敢起来。最后日军问不到八路军，端起刺刀便朝她脊梁上狠狠穿去，其母一声不响地死去，小顺在娘身下幸免。接着敌人各屋搜索，放火烧了他家的13间房屋，牵走驴、牛各1头，家产全被抢尽烧光。年仅13岁的小徐三，被两名伪军、一名日军进院抓住，问他“土八路哪里去了”，徐说：“没见过八路”。日伪军问他数次不见他答应，随向他捅了两刺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敌人进村后的横扫滥炸中，联防队员张同公从寨墙往内一座磨房屋里躲避时，不幸左边大腿被敌弹炸了象杏似的口子，一时昏倒在一家猪圈后边。等苏醒过来时，棉裤腰筒里，地下全是血。由于流血过多，他正要爬着到附近院里找水喝时，不料被搜索的日军发现，随用刺刀将张同公刺死。

对于隐藏的村民，日伪军在刀、枪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还实行了些特殊的杀人手段。联防队员吴连章在敌进村后，避在一个荒园内破屋角内，不料被日伪军发现朝他走来，吴撒腿就跑，当跑到一偏僻处再想躲藏时，又被另一伙敌人发现朝他跑来，在千钧一发之际，吴连章跳入一个一人多深的土井内，伪军立刻投入一颗手榴弹。日军看他未死，便令一伪军在附近院内搜来两把大三齿将吴连章钩上井面。日伪军问啥他也不说，最后敌人用刺刀给挑了。王开元、徐凤奎等4人藏在后街的一个地窖里，敌人搜查时其他三人钻到窖内的小洞里，王开元在洞口，日军以为就他一个在窖内，对他打了两枪就窜了。结果另3人幸免，王开元遭杀害。在地窖窖（土井）内死的最惨的是联防队员宋天登。他在地窖内被日伪军发现后，日军一面向一伪军说：“里边八路的有”，一面向土井里嚎叫。敌人不见宋上来，便就近搬来几个秫秸点着投进井里，顿时，烟、火灌满井筒，宋天登想上也上不来，最后被烟熏火燎烧死在井内。

日伪军对妇女的残害也是令人愤慨的。34岁的汪绪英在家听到敌人的狞叫声、枪杀声和看到四下的烟火吓呆了，领起两个儿子便往外跑，到南门里迎头遇见了日伪军，于是她大儿子（15岁）从寨墙洞里往外跑，没跑多远就被打倒，他爬起来又跑，被赶上来的汉奸用刺刀挑了。汪绪英一看到外跑不行，就领着小儿子（10岁）再向家跑，敌人在后边又追，她一看走投无路，就跳进家旁的水井里。张克连的媳妇和徐凤春的妹妹小银（17岁）被日军从另一面赶来，敌人一面追一面狞笑，她俩一看无处可走也跳进井里。她们在井里抠着砖缝维持。敌人就往井里扔石头、掀石滚，她们几次被砸到井底又漂上来。结果，张克连的妻子被砸死，汪绪英头部砸伤，小银幸免。特别是，就在日伪军屠杀张家楼人民归城的当晚，被敌逮往县城的张家楼的群众中，有的青年妇女仍未逃脱日军的蹂躏。

日伪军的屠杀，使张家楼东南门外的小场院里，村内沿路、胡同里，躺满了被杀的群众。倒下去的，不论大人小孩很少是赤手空拳的，身边不是红缨枪、铁钎，就是钢枪、木棍、菜刀、手榴弹，有的手榴弹线还穿在手指上，路上、墙上满溅着血肉脑浆，到处堆着骨肉脏腑。惨状目不忍睹。

3700多名日伪军对张家楼短短两个小时“血洗”，使这个950多人的张家楼竟有604人惨遭死、伤，这在张家楼历史上是亘古无有的。滚滚的狼烟着了几天，好端端的房屋变成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耳闻目睹的只是外地亲友的收敛、埋葬亲人的哭叫声，伤者的呻吟声。此时张家楼除去死伤和被敌逮捕的200多人外，村内基本无人，只有成群的野狗奔跑在村内外。直到夏季，张家楼的地无人种，小麦没人收，一片废墟变成草原。这腥风血雨的深海仇冤，岂容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抵赖！我们愿和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但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我们永世也决不能忘记！

附件一

关于“张家楼惨案”的调查

姜军洲整理

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抗日联防队，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党在伪二区的核心处建立的。1945年农历二月十八日，反共顽固派、国民党山东省挺进三十三纵队司令、茌平伪县长李歧山，纠集日军、治安军和他的伪军3700余人，以它的“三光”政策对张家楼发动了突然袭击，杀害我联防队员和无辜群众333人，负伤271人，被捕群众264人（后有8人送往日本做苦役，1人死于日本，日本投降后7人返回国），死绝的11户，只剩1人的11户，烧毁民房2723间，抢走耕牛86头，大车48辆，其它财物不计其数。这就是闻名鲁西北的“张家楼惨案”。

一、张家楼联防队如何建立的

1943年秋季，我根据地形势好转，较为巩固。1944年春季，茌平县委提出广泛发展民兵联防，以根据地为依托，向敌占区扩展，缩小敌占区。

张家楼位于茌平县城西南20华里，全村近千人，是伪二区的大村，但它处于受敌包围之中。向西北5华里，是伪二区区长田金忠的陈范庄据点；向南6华里的广平，是伪县长李歧山的独立营营长李长录的驻地；向东南18华里的沙土寺，是敌三团团长路兆月的匪巢；东北10华里的普陀寺，是敌二团团长姚长贵的小圈子。

县委认为，张家楼村大，对周围小村有影响，若孤立广平之敌，

应在它的北部成立联防，在这个地区发展联防张家楼是关键。当时张家楼组织不起来，其他小村是不敢成立联防的，张家楼成联防可做为我们的前沿阵地。这是地理位置上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贫雇农多，210户、4800亩地的村庄，有破落地主1户、富农5户，这些户只是土地偏多点，雇有短工或长工，且长年参加劳动，群众称“土鳖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贫雇农或中农，虽每人四五亩地，土质多是沙薄地，种粮食拿不着苗，以花生为主，一年收不几十斤，但伪顽的勒索厉害，今天不是这个据点来催粮，明天就是那个围子来要给养。1943年大旱加敌人的苛捐杂税，一年就饿死42人，外逃的7户。1944年春季一天晚上，广平的伪顽进村逼粮款，一次牵走26头牲口，抓走了5人。农民张同林，因多次交不上粮款，被敌杀害。张家楼群众像在刀尖上过日子。三是张家楼革命人员多，这个村在我政府县大队抗战的有42人，在敌占区一个村有这么多的八路军是罕见的。该村当时虽还未有党的组织，但这些抗战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却是宣传、教育、组织群众起来抗战的一支力量。四是广大群众有抗战的迫切要求。随着我在南根据地内群众性雇工增资运动开展，游击区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张家楼人民不堪于敌人的横征暴敛、随意抓人、杀人的罪行，几次派人找我抗日县政府、县大队，要求派人成立民兵联防，抗击敌人。

基于上述原因，县委认为该村建立联防队的条件比较成熟，于1944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公历9月30日）派县大队副大队长帮助建立了民兵联防队。全村共组织民兵300人，下分3个中队，大队长张承岗，副大队长张承新。联防队建立的当天，立即向群众宣布了两条：一是抵制敌人一切摊派，对伪顽一粒粮不交、一厘钱不拿，任何公事不出差。二是购买枪枝，修制土枪、土炮。不到半月工夫，修补加固了寨墙，并规定了其它防范措施。如：村外一里路内不许有生疏行人，当村人外出办事走亲访友要请假，必须

当日回村。而外村人进张家楼探视者，到寨门前必须向民兵报告因何事来，到谁家去，再由民兵通知户主领进村，并限时离开。

从此，我抗日县、区政府领导人也不断来张家楼帮助工作。参加抗日县大队的同志，回家后也给民兵出主意、想办法，全村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对敌。因此，张家楼抗日民兵联防队的建立，不仅使我抗日县、区武装及其他上级部队有了新的可靠的立足点，同时在敌人腹内也成了一支坚强的堡垒，周围各据点的敌人再也不敢来催粮款、抓壮丁抢劫了。为抗日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二、“惨案”前后的对敌斗争

从张家楼抗日民兵联防队建立的第一天起，驻广平据点的独立营营长李长录和伪区长田金忠，就多次找伪县长李歧山告状

“对张家楼怎么办？”其他反共分子和顽固派也把张家楼视为眼中钉。这是因为：（一）它靠近县城李歧山通往广平据点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决不会容忍在他们眼皮底下让我们建立这一红色堡垒村的。（二）阻碍了伪顽匪军和贪官污吏对张家楼的横征暴敛，有我们在，他们就不能为非作歹。

敌人还妄想恢复对张家楼的统治，而他要想改变广平北部的形势，也必须首先打击张家楼。同时，保卫张家楼也就成了我们在这地区斗争的主要任务。

敌开始主要是在上下层广造舆论，说张楼是“八路村”，以引起众匪徒对张家楼的不满，后就派特务到村内刺探情报，也未得逞。不久就实行武装扰袭。1944年农历腊月间，李歧山纠集在平的三支队和治安军2000余人，先后两次攻击张家楼。第一次，打了一天未攻进村；第二次敌进村后我联防队和群众已转移，只烧了部分房屋就走了。

对于伪顽军的反共活动，我党除让张家楼民兵联防队适时转移外，同时，迅速将与张家楼东面、东南面紧相联的周庄、马

庄、殷庄、贾庄、张老庄、吴七庄、双庙、魏庄、姜庄、梁庄、韩阁等十多个村，先后组织起民兵联防，往南和我游击区边缘村于海子、胡明宇相接。向东南和伪三区我游击区张二尤、李家胡同、木梳刘村紧相联，形成了纵横220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直通往南抗日根据地，从而孤立了广平区的据点。更威胁着敌三区沙土寺三团团部。张家楼民兵联防队近有游击区作后盾，远有根据地相呼应，更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决心。他们总结战斗经验，密切与我抗日武装的联系，学习作战方法，加强自卫，继续坚持斗争。

敌人的进攻连遭破产，在平的日伪顽便于古历二月中旬对张家楼抗日联防村发动了偷袭。

三、“张家楼惨案”的基本过程

这次“惨案”，由伪县长李岐山和日军共同策划并亲自指挥。李岐山的老家是在平县南陈庄，始终盘据在在平境内。在平沦陷前后，是旧政府的排长、大队长。1939年到1944年，由于他反革命有功而不断受到伪山东省政府的提升。曾先后充当伪保安独立十二旅齐子修部的第四团团长，伪山东省第六专区保安司令部第三旅旅长，伪保安第二十六旅旅长，山东省挺进三十三纵队司令员。他官位越大越要反共、灭共。一心想把在平搞成反共“堡垒”进而取得主子的重赏。对张家楼的突袭，足以说明这一点。

1945年古历二月中旬的一天，敌人探知我抗日县大队驻扎张家楼。晚上，伪县长李岐山召集了有日本顾问井上和他的交际处长雷汉臣、参谋处长杜建之、手枪队长杨存才、骑兵营长李本岱、第六团长兼伪县大队长许学章、副官处主任兼日本翻译庞志升、参谋杨子相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打张家楼的事，同时妄想消灭我县大队。两天后的2月15日下午，聊城发来了60多名日军，带来重机枪1挺、轻机枪5挺、掷弹筒5个，由一名日军中尉带领，

治安军一个团。当晚，李歧山及其左膀右臂进行组织和策划。决定以2900人的兵力对张家楼进行偷袭。当时，张家楼950多人，其中手持武器的联防队员300人，其他有自卫能力的男女壮年100多人，共400余名武装人员。在武器上，已有105支钢枪，还有6门“大将军”、十多门“小将军”、60多支“大抬杆”和许多土枪。不过，担任支援张楼联防队的抗日县大队，在张楼住了一天一夜，因没得到敌情已经转移了。

1945年的农历二月十六日清晨，敌人包围了张家楼，妄想从东门攻进。村内一阵钟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登上寨墙抗击。我县大队派往张家楼负责联络的张同周、季承申、张先顺也就地参加了指挥。战斗相持中，抗日县大队速来接应，敌未攻开，丢下十多具尸体即逃回在平。县大队仍转移外地。

17日傍晚，我政府已获悉李歧山调日军和重炮血洗张家楼。在平抗日县长兼大队长徐效参，亲自给张家楼联防队写信要全体村民撤离，不要固守，并让前来政府联系的张楼民兵王培山速回家送信。

张家楼联防队的干部，晚上一直等到过半夜不见王培山回来，十分焦急。大队长张承岗说：“没有上级的指示，任何人不准离村。”

对于张家楼的抗击，在平的日伪头子早已恼羞成怒。敌人虽撤回县城，但消灭抗日武装之心仍不死。日本井上对李歧山说：“对张家楼要打速决战，不然后患无穷。”李歧山说“打不下张家楼，八路军增援这个仗就只好打了”。为此，他们熬费苦心。到17日下午，日本井上从临清调来30名日军和一门大炮。聊城的治安军比第一天又增加了一个团。李歧山从他的老巢——袁庄，把180多人的机枪营也迅速抽来在平待命，总兵力比前一天增加800多人，敌人决心用“烧、杀、抢”对付张楼。“谁的刺刀不见血按八路治裁”，李歧山把他的指令层层传给匪兵。

18日早4点左右，李歧山略加调整了部署，大部兵力除按第一天的位置攻击外，聊城的治安军排在南面和东南面，全部日军、大炮、重机枪和机枪营，摆布在北面和东北面，妄图从北面进攻。

8点多钟，日军连放了3炮，把紧靠北门的寨墙打个像楼门似的大窟窿，敌人马上吹起了攻击号，日伪军齐涌进去，四面敌人集中火力，向村内发动了更猛烈的袭击，敌攻占寨墙后，机枪、步枪上下组织密集的火力网。敌人进村后见人就杀，遇柴就点火，见房就烧。村内村外杀声一片，烟火四起，各处响枪。

民兵虽然拼命抵抗，但终敌不过敌人的火力。联防大队长张承岗发现寡不敌众，立即组织突围。当副大队长张承新带领20多名民兵从南门冲出寨，正是敌人机枪封锁口，民兵和跟随的群众全遭杀害。接着由县大队的联络员张同禹等3人带领群众继续突围。他们冲出寨墙首先打死了治安军的指挥官，趁敌人一时慌乱之际，从老路沟绕道冲出，使150多名群众脱险；当后边的群众再突围时，又遇敌人火力封锁，遇难很多。这时，大队长张承岗在村内早已负伤，村民们失去了指挥，都乱了。群众又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大街小巷死尸遍地。接着日伪纷纷进院进屋寻找抗日军民，任意大杀、大烧和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紧张的烧杀抢掠持续两个多小时。

12时许，我冀鲁豫军区一军分区基干三团和在平县大队，先后从东、南两个方向迅速赶来张家楼抗击敌人，营救群众，不料敌已于11时左右押着逮捕的200多名群众和所抢物资仓惶撤退了。我军进村后想救火，但水井被敌人用高粱秸全填满，灭火无水源，看到遍地死亡的群众，战士们都哭了。这时我军指战员分别寻找躲避的群众，帮助搞起了战后应急工作。

下午，王培山也回到了村里。原来他昨天晚上在从县大队回村途中，路过沙土张时喝醉酒不能走了，酒后回家时天亮，再也

进不去村了（王培山后被我政府处决）。

“张家楼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共谋。其结果使张家楼30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房屋烧光，财物抢掠一空，造成张家楼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灾难。这是日军投降前夕残酷杀害中国人民的又一铁证，也是在平县伪军头子李歧山加速灭亡的垂死挣扎。

四、“张家楼惨案”后，我党政军的补救措施

“张家楼惨案”激起了我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我分区党委、特别是在平县党、政、军对“张家楼惨案”非常同情和关心。

“惨案”后，（一）我抗日县政府一面号召周围村庄跟张家楼有亲朋关系的群众，到张家楼帮助辨认死难群众，掩埋尸体。另一方面从外村组织民工抬运伤员。我县区武装掩护其余群众转移到根据地内较为稳定的村庄。按我政府人员待遇供给生活和养伤治病。并允许青壮年持枪随时回村看望和探亲。（二）揭露敌人的残酷暴行。我《冀鲁豫日报》登载消息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三）帮助张家楼人民收好小麦。麦收时张家楼村内无人，我县政府从根据地组织民工和邻近张家楼群众的亲友进行抢收。敌人仍未从张家楼得到一粒粮食。（四）支持张家楼人民继续抗日。在县大队的帮助下，于“惨案”后不久，县大队帮助组织了一支小型的“张家楼抗日游击队”归县大队指挥，主要是抗敌保家。

1945年9月下旬，我冀鲁豫一分队集中优势兵力，攻克了茌平，身沾人民鲜血的伪县长李歧山被击毙，终未逃脱覆灭的下场。那些制造“张家楼惨案”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和刽子手，也先后受到惩罚。

附件二

张家楼惨案座谈情况

时间：1985年4月19日。

地点：广平乡张家楼村。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

张同禹，76岁，县大队侦察排战士，“张家楼惨案”时民兵联防队指挥员之一。

张先荣，70岁，1945年抗日武装交通员，联防队员。

王振瑞，65岁，张家楼联防队员，曾被日军逮去日本下苦力。

王敏忠，84岁，联防队员。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家楼第一任支部书记。

徐风明，40岁，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卓云，男，42岁，村民委员会主任。

调查者：张洪福、姜军洲。

座谈内容：1945年古历二月“张家楼惨案”及其前前后后。

整理者：姜军洲

张先荣：要说“惨案”的事，你还是先从建立民兵抗日联防说起。因为联防队把敌人斗急了，李岐山才调日军和治安军打的张家楼。

那时全村不到1000人，48顷地，净沙岗子地多，种粮食作物春天拿不住苗。只能种点花生，一亩地一年也就是收个几十斤。

遇到灾害就更苦了。1943年大旱没收成。一年里饿死40多人，七八户逃荒关外的。那时，周围净敌人。往南是敌独立营营长李长录的广平据点；东南是路兆月在沙土寺安的据点；西北是陈范庄汉奸区长田金忠的据点；东北是敌二团的普陀寺据点。敌人勒索很厉害，今天这个围子送条子来要粮，明天那个据点来人催款，简直敛不迭啊！不光要得多，还限时送到围子里，那时群众本来就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哪有这么多的粮、钱给他们。送的少了不行，送的晚了也不行，不是抢就是打。王开元家里没有粮食，敌人把磨眼里粮食给搜走了。1944年春天，广平李长录派人来要粮，村长张先石因敛不起来躲藏了，最后敌人把他爷爷张同林打死了。群众实在忍不住了。不久，俺村在县大队工作的人员回家来不断宣传外地群众组织联防抗战的事。县大队、区队也不断秘密来村里找张承岗（已故）、张承新（已牺牲）等人发动组织民兵起来抗粮、抗捐。经过村里几个人一鼓动，群众听说参加民兵不给敌人拿粮、款啦，都积极要求加入民兵。经过请示县、区政府同意，就于古历七月二十四日召开全村群众会，宣布了民兵联防队的成立。这天县大队副大队长凌林来参加的会，当时组织起300人的抗日联防队。并当场给群众宣布：从今日起不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分钱，敌人再来时不许他们进村，群众很高兴。

王振瑞：组织抗日联防队主要是抵抗敌人对于群众的压迫剥削。怎样跟他们斗争呢？必须得想抵抗的办法。一是修寨墙；二是要群众买枪，决定每19亩地要买一支钢枪。也就是半月的时间，男女老少黑夜白天干就修好了寨墙，买了一些钢枪。全村4个寨门，后来把通向敌区的西门、北门、东门全用土屯住了，只留下离游击区近的南寨门让群众出进；为了防止坏人来村侦探，离寨墙一里路内不许外人行走；来张家楼探亲的必须向站岗的联防队员说清来意和去谁家，让主人领进去，并限时离村；本村群众外出同样要请假按时回家。这一来，敌人就再也不敢进来了，于是

他们就四处扬言张家楼是“八路村”。

张先荣：张家楼联防队一建立，好像是立在敌区的大堡垒。许多外村的穷人也到张家楼住亲家，躲避敌人的剥削。刚建联防不到半年，记得腊月初六，李歧山调了2000人来打张家楼，打了半天也没有打开，敌除死伤十余人啥也未得到，当天就撤了。

这时，咱在平抗日县大队和分区（即冀鲁豫一军分区）二团也不断来俺村居住。除鼓励我们跟敌人坚决斗争，还传给我们办法。那天战斗后，为防敌人报复，有时我们就带领群众转移外村。从此，闹得周围敌人对张家楼一点办法也没有，要不怎么会出現以后的“惨案”呢？……

张同禹：张家楼在广平以北是个大村，不给敌人拿粮、款，在城南远近都知道。可是，到1944年冬，近处的周庄、马庄、梁庄、贾庄、双庙魏、于海子、胡明字等十几个村庄也成立民兵联防队了，给俺张家楼都联成了一大片了，咱们称游击区。这就把广平的敌人孤立起来了，敌人眼看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李歧山于1945年古历二月十六这天对张家楼又包围了。他纠集了聊城的鬼子、治安军和伪顽军2000多人于早晨包围了张家楼，围攻了多半天也没有打开就又撤了。当敌人撤退后，就派人找咱们县政府联系想撤出去，可是去联系的人晚上没有回来，没有上级的指示又不能随便离村，最后大家还是决心坚持下去。

到了十八日天不亮，在平的日伪军就又围起了张家楼。这一次可不同头两天了，敌人增加了重机枪和大炮。早饭时候，日本鬼子用大炮轰开了北门。北门一开，敌人像疯狗一样涌进来了。这时联防队男女老少虽然拼上命抵抗，但终敌不过敌人的火力。鬼子在头里领着打，见人就杀，村里的柴禾垛都点着了，房屋也都冒起了烟火。寨墙上、大街上，敌人的机枪，步枪响成一片。

敌进村不久，我一看不行，就找到大队长张承岗几个人商量突围。先由副大队长张承新带着20多个民兵和群众从南门冲出

去，谁知刚出寨门就被敌人的机枪全扫射死了。接着我和季成申、张先顺突围。突围前我们瞄准了治安军指挥官，冲出寨门后首先打死了他。趁敌人的一时慌乱，我们带着150多名民兵和群众，躲开敌人的机枪封锁口而绕道老路沟冲出去了。张承岗在村里也受了伤。这时，村内联防队和群众失去指挥了，再想从四门突围，敌人的机枪都封锁着谁也出不去了，可叫李歧山和鬼子杀苦了。

这天上午，敌人11点来钟就带着所抢的物资和逮的群众撤退了。12点左右，咱抗日县大队和刘致远司令的三团来张家楼，这时敌人已跑了，接着帮助村里搞起了善后工作。

王忠敏：这次敌人杀害民兵和群众333人，伤者271人，被捕男女群众264人，死绝的有11户，剩1人的11户；烧毁民房2723间，枪走耕牛86头，大车48辆。其他财物也算不清了，这就是张家楼大惨案。

敌人对俺村的暴行，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恨。一段时间后，死的埋完了，伤的和躲避的群众都被政府安排好了。接着联防队那个崔又组织起了几十多个青年，成立了张家楼“抗日游击队”，张家楼游击队除不穿军装和县大队一样对待，全吃公粮。主要是在村自卫，抗敌人的苛捐杂税。

建国不久，经上级批准，对俺村牺牲的141名抗日联防队员追认为烈士，并每人追补150元的抚恤金。

附件三

我的控诉

我叫王振瑞，1920年生人，1945年是抗日联防队员。

1945年2月18日（古历），日军、治安军突袭那一天，我的枪子弹已打完，怕敌人把枪拿走，就把枪埋了起来。钻进院里高粱叶堆里隐藏起来，但只钻进上半身，下半身还露在外边，鬼子进院后看见我，就在我腿上刺了两刀，鬼子把我拉出来见还没死，就把我捆到北门里场里。我叔王主忠，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被鬼子捉住。被抓到莒平，我的叔兄弟王振方、王振怀活活被敌人打死。

敌人见我和王开春、徐凤奎、徐凤功、王都忠年轻力壮，就把我们由莒平转济南、青岛，用火轮载到日本华岗做苦工。莒平被抓去25人，同船被载去的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共计1000多人。在日本受到非人的待遇，每天都有人被折磨死（我村的王都忠就死在华岗），直到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1月12日（古历）我才回到莒平。

控诉人：王振瑞

附件四

我的控诉

我叫汪绪英，1911年生人，女。

1945年2月18日（古历），日本鬼子和汉奸攻进我们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村里到处是哭声和叫声，一片火海。我领着两个儿子跑到南门里，迎头遇到了敌人，我儿子（15岁）从寨墙洞里往外跑，没跑多远就被打倒，他爬起来又跑被赶上来的汉奸用枪挑死。我一看向外跑不行，就领着小儿（10岁）向家跑，敌人在后面追，我走投无路，就跳进家旁边井里，随后徐凤春的妹妹小银（17岁）也跳进井里。我们扒着井边，敌人就往井里扔石头，掀石滚，我几次被砸到井底，又漂了上来，头被砸伤了几处，敌人走后才被人救起。

这次惨案除我儿子被杀死外，我的二弟被敌人将腿打断。我家12间房子，二弟7间房子，三弟6间房子都被烧掉，家财烧光。要不是抗日政府及时救济，我们全家早就饿死了。

控诉人：汪绪英

附件五

罪犯庞志升参与攻打张家楼的口供 (摘抄)

我叫庞志升，又叫庞成勉。22岁时，到青岛日本机关学日语3个月。1942年到袁庄参加三支队，当过李歧山的随从副官兼日本翻译，旅部副官，1945年当李歧山的副官处主任。

我交待策划打张家楼的罪恶：

匪二区区长田金忠，屡次给县长报告张家楼抗拒新旧公粮和各种花项，分文坚决不拿。欠得很不少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县长李歧山说：“以后再说吧。”

1945年2月间的一天晚上8点来钟，县长李歧山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我、日本顾问井上，交际处长雷汉臣，参谋处长杜建之，参谋杨子相，手枪队长杨存才，骑兵营长李本岱，秘书赵乾英。这次会上主要是研究怎么打张家楼的问题。李歧山说：光张家楼一个村不拿（指公粮和各种负担）倒不要紧，影响开辟地盘，又显得县府没办法，连一个小村就打不开，可是我们的兵力、武器又太薄弱。当时还打听到张家楼驻有抗日县大队。李歧山让井上顾问想个打张家楼的好办法，我，杜建之、雷汉臣都同意李歧山的意见，要求鬼子打张家楼或想别的办法，光三支队是不行。井上说：“我写封信给国井司令送去，要求来上一部分军队帮着咱们的队伍一定打好。”我们都说此办法甚好，井上随着给聊城日军头子国井写了信。

相隔四五天，聊城就发来了60多名鬼子，重机一挺，轻机一挺，掷弹筒5个，有个中尉司令官带着来的。当晚，李歧山请的鬼子的客，饭后，日军中尉了解了一下张家楼的情况和县长打张家楼的兵力，决定了出发时间。是夜间两点多钟出的发。队伍行至卅里铺以南2里来路的地方。大部分三支队和全部鬼子去张家楼了，我跟李歧山住在了沙土寺（伪三团团长的据点），我主要是跟李歧山负责给鬼子联络。鬼子和三支队到张家楼后打了一天没打开，鬼子还伤亡了七八个人。

第二天一早，李歧山随着召集日本井上，赵乾英、雷汉臣和我商量。李歧山：“这个战斗越快越好，八路军要发来增援的队伍这个仗就不好打啦。无论如何要把张家楼压下去，以防后患。”商量到最后，一是请井上再想办法，二是从袁庄调机枪营去张家楼，用烧、杀、抢对付张家楼。接着井上就给临清的鬼子拍电报调兵力和武器。井上对李歧山说：“县长放心吧，大炮很快就来到，攻打围子小枪不管用。”还说：“对张家楼要打速决战！”到了下午两点多钟，鬼子来了两辆汽车，有30多名鬼子，一门大炮。

次日一早（记不清日子啦）天亮后，鬼子中尉官和李歧山来到了张家楼，在一个松树林里商量了下怎么打法。商议完以后，我给鬼子中尉、李歧山指着东北角的炮楼说：“头一天皇军伤亡的那几个人，就是从这个炮楼上打死的。你们打这个炮楼不行吗？”中尉官和李歧山用望远镜看了下后，鬼子对炮手说：“要加比的放，加比的放！”炮手定好标尺就开了炮，只放了3炮，在炮楼南边打开像城门似的大窟窿，随着吹起了攻击号。鬼子、治安军和伪军齐涌进去了；不多时，村内烟火四起，杀声一片，各处响枪。李歧山和我是最后进村的，进去后这时街上已杀了好多人，我们行至北门里向西走，从场院屋内跑出两个人，手持红缨枪往县长跟前跑来。我和传令兵把这两个人打死了，再往西走

不远，从北寨墙上跑下一个妇女来，手持铁杈直冲鬼子司令抛过来，鬼子没碍事，随着用大刀把那名妇女砍死了。快晌午时，李歧山和鬼子司令说：“快收兵吧，人死的不少啦，又是敌占区，不能久呆。”于要，鬼子吹哨子，号兵吹起号就收兵了。这一天共打死多少人我弄不清楚，记得光逮的男女老百姓有200多名。抢夺的民财套了8大车，全被三支队押解到在平城里来了。

回来后当天晚上李歧山摆席请的鬼子。酒后鬼子要花姑娘，我从南关娼家叫来4个女的，后不够用，经李歧山同意，又从张家楼那些妇女里挑了几名给了鬼子。

以上都是事实。

庞志升（手印）

1960年1月21日

（摘自在平县法院档案）

附件六

对徐廷梅攻打张家楼残杀革命群众 等罪恶的审讯笔录

问：把你的出身历史谈谈？

徐答：我叫徐廷梅，在平县杜郎口公社鲍庄人。32岁参加袁庄三支队，充当伪兵、班长、排长至34岁（即1944年）当伪匪机枪营副营长。1945年解放后逃往博平、长清、青岛、福建等地，1949年5月在福建被俘后回家为农至今。1950年被管制2年。

问：把打张家楼的事交待清楚？

徐答：1945年古历2月间，一天头午，部队在操场上游戏时，营长杨荣生（外号杨狗）把我和连长叫到一块。杨说：“县长来的电话叫队伍出发。今天早晚到城里。”中午早吃的饭，半过午进的城。”晚上各连找地方住的。我住的手枪营。夜12点左右，队伍在县府门口集的合，杨荣生把队伍带到南阁子门外路东沿，由杨荣生讲话、下的命令，说今晚是配合皇军和治安军打张家楼，到那里是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回来的时候所有刺刀都得见血，哪个不见血也不行。我说，这次不是光我们出发，另有皇军，治安军，还有城里的手枪营。我们去了不要乱，都得完成任务，哪个刺刀上不见血由你自己负责。约计下一点出的发。到了张家楼北一里多路的地方停了一下。天才亮，杨荣生到了那里说，我这个营和日本人负责东北面，任务是外边有八路军就顶住，由鬼子用大炮打北门。听见响了3炮，北门就打开了，鬼子兵一齐往庄里拥。我一看打开啦，带着全营就从北门进了村。进

村时我和部下说：“见到活的一律杀死，谁放跑一个，回去按实报你！”进了村后，大部分顺着路往南去的，看见群众也有拿铡刀的、拿刀的，情况很乱。我往东走了不远，顺着一个胡同往南去的。到了胡同南头看见有9名群众（8名男的，1名女的，其中有一个10多岁的男孩）都拿着铡刀、棍子往外跑。我当时下令都杀死！当兵的上去有用刺刀挑的，也有用枪打的。打倒后，我见还没有死的，又命令翻了一遍，把活的也都杀死。杀完后，我听着南边枪响地很激烈，到寨墙上一看是治安军和民兵打，因为民兵在沙窝行子里掩护着群众往外退；我看村边死的人也很多，下了寨墙后就叫李福生带着一个排抢东西吃去了，我带一个传令兵在外边等着。

问：张家楼什么地方死人最多？

徐答：村南边坑里死人很多，光看见在沿上的有40多人。村东南的小场里和路上，约计打死有60多人。

问：打张家楼你营去了多少人？

徐答：全营共180多人，那次把老的，病的留在家里30多人，打张家楼去了150多人。

问：你营去了多少人在东南小场里了？

徐答：有我带的一个排和在全营挑选能干的，总共有80多人。

问：你亲自指挥杀的还有吗？

徐答：我带着传令兵翟恒臣（该人已死）到小场里见一个40岁左右的群众还没死，当时翟恒臣打死啦。接着我下命令：把小场里再检查一遍，看还有没有活的，检查出几个记不清楚了。记得二连检查出4个，还有三连和营部检查出来的也得四五个，连我叫翟恒臣打死的共计10人左右。

问：再谈打张家楼的问题？

徐答：我记得在张家楼前街东西路南边、南北路东一个井

里，跳进去好多群众，有些没有死的，当时我命令在场的伪兵袁之平、三连长所光兴、传令兵杨泗兴。另外还有几个人记不清名字啦。叫他们往井里掀石头、赶石滚，共赶到井跟前四个滚。赶进井里两个去，还扔进些石头和砖，这样把里边的人都砸死啦。

问：这井里都是些什么人？

徐答：没看清，反正都是群众。

问：是什么时候办的，怎样办的？

徐答：打完仗以后，传令兵袁之平对我说，在追着的时候有些人跳井啦！我说别管死不死，去掀石头都砸死，因为掀了几块弄不动啦。我又命令他们往井里推的石滚。

问：交待放火的情况？

徐答：在城里出发以前，营长杨荣生下命令的时候说，到张家楼后把人杀净，房子烧光！我到张家楼进了北门以后，一个麦秸垛、一个柴禾垛、还有一院子（柴禾），是我指挥点的。我事前让各连都给当兵的发了洋火，他们进去以后到处都点着啦，看见什么烧什么。

打仗还没结束时，在张家楼前街路北一个胡同里门西的一家，我和翟恒臣去找东西吃，听见他北屋东山上草棚子里啦哗响。我发觉里边有人，就命令翟恒臣用大枪打了3枪，一听没动静啦，又叫翟恒臣把柴禾点着，等着了火后才出来的。

问：你那个营在张家楼共杀死多少人？

徐答：战斗结束以后，各连统计的是，光伪兵在街上，院里单独杀死的27人，连集体在东南小场里杀死的共有50多人，详细准确数无法统计，因为是配合皇军、治安军和其他部队共同打的。

问：你们营共逮了多少活人？

徐答：逮人是准逮过，逮了多少我说不清。我知道打完仗集

合的时候，连长常率阁问杨荣生咱逮的那些人还管不？营长说上交司令部就行。

被告人徐廷梅（手印）

1960年1月11日

（摘自茌平县法院档案）

茌平城南“六·二七”惨案

中共茌平县委党史办公室

茌平县韩集乡政府驻地东边附近二华里处的田野里，有一座四米高的砖砌八角亭，亭内立有一块扇形碑。走进亭内，只见碑正面两边的对联尤为惊人，曰“百卅四口祖国儿女遭倭寇残暴屠杀，六·二七吾辈后生怎能忘海深血冤”。这是1944年6月27日驻茌平的日军勾结聊城、阳谷、博平等县的日伪军对茌南人民群众集中杀害后，当地村民为表彰先烈，教育后人而修竖碑亭，当地通称“六·二七”惨案纪念碑。

这次惨案是日军对我茌南抗日百姓的血腥大扫荡。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在茌平城南三区不足百平方里地带内的朱楼、大吴、小马、小孙庄、广平、常楼、教场铺等村安设了20多个据点和碉堡，不断地搜查、逮捕我抗日百姓。但三区的人民不堪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伪军的据点、碉堡均先后被我抗日群众、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摧垮，日伪军大部被消灭。从而使日军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政策”遭到破产。日军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为进一步镇压我抗日运动，于是对我三区的抗日人民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1944年6月27日拂晓，茌平、博平、聊城、阳谷的日伪军向三区进行铁壁合围。我茌平县政府夜间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各村的群众迅速转移。一部分群众冲出了日军的合围圈，但有数百名群众因情况突然，时间紧迫，没有转移出去，被敌人围困在张

会所庄东南，韩集以东、莫庄以西、门刘以北的旷野上。敌人越逼越近，包围圈越来越小，最后将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压缩在张会所庄东南二三亩地的一块土地上。周围日军的机枪、步枪和刺刀均对向了被围的群众。

上午10点来钟，日军挨着个的搜身盘问“谁是八路的干活？说出来优待优待的。”敌人见无人回答，便一连绑起40多名男女青壮年，一面用棍子往身上抽打，一面仍然逼问。张会所庄的朱世常刚娶了媳妇，穿一身新衣裳，日军误以为他是干公事的，便将其捆起来，一面用木棍往头上抽，一面嚎叫“八路八路的”，草帽被打得稀巴烂，头上出现了两道口子直冒血。其父朱希成对那一日军一面作揖磕头，一面求告“皇军，他是个好人，不是八路军，皇军饶命啊”，日军“嘿嘿”地狞笑了几声，另几名日军上前便将朱希成爷俩用刺刀挑死了。日军想杀一儆百，恐吓群众交出共产党、八路军来。但黎民百姓们一时不知所措，有的蹲下把脸扭向一旁，有的低头不语。敌人见长时间无人回答，这时，一骑白马的日军军官向敌人训话，讲完后，日军便强令被绑的群众一字摆开，那军官把小旗一挥，这40多名青年男女便先后被日军枪杀、刀捅而惨死。石海子村的石莲芹被日军的刺刀从胸膛上扎进去，在脊梁上露出刀尖，没哼一声便死去；同村的王金奎被刀刺穿后当时还在地上翻滚，日军用铁镐在他的脑门上又连续捣了10几下才断了气，脑浆都淌出来了。张会所庄的张希成和他的两个儿子、贾景龄爷俩，都是死在日军的挑、穿、扎中。面对敌人的暴行，被围困的群众又恨又怕，有的当场痛哭，有的吓懵了一时不知所措，有的蹲在一旁寻找逃脱。

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仍有部分群众临危不惧，一个叫杨先民的带头呼喊了声“老乡们快跑哇！”于是，群众立即向不同方向的日军包围圈冲去，敌人的四挺机枪随即朝正在奔跑的群众的背后扫射。这时，有的人中弹倒在血泊中，有的幸免。高庄的刘

士元，就是死在杨先民身后的；聊城的韩效民、博平的谢家福在奔逃中死在张会所庄东边的庄稼地里。逃出来的群众有的躲在远处的高粱地里，有的隐藏在附近的村庄，以跑向刘庄的较多。这时，日军军官一面指挥部分敌人去南边小刘庄搜索，一面对仍在包围圈内的黎民百姓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杀戮。石海子陶西良的哥哥才四岁，一日军上前将这个幼儿从他大爷的怀里拽出来，提着小脚丫抛向半空，摔在地上后孩子哇哇直哭，日军随即又用刺刀将他的肚子豁开，肠子淌出来，当即流血死去。同村的张进德在一条沟崖上蹲着，一名日军从他身后上去在他右肩上穿了三刀，随即昏倒滚到沟里去（后被救出）；陈寨庄的小石头才13岁，被两名日军按倒在地上，每人抓住一条腿，第三名日军跑过来立即用刺刀把小石头的脚砍下一条来，最后流血流死了。尹庄的尹循严、门庄的门吉昌也同时被日军杀害。这样，先后死在包围圈内的有100多人。而去刘庄搜索的日军，对群众的屠杀也非常狠毒。有个叫于化民的青年，他在突围奔跑时头部中弹，到小刘庄后被群众隐藏在一座石磨房里，不料被日军发现，看他脸上淌着鲜血，敌人边狂笑，边大叫：“哈哈，八路军的干活！”于是几名日军用枪托子轮番向他身上捣去，于化民始终没承认是八路军。后来日军见用刑无效，竟朝他屁股上捅了两刀，然后又在他身上绑上一块大石头，把他推进刘庄、赵庄之间的大水坑里淹死。尹庄有个名叫尹以树的石匠，当时去刘庄不幸被日军逮捕。敌人在他身上背的兜里搜出了凿磨的斧子和镢子，便以为是给八路军修武器的，硬要让他交出共产党来。尹以树最后也没说出谁是共产党，敌人便把他打倒在地，把镢子从他头上用斧子砸进去，尹以树当即死去。

下午一点多钟，日军吹哨先后撤散。

敌人走后，我抗日区、村干部和群众先后赶到现场寻找死难的亲人。只见这块2亩多的土地上、尸体横七竖八，有的三四位

死者压在一起，有的遍身是血，有的胸前凝结着发黑的血团，有的张嘴瞪眼，也有的脸部被捅得烂糊糊，已看不清模样。就这样，一片片的黄土染成红色。最后清点，在包围圈内和附近的田野村庄，有134名无辜男女惨死在日军的枪、刀之下。这时，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有的在抢救奄奄一息的遇难者，大量的是在忙于寻找、收敛亲人的尸体，百姓们的哭叫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枣棵杨惨案始末

朱成震 曹代岭整理

1945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在望。日本军国主义者已陷入泥沼，如步深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太平洋战争的失利，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空前壮大，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人力、物力更感贫乏。他们为挽救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困兽犹斗，加紧了对我抗日武装的扫荡和对我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妄图以此弥补其人力物力的不足。

1945年，黄河西岸，日、伪据点，大部已被拔除，运东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驻山东的日本侵略军为了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抢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于是年初，纠集济南、泰安、莱芜、新泰的日军4000余人，伪军六七千人，渡过黄河，对我运东根据地、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抢掠。

194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八），日军扫荡到达枣棵杨一带，惨无人道地制造了“枣棵杨惨案”。

枣棵杨庄，原属茌平三区（现属东阿杨柳乡）。当时有100余户，500余人。在这次惨案中，我村民和民兵被杀和牺牲的有31人，伤28人，被抓走青壮年28人，其中有18人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烧毁房屋120余间，全村柴草全部烧光（约60万斤），烧毁树木无数。

枣棵杨村地处赵牛河东岸茌平、东阿界首，抗日战争时期属运东根据地，碉堡，据点林立，据点相距最近的仅有3公里，敌

人经常出发扫荡，杀人放火，逼粮逼款。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联防，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全村有25名联防队员组成的钢枪班，他们集体吃住，日夜轮流值班监视敌人。遇有情况立即通知全村做好战斗准备。还有200多人的自卫队，以邻近分片，组成20多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有土炮一门，土枪数支。还有大刀、红缨枪。青年妇女也组织起来平时轧制黑色火药，砸破铁以备铁砂不足时供给土枪、土炮使用，战时运送。敌人来了，各小组立即进入各自的更屋（修在房顶上供监视敌人并作战时隐蔽之用的小屋）。钢枪班则作为机动力量随时支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因此小股敌人从未能进入这个村子。这里也成为运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门户之一。它像钉子一样牢牢扎在敌人的痛处，而敌人经常到这里骚扰，伺机妄图拔掉这棵钉子。

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这里的群众锻炼得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敢于斗争。

1943年春，一天早饭后，村民常维汉端着仅存的一点玉米去街上轧糊糊，刚倒在碾子上没推几遭，伪乡政权的贾瘸子带着一个乡丁来杨庄催粮。恰巧看见常维汉推碾，便说：“有粮不交，说没有这是什么！给他拿着。说完便走上前要抢。维汉一看肺都气炸了，二话没说，抽出推碾的棍子，抡起来向敌人打去。贾瘸子一看势头不好，顾不得抢粮，拉了一下乡丁，拔起瘸腿一颠一颠的往村外跑去。

枣棵杨枣树多，枣芽刚冒出来后，有虫子，要用棍子猛敲树枝，把虫子震下来。这天早晨，杨玉册和父亲去村西打枣虫子，玉册刚爬上树去，打了没几下，发现从河西过来一个人，鬼鬼祟祟向村边溜来，仔细一看是个伪军，看样子不是来侦探情况便是企图乘我不备抓个人，好逼粮逼款。玉册看准敌人越来越近，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大喝一声，“狗日的，哪里去！”扛起杠子向敌人扑去，他父亲也随后跟上。敌人愣了一下，一看风头不顺，一溜烟

跑回了河西据点。枣棵杨村的群众就有这么一股天不怕的劲头。

1945年古历正月初七傍晚，我军分区三团驻进这一带村庄，杨庄驻了一个连。我军为避免与敌人正面作战，于初八黎明前撤走，而敌人尾随而至。

黎明，启明星还在眨着眼睛，溜溜的小北风吹在村西北角房顶上值班钢枪队员刘安芝的脸上，钻进衣缝，使他裹了一下身上的棉袄，瞪大了有点疲乏的眼睛，警惕地向村外望去。忽然发现西边干涸的赵牛河里有什么在蠕动，他伸长脖颈，往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啊，敌人！他顺手拿起木梆敲了起来，梆梆梆……警报立即传遍全村。自卫队长杨立秀立即带领钢枪班检查各小组进入岗位的情况，并告戒他们，土枪、土炮射程近，一定等敌人临近再打。又组织老弱妇孺到地洞或夹皮墙中隐藏起来。一再叮嘱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随便出来。

天亮了，大约有五六百日军顺赵牛河从北向南运动。他们爬上河沿四面散开悄悄向村子围来，村中没有一点动静，敌人摸不清情况，不敢贸然进攻，首先向村中打了一梭子弹，但村中仍然死一样寂静。

敌人越来越近了，一声号令，一批手榴弹呼啸着飞向敌人“轰轰”地炸开。土枪、土炮也怒吼起来，像阵阵飓风挟着铁砂，带着仇恨，拖着一缕青烟向敌人蒙头盖脸的刮去。敌人一下子停止前近，缩在地上开始还击。步枪、机枪子弹似冰雹一般向村中射下来，打在上墙上爆起一片片黄色的烟尘。小钢炮射出的炮弹响着落进村中的街头、房顶，腾起一股股烟柱。有的房顶塌陷了，冒烟了，着火了。

战斗首先从村西北角开始，接着四周响起了枪声，敌人包围了整个村子。

村西南角杨西莲战斗小组打得十分激烈，参加战斗的八九个人，其中光杨西莲一家就有父亲玉录、叔父玉元、哥哥西荣4个

人。玉元一下子解开衣扣露出紫红的胸膛，眼睛红红的冒着火，一边向敌人叫骂着，一边向敌人还击。战斗中，一颗罪恶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胸膛，当即牺牲了。西莲一看叔叔牺牲了，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向敌人射击。身上的棉袄被打了五六个洞冒着青烟，他睬也不睬，也顾不得。玉林负伤后被强扶下房。但他趁别人不注意，又爬上房去继续参加战斗，直到最后一口气。不久，玉敏也牺牲了，玉录从房上掉下去摔伤了腿，但他们仍然顽强地抵抗着。

战斗在南门上的小组形势特别险恶，在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中杨玉奎、杨玉珠先后牺牲，杨玉银也负了重伤，杨西角的双腿被弹片炸得像狗撕的一样血肉模糊，杨玉芝的嘴崩进了一块弹片，但仍一边高骂着敌人，一边愤怒的还击，直至壮烈牺牲。只有八九岁的杨绪亮和伤了腰的父亲西田也跑出屋里往房上递火药、铁砂。他爷爷玉兰60多岁，双目失明，他看自己帮不上忙，便站在院子里一遍遍的高喊：“老少爷们，都上房，坚决顶住，拼死也不能让敌人进来！”借以鼓励大家勇敢战斗。

战斗在继续进行，钢枪班队员杨希才来到西南角支援战斗，西才是个有名的猎手，许多凶恶狡猾的野兽曾在他枪口下丧生，人称“神枪手”，这时他发现一个拿小旗的日军正在上下左右的挥动手中的小旗。他伏下身只一枪就把敌人打趴了，紧接着又把敌人的一名机枪手击毙，另一名敌人想爬过去援救，结果也被打伤，这下敌人气疯了，机枪、步枪、小炮各种子弹一齐向这里倾泻下来，但是西才已经转移了阵地，连半根毫毛也没损伤。

班长杨玉田的爱人张玉莲快要生孩子了，别人劝她隐蔽起来休息，但她执意要和丈夫一起参加战斗，一步也不离里，她送火药、运锅铁、递砖头……一刻也不休息。苍白的脸上挤满了汗珠，肚子一阵阵疼痛，咬紧牙关，一声不响的忍受着坚持到底。当天晚上就生下了女儿小玲，可是玉田却没能见到自己可爱的女儿，因为上午带头突围的时候牺牲了。

杨立兴战斗在南门上。当他看到西南角那个小组伤亡，火力逐渐弱下来，处在危急之中，便立即前去支援。但还没有迂回过去，就负伤栽倒了。杨立恒一看急忙跑去救护，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嘴巴，血流如注；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仍然跑过去，抱起立兴一看已经停止了呼吸。

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一个以土枪、土炮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人口不满600的小村子，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大敌人，不惊慌，不屈服，顽强抵抗，不怕流血牺牲。这是一场多么艰难的战斗，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铁砂没有了用钢铁，锅铁没有了改用砖头，火药没有了……，土枪、土炮、手榴弹的响声逐渐稀疏下来。

上午10点多钟敌人爬上了围墙，自卫队长杨立秀深感无法再坚持下去，便决定带领队员与部分群众冲出村去，他们先到北门，一看敌人兵力很强，便又转回南门。张立方想从水沟中偷偷爬出去，结果中弹倒下。他们打开南门，杨玉田带头一下子冲出去，结果一阵机枪扫来，身中数弹当场牺牲，立秀一看不行，想立即关门退回去，但是已经晚了，敌人随后跟着冲了进来。没有子弹的枪只能算一根棍子，他们丧失了抵抗能力，只好撤入关帝庙内，把没有子弹的枪支藏好，大家分散隐蔽起来。

敌人冲进村子，到处搜捕、杀人、放火、柴草垛被点燃，房子被烧着，到处是一堆堆大火，几丈高的火舌舔着周围的一切，树木烧焦了，弹孔累累的土墙烤红了，随着房架被烧塌的轰响，烟尘滚滚，如浓重的黑云笼罩着整个村子的上空，燃烧的灰烬被风卷起，撒向四方。

一名日军从房上跳进院子，端着上了刺刀的大盖枪闯进了张杨氏的屋里，50多岁的杨张氏用身体挡住躲在她身后23岁的杨王氏，敌人一看见只有两个妇女便瞪着眼咧着嘴唔哩哇啦地逼过去，

杨张氏一面护着身后的杨王氏一手摸起旁边的菜刀想和敌人拼命，她的手还没举起来，凶恶的敌人已经将刺刀扎进她的胸膛，杨张氏一下子倒在血泊里，接着反手向杨王氏的腹部刺去，肠子被挑了出来。

杨瑞常老人耳聋眼花，敌人用枪逼住他问，八路军哪里去了，老人以为是问他多大年纪，便抬起手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字说：“今年80了”。敌人便不分清红皂白，用刺刀向老人连砸带攘，老人当场昏了过去，几天后便含恨而死。

这天有200多和杨庄有亲戚关系的外村人，来杨庄躲避敌人扫荡，赶上了这次事件，他们和杨庄的群众并肩战斗，有的牺牲，有的负伤，也有的被抓了，马庄的马玉祥被敌抓住，因说自己不是杨庄人，就被敌人捅了七八刀。

敌人对每一个杨庄人都不放过，杨玉银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敌人发现后把他扔到火里活活烧死。杨玉生手无寸铁被敌人追赶跳入水井，敌人仍不罢休，向井中又打枪又扔石头，致使浑身是伤。敌人走后才被救出。

敌人到处乱蹿，走到哪里把灾难带到哪里。刘维让的妻子尉氏和10几人一起躲在夹皮墙内，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桂苓，被枪声、敌人的吼叫声吓的忽然哭起来，尉氏怕被敌人听到暴露目标，便一把捂住孩子的嘴，孩子被闷得喘不过气来，小脸由红变青、变紫，眼看着快要憋死了。尉氏含着眼泪仍不松手，在众人的劝说下才把手拿开，接着又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紧接着不让孩子出声，直到敌人离去。

战斗中负伤的杨立恒被母亲守护着。他看街上的浓烟大火，听着乡亲们的哭声，肺都气炸了。他顺手抓起一把镢头往外就走，要去和敌人拼命，说砍死一个够本，砍死俩赚一个，母亲死拉住一再劝说，只好含泪忍下。

敌人最后包围了关帝庙，端着机枪冲了进去，到处搜查。躲

在秫秸垛内的杨玉册被敌人一刺刀刺透了左脚，将他拉出捆绑起来。当场被抓的还有27名青壮年群众，最小的只有17岁。

12点左右敌人带着被抓的人撤到东南7里之外的解、白、刘村一带。午后我在平县长徐效参带人前来营救，组织群众转移到教场铺、大白庄一带，以免敌人再来报复，原来上午我军分区部队、在平县大队王集钢枪班从西北、西南两面对敌人进行袭击，敌人怕吃亏提前撤走。下午4点多钟敌人又回到杨庄进行报复，但是群众已经转移，敌人只好又烧了一些房子才往东撤至20多里的纪庄一带。

晚上6点多钟，军分区司令员刘志远和县长徐效参带领部队以及王集一带的群众前来扑灭了大火，慰问了群众，并把伤员送至军区医院治疗。后来对在战斗中牺牲的人都追认为烈士，每人发抚恤粮640斤小米。

这次惨案被杀害和战斗中牺牲的共31人，伤28人。烧毁房屋120余间，柴草全部烧光，约计60多万斤，烧坏树木不计其数，时至今日已经40多年了，但在西门里一铤挖下去，当年焚烧的灰烬仍清晰可见。

被抓走的28人（有外村的5人），一路上被拳打脚踢枪筒捣，受尽凌辱与折磨。敌人因看着刘维海长得魁伟，便向他背上插了一刀，还无缘无故的将杨西苓的帽子挑掉，头也被挑破。

在芦庄，敌人把抓去的人集合到一个小院里，用机枪堵住门，查问谁是八路军、谁是干部。自卫队长杨立秀怕大家受害，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是村长，有事找我，与他们无关。”敌人二话没说就向他的脖子刺了一刀，接着又向他的肋下刺去。这位英勇的自卫队长因伤势严重，得不到治疗也吃不饱肚子，不久便怀着一腔仇恨，死在平阴牢房里。

敌人从各地抓来的人越来越多，像对待牲畜一样驱赶着向大城市集中。从平阴押到肥城，在泰安集中装进闷罐车厢送往济南。

在这里只一个大库房中就关着2000多名从各地抓来的劳工。敌人先把年老体弱的挑出来押往枣庄煤矿然后将年轻力壮的押往青岛，由青岛用船送往日本。这批劳工中，除从山东各地抓来的外，还有河南、河北等省的人，其中有杨庄的15人。

他们这批劳工大约有2000多人一起上船，有日军军舰护航。他们象货物一样被关进底舱挤在一起，每人每天一两粮，4个人才能分到一小碗米饭。海上风大浪高，许多人受不了，整天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17天的航行，病饿而死达600多人，全被扒下衣服扔进大海，许多人还活着也被扔进大海里。

船在日本的下关靠岸，上岸后被分别押往北海道和丘田两地。

在日本，他们受尽各种非人的待遇，活又脏又累，劳动时间又长，日本监管人员稍不如意便呵斥、辱骂、毒打劳工，还克扣劳工的口粮。在这残酷的折磨中有的病死，有的饿死，还有许多人活活被打死。在日本人的眼里，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头牲畜值钱。从农历三月至同年八月日本战败投降，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送去丘田的1000多人，仅剩下三四百人回到祖国。

附件一

枣棵杨惨案中被抓去日本当劳 工的刘安智同志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控诉

刘安智（中共党员、原任大队党支部书记、74岁）：

1945年农历正月初八拂晓，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天空，惊醒了熟睡未醒的村民，大批日军、伪军突然包围了我们的村子。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我村抗日自卫队，在队长杨立秀同志的指挥下，率领村民当即对日伪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

上午10点左右，我村民兵和群众对2000多日伪军的进攻进行五六小时的奋勇抵抗后，弹药用尽，但是在钢炮、机枪掩护下的日军和伪军，仍在疯狂地向我发动进攻。自卫队长杨立秀同志感到弹药已尽，难以继续坚守，便打算带领群众从北门冲出敌人的包围。来到北门，只见外边黑鸦鸦的一片全是敌人，遂又决定从南门突围。打开南门后，钢枪班班长杨玉泗率先冲出，出门不久，玉泗同志即被迎头压过来的日军的密集枪弹所打倒，玉泗同志当场牺牲。我们见日军来势凶猛，便返回围子内，不长时间敌人攻进关帝庙。

村子被敌人攻破了。

日军攻进村后，一面沿街放火，一面狂捕滥杀，杨瑞常老人当时年已80岁，敌人向他追问八路军的去向，老人没听清敌人的问话，以为是问他的年纪，便用手划了个八字（意即80多岁了）敌人一见，二话没说，即将老人刀刺枪砸，他当即倒在血泊中，几天后，含恨死去，杨玉册藏在庙内的秫秸垛中，脚被敌人刺

穿，50多岁的杨张氏和杨王氏两人藏在一所院子里，几个日军从房上跳进院内，将杨张氏挑死后，又向杨王氏的腹部刺了一刀，肠子当即露了出来；民兵队长杨立秀被日军抓住后，眼见敌人的暴行，怒火胸中烧，愤怒地对敌说：“我是村长，有事对着我来，和他们无关！”一个日军士兵见立秀同志出言不逊，便用刺刀向他捅去，一刀刺中了他的脖子，一刀刺在他的肋下。立秀身上血流如注，疼不可忍，尽管如此，敌人仍将他绳捆索绑，押到平阴，不久死在狱中。

日军进村后，大肆烧杀、抢掠、抓人，这天我村有23名青壮年被抓。

我们23人被他们逮住后，于下午一点被带到刘庄。路上对我们随意进行打骂，不是拳打脚踢就是用枪托子砸，一个日军士兵无缘无故地向正在走着的杨西岭头上刺了一刀，幸亏西岭头低的快，没有刺在头上，但把他头上戴的帽子穿了个洞。

到刘庄后，敌人挨门挨户逮鸡捉鸭子放在火上烤着吃，整个刘庄鸡飞狗跳，村民不得安宁。他们把刘庄糟塌一通后，似乎感到对我们枣棵杨庄的恶气未出，便又带着我们返回了我们村上想再次血洗我们庄，这时我们无不为村中父老担心。幸好，当敌人再次来到村庄时，他们看到的是冒着滚滚浓烟烈火的房子、柴垛……，村中老少都已转移了。敌人的兽性无处发泄，便又拿着我们的房屋出气，将那已为数不多的，尚未着火的房子又放了一把火。时至40多年后的今天，原西门里，用铤一挖，当时敌人焚烧村子时的灰烬依然可见。

他们在我村烧了一通之后，又跑到大窑进行烧杀。晚上，他们在纪庄住下后，将我们和从柳庄、吴海子等村抓来的20多人关在一家北屋的西间里。外间的日军将桌椅砸烂，当柴取暖。屋内被他们弄得一塌糊涂。

凛冽的北风，透过门窗和墙缝吹进屋来，象一支支利箭射在

我们身上，浑身针扎似的难受。大家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相互暖一暖冰冷的身子，我们40几个人，大都一整天未吃东西，特别是我们20几个，从天明起奔波战斗了一天，又身受大半天的折磨、疲劳、饥饿、伤疼，对村上亲人的挂念与担心，一起向我们袭来，身心都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

第二天（初九）敌人将我们用绳子捆上，40多人连在一起，在他们的押解下，傍晚来到了平阴。并被关进了监狱。牢房内，高高的墙上有个拊八见方的窗口，微弱的月光，透过窗口射到屋内光秃秃的石板炕上，肮脏的墙壁上布满了一块块乌黑的血迹。两天来，我们滴水未进，特别是玉秀同志，身上多次负伤，路上几次受到敌人的毒打，这时已被折磨的不像样子了。杨玉章饿得的实在受不住，求他们给点水喝。一个伪军却说：“这里一不种高粱，二不种谷子，哪里来的吃喝！”后经我们大伙一起哀求，并答应家中来人后付钱给他们，一个狱卒才赊给一罐水。

后来，家中去人，经上下打点，他们才同意家里人在外边买干粮送进狱中，买进来的干粮要先给他们一部分，名曰“抽头”。

在平阴狱中，杨立秀同志的伤势不断恶化，日伪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在精神上肉体上加以折磨，冻饿疾病交加，10几天后便死在狱中。这期间，马庄的马全泽、马全海，我们村的杨西岭、杨玉告、杨立臣家里托人花钱赎回。

一个月后，敌人将我们由平阴经肥城解往泰安（途中，崔德绍、李常兰两人先后寻机跑脱）到泰安的当天，把我们装进闷罐车里，拉往济南，关在一所仓库改成的监狱里。和我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从其他地方抓来的2000多人。在这里，敌人看守得很严，四周是高高的院墙，全副武装的敌人日夜监视着。

10几天后，敌人突然叫我们在院子里站队。我感到十分奇怪，心想：10几天来我们被关在屋内，吃、喝、拉、睡全在里边，从不让我们出屋，今天是想搞什么名堂！正寻思间，只见几个日本

人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日本人一手提着一桶油漆，一手拿着一把刷子，这伙人来到我们队前，从头挨个看起，每当看到年纪比较大或身体弱的人，领头的日本人用手一指，手拿着刷子的敌人便用沾满红油漆的刷子往这个人的鼻子上一抹……，最后敌人将被刷成红鼻子的人叫出，另站一队带走了。我们村上的杨立化、徐广田也在其中。后来听说这些人被带到枣庄煤矿为他们挖煤。

又住了10几天，一天早晨，天还未明，我就听别人不住议论，说是敌人要将我们解到别处去。有的人则表示不能在他们手里等死，要想法逃出去……。

开早饭的时候，送饭的敌人刚把门打开一半，早就等待着的人们，一起涌向门口，争相往外冲，由于人多，事仅开了一半，人们一下子挤在了门口。敌人一见，便用刺刀向人们乱捅乱砍，并向冲到院子里的人开枪射击，我们也顺手拿起砖头瓦块向他们砸去。由于敌人的镇压，我们又没有组织好，当场被敌人打死打伤的不少。仅有少数人得以跑出，这次暴动失败了。

出事的当天，敌人将我们押上火车。上车前，为防止我们再次闹事，解下我们的腰带把我们捆上，大家只好用手提着裤子，在从济南往青岛的火车上，不少人利用夜暗跳车逃跑，有的当即摔死。和我们在一起的化胜，刘忠芝也乘黑天跳了车，忠芝当场摔晕，后被一好心的老大娘救起，月余后才回家。

在青岛，住了半月左右，敌人给我们发了劳工证，换了劳工服，这时才知道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去当劳工。又住了10几天的样子，敌人将我们押上一艘日本火轮。

现在常听人们称赞青岛的美丽，说是崂山脚下的青岛海滨，风景如画，景色迷人，是人们疗养休息、度假游览的地方。可在当时，我们却没心思观赏那里的景色，当我们被人像赶牲口似的赶上轮船的时候，眼前一个个凶神恶煞如狼似虎的日本士兵，一艘艘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舰，面对生死未卜、遥无归期

的异国之行，无不面带愁容；天水茫茫，海浪涛涛，此去到何处？何处是归程！抛尸异国，暴骨他乡的忧虑，与故国亲人永远别离的心情，像一块块沉重的石板压在我们的心头。

上船后，我们被安置在船的最底层，2000多名劳工挤在装满矿石的货舱里，进了货舱无疑等于进了地狱，舱内浑浊的空气令人窒息。2000多人的汗腥气，大小便的恶臭气使人作呕。特别是当船航行了一段以后，大部分开始晕船，胸中的五脏像外边的海浪一样不住翻滚，心肝肺一下子涌到喉头。人们开始不停的呕吐，开始还有东西可往外吐，后来胃里的东西吐光了，心里还是不住地翻腾，只好趴在那里张着嘴巴干呕，有的把胆汁也吐出来了。

在船上，他们每天给吃两次东西，每次4个人才给只盛2两米饭的一小黑碗饭。几天后，我们个个饿得面黄饥瘦，有的饿死了；有的饿的实在不能忍受，不愿再活受罪，便爬到上边，滚进海里，自杀了；不少人得了病，狠心的日本人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借口传染，把他们弄到上边，扒光身上的衣服，扔进大海，每天被他们扔进海里的不下几十人，我亲眼见到好几个人被他们弄上去，没一个回来的，全被他们扔进了海里。就这样，我们上船时2000多劳工，17天后下船时仅剩下一千五六百人，被他们扔进了海里的足有六七百人。

我们15人，幸亏在青岛上船之前买了一大串咸菜，靠它，我们几个才度过难关，得以活命。

17天后，终于结束了海上的苦难生活，在日本下关靠岸。上岸后，敌人将我们重新编队……我们几个都被编在一个队里，我们这些人从下关起，又经过7天的行程，到达北海道，一个月后将我们解到一个叫吉村别的地方，为他们开山拾石头。他们像使牲口一样使我们，稍有意慢，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每天两顿饭，每次只给牛眼大的两个橡子面窝窝头，连半饱也不到，人们饿的几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有的走着走着一头栽到地上，就再也起

不来了。尽管如此，他们还逼着我们每天为他们干10几个小时的活，到吉村别不久，我村张殿玉就因挨打、饥饿而病死。

在吉村别和我们一起当劳工的，除山东的外，还有上海、山西、河南甚至朝鲜人。这期间，有的不堪忍受他们的凌辱和折磨，便想法逃跑。日本人为了防止我们逃路，除严加看守外（每10个劳工便有一名看守），凡逃跑被他们抓回的人，都当着全队劳工的面乱棍打死，借以威吓我们，当时的情景之惨，令人难以目睹。

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一直接续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方才有所好转。

日本投降后，经中国政府与日本交涉，我们于11月20日回到了家乡。

附件二

杨西荣同志对日军暴行的控诉

在下关上岸，重新编队时，我和安智他们分开了，和另外的1000多人编在一起。3天后，到了秋田，在一个场子为他们抬石头。

在秋田，吃的也是橡子面窝窝头，每天两顿加在一起也不过半斤，就连一点可怜的口粮，黑心的日本看守人员还克扣我们的，偷偷卖掉，将钱私分。

繁重的体力劳动，饥饿的折磨，使不少人病倒了。他们不但不给治疗，反而硬逼着去为他们干活，实在起不来的，就将他们抬到一间小屋里，不给吃不给喝，活活将人饿死。凡是被弄到小屋子里去的，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3个月后，我们感到吃到口的东西越来越少，同时发现了他们倒卖口粮的行为，大家十分气愤，便选出代表给他们交涉，抗议他们偷卖我们口粮的行为。但是，亡国奴的性命不值钱，亡国奴的话就更不算么了。他们不但不理睬我们的抗议，反而克扣得更狠，我们吃到口的东西更少了，被饿死的人不断增加，每天都不下六七个饿死的。有句俗话，叫做狼恶虎恶不如饿恶，我们心中的气再也压不住了，与其饿死，到不如拼着性命和他们一拼。在一个河南劳工的鼓动和带领下，我们造反了！经过初步准备，一个个愤怒的劳工，手拿铁铤木棒向他们冲去，当场打死几个最凶恶的日本看守，然后分头逃跑。由于我们语言不通，道路不熟，他们又调来了大批军队，结果，我们没有跑出秋田，被他们围困

在一座山头上，一个个先后被他们抓住，绑上，挨个进行毒打，当场不少同胞被打死。这天正赶上下大雨，毒打完了后，他们又将一个个遍体是伤的劳工，绑在露天地里，大雨下了3天，我们在外边淋了3天。饿了3天。3天之内被打死、折磨死的有300多。我就是那次因冻饿和遭受毒打落下了痼病，至今未好。

为了叫我们继续为他们干活，3天后，才放了我们，开始给点吃的，同时对们看守更加严格了。

在秋田，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们去时1000多人，到回来时不到400人，半年内死掉七八百人。我们那个小组，去时10几个，最后活着的，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

日本投降后，11月我们方才回到祖国。

恶贯满盈的汉奸

——“刘二金岭”

马世祥 刘广恩整理

刘金岭，字泽南，因排行第二，俗称刘二金岭，1896年生于朝城县申屯村一个大地主家庭。成年后曾去东北做工，不久返乡在村入大刀会，习武术、练气功。因其生性胆大，又奸诈狡猾，是朝城一带无人敢惹的一霸，一度成为申屯及附近苗楼、辛店集、店子等村大刀会的头目，并被推立为民团团长。此间，曾推粮食车子当过粮贩子，后被推举出任朝城县商联会会长、县联庄会副总会长兼清乡副主任职务。

1935年，在朝城县地主豪绅的推荐保举下，刘金岭接替朱庄大地主朱洪昌当上了朝城县保安大队长。时刘的侄子刘喜波在县保安大队任连长，因卖掉短枪两支，刘金岭将其活埋于罗屯，故群众有歇后语：“二金岭戴眼镜——六亲不认”。1936年冬，范筑先就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朝城县保安大队被范筑先收编，仍由刘金岭任大队长，驻扎在朝城东北罗屯一带。1938年11月，日军攻陷聊城，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王金祥被委任为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盘踞朝城一带，与我为敌，此时，刘金岭投靠了王金祥。1940年2月，八路军主力部队讨伐顽军王金祥部，将其赶出朝城、范县、濮县等地区刘金岭陷于孤立境地。我筑先纵队为不失时机的将其收编，一

天，筑先纵队供给处长傅亚屏（书香门第出身，在国民党地方势力中有一定影响，与刘金岭相识）奉筑先纵队司令员张维翰的指示，单人独马前往刘金岭部作说服收编工作，向其申明大义，规劝其率部投向人民一边。刘金岭在失去靠山的形势下，为保存实力，同意改编。但刘金岭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傅亚屏任朝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傅亚屏就带着刘金岭一同到了朝城城内与张维翰面谈。此时，朝城全境已获解放，朝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在筹备成立。张维翰当即委刘金岭为筑先纵队特务团团长，并以鲁西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张维翰兼主任）委傅亚屏为朝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刘金岭部仍驻罗屯一带。为改造这支刚刚收编的队伍，筑先纵队随派出政工干部20余人，由莘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郭澄之带队，到该部团、营、连做政治工作。

1940年5月，讨顽战役取得胜利，八路军主力部队相继归建，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奉命合编，组成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同时北上王奉整军。在调动筑先纵队特务团北上王奉整军的路上，刘金岭在毕屯一带哗变，将郭澄之等政工干部逐出，率部又返回罗屯一带。不久，日伪向朝城一带大举“扫荡”，出动一百多辆汽车包围了罗屯，只向村打了几炮，刘金岭便率一千多人的武装投降了。1940年底，“石部内讧”后，石部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率部投向驻朝城日军，文大可被委为绥靖三十一师师长，刘金岭被委任为朝城县伪县长，后又被委为“范观朝剿共总司令”，从此，刘金岭走上了彻底与人民为敌，充当日本侵略军鹰犬的道路。

朝城城西的吉祥寺村，抗日群众组织十分活跃，被人民群众誉为“朝城城西的抗日堡垒”，中共朝城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经常在这里活动，吉祥寺成为朝城敌人的一颗眼中钉。当时朝城敌伪的共同策略是：要征服朝城，必先征服城西；要征服城西，必先征服吉祥寺。1940年8月，刘金岭派往吉祥寺催要给养的人被捆在树上打了一顿后逃了回来。盘踞罗屯的刘金岭闻讯大

怒，于22日深夜带一个营的兵力奔袭吉祥寺。吉祥寺的模范班寡不敌众，边打边撤。因吉祥寺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陈东明（又名陈宪波），所以敌人进村后见姓陈的就抓，先后抓捕了思想进步的老人陈常（又名陈纪民）、陈东光（又名陈宪典）、陈金元、陈金田、陈庆怀、陈长成等50多人，后经当场识别，决定把其中的36人带回罗屯。回罗屯后，刘金岭企图从老人陈常和年仅14岁的少年陈东光身上打开突破口，逼出口供，一网打尽朝城一带的中坚分子，但这一老一少都软硬不吃。他们把一老一少捆在板凳上，然后头朝下立起来，用煤油掺辣椒面往嘴里灌，但换来的只是断断续续的怒骂。刘金岭无计可施，只得宣布停审。我抗日地方武装为了营救陈常和陈东光他们，把砖庄汉奸头子“四牧师”的老娘和肖屯的汉奸头子张清俊之弟“三大牙”抓了起来，接着又传讯了刘金岭的大儿子刘学颜、亲家王青山（伪乡长），并通知他们，如敢伤害陈常、陈东光，我们也决不手软。刘金岭无奈，只得把陈常、陈东光宣布无罪释放。但奸诈的刘金岭那肯罢休，就又玩弄伎俩，把其他被抓人员移交给驻守郑庄的伪军旅长段海洲。段海洲将民兵骨干陈道元、陈东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将其他人于春节前释放回家。

刘金岭当上伪县长后，率部驻进朝城城内。刘金岭自以为有日本人撑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残酷地镇压朝城人民的抗日活动，搜捕抗日家属，配合日军扫荡向抗日根据地蚕食。当地一首民谣说：“二金岭、文大可，烧了这个杀那个”，就是刘、文罪恶活动的写照。朝城共产党员孙超、谢春风、陈东明、王史可、郝明甫、杨介忱等同志的亲属和家乡，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刘金岭一伙的迫害和破坏。有一天，刘金岭的部下抓来5个人，刘金岭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说成是土匪、八路探子，拉到关帝庙前立即活埋。阳谷仓上的两个人从罗屯路过也被抓住，刘金岭硬说是八路探子，第二天便拉到村北枪毙。他们去北林屯抢粮，抓住了

民兵班长李大方，当场扔到水井里活活淹死。

刘金岭还与驻朝城日军和伪绥靖三十一师相配合，大肆搜刮掠夺民财，于1941年3月修通了朝城至阳谷的公路。刘金岭占据了公路以北地区。刘金岭用搜刮来的钱财，乘1941年至1942年的灾荒之年，以一斗谷子（约合35斤）索要一亩地，购地三顷，雇本村和外村的巨全印、张会青、申章成等6名农民为其耕种，秋按三·七，麦按二·八相分，每亩刘取多数进行剥削。刘金岭建有四方砖院和耕畜饲养房共计19间。后在土改中按政策对其家产平分给贫苦农民。

1941年下半年，刘金岭率部进驻罗屯，全村800多人统统被赶到围寨外。当时正逢大灾荒，人们无家可归，无亲可投，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多数人外出逃荒要饭，致使全村2000亩良田荒芜。

刘金岭的倒行逆施，促使各村群众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民兵联防。他们白天带枪下地劳动，夜间站岗放哨，村内村外巡逻，发现情况就吹响牛角号，打锣报警，各村之间互相支援。抗日民兵联防组织的建立，使得刘金岭处处被动挨打。为了搞垮这一带的联防组织，刘金岭纠集阳谷的伪治安军1000多人到抗日联防模范村东孙庄一带“扫荡”。联防民兵采用麻雀战术，从四面八方方向敌人射击，区基干武装也乘机出击，敌人被迫撤回。1943年2月2日夜，刘金岭和伪区长刘天顺亲自带领300多人的汉奸队突然包围了东孙庄，由于其他村的民兵增援未及时跟上，敌我力量悬殊，东孙庄民兵只得边打边撤至村外。敌人进村后，大肆烧抢，全村300多间房子有一半被烧毁，烧毁各种家具不计其数。

1943年7月，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杨得志司令员的指挥下，发起朝（城）南战役，攻克朝城外围据点、碉堡77处、毙伤俘伪军官兵700余。文大可采用金蝉脱壳之计偷偷离开朝城，逃往济南。在周围地区都已解放，县城孤立，朝城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刘金

岭率残部弃城逃往阳谷，投靠伪军张育煥部。

逃到阳谷的刘金岭，不甘心失败，企图以阳谷为据点，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白天，他们在阳谷城里吃喝玩乐睡大觉，夜间则在情报员带领下，到朝城一带抓人抢粮，拉牛掠物，杀害抗日干部群众。与阳谷县相毗邻的朝城县四区，斗争形势比较复杂。汉奸区长赵文英与抗日区长赵文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44年农历9月初7、四区韩马庄的郝风举（敌中队副）、催振生（敌小队长）探得几位抗日干部住在韩马庄的韩更勤家里，便向刘金岭报告。夜深后，刘金岭带300多人扑向韩马庄。来到韩马庄东头，敌人想在打探一下动，便到一个院子外叫门。住在院内的60多岁的崔玉法老俩口听出不是自己人，遂将门死死顶住，被敌人开枪打死。崔玉法的儿子崔心成正在街上站岗，听见枪响，赶快扔了两个手榴弹报警。敌人见已暴露，便直扑韩更勤的院子。住在院中的中共四区区委书记万守仁、抗联干部韩进忠、武委会干部韩建德、事务长吴善学分别据守门窗，与敌人对峙了近4个小时。敌人见久攻不下，便点燃秫秸放火焚烧。万守仁、韩进忠、韩建德被烧死，吴善学冲出房子，与敌人拼杀，被汉奸用刺刀挑出了肠子，很快死去。敌人这次偷袭，烧死我抗日干部4人，打死农民2人，抓走了村农会长崔存学和韩立奎（后被赎回）。

1945年刚过春节的一天夜里，朝城北谢楼的民兵开完会正燃起谷秸烤火，刘金岭的数百汉奸突然包围了村子。待民兵发现有情况时，敌人已上了房顶，封锁了门口，并开始向屋内打枪。民兵们立即上好了刺刀、准备近战拼杀，但敌人却没敢冲进屋来，他们将房顶挖开，把点着的谷秸、高粱秸填进屋子里，一时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民兵班长谢同信、副班长程保先高喊一声，带领民兵冲出屋外，与院子里的汉奸展开肉搏。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谢同信等3个民兵杀开一条血路，翻墙跳出，奔邻村求援。民兵谢纪安被砍死，程保先中弹身亡，程保柱、程得水未

能冲出屋门，被敌人用高粱秸封住屋门，活活烧死。之后，敌人又烧了农会长的三间瓦房，才拖着伤兵退走。敌人撤退时，抓走了在谢楼养伤的我军战士小刘，拉到村外枪杀。路经康园村时，该村农会长史八吉正打鼓集合民兵增援谢楼，汉奸冒充我抗日游击队，史八吉受骗被抓住带走，到焦庙时，敌人又抓住了残废军人焦得水，当即枪杀。回到阳谷后，刘金岭逼迫史八吉出卖组织，史八吉严词拒绝，被活埋于城郊。

1945年7月26日，解放阳谷的战役打响，刘金岭负隅顽抗，被击毙于阳谷县城，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的一生。

莘县日伪县长——刘仙舟

王协振 马世祥整理

刘仙舟，原名刘英伟，泰安县城镇西关茂胜街人，生于1902年。幼时曾在城镇西街读私塾二年，及至稍大，常纠集街头地痞流氓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抢掠财富。后到兖州学木器制作技术。1926年去济南，在济南市保安队当警士，后升任警长。1929年，山东旧军阀张宗昌被国民党军打败，韩复榘就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司令，刘仙舟就投靠到韩复榘的部下，在济南市公安局特务队当队员，后升迁第三路讨逆军特别侦探队队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韩复榘不战而退，刘仙舟即率部跑到宁阳、泗水一带，打起“抗日”的旗号，拉杆结伙。组织土匪武装。1937年底，日军先后攻陷济南、泰安，刘仙舟便率部回到泰安家乡，又招收了一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投降了驻泰安日军，被委任为“剿共司令”，跟随日军扫荡，到过青岛、济南。至1938年，刘仙舟已发展到300多人枪，其中骑兵就有50余人，成为日军奴役中国人民的一支铁杆汉奸队伍。日军攻陷鲁西北重镇聊城后，即委刘仙舟为“鲁西自治军剿抚司令”，调往聊城一带，准备向外扩展。1939年2月28日（古历1938年12月30日）刘仙舟在驻聊城日军一个大队的配合下，侵占莘县县城，被委任为莘县伪县长兼保安司令。

刚到莘县的刘仙舟，羽毛未丰，只有其带来的汉奸队伍三百多人，住在莘县城内。他仰仗日本人的鼻息，不断配合莘县、聊

城、冠县的日军外出“扫荡”。当时，中共莘县县委在莘（县）冠（县）边界一带活动、组织群众打狗破路、锯电线杆，散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刘仙舟的汉奸队于1939年秋配合日军向莘北“扫荡”，逮捕抗日军民，勒索抗日家属，将中共莘县二区区委的张玉书、徐广文等捕到莘县杀害。1939年秋、冬，刘仙舟的汉奸队在俎店和位庄的战斗中，受到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的沉重打击，尤其是位庄战斗，消灭其主力一部。随后不久的讨顽战役，八路军主力部队追击顽军石友三部到达莘县，慑于八路军的威势，刘仙舟蛰伏于莘县城内，半年很少出城。刘仙舟深谙“有枪便是王”的土匪哲学，表面上一蹶不振，暗地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随着日军回师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刘仙舟的气焰逐渐嚣张。他忠实地推行了日军的所谓“保甲制度”、“三光”政策，“囚笼”政策，以及在其占领区建立反共自卫团，发良民证、身份证，筑公路、修碉堡、设据点等方针，在不断的向根据地“扫荡”蚕食中，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其伪军队伍，到1942年春，扩大到6个中队，到1944年扩大到16个中队。1941年7月在燕店西设立了第一个据点，随后于1941年11月设立了小马庄、燕店东北角、铁佛寺据点。1942年3月后，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了王化、张屯、马厂、十八里铺、西吴家、东赵庄等据点碉堡。在安设据点的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的安设几次都没有安成，如豆村；有的被拔掉，如燕店西据点，先后在1941年秋和1943年7月两次被拔掉。但随后刘仙舟又给安上了。

到1944年，刘仙舟在莘县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机器，成为所谓“模范县”其主要组织及其机构有：

一、伪军：1944年1月，莘县有伪军1337人，据点11个，碉堡9个。各区还有数目不等的反共自卫团。

刘仙舟视伪军为命根子，为了牢牢地控制伪军，他把中队长

以上军官，几乎全部换成从宁阳、泗水带来的亲信。在16名中队长中，莘县人只有1人，且中队长经常调换，不使其在一个中队久处。中队长以下之小队长，也不是明确的和固定的，由他分别加委为中尉队副或少尉队副，以便其直接控制各个小队。即使如此，刘仙舟仍不放心，又把其亲信经过训练，派往各中队担任事务长，进行特务活动，监视各个中队的行动。

二、伪政权：刘仙舟占领莘县后，首先按莘县原区划建立了6个伪区部，使其政权系统逐渐完善。其组成情况是：县长刘仙舟，日本顾问何田，下设秘书处和财政、教育、建设三个科。

各伪区公所设助理员2人，区丁6—9人，还建立了30—80人枪不等的所谓区队，即反共自卫队。

为维护其血腥统治，刘仙舟强化了警察系统，县设伪警察总所，设所长和督察长，下设警务、保安、司法、经济、特务5个系。另在燕店、小马庄、东赵庄设了警察分局，向王化、马厂、十八里铺派出了巡官。

为对付共产党人的抗日救国活动，刘仙舟还在警察所的特务系建立了20多人的剿共班。

三、新民会和剿共委员会：新民会是刘仙舟根据日军旨意，配合日军教育、争取群众而设的，总会长由刘仙舟兼任，具体事务由主任梁国忱负责。县新民会下设总务科，组织指导科和青少年训练所，在全县6个区建立了新民分会，委派了区指导员，还在一区的柳河乡、盛河乡、单庙乡、乔庙乡，二区的大里乡、白马乡、三区的燕店镇，四区的董王乡、王化乡，五区的马厂乡、张堂乡，六区的鞠屯乡、王楼乡、严营乡设置了乡指导员。

剿共委员会是刘仙舟为适应其反共需要，加强反共宣传，妄图扑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而设立的，主任刘仙舟，副主任龚星三。

另外，刘仙舟还建立了伪农会、伪商会、伪新民教育馆等组织。

刘仙舟盘踞莘县5年多的时间，依仗其军事机器，实施反动的日伪统治，犯下了累累罪行。仅就经济掠夺一项，就给莘县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据莘县县委1942年对敌人统治区袁花园村的调查，该村有土地933亩，人193口，人均土地4.8亩，从1939年到1942年，亩产量和每亩地交敌人的负担如下表：

年 份	亩产粮食（斤）	对敌正式负担（折合粮食：斤）
1939	80	43
1940	75	25
1941	200	62
1942	40	20

从上表不难看出，在这四年中，刘仙舟向其占领区农民掠夺的粮食物资，有两年占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两年占30%以上。这四年中，袁花园村人均收入折合粮食分别为：1939年，177.6斤；1940年，240斤；1941年，662.4斤；1942年，96斤；再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诸如大车牌钱、户籍薄钱、在新民会钱、情报薄钱、死亡出丧薄钱、生子薄钱、出外薄钱等等，还有大量的出伏出工的负担，使农民不堪重压。

在接敌区，刘仙舟掠夺更甚，他利用其军事和政治力量，横征暴敛，有时抓捕办公人员或群众，强行催促粮款，接敌区天齐庙村，有土地1264亩，人口331口，人均土地3.8亩，其亩产量和每亩对敌负担如下表：

年 份	亩产粮食 (斤)	正式负担 (斤)	苛捐杂税负担折合粮食 (斤)	总计负担折合粮食 (斤)
1939	150	32	20	42
1940	100	28	35	63
1941	170	15	23	38
1942	40	13	10	23

按此计算，该村人均纯收入折合粮食分别为：1939年、410斤；1940年，140斤；1941年，501.6斤；1942年，64.6斤。

可以想象，这么微薄的收入，大户人家尚难以维持生计，小户人家可怎么生活。1942年冬至1943年春，莘县大地上的遍地饿殍，累累白骨，正是对刘仙舟血腥统治的血泪控诉。

与此情形相反，刘仙舟吮吸莘县人民的民脂民膏，在县城内屯积了大量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还在济南购置宅院一处。跟随他到莘县来的有两个姨太太。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944年8月1日，我冀鲁豫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率部一举攻克莘县城，活捉了刘仙舟，并押解刘仙舟去燕店、西吴家据点喊话，迫使四个据点的伪军投降。在押解刘仙舟去王化据点喊话的途中，刘仙舟逃跑未遂，被押至根据地的四层楼村，经赵司令亲自谈话教育，讲明政策后释放。刘仙舟先到济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随匪三十六师副师长刘跃亭去兖州，是年底投奔济宁防务司令刘丙功腋下，济宁解放后随刘跃亭去河南省商邱，后去西安，西安解放时去宝鸡，此时刘仙舟得了瘫痪，1949年病死宝鸡市，被埋于市郊土地上。

罪恶累累的齐子修

王协振 马世祥整理

齐子修，河北固安人，土匪出身。抗战前投奔国民党二十九军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并混了一名连长，几个排长邵吉胜、齐润泽、薄光三等都是他在冀北拉杆时的弟兄。

“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南侵，石友三部随二十九军溃退到大名一带，齐子修率连脱离石部，流窜到堂邑、清平乡间。此时，日军进逼鲁北，国民党官吏纷纷逃散。齐子修侦知国民党第六区专员范筑先有奉命撤退的消息后，即埋伏在聊城附近，伺机袭占聊城，发笔洋财。10月17日凌晨，范筑先专员奉韩复榘命率部撤退后，齐子修即率七八十名溃兵谎称二十九军官兵，于该日上午九时骗开了聊城城门，首先缴了政训服务员的枪，又派兵监视起代理县长张维翰，接着翻箱倒柜搜索财物，他们从厕所搜出政训服务员藏起来的枪支，从专员办公室搜出两千块大洋，而后，砸开聊城监狱，将在押的土匪和刑事犯等80余人释放，发给枪支，编入自己的队伍。齐子修企图利用代理县长帮助他筹饷，张维翰为了脱身，于当天下午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邀请聊城所谓“士绅”作陪，以欢宴齐子修和他的主要军官。正当齐子修等酒酣耳热的时候，张维翰借小便为名离开席位，乘机从专署后院越墙而去。齐子修见勒索款项未成，遂于当晚抢劫了东关殷实商号和东门里裕鲁当铺，于下半夜撤出了聊城。

10月21日，范筑先在政训服务员的说服动员下，毅然接受我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定回师聊城坚持抗日。当得知齐子修逃跑到沙镇的消息后，范筑先即亲率保安营追击。齐子修不支，向北逃窜至博平，范筑先又率保安营主力经清平、夏津，最后将齐部追击到武城。齐部所经之地，到处骗开县城，释放罪犯，扩编队伍。

为收编齐子修部抗日，范筑先亲自率几个警卫人员，骑自行车直驱武城城内齐子修处。齐子修看到范筑先只身前来，感到不是来讨伐他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但仍不放心，架着机枪，摆开阵势。范筑先进了城，见到齐子修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救你们的。你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把你们吃掉吗？随我抗战去吧。”他接着又指责其破坏抗战、抢劫聊城、侵扰百姓的罪行，后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晓谕齐子修，“邪不压正”，齐子修慑于范筑先将军的威势，又想借投靠范筑先以发展自己的势力，遂表示愿随范效命疆场，并向范说：“蒙司令知遇之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齐子修将部队集合起来，范筑先对他们讲了话，随即将齐部改编为保安第三营，任命齐子修为营长，薄光三、邵吉胜、齐润泽三个排长都提升为连长，第六区政训处派共产党员史钦深、张承先、许言、成润、张德政、于笑虹等到该营做政训工作。不久，范筑先将齐子修营扩编为第三支队，委齐子修为司令，驻防高唐、清平一带。齐子修率部打了博平的贾寨，打跑了高唐城内的土匪头子李采题（外号李九），得了大量枪支和现款，齐子修又招兵买马，使部队发展很快，不到半年达到五千人枪，编为五个团；一团团长邵吉胜，二团团长齐润泽，三团团长薄光三，特务团团长李明歧，骑兵团团长肖德茂。

当时，在范筑先所属三十几个支队中，三支队是比较有战斗力的。齐子修在任范筑先保安第三营营长和三支队司令期间，慑于范筑先将军的威名，曾率部参加了界牌战斗、南镇战役和济南战

役。在济南战役时，齐子修为前方总指挥，曾一度打进张庄飞机场和纬十一路，为抗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8年11月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牺牲后，鲁西北的抗日阵营发生分化。齐子修站在坚决反共的王金祥一边，与共产党直接掌握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十支队为敌。驻清平的二十九支队王善堂部、阳谷的十九支队布永言部投靠了齐子修，齐子修把他们各编为一个团。这时齐部号称万人，国民党委齐子修为山东省第六专署保安副司令，其部队编为山东省第七保安旅，齐子修为旅长。1939年春，日军扫荡鲁西北，齐子修把部队拉到寿张、吕堤口、张集、柴楼、梁山一带。9月，因给养问题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发生矛盾。这时徐向前由冀南去山东路过鲁西，认为齐子修还可争取，派周云章去齐部，劝说齐子修编为一个纵队，与八路军合作抗战。齐子修不同意，但又怕被八路军消灭，遂离开了寿张，又回到了高唐、博平，集中盘踞在梁水镇周围地区，司令部驻秃胡刘村。这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正在展开，高唐、博平抗日武装组织相继建立，八路军主力部队也不断在此活动，给齐子修实现占地为王的企图添了一大障碍。因此，齐子修不断制造摩擦，袭击地方抗日部队。为打击齐子修的反共气焰，八路军一二九师筑先纵队、博平县五大队在清平县的蔺桥与齐部激战一天，歼其一部。齐子修还配合日军破坏茌平、聊城、东阿交界地区的抗日活动，肖华亲自指挥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反击，消灭其一个营。秋末，齐子修侵占冠县东北部的韩路、张八寨、石家寨、王姜等村。

1940年初，八路军主力部队展开反顽作战，讨伐专搞摩擦不抗日的王金祥部。王金祥原是范筑先将军的参谋长、二支队司令。范筑先殉国后，王金祥被国民党委任为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带其部队驻扎在朝城一带。经过战斗，王金祥不支，率残部溃逃到东平湖以东地区。国民党委齐子修为第六区专员兼

保安司令，又给他一个独立十一旅的番号。齐子修自恃有国民党的大力扶持，他趁日军扫荡之机，大举向周围地区扩张，这年春，先后占领了莘县、冠县、堂邑、聊城交界地区，其邵吉胜团占据了白堂，齐润泽团占据了李海。为打击齐子修的嚣张气焰，八路军主力部队七七一团、一二九师骑兵团、中央纵队的二十团、二十二团等部队，采取围白堂打李海的办法，歼齐润泽团大部。

由于日军的大举扫荡，八路军主力部队投入百团大战，鲁西北主力部队在李海、白堂战斗之后，相继撤出，到达铁路沿线展开破袭战。齐子修的气焰更为嚣张，他趁势扩充实力，占领了莘县东北部、冠县东部以及聊城、博平、茌平、高唐的大部地区。1941年冬，齐子修升为山东省保安第五师师长，所属组织机构庞大，兵力实力雄厚，时称6旅7团2院。6旅即有6个整编旅，其中有4个较有战斗力，就是七旅旅长薄光三；八旅、旅长邵吉胜；九旅、旅长齐润泽；十一旅、旅长齐子修兼；7个团是4个特务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教育团；2院是一个反省院，一个野战医院。齐子修还发展国民党的核心组织，成立所谓“铁血救国团”。不久，齐子修又将团改编成三个特务旅和一个山东保安二十五旅。

齐子修部名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部队，实际上他们不但不抗日，反而勾结日军，配合日军的扫荡蚕食，攻击八路军，摧残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齐子修派李静波代表他去聊城与日军订立了双方互不侵犯条约。为便于联络和统一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行动，齐子修在聊城日军司令部设办事处，李静波为处长。

1941年冬，齐子修部窜犯莘县北部，莘县抗日军民与之进行了顽强斗争，但终因敌强我弱，马颊河东沦入齐匪之手。其八旅旅长邵吉胜部将旅部设在安头，并在西赵庄、马桥、东赵庄、孙家、姬家等地安设据点。1942年2月，其七旅4000余人窜犯桑阿

镇一带，将旅部设在桑阿镇，并在轧庄、野庄、凤庄、油坊等村安设了据点。

齐匪在这里盘踞期间，四处烧杀抢掠，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家属，残害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他们要钱要粮要东西，人民无力缴纳，立即受到扣押、拷打乃至处死。他们常在深夜活埋人，每次不下三五个。仅在桑阿镇一地，就被残杀200余人，把这里变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由于齐匪的烧杀抢掠残害，使小赵庄以北的桑阿镇为中心的冠县、堂邑交界地区，形成了方圆六七十里的无人区。无人区的荒凉景象是十分可怕的：老百姓开始是吃树叶、树皮，后来掘鼠罗雀，最后几十里的农村炊烟断绝。遍地蓬蒿，村无树木，路无行人，人的生命微弱到了极点，勉强能够行动的人，个个腊黄脸色，脖子长，眼球突出，细脚伶仃，弱不禁风。老少走路不离拐棍，一步挪不了半尺。有的为了在少皮无叶的枯树下利用稀疏的阴影喘一下力气，两眼一合就昏昏睡去，再也不会醒来；有的一步踉跄，摔个跟头就离开了人间。草丛中、屋角里、井边、路旁，到处可见饿死的尸体。有的人饿死数月没人掩埋。有的自己再无产可以变卖，就把已逃荒在外的邻居家的房子也卖了。冠县烟庄的夏伍德，饿到极点，只求速死，拿起镰刀，想割断自己的喉咙，可割到一半，再也无力气割了，半死不活地躺在野外。天黑后，被饿红了眼睛的农民张延禄拖回来，剥了皮煮在锅里。象这类吃人肉的事，在无人区不断出现。据对桑阿镇一带32个村的调查，1942年前后，饿死人数达11000人之多。齐子修部对人民的残害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齐子修部还疯狂地屠杀抗日军民。1943年4月，齐部九旅齐润泽部窜犯冠北，又相继占领了兰沃、清水、刘屯、张庄等地，齐子修亲自率众攻破抗日堡垒村张柳邵村，杀死无辜男女群众108人，烧毁民房104间，牵走耕牛130头，村中财物被抢掠一空。离去时，又将51名群众带至据点，打死4人，

活埋 2 人，饿死 17 人。

齐子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军民同仇敌忾，展开了反齐反奸的斗争。1942年8月，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率部攻开小孙家据点，歼敌一个营。1942年秋，回民支队到达鲁西北以后，又在冠县的油坊一带，给齐部以重创，消灭其一个营。1943年2月，三分区部队在冠县野马庄、野庄等地予齐部以痛击，毙伤敌近300人；五月，三分区部队在桑桥发起围歼作战，一举歼灭其薄旅两个团。同时，四分区部队也在茌平、高唐予齐匪以重创。

正在这时，驻聊城的日军担心随着日军力量的减弱，齐子修会反叛日军，对其后方构成威胁。1943年5月31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聊城日军诱齐子修部团以上军官到聊城开会，将其全部扣押。尔后，乘汽车押着他们到各旅驻地缴械。这样，齐子修部便作鸟兽散，彻底瓦解了。

日本投降后，齐子修在济南又想召集旧部到鲁西北活动，被王耀武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齐子修在冠县的罪行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齐子修原是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1937年秋，二十九军向南溃退路过冠县时，齐子修中途逃窜，率60余名士兵，在冠县的李辛村一带，以抗日名誉，招兵买马，扩充实力。1937年冬，齐子修等被范筑先收编为第三支队（初为第六区保安司令部第三营）。他表面上表示愿意接受改编，而骨子里却妄图独树一帜，霸占一方，充当地方上的土皇帝。因此，他暗中与国民党反动分子王金祥勾结在一起，排挤共产党，压制和打击我党所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同年11月中旬日军围攻聊城，齐子修、王金祥等暗中破坏，导致聊城失陷，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姚第鸿、张郁光等700余名抗日将士壮烈牺牲。

聊城沦陷后，齐子修初与日军暗地勾结，后投降日军，在鲁西北到处烧杀、奸淫，血腥屠杀抗日军民。齐部在盘据冠县的五年中，制造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1939年秋末，齐子修一部侵入冠县东北部的韩路、张八寨、石家寨、王羨等村，并以此为大本营，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李辛村，葛辛村一带进攻，妄图消灭抗日力量。

1942年1月，齐子修调动七、八、九3个旅的兵力进犯冠县北部地区，有300多个村庄惨遭蹂躏。同年3月27日（农历二月三十日）齐子修令其七旅旅长薄光三率4000余人，侵占冠县桑阿镇一带，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致使这一带的

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片沃土变荒田。如距离桑阿镇6里的花园头村90户人家，就有12人被抓走毒打，6人活活饿死，80多户被迫逃亡外地。桑阿镇东边8里的阎工庄村30户人家全部逃亡，全村120间房屋被拆烧干净，抓走8名平民百姓，2人被杀害，2名妇女被奸污。同年，齐部侵占了田茉莉营、丁茉莉营，宁茉莉营后，便把3村抢劫一空，并安上了据点。3个茉莉营共有房屋1200多间，除被敌人占据的265间外，其余935间房屋全部被烧光。牲畜102头被抢走，三个村庄，943口人因粮食被抢走，致使212口人被饿死，248人被抓走失踪，其中死绝14户，下剩的472人逃亡了460人，3个村仅剩下12人。

1943年4月齐子修九旅旅长齐润泽率部侵占了兰沃、朱庄、清水、刘屯、西王庄、张庄等一带村庄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为了消灭抗日力量，于19日（农历三月十五日）齐润泽亲自指挥其部队围攻我抗日堡垒村张柳邵，该村自卫队在张洪儒带领下与敌激战竟夜，终因寡不敌众，张柳邵村被齐部攻占。进村后，大肆烧杀抢掠，108人被惨遭杀害，104间房屋被烧毁，130头耕牛被抢走，粮食财物洗劫一空，51名村民被抓走，4人被活活打死，2人被活埋，17人被活活饿死，制造了空前的张柳邵惨案。与此同时，冠县东北部大部分村庄也遭到了劫难。无数群众被打死，饿死，仅大柳邵、邢柳邵、郭柳邵3个村就饿死300余人。

在齐子修长期惨无人道的蹂躏下，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致使齐子修占据的32个村庄就有11000多人丧生，大批群众外逃，良田荒芜，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无人区”。

齐子修在冠县盘据的5年中给冠县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吴连杰覆灭记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吴连杰，字汉三，在中华民族危亡时机，他先后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是鲁西北地区有名的土匪、伪军头目。

一、出外当土匪。

吴连杰是冠县（原属堂邑）吴海子人，他排行老四，外号四家兔子。开始家贫（后为地主）无法维生。吴连杰14岁那年就到关外谋求生路。因在那里出大力，受不了累，他就回到关里跑到山东峰县找到土匪教练祖家吴希义，搞了一杆枪。不久，他携枪到费县投了匪首刘黑七（刘贵堂），当了匪兵。

刘黑七当了师长后，吴连杰也由营长升为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三十八师骑兵第一团的团长。后来张自忠收了马，把骑兵第一团改为步兵七百二十团。最后，又当了专门训练士兵的补兵团团长。

二、拉武装、当司令。

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军疯狂地大举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击而溃。二十九军退到河北省大名县时，吴连杰回家探望，带了一个团部，共有13个人，其中有警卫员、传达兵、马夫、伙夫等，日本大盖和汉阳造枪各一支，3把盒子枪，共5支枪。另有一匹马，一头驴，回到了柳林。到柳林后先后见了赵绍文、黄汝修两个地主豪绅。不久，吴

连杰又带着人马返回部队。走到东河被日军截回来。当时，赵绍文、黄汝修等人愿意让吴连杰留下来一起抗日。这样，他就没有再回二十九军。

吴连杰留下来以后，一些在地方上有权势的土豪，如西区的区长李伯庄，五区的区长黄汝修，六区的区长赵绍文等，认为有了靠山。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要求吴连杰拉队伍，他们的举动恰恰符合吴连杰升官发财的欲望。于是吴连杰就树大旗，招兵买马。许多土豪、地方民团武装，枪支弹药，都归了吴连杰。当时，每30亩地买一支枪。吴连杰提出，只要有支枪，就得出个人当兵，有枪没有人的拿钱雇人当兵。有枪有人不愿当兵的，也要拿钱雇人当兵。这样又给吴连杰充实了一部分人和枪。

吴连杰的兵源和武器的另一个来源是，二十九军的某团三营退却到黄河时，营长被曾给吴连杰跟过班的副营长董天佑杀掉。营长死后，董天佑就带着一个营部，两个连，约80人，长短枪60多支，轻机枪6挺，投靠了吴连杰，在辛集驻防。不久董天佑发展到1000多人，各种枪900多支，这时董成了团长。一天，吴连杰以商议军事为名，把董天佑叫到大界牌，将其枪毙在西门外大庙后边。从此，董的全部武装都归了吴连杰。这样，吴连杰的部队就达到了近5000人，各种枪支4800多支，内有迫击炮两门，转盘机枪10挺，轻机枪6挺，马60多匹。成了当时鲁西北一支比较庞大的日伪武装，自己也当了司令。吴的司令部，驻吴海子。司令部下辖4个团，8大处和4个直属连。一团辖3营，团部住张官寨。二团辖3个营，团部住阮庄。三团辖2个营，团部住邓庄。四团即特务团（无营编制），团部住班桥。8大处是：参谋处、政治处、军需处、传达处、副官处、军械处、军训处（即教导队）军法处。8大处住后哨营。4个直属连是：手枪连、特务连、迫击炮连、新兵连。

吴连杰从1937年10月拉起武装当上司令后，为了保存实力，

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时而为日军，时而又为“国军”，反复无常。因此，部队番号不断随之而变。1938年夏天，摇身一变，成了第一皇协民军，打起了膏药旗；1939年1月又成了“国军”，名曰，山东省保安第三旅，打起了青天白日旗；1941年2月又改为山东省保安第三十一旅。

三、草菅人命

吴连杰的势力范围，东起土闸，西至甘屯以西冠县老八区，南起堂邑，北至临清。在方圆近200华里的地方，盘据着几千名日伪军，他们全部由这一带人民养活。他们经常拉夫抓丁，打家劫舍，牵牛架户。要群众出大车，抬担架。他们要粮要钱，霸占民房，侮辱妇女，无恶不作。吴连杰还采取种种手段来压榨盘剥百姓，如：成立税局子，税收如牛毛，设立粮店，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印发钞票，搜刮民膏，名曰“生记银行”群众叫钞票为生气票。1943年灾荒时，吴连杰还按户养兵，一户一个。吴连杰的母亲死时成立了以8大处为主的治丧委员会，全军披麻戴孝，连级以上及亲信穿孝衣，其余戴黑纱，唱大戏6天，棺槨奇好，值千金。为给他母亲出殡，专门给群众按地亩派粮要款，弄得民不聊生，贫苦群众不得活命，卖儿卖女，背乡离井，下河南，闯关东，寻求生路。人民群众恨透了吴连杰。举个例子，吴匪一团有个特务连长赵冠基，作恶多端、天怒人怨。解放后，他赶八刘集时，被当地群众捆在树上，活活地用刀零刮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人民群众只有怨声载道，略有反抗，就会招来弥天大祸，遭到武装镇压。柳林镇乔庄，由于人民群众饥寒交迫，无力交拿粮款。吴连杰恼羞成怒，于1939年古历八月十二日黎明，派吴长清、郭志三、曹书杉、侯连仲带领一个手枪连和两个营，约600人，血洗了乔庄，枪杀了张玉德、杜金康、董吾尧等18名成年男人，打伤数10人。拉走大车60辆，牲畜80头，大枪80支，抢走粮食衣物无计其数。烧房5间，烧谷垛百余个，弄得全村浓

烟弥漫，血流成河，一片凄惨。最后又将60名青年男女（主要是青年妇女）绑架到后哨营。全村卖了2000多亩地才把抓去的人赎回来。

四、彻底覆灭

吴连杰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其内部也是众叛亲离，有的开小差回家，有的投日军和国民党，有的起义加入八路军，最后全军不过500人。吴连杰眼看自己的统治日落西山，摇摇欲坠。他为了东山再起，于是弃部窜逃，接着几个匪巢相继解放。

吴连杰伪顽部在我鲁西北抗日军民打击下，于1944年春被迫带着马光远、杜贵连等窜往济南投了吴化文，充任吴部独立第八师师长。1945年7月吴化文委任他为鲁西北剿匪司令，又带着马光远、杜贵连到了临清。原部下郭培恒、吴广顺、贾士超等已提前去临清投了日军第十一中队，当了伪军。10多天吴连杰就网罗了800人的残兵败将，组成3个团。一团长郭培恒、二团长贾士超，司令部住临清西南关老盐店。吴连杰匪部重新组合10多天后就被八路军包围。当时战斗一打响，一团打头阵跑了，三团被歼灭，二团和司令部20个人由吴连杰带领，在车辕后边小黑庄的回民坟上，全部当上俘虏。吴连杰被俘后，于1945年11月被人民政府枪决。

1944年古历9月4日，我军解放了吴海子，铲除了吴匪的老窝，当时吴连杰的三哥吴连祥任总指挥。此战役吴连祥，副营长蔡广智，连长李炳贵和百余名匪兵，被一网打尽，缴获枪90多支，内有转盘机枪3挺，轻机枪两挺，马5匹。至此，在鲁西北经营了7年的吴连杰彻底覆灭。

王来贤的罪行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一、卖国求荣

王来贤系河北省馆陶县北榆林村人，外号“八撇子”。其青年时期家中有六七十亩地，因其赌博而倾家荡产，当了土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二十九军南撤时，王截卡收容了一部分二十九军的掉队人员和小股流散部队，同时还收拢了一部分土匪和民团，从而扩张起家。当时共有3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约有4000多人枪。自称抗日义勇军司令。

1938年秋，该部被范筑先改编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并委王为司令。1938年11月，日军进攻聊城（当时为东昌府）时，范筑先调王及其部下防守聊城东门，王来贤不但不抵抗，反而临阵逃脱，给日军敞开了东门，致使范筑先专员和700多名英勇的指战员壮烈殉国。

1938年12月24日陈赓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张维翰带领十支队（即三八九旅）将王来贤的老巢东目寨团团包围。经3个小时的激战，将其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王带其部下30余人投靠了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1940年，王又带30余人，脱离石部，返回馆陶北部，后投靠了河北省馆陶县的日军和皇协军，当上了日伪警备队第二中队长。

1942年秋，吴作秀任冠县伪县长后，王来贤升为日伪警备队

大队副。

1943年秋，馆陶县伪县长张呈瑞被打死后，王又升为伪县长兼日伪警备队大队长。其警备队下属13个中队，一个卫队，共1400多人、枪。另外其所属8个区队还有800余人、枪，总计约有2200余人、枪。

1945年7月31日（古历六月二十三日）馆陶县解放时，王来贤及其部下2000多人逃亡临清，被改编为国民军特务第八旅，王任旅长。

二、血债累累

1940年冬，王来贤未投靠日伪前，其匪巢盘据在河北省邱县东目寨，活动于邱县东北部、临清西南部、馆陶西北部、威县东南部，4县交界处，方圆约百余里。1940年投靠馆陶日伪后，经常活动于馆陶一带，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其主要罪恶是：

1、王及其部下经常到处烧杀奸淫，抢掠民财，抓人架户，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无恶不做。如：1937年事变时，王来贤带其部下到临清杨安镇抢劫时，一次用铡刀就铡死了8人。当地群众都称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贪得无厌的豺狼、野兽。王投靠日伪当上伪县长之后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更加肆无忌惮地残害人民，破坏抗日。

2、经常率部配合日军围剿和袭击我抗日武装部队，清剿我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人员，血腥镇压抗日群众，利用枪决、刀砍、活埋、投河、狗咬、刀挑等残酷手段，明杀暗害我地下党员，抗日战士和革命群众无计其数。如：有一次伙同日军在卫河沿用刺刀挑死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8人。1945年6月29日（古历五月二十日）带其部在馆陶县魏僧寨枪杀我地下党员抗联主任王洪泉

等 5 人。类似事件不胜枚举。

3、为日军抓夫、抓差、抓苦工送往外地当劳工。1943 年一次为日本抓苦工 200 余名，送往日本做苦工。

三、死有余辜

1945 年 8 月 30 日（古历七月二十三日）解放临清时，王来贤又带其部下逃之禹城，被国民党改编为保安第二师第五团，王任团长。因其罪大恶极，告发者很多，后被免职。王被免职后，畏罪隐居在保安二师师长张子春处。济南解放前夕，张子春乘飞机逃亡时，将其带往南京。1951 年镇反时，王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枪毙于馆陶县南门外。王来贤这个历史的罪人终于受到了人民和历史对他的审判。

祸国殃民的伪军头目冯寿彭

赵广善整理

冯寿彭，外号“冯二皮”、“二皮脸”，清平县三区由集（今属临清县松林镇）人。惯匪起家，战前即与临清县四区白米庄的吉占鳌、夏津县的张栋臣（外号“张八”），高唐县的李彩题（外号“李九”、“胖娃娃”）结拜为把兄弟，经常打家劫舍，横行乡里。为此，受到四专署专员赵仁泉的通令辑拿。冯寿彭被迫带少数人逃往天津。不久，冯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委任冯为冀北边区保安第二旅第四团团长。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冯率该团800余人随二十九军南撤。9月冯部撤至临清。休整数日以后，冯除命其亲信朱绪武、张儒仁等留下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之外，其本人则率部继续向南渡黄河撤至河南滑县一带。不久，冯被委任为冀察战区独立第二旅旅长。

1938年初，冯率其部转至阳谷、寿张一带，旋即，又返回临清和清平。此间，冯将其所带领的800余人与朱绪成等在临清扩充的土杂武装1500余人混编为4个团，朱绪成、张儒仁、王再亮、赵世修分任一至四团团，冯自封为司令，肖健九为副司令。司令部驻清平县由集。后移至麻佛寺。时该部共约2000余人。

1938年5月中旬，驻临清城内日军在我八路军东进纵队英勇打击下，撤离临清县城，冯寿彭乘隙进驻城内，并纠合吴连杰、吉占鳌等结成“抗八联军”，将部队布防于卫河东岸，拒不让卫

河以西的八路军东进纵队渡河东进抗日。后经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韩多峰出面调停，“抗八联军”宣告解体。6月，冯率其部开赴东阿县。同年12月，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其为山东省第一行政区专员（驻长清县）。

1939年12月，冯寿彭奉令与驻临清的第四行政区专员袁聘之对调，起初因袁不就，冯遂于1940年初赴南京汪精卫政府告状。同年5月，冯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山东省剿共第一指挥部司令。自此，正式投降了伪军。1941年夏，冯寿彭从南京返回临清，驻临清城内河西街。

1941年5月，冯寿彭为了讨好日军，亲率1000余人赴临清县两部高尔庄、西马庄一带进行抢粮扫荡，并在高尔庄、丁庄、西马庄、海尔寨、丁庄建立了8个据点，妄图阻隔我冀南区 and 鲁西区的联系，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其中，冯寿彭亲率500人住海尔寨，另在高尔庄、丁庄分驻400人和200人。为了消灭这股敌人，为我八路军主力调动争取时间，临清县公安局长张维良率领县公安队和民兵，在刁庄、海尔寨之间与彭部周旋7昼夜。6月6日晚，冀南军区组织七旅十九团、八旅二十二团和四分区基干团等部队，由冀南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和八路军八旅副旅长王近山指挥，发起临西讨冯战役。临清县、区武装和临南县委组织的一部分武装参加了战斗。经过3天激战，毙伤冯部伪军400余名，击毙增援日军30余名，缴获各种枪230余支。惟冯寿彭带百余人逃窜。之后，冯赴长清县任剿共指挥部司令兼长清县县长。

1945年10月，冯部在长清县被我军消灭，冯外逃，至今下落不明。

清平县伪军头目沈凤舞

赵广普整理

沈凤舞，清平县二区双井（今属临清市康庄镇）人。“七·七”事变不久，参加清平县一区以王善堂为首的封建地主自卫团，任司号员。1938年初王部被收编为范筑先领导的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二十九支队，沈历任司号员、手枪班长。1938年夏，二十九军奉令调往平以东、齐河县以西的潘店一带作战，沈凤舞临阵脱逃，私自携带两支手枪返回清平县二区，参加了以由瑞甫为首的地主民团。1939年夏，山东省第四行政区警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袁聘之委任由瑞甫为某旅长，沈凤舞任该某连长。1942年，沈凤舞卖主求荣，将由瑞甫之兄打死，又将由瑞甫擒获押送至聊城县梁水镇，投降了山东省第六区警察专员齐子修，齐委任沈凤舞为特务第五旅旅长。时沈部仍驻防清平县双井、康庄一带，并企图将其势力范围扩充到二区西部，以取代由瑞甫。为此，与以孙景明、冯寿亭为首的二、三区顽地主武装结下怨恨。1943年初，齐子修公开投降日军，当年春日军将其押解济南，之后，齐部势力大减，加之间在长清县任山东省剿共司令兼伪县长的冯寿彭返回家乡清平县三区由集小住，二、三区地方武装趁势与沈凤舞抗衡，使沈部处境十分困难。沈遂再次易主，又投降了驻康庄的清平县伪军，名义上编沈部为一个营，实际上只有两个中队，合计不足200人。1943年夏，沈部奉令由双井调往孔寨驻防，后又奉令驻防侯寨子。同年10月，我八路军二十二团向侯寨子据点发动进攻，沈大部被

消灭，余部由沈凤舞带领逃至双井。1943年12月，沈部被编入伪清平县大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沈任中队长。1945年“八·一五”日军投降以后，短期出现日伪顽合流之势，山东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熊纪明委任沈凤舞为山东省保安第六旅旅长。沈趁势将其主力拉到康庄驻防，时沈部有600人。8月17日，冀鲁豫军区七分区永智支队发起解放康庄战斗，战斗中，沈大部被歼、溃散，沈率残部逃至双井。旋即，沈又带领十余人向东逃窜，投降了博平县五区顽军许冠五部。许深知沈狡诈多变，对其极不信任，遂命人将沈活埋，其随员被收编。

日伪团长郭进诚

尹增训 鞠立楷整理

郭进诚，字展卿，三十里铺乡郭庄人，自幼失去父母，由寡嫂养育成人，毕业于蚕业讲习所。在家务农，早涉难挨；后当间长，屡遭磨难，经商受挫，又打了几场官司；中年丧妻，撇下3个孩子。抗日战争前开酒店，亏损甚巨，面临倒闭，但当时规定停产歇业须照常纳税，故负债累累，随之破产。某年春节，一家人没吃上饺子，用泪水度过了年关。如此困境，郭进诚往何处去？眼前有光明与邪恶两条路，郭进诚背离了光明进步之途。

（一）

日军深入，国土沦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郭进诚萌发了挺而走险的邪念，暗自念叨：我何时能拉起一竿子人来？

1938年，日军已占领了高唐，大汉奸李采题当了高唐县伪县长。郭广交绿林弟兄，狐朋狗友，扩充实力。当时，已有一些人枪的三十里铺的张清佑当上了五区伪区长，郭进诚投靠张清佑，帮闲混饭，又拜打渔李庄李采昌为师，入了“黑帮”。从此，与张称兄道弟，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挤走了团长臧一干，郭即充任其职，又经张妻撮合，续娶了妻室。张清佑当时独揽大权，郭进诚名为团长，实为屈膝在张卵翼下的奴才，就连马伕也看不起他，好马不让他团长骑，郭忍气吞声，无可奈何，为了讨好张清

佑，得到张的信任，郭进诚想方设法投机钻营，预谋向小股土匪李维道开刀。李维道，开始活动在赵寨子、侯张屯一带，后投靠李九（李采题）为虎作伥，居城里鬼混。李维道为了一个女演员与张清佑的儿子“争风”，声言要杀害张的儿子。郭进诚乘机进谗言挑唆李九与李维道的关系，伙同张清佑将李维道杀害，没收了李氏随从的枪。接着，郭进诚又助纣为虐，与张清佑协力向联庄首领宋长力开刀，宋当初追随范筑先将军任抗日区长时，张清佑一小撮匪徒在原清平境内受挫，东躲西藏无立锥之地。日军占领高唐后，宋部解体，被李九招降，后典家为民。张清佑为报前仇，派郭进诚逮捕了宋长立和其助手张凤仪，交给李九要其一死。这时大玄门（会道门）首领韩家鳌和黄沙会会长曹大傻子到城里为宋说情，回家途中被郭进诚拦截在庄庄桥杀害。于是，李九就找借口把宋长立、张凤仪交给日军处死。张凤仪是被日军狼狗活活咬死的，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这样，李九、张清佑、郭进诚即报了前仇享了钱，加深了交情，又在日军面前“立了功”，表了“忠心”。

其间，张清佑与其妻弟一一四区伪区长郭隆元、三区区长刘文学结成联合体，权倾半个县，甚为李九所忌。李九为拆散张的联合体，强化其统治，与郭进诚密谋，通过夏津伪县长王康侯火并张清佑。郭进诚对张的地盘和军财大权早已垂涎三尺，故与李九的灭张计划不谋而合。当时，李九与王康侯是一丘之貉，于1941年初春的一天，在张清佑去夏津时，将张清佑逮捕押送高唐，郭进诚则连夜带领亲信到张部驻防处叫开寨门收了枪。一夜之间，干净利索地完成了武力统一。

郭进诚火并张清佑之后，本想独霸五区，但李九也要伸手分赃，派遣他的妻侄李书文当区长辖3个乡，郭享6个乡，于是，调整人马，排除异己，任用亲信，招兵买马，拉拢流匪郭子正入伙，当了团副，先稳住后暗算，郭子正见机溜走，幸免一死。从

此，郭进诚的日伪武装日趋发展壮大，最后竟达1500余人，郭自恃无恐，开始了他新的罪恶生涯。

(二)

郭进诚的势力壮大，无疑是大汉奸伪县长李九的提携豢养所致，但更大的靠山还是日本人。郭进诚为了表示亲日，便亦步亦趋地竭力奉迎，以求得日本人的赏识。当时有个东北籍的日本翻译，郭竟同他拜了把子，还为他操办了婚事，为强化其统治，他倾其全力修据点筑巢穴，强拉民工在郭庄修了一座像堤坝一样厚的围墙，挖双层寨壕，设扭头门，建5座炮楼，还安设了电网，修了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以便与城内日伪军相互接应。

郭当了团长后还对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敲诈勒索，横征暴敛，置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直逼得很多人背井离乡，要饭逃生，或下关东，或自谋生路。小周集村周美湖和周美成就是因为没给郭进诚棉花被迫纳了花销后自杀的。北王庄的一个农民攥着糠窝窝给郭团修围子，竟被监工的伪军头目活活打死在工地上。

当人民饥寒交迫，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时候，郭匪却极度挥霍，大兴土木，修房筑楼，安置电灯、电话，真是富丽堂皇不可一世。郭玩弄手段重资聘请了京剧名演员李和曾，河北梆子名演员李桂云母女，还有评剧名演员曹金顺等参加了他的戏班，长期为他演戏，遇订婚、祝寿、立碑、挂匾、逢年过节、宴请宾朋等，必是点剧目，热闹纷繁，真是看不完的戏，吃不完的酒席。郭乘人之危，置地数顷，横跨马颊河两岸，成了五区头号大地主。郭整天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玩弄妇女，草菅人命。为此，他家中出现了为争风吃醋而杀人的丑闻。一天，郭团部一辆轿车送出一个被郭钟爱的女子，被郭的大儿子枪杀于路，并直言不讳地说他继母让他干的。同郭相好的女演员在澡塘子里洗澡时被郭

太太打了一顿鞭子，后向郭哭诉，郭厚颜无耻地说：“一鞭子一千元”。后来，李九抽大烟的黄脸老婆死了，郭进诚竟花了3000元重金买了一个19岁的农家姑娘奉献给李九玩耍。郭进诚这样，太太也不示弱，她私下找了英俊的亲兵侯志旺作为姘夫，二人鬼混无度，被郭发觉后便将侯志旺拉出去活埋了。郭太太为失情夫哭了好几天。队长、亲兵对太太争相巴结，极力奉承，谄媚取宠，有的竟购买专治梅毒（一种性病）的德国六六六药针相馈赠，更加助长了住乱。

（三）

郭进诚当了团长后凶相毕露，杀人如斩麻，报私仇、泄私愤，随心所欲。宜丰镇张×因与郭打官司，被抓到郭庄勒死。韩家鳌因保释民团团团长宋长立也被郭杀死，与韩有牵连的人为之震惊，怕受株连，在郭进诚的淫威下忍痛献出亲生女儿满足郭的兽性，换得赦免一死。当初曾看不起他的郭保林被罚了多回款才算了事。曲庄阙金生给张清佑喂马时因对郭侍奉不周，郭耿耿于怀，借口曲庄有盗案，把阙金生绑赴西门外处死。董集李长申因过去给张清佑干过事，郭进诚也不放过，遂派人把李活活勒死。郭庄郭本正当初是个大家族，自恃有人有钱，不惧郭进诚，和郭打过官司，郭怀恨在心，当上团长后，先打死了郭本正，老二郭本岑吓得搬到谢里长屯陈脾去住，后被郭匪哄骗回家，郭本岭为了活命，违心地把女儿嫁给郭进诚部的焦翻译。但郭进诚兽性不改，为了斩草除根，又拘捕了郭本岭全家。除老三的两个孩子和一个妇女逃出虎口外，一个夜晚，郭本岭的全家老弱妇孺17口被押到了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一起遭杀害。第二天消息传开，全村人大为震惊，敢怒不敢言，很多人难过地连饭都没有吃。

郭进诚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在用人土左右都安插了自

己的心腹。一队是他的亲信外号叫“董二天爷”的董洪祥，另一队是他的内弟郝五（郝兴奎），其余三队也都是姓郭的。郭进诚盘据郭庄老巢，郝五驻蒋家铺为外援，四队郭来春驻董集为犄角，他极力支持代官屯土匪团长葛东来夺取原清平县的地盘，使清平辛集三乡的刘序荣团也成为郭的附庸。郭所辖6个乡的老百姓困苦难熬，当兵的日子也不好过。前屯一个姓柳的小兵逃跑回家被抓获，诬以拐枪罪名在村外用刀子活剥，杀一儆百，威吓士兵，为其卖命。后来队长们都私下买枪支作为体己，引起郭进诚的疑虑。郭怕他们仿效自己当初的犯上做法，就以外地人燕分队长为替罪羊，说他私买枪械，图谋不轨，在一个夜晚拉出枪毙了，于是各队队长吓得把私人枪支全部交给团长了。

1943年春，我县抗日志士刘化溥率部在堂邑与日军作战壮烈牺牲。他的夫人带余部东归，郭进诚假意招待，收了他们的枪，其中一机枪手不愿把武器交给日伪汉奸郭进诚，将一挺日本机枪扔在井里。郭进诚知情后，就立即派人把该机枪射手活埋了。这个抗日战士没有屈服在日军的屠刀下，却死在了汉奸郭进诚的手里。

城东陈景光通过他哥哥与郭进诚是同学的关系，加入了郭的手枪队，老婆孩子均来郭庄，因有不明身份的人来找陈看戏，被郭进诚怀疑是共产党找陈联系，就不明不白地将来人和陈景光一家四口拉到村北活埋了。

（四）

郭进诚的出身是贫苦的知识分子，中共党组织曾有发展他加入共产党参加抗日的想法，派地下县委敌工干事李华卿同志打入内部进行争取工作。李华卿与郭进诚是表兄弟，同学关系，与四队长郭来春也是同学。李华卿同志到郭团后坦诚相见，推心置腹

说服教育工作。

1942年秋，郭来春带领有12匹马24支枪的小队（内有通讯兵一人）去夏津李官屯一带抓逃兵，误入我八路军“夏津独立团”驻地，被俘缴械。李华卿为了进一步做好对郭进诚的争取工作，团结他一道抗日，给独立团写信要回全部人马枪支。郭进诚、郭来春对此感恩不尽，一再表态说：“八路军解放高唐时我全部缴枪，一个螺丝也不留”。谁知郭进诚口是心非，对李华卿更加戒心，认为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遂起恶意杀害李华卿同志。为时不久，即1943年古历6月25日，郭进诚在辛集刘序荣部秘密逮捕了曾经为争取郭进诚反正与郭联系过的我冀南二地委政工科长焦克东同志（即马子英），李华卿为了营救焦科长只身虎穴，郭进诚抓住机会把李带到张兴华军需处，对李进行吊打审讯，逼问我党组织情况，李横眉冷对，大骂张兴华是汉奸走狗……。晚饭后，郭进诚派郭来春将李华卿同志押至村南枪杀，投尸马颊河。当时群众气愤地说：“李华卿好心没好报，‘郭二黑子’真不是人！”李牺牲后，焦克东同志被匪带到县城交给李九，由城关区伪区长梁树梓将其杀害在金寨东一座废窑中。

汉奸郭进诚的反革命闹剧愈演愈烈，罪上加罪。在大汉奸李九及当时以郭来春、赵多三、胡桐等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唆使下，郭进诚反共反人民的凶相进一步暴露。继1942年12月参与杀害我地下党员张春岭之后，又于1944年8月将共产党员李兴贵（高唐县李奇庄人）杀害。李在运西工作回家探亲，被手枪队告密，郭进诚便派兵包围了李奇庄，当时李兴贵正在学校和人们谈话，被敌人发觉，敌遂进前喝问谁是李兴贵，兴贵同志凛然正气，挺身而出，毫无惧色，与敌搭话不多就被匪徒们拉到门外枪杀了。

（五）

日军投降，郭进诚看到末日来临，急令郭来春用汽车运票子

和金银财宝到济南置买产业，为自己准备后路，可是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横扫鲁西北，兵临城下了。郭团驻邱庄李书文部和驻蒋家铺郝五部闻风投降。郝五立功赎罪，还到郭庄为我游说，劝郭进诚反正，遭拒绝。于是郭进诚凭险固守西部郭庄据点，我军攻了几次都不得手。这时，郭团驻高唐县城东部的一支部队在回守郭庄老巢的路上被我军截击，队长是郭的亲戚，料知厄运难逃，战斗中自杀，余部全被消灭。

围歼郭团的战斗打响了，指挥官王宏坤司令员住了一天就调往西线，赵健民同志也相继调走。围攻郭匪的主力部队是二十四团，人马不足千人，其余是一部分县大队、区中队，战士大多是大名、濮阳一带人，攻坚失利，坚持围困，用门板木料构筑工事，用条围和棉花包垒射击台，遇秋雨连绵，郭庄北面一片汪洋，，双层寨壕，壕宽水深，挖土掏洞也极困难，我军虽有几次强攻但未攻克，伤亡也大。当我军展开政治攻势时，郭进诚假意和谈，暗设机枪，杀害了我军和谈干部。其间，济南蒋军还派一架飞机，空投弹药、物资给郭进诚，助威打气。但敌人再顽固不化也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我军自1945年古历7月15日起困敌成瓮中之鳖，直至10月下旬，敌人已被逼得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山穷水尽，无力坚守，28日夜，乘我军一时不备，率部突围，跑到夹滩与国民党杂团会合。其间伪军大部逃散，手枪班和一部分士兵投了杂团杨敬斋，少数人退至齐河。郭进诚换装逃往济南，后张兴华又回到齐河，把郭部剩下的一百几十人骗走，押到济南东深山沟内，编入九十六军。

(六)

郭进诚投靠日伪县长李九，甘当汉奸，臭名昭著，血债累累，本应束手就擒，低头认罪，但他逃到济南后贼心不改，仍梦

想死灰复燃。他摇身一变又混入国民党部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装璜门面，于1945年底又责令张兴华、李克洪回高唐要回已投靠杨敬斋部的原手枪班人马及士兵80人，去济南参加了国民党部队。不但如此，他还厚颜无耻地谎称抗战3个月，毙敌数百名，功在党国云云，受到了国民党军李延年司令长官的褒奖，也受到了逃往济南去的所谓高唐同乡会的热烈欢迎。郭进诚逢场作戏，大摆宴席，以丰盛的西餐答谢各界人士。自此，郭进诚在济南不仅有了立锥之地，还投机钻营去北京一趟，回济南后成了什么剿匪司令，更俨然以反共英雄、剿匪司令而自得，时日不久，郭进诚的身份暴露，遭到原高唐杂团头子们的控告，抗战名人刘化溥夫人的控诉，更击中了郭的要害之处。加之郭进诚与郭来春因分赃不均又打起了官司。郭来春系老国民党员，与济南国民党旧部早有瓜葛，打起官司。自有国民党靠山，郭进诚输了官司。此时此刻郭进诚这个恶贯满盈的日伪汉奸在国民党那里已成为一堆失势的狗屎，被押在济南一监狱，解放济南前夕他出狱，解放济南的战役打响后，他假冒吴化文部军官出现在闹市，从南卡子逃跑时被国民党部队当场击毙。当了7年（1939——1945）汉奸，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日伪团长郭进诚，就此了却了他罪恶的一生。

罪恶昭昭血债累累

伪第四区区长郭隆元的罪恶史

邵金铭 张金洪 整理

1937年日军侵入高唐之后，伪县长李采题逐步在全县建立伪政权及其反动军事统治，当时在全县8个区分别设立伪区部和伪团部。抗日战争的8年中，盘踞在城南第四区的就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伪区长郭隆元。

郭隆元（又名荣元）自1938年6月任伪区长以后，他收编了该区8个乡的地主武装——乡卫队，组织了直属于区公所的反动武装46人，后来通过向农民摊派花销、购置枪支、抓丁买兵不断扩大，至1940年发展到160人；1941年开始设立“造枪局”，制造步枪和轻机枪，并组成“娃娃队”80人，之后共有反动武装250余人。

郭隆元统治四区以后，8年中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残杀无辜，霸占妇女；为非作歹无恶不为，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封建地主阶级的纨绔子弟

郭隆元于1904年生于高唐县姜店乡郭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他祖父是清末的武举，他父亲郭岩峰乡里人们称之为“大少爷”，他叔父郭海峰称之为“二少爷”。虽然由他祖父创兴了很大的家业，但由于他父叔两个“少爷”的无度挥霍，到郭隆元出生的年代，家境早已败落下来。郭隆元共兄弟3人，即郭隆元和

他弟弟郭春元、郭庆元。当这个封建地主家庭的长男出生后，就给他起了乳名“荣富”，大约是希望他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罢！无奈这个“小少爷”生不成器，不爱读书不学农艺，最后只混了个高小文凭。回乡以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在1926年他22岁的时候，郭岩峰把他送到城里“长茂”杂货铺学徒。在学徒期间，经常和城里的地主恶少爷们鬼混，同时认识了土匪李采题。后来并拜李九为师，加入了青帮。

1933年高唐匪首李长兴被韩复榘诱往济南枪毙，李采题外逃，这时郭隆元也离城回乡，在家乡开设了一个小杂货店。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的时候，为镇压群众和所谓“防匪防盗”，各区都组织了地主武装——“联庄会”，郭隆元这时也买了长短枪各一支。此后，他就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实际上是“半匪半民”。1934年夏季的一天，他在自己家里“玩枪”“走火”，把他弟弟郭春元打死。

就是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纨绔子弟，在日军侵华的8年中，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讹诈财产 霸占妇女

自从1938年郭隆元当伪区长以后，除了横征暴敛修筑围墙、买枪抓丁扩大武装以外，还通过讹诈强占等手段，经营他的“家业”。郭庄的村东是一片良田，而且离村近耕耘方便。这里该村的郭连生有地7亩，郭化堂有地5亩，都和郭隆元是地邻。1939年冬季的一天，郭隆元把这2人叫到他家说：“小朱寨村东尹集郝家卖地，你俩都买点吧！”郭连生2人都说：“买不起地。”郭隆元这时说：“你俩把村东的地让给我。”该2人强调“不敢变卖祖业。”从此，他怀恨在心。第二年春季郭隆元硬说该两户的牲口啃了他的青苗，一定要重重罚款。结果该两户只好以地抵

款，写了卖契，12亩土地被他白白霸占。

郭庄当时是个比较富裕的大村，宅基很贵。十字街附近，是全村最好的地方。1943年春郭隆元扩建区公所，选中了十字街南路东的一片宅基，共包括郭次辛、郭友章、郭化堂等8户宅基13亩，房屋67间。于是下令限期拆房搬迁，逼得这8户家园破碎，流离失所，后来全部搬到村南。

郭隆元这个民族的败类，霸占强奸妇女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1939年夏季，该村的王先志去小朱寨赶集，郭隆元派人在集上将他打死，后又将其弟王先明打死，随之而霸占了他的妻子。数年之后其女儿长大，也被郭隆元霸占，直至解放也不敢结婚。南五里铺王长寅的妻子系郭庄郭××的女儿，被郭隆元霸占8年之久，1944年逃往张大屯以后，因无法再带其外逃，就将这个女人连同其弟一起勒死。

郭庄村的张怀武因其妹被郭隆元霸占而活活气死。除此之外，在本村就强奸妇女达十几人之多。这些受害者及其家属都敢怒不敢言，否则，就将招至杀身或灭族之祸。

横征暴敛 穷奢极欲

郭隆元自从当区长开始，为了扩充势力和供其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民财。摊派花销名目繁多，除农业税以外，诸如修建费、给养费、子弹费、壮丁税以及经常的所谓“月份钱”等等。不管农民收与不收，也是照样摊派，稍有迟误即抓人或罚款。使得农民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1943年秋，农民刚度过大灾荒，四区就强迫群众每亩地缴籽棉30斤，因交纳不起而被迫外逃的农民不计其数。

尽管人民生活艰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郭隆元却穷奢极欲，大肆修建、置买田地。从1938年开始，第一件事就是修筑围

墙。每年春耕大忙季节，不顾农民的耕耘，集中大批劳力为他修寨，20人有一伪兵看管，稍有怠慢，就遭到棍棒痛打。这样年年加固，年年维修。只这一件事使群众遭到极大的痛苦和损失。特别是1944年的冬季，大概他感到形势不妙，在滴水成冰的严冬，下令周围村集中民工加固围墙。天寒地冻，无法和泥，先是让民工烧开水和泥，无奈热水入土立即成冰。后来又命令民工熬盐水和泥，只这一项工程500多民工干了20多天才完工。

第二件是修建兵营和他的私人住宅。8年中重修了他的住宅共瓦房40多间；新建住宅两处共瓦房55间；兵营和马厩80间。为了他家的“风水”好，在他旧宅的路南赶走群众，在别人的宅基上人工挖掘“月牙湾”，并修上“望月亭”，湾畔还修了花园，供他玩赏。在村东占地15亩，修了他家的祖坟地，全部栽上柏树；并在村边的路口上，给他父亲立了碑建了碑亭。每逢他父母的所谓“寿辰”，唱大戏两次。同时通过霸占和强买等手段，直至解放时他家的土地拥有480多亩。

郭隆元搜刮民财，穷奢极欲，荒淫无耻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人民群众无不恨之入骨。

欺压良民 残杀无辜

郭隆元卖国投敌充当汉奸以后，欺压百姓的事是数不胜数的，最可恨的是无故残杀无辜。

1939年为霸占妇女先后枪杀了本村的王先志和王先明兄弟2人；1941年本村农民张怀国，因有人报告郭隆元说他偷东西，但谁也说不清是真是假，就被拉到村南枪毙了；1942年秋，本村的贫民王玉宪，也是被人告发偷庄稼，被郭隆元抓去游街示众以后而枪杀。实际上这是借此而镇压人民，这样两个无辜百姓惨遭杀害。

1937年冬，柳庄的土匪王芳兰和他的儿子，被坟台民团的赵克方等人打死。王芳兰是李采题的同伙，他儿子是郭隆元家族的妹夫。因此，郭隆元总伺机报复。但赵克方逃跑在外，于是在1944年的夏季，将坟台的赵玉来捉住，在小董庄后勒死。1943年刘郭庄的刘建柱在郭隆元处当兵，不知为什么关了“禁闭”，后因逃跑被抓回勒死。三杨庄的杨英华被郭隆元抓去当“娃娃”队员，后来逃跑了，1944年6月将他父亲捉住活埋了。潘庄潘斯禄1945年8月去南镇赶集，被郭隆元抓住，以“通八路”之名，用刀刺死。

1941年冬季，刘化溥这支抗日队伍发展的时候，郭隆元部的小队长张兆坤率7名士兵携枪逃跑，投奔刘化溥部参加了抗日。1942年刘化溥的部队被日军打散。跟随张兆坤逃跑的郭维喜和郭善成2人逃回高唐，藏在亲戚家，不久先后被郭隆元捕获，是年7月将郭维喜勒死，把郭善成押到辛店，绑在柳树上用刀“大卸18块”凌迟而死，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

穷凶极恶 垂死挣扎

1945年农历八月初，由我冀南军区十九团和夏津独立团开始围困郭庄伪据点。8月2日夜，十九团秘密包围了郭庄，严密封锁消息。计划在3日天明之后，趁敌开寨门之际，发起突然袭击，一举攻入据点。不料在3日凌晨，据点内派出7人的侦察小组，出村侦察情况。我军埋伏在村外的突击队被发现，一场激烈枪战之后，敌人逃回村里，紧闭寨门，我军突袭计划未能实现。

郭庄的伪据点，经过郭隆元的苦心经营，是十分坚固的，除了高两丈的围墙，四角有高大的炮楼和暗堡；有两道两丈宽深的围壕，并修有围壕墙，自从3日偷袭未成之后，郭隆元把全部兵力拉上寨墙，并抓了全村青壮年300多名强守寨，“一兵督一民”，组成33个小组，吃住在寨墙上，日夜防守，光手榴弹就抬上寨墙

500多箱。四角炮楼上配有16挺机枪，要冲防段架有“滚木”，防守相当严密。

我军经过几天战前准备以后，于农历八月初八日夜，采取坑道爆破作业和架云梯强攻的战术，对郭庄发起总攻。但是由于二道壕内有水，坑道作业受阻，炸药只安装在二道壕的墙底。晚9时左右，村西北佯攻开始，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去，这时东门南侧一声巨响，二道壕墙被炸开缺口，突袭队架云梯成功。然而就在关键时刻，云梯被墙上推下的“滚木”砸断，这时墙上的手榴弹如暴雨似的倾泻下来，突袭受阻，尔后又两次在机枪掩护下架云梯未成。

当夜我军遭受一定损失，未能攻克。

我军主力为了服从整个战局需要，奉命西进切断京汉路攻克邯郸，而于两天后撤出战斗。我军主力撤走以后，郭隆元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首先指向曾驻过我军的刘郭庄，农历八月十三日派兵洗劫了该村。因为群众全部撤离，财物被抢劫一空，临走时把全村150多户村民的锅全部砸毁，因为这些锅都给八路军做过饭。8月11日许楼的群众不知部队撤走，派许希良到小董庄送军粮，被郭隆元的兵逮住用刺刀扎死。

我党地下党员马××，系临清松林人，曾在部队当过连长，1943年被派到郭庄作地下工作，以摆小杂货摊为掩护，住在小董庄王兰岭家中，每天在郭庄村东摆摊。1946年8月底，因部队一名通讯员被捕，搜出给他的信，郭隆元立即将他逮捕，进行了严刑拷问，手心和脚心均砸上大铁钉，连续审讯拷打两天一夜，马同志始终未吐一字。后来这位不知名的通讯员被枪杀，马同志被押到徐官屯英勇就义。

还乡杀人 血案如山

1945年农历十二月，我军新编第四旅和部分地方部队，在冀

南军区副政委王贵德的率领下，进军高唐。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郭隆元把他的部队交给了庞长申，仅带30多名卫队于12月5日弃巢潜逃到河东张大屯，依附于杂团吴春阳，12月6日我军解放郭庄，全部俘获残余匪徒50多人。不久，庞长申的各个据点也先后被攻克，整个四区全部解放。

四区解放以后，高唐县的形势仍是极严峻的。由于解放战争的需要，我主力部队转移后，逃往徒骇河东的敌人，伺机反扑，加上原有的杨敬斋、云茂才、陈胜堂、吴春阳等部的顽匪，兵力尚有四五千，并不断派小股武装进行偷袭和暗杀。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党派杨炳辉同志任四区区长，建立农村政权，组织民兵自卫队，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底，杨炳辉同志带领通讯员何子成和两名战士进驻四区郭庄。受尽郭隆元欺压的广大群众，对工作组的到来无不欢欣鼓舞。然而极少数坏人却仍不死心，总想伺机报复。就在杨炳辉同志进驻郭庄不久，郭隆元的族侄郭善起，以看望其父为名窜到张大屯，把我方情况及群众的活动，都报告了郭隆元。这样一场重大血案就此而发生了。

1946年农历正月初十晚，郭隆元派郭化山率匪徒40多人血洗了郭庄。这天杨炳辉同志刚从城里开会回村，回到他的住地郭化岭的三间北屋里，因为形势紧张，决定4个人分成两个组，他带通讯员何子成临时秘密转移，两名战士留守原地。晚饭后杨炳辉同志要借故离开，但被郭化岭死死留住，又烧水又沏茶，说：“时间还早哩，玩玩再走！”约在10点左右，郭化岭借口上厕所，溜出去不回来了。就在此同时，听到房上有人走动，村东头响起枪声，杨炳辉同志率3人立即突围。不幸，杨区长刚跳出窗户，就被房上的敌人打死，其余3位同志跳窗逃走，幸免遇难。这天夜里郭隆元还打死了曾给工作组多次办事的郭明元和对工作组接近的群众窦九袍、窦九德夫妻2人，以及过去曾对他不满的群众张克中、郭顺元的妻子等6人。牵走群众的牛3头，骡子两匹，抢

走群众大批财物，制造了震惊全县的“郭庄惨案。”

人民的法网是难逃的，血债必须用血偿还。血债累累的郭隆元，终于在1951年12月在青岛逮捕归案，于1952年6月13日被处决。

附件

伪区长郭荣元自供状

1938年底当了伪区长，1939年5月间成立伪区部。自此每年向群众摊敛枪弹费。

1940年，我让各乡成立伪自卫队，每一大乡成立一大队，每队20人，都得有枪。8月底，八区伪教练郭化远在大朱寨枪杀了王先志、王先明2人。

1941年在伪区部当兵的张兆坤、郭善成等20多人拐枪跑了。一个月后，伪七区区长刘保善在他区里捕住了郭善成。我把他带到辛店，同伪区团长把郭善成杀了。

1941年1月15日，在坟台村以抓“赌博”的名义抓了十多个老百姓，带到伪区部。把他们打了一顿，让他们家人拿钱赎，每人多少不等。拿上钱才放了人。

给各村要民伕来郭庄修房子。也不管他们有吃没吃，一春天修了30多间。秋后又修了寨墙、寨壕。

1942年春间，区部新添了40个伪兵，成立了第一大队。秋间又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年龄都在14岁以上，半年后就招到了70多人。

伪县长李九要田赋，我把四区所欠交的全数催齐。冬间，又要牛皮、羊毛、铜、铁等，我都是按数给老百姓要。

夏天枪杀了孙洪山，他是个当兵的。还把村里（孙庄）罚了两支大枪。

向老百姓要粮食，每亩谷子1斤，另给李九要2斤。

过麦后，向老百姓要麦子，每亩1斤，另给李九要1斤半。

5月底，帮着杨庄的贾兰元把他庄的林自立的房子烧了一座，烧死了林自立的妻女，冬间，又把该村一个姓杨的（叫马）活埋了。

秋间，李九要棉花，定价每斤伪币600元，而市价每斤800至900元，每斤棉花老百姓就得赔300来元。四区一共要到23万多斤，有的没种棉花就拆卖房子。这些都是我办的。

夏天，把杨英华的父亲抓到伪区部杀死了。

冬间，在城里南街抓到了坟台的赵玉宽三弟，带到伪区部枪杀了。

1945年1月10日，在城西关外，把郭芹章的哥哥抓住枪杀了。

过了麦，又给老百姓要麦子，每亩李九要1斤半，我要1斤。

7月底鬼子投降。11月底郭庄即被攻破。我带人跑往在平张大屯吴春阳那里去了。

1946年正月初十，吴春阳帮我20多个人回郭庄要东西。到了郭庄枪杀了窦九德、窦刘氏、窦九苞、郭明元、郭赵氏、张克中。同时还杀害了八路军的杨区长，并抢走步枪1支，又在村内牵了两头骡子、3头牛。吴春阳的人牵走骡子1头、牛1头、抢走捷克大枪1支。卖了骡子1头、牛两头，共得伪钞90余万元。给吴春阳的人30万元，给我的人分了20余万元，其余的我用了。另外，在路上看见吴的人有拿被子的，不知是拿了谁家的。3月底，吴春阳说我有嫌疑，把我的人都收了枪，人全遣散。还杀死了郭化山。我就跑到济南躲了四五个月，后又跑到青岛干摊贩、卖点心坑害人民。

1938年至1945年间，共强奸妇女14人，杀害革命同志两名，杀害群众22名。1945年跑的时候，我埋在东房后榆树根南四块银元，现洋约800元。交给郭凤元两支匣枪，200粒子弹，让他藏在

东院后。东房内还埋藏大枪20多支，被吴春阳拿去。1946年在张大屯跑的时候，交给贾兰元1支匣枪，叫他存放起来。

郭荣元坦白
1953年8月4日

（摘自高唐县人民法院郭荣元刑案材料）

阳谷伪县长董政华的罪行

崔衍峰整理

董政华，又名董其钧，男，1911年出生，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寿光县大东关人。

自幼8岁上学，小学3年，11岁入县立高小，2年毕业，14岁考入初中，2年后肄业。16岁考入青岛礼贤高中，一年后肄业，后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3年毕业。1932年在青城县伪法院任书记员。1933年9月任山东省蒲台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长；1935年任青岛地方法院书记官，1936年升任候补推事，1937年调任济南伪地方法院书记官长；1939年在日伪山东行政人员训练班县长班受训半年，1939年11月任阳谷县伪县长、警备大队长。1943年2月调任烟台市长兼公安队长，新民会长、剿共委员会主任。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日伪东临道尹。

在阳谷任职期间，董政华效忠日军，背叛祖国，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罪行十恶不赦。他上任后，在县、区、乡逐级建立了伪组织，组建了县警备大队，改编了区自卫团，并修碉堡、建炮楼、架设电线，横征暴敛，逼得百姓流离失所。在北至朱老庄，南至郭店屯，东至七级，西至沙镇范围内，强迫群众挖了2条长数10里、宽2丈余的封锁沟。在县城修城墙，挖战壕，并加高拓宽聊阳路、莘阳路、寿阳路、朝阳路、阿阳路、安阳路等。毁坏了很多庄稼，便利了日、伪军的军事行动。为进行反共、剿共教育和奴化教育，成立了乡村自治人员训练所、军事训练班、教员

训练班等。他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距城15里内划为治安区，15里以外，30里以内划为半治安区，30里以外至县境划为非治安区，进行血腥统治。他多次亲率汉奸，配合日军下乡扫荡，进行“铁壁合围”，纵匪残酷捕杀我方工作人员。据查证：

1、1940年间，董政华率匪下乡扫荡时，纵匪捕获了我方工作人员张学香、刘书林等7人，后遭杀害。

2、1940年至1942年间，率匪先后袭击我军多次，打死我军苏兴合、高景录、雷林德、李风山等37人；打伤我抗日大队苏政委等15人，造成我军重大损失。

3、1940年间，在阳谷城苦奶奶庙处，与日军宪兵队，警察所共谋残杀我军政人员及无辜群众400余人，并亲自指使特务系长王文山，由狱内提出我方被捕人员5名，在苦奶奶庙处残杀。

4、1942年6月，指使匪徒将我被捕的情报员高风荣、侦察员党贵林、刘大秃，群众段继刚、段继秋等7人，由狱内提出亲自点名带至东门外枪杀（高被击中眼部，未亡）。

在任烟台市长期间，扩充武力，实施治安强化运动，配合日军“池田”部扫荡，残杀群众200余名。1944年，亲派市新民会雇员阎书田打入我革命队伍内部，刺探情报，幸被我胶东军区及时发现，予以镇压。在市府内设宣传室，大肆宣传“中日亲善”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

在任东临道尹时，扩编伪保安团2个，组训各县政人员，带领各科长赴各县视察宣传。馆陶被我军围困，亲命保安团配合日军增援，1945年秋武城汉奸撤退时，被我军截击，令保安团接走；阳谷解放时，亲率部驰援，至半途返回。

日伪时期，董政华确系血债累累，罪恶极大。鉴于其罪行，寿张县人民政府于1960年8月将其依法镇压。

附件；

寿张县人民法院判处董政华死刑

日特杀人犯董政华，历任伪军书记长、科长、敌县长（兼警备队大队长）、市长、道尹、剿共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董犯于1940年充当敌阳谷县长时，纵匪杀害我方工作人员张学香等7人，并亲率匪徒袭击我军，使我伤亡50余人。更严重的是，同年与日寇共谋，派王文山先后32次率匪在阳谷城内苦奶奶庙，惨杀我军政人员及无辜群众465人。1942年6月3日晚，王文山奉董犯之命，率匪将我侦察员党贵林、刘大秃、情报员高凤栾、群众段继刚、段继秋等7人，残杀在阳谷东门外，其中高凤鸾同志被击中后脱险未死。

董犯，背叛祖国，效忠日寇，大肆残杀我军政人员和无辜群众，实属血债累累，罪恶大、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保护人民，本院依法判处日特董政华死刑，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1960年8月27日将该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1960年8月27日

伪军头目李洪图的罪行

崔衍峰整理

李洪（宏）图，男，1916年出生，济南市第五区民主中街2号人。

自幼上学，17岁在山东省立第3职业学校毕业，1939年考入军校，1940年参加国民党，任伪宣传科长，1941任阳谷县伪警备大队中队长，大队副等职。1950年8月被阳谷县人民政府依法镇压。

其罪行有：

1、1943年任日伪中队长时，率伪7中队驻防阿城，曾捕我二区抗日战士2名，掠去步枪2支。

2、同年2至3月间，捕我二区抗日民政助理员李皖民，毒打后枪杀在阿城西门外。

3、在阿城下闸、刘楼一带抢走我抗日政府公粮一部。

4、1944年在大小赵庄清出我医院器材一部，捕去我伤员4名，后放出。在阿城、安镇修据点、毁民房、树木很多。

5、在古柳树驻防时，安置据点、挖沟毁民房20余间。

6、1944年10月，在安镇驻防时，捕我7区民政助理员杨子良，扣押数日，后惨遭杀害。

7、1944年12月4日，我7团战士张进海之妻去安镇走亲戚，被其抓获。对其用刑逼供，我区侦察员、情报员后被枪杀在安镇南门外。

8、1943年4月17日，捕获胡楼村抗联主任胡鹏珠、自卫队长任继贤。后由任陪绑，将胡鹏珠枪杀在安镇。

伪军头目刘继春的罪行

崔衍峰整理

刘继春，又名刘肖阳，化名李庆浩，卢保今，男，1915年生，阳谷县城东马庄人。

自幼出身氓流，不务正业，后充当土匪。日军占阳谷后，即充当汉奸。1940年1月至1945年7月任日伪阳谷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等职。

在任职期间，刘继春认贼作父，终日媚红，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配合日军多次扫荡、围剿、率匪多次袭击我抗日军民，残酷捕杀我党员干部，对阳谷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据查证，其罪行有：

1、日伪时期，多次率匪配合日军回击扫荡，修筑据点，抢粮拉牛，捕杀我抗日军民。

2、1943年，刘继春唆使中队长李宏图，逮捕我区助理员李皖民、杨万林等同志，予以枪杀。

3、1944年3月，刘继春率伪警备大队到阎楼区熬盐场围击我抗日七区队，俘我区队员30余人，打死指导员徐起如，队副许志新、通讯员吕洪金、战士岳天振、朱永成及本村群众杜春和等6人，掠去我区队枪30余支，群众财物一批。

4、1944年9月，刘率匪去阎楼阎胡同村围击我抗日七区队，打死我区队战士1名，俘击郑从义等3人，掠去枪6支。

5、1944年9月，刘率匪到定水镇坡里村围击我抗日八区

队，击伤战士徐化亭等人，俘去班长李民先、战士胥子亮、李清山、李维芹等10人。后将李民先、李清山、李维芹等7人押送日本。日本投降后，李清山、李维芹返回，其余5人生死不明。

6、1945年5月，刘继春率匪到石佛安据点时，袭击了我军某部3团，伤亡战士30余人。

7、1945年古历正月二十四日夜，刘继春率领牛贯一、刘继梅、席连成3个中队，将我三区沙河崖村包围，当场将我民兵队长蒋广友、农会长蒋少仁、民兵蒋广汉、蒋广化、蒋景省打死。同时逮捕民兵李永清、李永福、蒋景乐、蒋广山等7人及群众蒋广明等29名，搜出枪32支，抢去殷广斗的牛一头及其它衣服等物，并烧毁民房42间。于古历二月三日上午，将捕获的7名民兵在县城西南角刀砍或枪杀。29名群众用钱赎回。

8、1945年间，刘继春带领4个中队，围击了张湾村，捕去我民兵7名，带至城里后，在城内围子南边杀死5名。

9、1944年10月，刘的部下刘宏图指令匪徒捕我区助理员杨子良，1945年2月，刘继春亲令匪徒将其砍死。

10、1944年10月，刘继春率4个中队去韩家洼抢劫时，与我军发生冲突，打死我军4人，掠去枪4支。

伪区长孟宪章的罪行

崔衍峰整理

孟宪章，又名孟忠州。男，1902年生，阳谷县城内南街人。

自幼上学，下学后经商。日军占领县城后，充当伪军，1941年任阳谷县第八区伪区长，1945年5月被我军捕获，同年8月，在范海被镇压。

在任伪区长期间，孟宪章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强修工事，欺压百姓。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枪杀我方工作人员及抗属7人，收我枪支，实属罪大恶极。

1、滥杀无辜：孙楼村自卫队长孙代曾，许楼村许某及赵开连，阿城茶馆伙夫刘严雨等，均借口抗公，被其下令枪杀。

2、残杀抗日积极分子：大碓臼的农会会长高德修被其铡首，大洼里的农会长袁玉堂被其剖腹，熬盐场农会长张爱柱被其绞杀，副会长均被抓做劳工。

3、滥捕滥罚：七区助理员周吉被其抓捕，罚钱数10万元。通讯员高继耀捕后送做劳工。我抗属齐长盛被抓捕后，被罚匣枪一支。杨尧战斗罚本村机枪3支，夹河战斗罚本村枪5支，徐庄战斗罚子弹1500粒。罚刘永太、张清泉枪3支，抓张秋百姓做劳工数十人，得款数10万元，抓张秋陆海数人，罚子弹470粒，还罚朱庄张景亮、张小六枪2支。

4、起存抗日枪支：1942年日军铁壁合围时，起我插存的枪支6支，七区队存郭位陈枪一支。收缴二区队枪6支，三团侦察员匣枪一支。

5、收缴民枪：纵匪在荆门、闸海子、城坡、刘楼、沙窝村收自卫队、模范班的枪支 5 支。

6、纵容爪牙，烧杀抢掠，敲诈勒索。借口抗公，火烧齐店。借口在教礼（安清道）收容道徒70余名，造谣破坏，搜集、侦察我方情况。

杀人魔王栾省三

冯文德整理

栾省三，字守卿。又名赵延印，外号栾小秃。1909年生于堂邑县一区丁远寨村，自幼家中贫寒，其父一生为匪，对栾省三幼小的心灵影响颇深，使其从小养成了损人利己的恶习。17岁开始充当匪兵，从此便走向了他那罪恶反动的人生之路。

栾省三的人性野蛮凶狠，杀人不择手段，他在堂邑一带盘踞时，是有名的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在他为匪和当伪军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后利用枪杀、刀劈、铡刀分尸、勒死、活埋、点天灯等惨刑致死人命无数，其杀人之多，手段残忍是世人所罕见。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在石友三部当兵混饭吃的栾省三，被迫弃伍回家务农。不久便在堂邑一带联络了从部队撤下来的兵痞12人，开始组建土匪武装，他们在民间明敲暗抢，经过3个月的扩充，便在冠、堂、莘边区纠集了1000多乌合之众，号称为民团。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靠敲诈抢劫寄生于群众之中。据堂邑三区20个村的统计，被栾省三部杀死309人，遭绑架的5户。在其中4个村子里，烧房144间，只大纸坊村就拆毁房屋40间，粮食全部被抢光，造成村民饿死300余人。

栾省三在扩充武装时，对民间看家护院的枪支，不择手段强行收缴。1937年9月11日栾省三派宋凤岐到洼里刘村强收民枪时，宋凤岐率兵夜袭该村，抢去大枪15支，短枪2支，牵马1

匹，自行车1辆。9月17日又复来本村，绑架了村民刘××之妻，强逼刘连楷、刘春荣、刘有、刘春田、刘成业、刘成文、刘建寅、刘同合等8户，限期5天内各交现洋500元，否则杀全村鸡犬不留。该村群众被迫无奈，联合起来奋勇反抗。栾省三在10月间3次派兵攻打未能进村，恼羞成怒，顿起杀机，栾省三亲带千余人，于12月27日将洼里刘村包围，黎明时开始从村外四边同时攻击，村民抵抗不过，于上午11时攻入村内。栾省三下令满村放火，烧尽杀光，顿时村内火光四起，哭叫连天，幸得村干部组织起青壮男人，拼出一条通路，掩护大部分群众闯出村来，走不脱者均被栾省三部逮捕。此次浩劫烧房237间，柴垛无数，衣物家具全化为灰烬。栾省三部枪杀群众38名，伤8人，其中刘纪山全家男女老幼5口，有其兄弟2人被残杀于院中，其妻胡氏因不从匪兵的奸淫被刺死于炕下，老母年迈八旬因伤心过度，昼夜哭啼以致丧命。刘丙辰全家子孙7人，被杀5人，伤1人，其孙年方12岁，被铡刀剁下四肢，割头而亡。刘××之女和侄女2人，年皆17岁，被栾省三强迫带入匪巢。另外还有乳儿3名，因与母分离而被饿死。大屠杀后，栾省三还扬言把洼里刘村铲平灭绝，凡回村居住者，不是被杀就是被抓进据点，刘同昌逃到洼里陈庄隐名改姓后，被栾部发现，先捆在树上打断双腿，又用铡刀分尸三节，扔于坑中。直到1938年6月，还对逃回村的人进行刁难，先后派许常安带兵抓走了村民刘成顺、刘成柱、刘纪文3人，7月又有许爱全带兵夜闯该村抓走刘春柯、刘有意、刘元廷、刘合廷等6人，遭到严刑拷打后，扬言以人命要挟村上交出所要的财物方可放人。

附：栾省三部打死打伤村民名单：

死亡名单：（38人）

刘金亮、刘丙辰、刘义章、刘春阳、焦福岭、刘同义、刘维章、刘春荣、刘成兴、刘保平、刘保功、刘仁义、刘同顺、刘良廷、刘保智、刘春苞、刘春田、刘新印、刘纪山、刘春茂、刘丙法、刘保连、刘成仁、刘洪章、刘化臣、刘丙堂、刘庆里、刘纪岭、刘胡氏、刘庆禄、刘春安、郭振华、刘金升、刘立成、刘春法、刘金斗、刘纪江、刘春藻。

被打伤名单：（8人）

刘建章、刘春柯、刘丙章、刘春早、刘春海、刘有、刘建勋、刘同太。

冻饿死幼童：（3人）

刘春广之女、刘金升之子、刘春安之子。

1937年腊月二十五日，栾省三带领匪兵闯进史庄，把全村的東西一抢而空，用铡刀铡死张子英、张汝魁、张长海3人，烧毁房子40余间，烧死张元义、张恒香、张小女、张小六等4人。

范筑先将军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鲁西北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后，栾省三迫于范筑先大义抗日的威严，于1937年底被强迫收编，该部被编为二十六支队，栾任司令。栾省三被收编后，不但抗日，其烧杀抢掠、危害民众的野性一点也不收敛。有一次他的一个亲信因抢劫群众财物，被司令部军法处逮捕枪决，栾省三得知后，便提枪找军法处长刘佩之拼命，后来有范筑先出面制止，才使栾省三未发野性。

1938年11月15日，日军进犯聊城，范筑先将军在聊殉国。栾省三的二十六支队也随即被日军打垮解体。后栾省三投靠在齐子

修魔下，以团长的名义在堂邑吕铺设立据点，收招旧部，重操烧杀抢掠旧业，致使当地人民不聊生无法生活。

栾省三杀人凶狠强悍，但没有中华民族的半点血气，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栾不顾背叛民族之大耻，奉行“有奶就是娘”的信条，于1940年秋公开率部投降了驻堂邑的日本侵略军，捞了个堂邑县伪警备大队副的头衔。从此便去掉伪装的面纱，更猖狂的枪杀民众，打击抗日武装力量。

栾省三利用在吕铺和阎营据点驻防的两个中队，大肆抢掠老百姓的财物，供其部队享用。还率部配合日军多次扫荡围剿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府驻地，与抗日部队直接发生较大的战斗就有：黄家寨战斗、马家村战斗、吕铺战斗等（5次）、郭关庙战斗等几十次，均使抗日武装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特别是1944年夏天，栾省三率部配合临清、冠县、聊城各县的日军1000余人赴冠县七区孔村扫荡八路军冀南七分区赵健民部，致使部队和附近群众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栾省三对抗日军民恨之入骨，杀害抗日战士和积极分子的手段更加残忍。有一次，在吕铺据点外围，逮捕了抗日政府的侦察班长王占山，经过严刑逼供后，把王占山用白布裹上，用铁丝捆在树上，外面浇上煤油，在杨庄点了天灯，把王占山活活地烧死。栾省三用点天灯法还烧死了马河支队的2名战士、以及抗日积极分子多名。

1941年3月27日，栾省三带领日伪军攻打堂邑县三区的赵庄，该村人民在多次遭其抢劫后，在村干部的组织下开始自卫还击，经过4小时的战斗，虽然阻住了日伪进村，但损失颇重，自卫队长刘付云、队员柴观仁、宋汉池、王心富等4人牺牲，15人负重伤，损失子弹2500发，手榴弹800枚，用于战后的丧葬费2800元，使村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栾省三的逼迫骚扰下，全村群众东逃西散，村庄荒落，与后来的堂邑“无人区”连为一体。

案省三一生罪孽深重，从他17岁为匪到41岁被擒期间，仅在堂邑地区就杀人如麻，抢劫民财无数，给堂邑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历史是无情的。解放后，作恶一生的案省三，也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下场。

赵振华及其罪恶

冯文德整理

赵振华，河北省静安县（前文安县）滩里村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45年7月经刘子善介绍加入国民党组织。

赵振华在聊城活动期间，曾追随齐子修烧杀残害百姓；后又叛变投敌，屈膝于日本侵略军的脚下，极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大肆屠杀积极抗日的有志之士；日军投降后，继续与人民为敌，带领国民党顽固派的残余势力固守聊城。他欺压百姓、卖国求荣，镇压革命的罪恶行径，给聊城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38年11月聊城失陷后，赵振华投靠了齐子修，先后任一团一营营副，二团二营营长等职，1941年9月，跟随齐润泽投降驻聊城的日军，被日军委任为鲁西剿共游击队第一支队中队队长。随后率部在高屯、周庄、魏庄、谭庄等地修筑据点，此间，赵振华不顾当地人民生活的困难，经常派兵到村上骚扰抢劫，为修据点把附近村庄上成材的大树全部伐光，砖瓦抢光后，便扒民房取材，另外还强迫农民出伙修筑据点。其工程之大，用料之多，害苦了当地的农民群众，据群众揭发统计，赵振华在修筑谭庄据点时，只大柳张损失枣树千余棵，青砖5000块，榆树300余棵，杨树200余棵，还抢走大批衣服、布匹、粮食等。该村的中青年男人，强迫到据点干活，他们自带食粮，多数人在饿着肚子干繁重的体

力劳动，很多人病倒累昏在工地上。伪军士兵监工甚严，对民伕稍不如意，就棍棒加身，天天打得民伕哭叫连天，有些反抗者轻的被打致残，重者毙命，有许多体弱生病者就此被夺去了性命。

据点建立后，赵振华便以坚固的据点为大本营，经常派兵到附近村庄牵牛架户，奸淫烧杀，引起了聊东南一带群众的极大愤慨。筑先县大队决定教训一下赵振华，夜袭了谭庄据点，吓得赵振华关闭四门有半月之余，不敢出据点，但在此期间，他把谭庄的群众全部赶出据点圈子，不准回家，并把全村群众家中的所有物品全部抢光，只粮食就抢了两万多斤，谭庄的群众有家不能归，生产无法进行，生活也无着落，最后大多数人家只有投亲靠友或流落他方。

日军在聊城猖獗时期，赵振华曾多次带部下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所到之处便烧杀抢掠满载而归。据初步统计，赵振华部在冠县沙窝扫荡时，抢抗日军民的钞票达三麻袋；在大名北、冠县西解放区抢去牛200头；在聊城王官庙围集时抢财物、豆饼、粮食及小贩财物整整装了8大车；在东阿高固抢骡子2头，牛2头，麦子3大车；在聊城于集，因该村群众配合抗日政府坚壁清野反围剿，赵振华便带兵袭击该村，将村中群众的锅掀光砸烂，能拿之物全部抢光，并放火焚烧了村庄，房子多半被烧毁。

赵振华当汉奸时期，甘愿死心踏地的充当日本侵略军的走狗，为立功讨好日军，誓为抗日的中国人民为敌，先后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发生战斗多次，特别是在茌平县南部迟桥、大白庄、王油坊、潘庄等地配合日军“扫荡”中，均使抗日军民遭受了较大损失；在邢庄、姚集袭击运东支队，造成军民多人伤亡。

侵华日军投降后，人民对汉奸赵振华的罪恶还未来及清算，他又被国民党六区专员王金祥任命为特四旅旅长，退缩在聊城城里固守，继续与人民顽抗到底。在解放大军围城之时，赵振华强

迫士兵昼不懈甲，夜不寝衣，吃住在城牆头哨位上。并煽动士兵说：“八路进来也是死，要想活命杀上去。”为了保持守城部队的长期生存，他不管城内人民的死活，先把城内商铺小贩的所有物品占为已有，拉到西北大操场上；后又对市民挨家抢掠，在修筑城防工事时，拆毁了许多民房，有的士兵做饭也要扒民房取柴，造成居民因饥饿病疫而死亡众多。

赵振华为长期固守城池，广积军粮和军需用品，把城内物资抢光后，就经常派兵出城袭劫百姓，沙镇、于集、李海务等地群众均受到过赵部的洗劫。1945年11月5日，偷袭大柳村，打死民兵高海昌，打伤6人，逮走了村民张金合、高海泉、张丕甲、邹景双、李丙焕、李润清、李庄林、李太林、李丙甫、李丙盛、李韦林等人，其中有李丙焕、李润清、张金合3人被毒打折磨死在狱中。牵去本村的牛5头，骡子一头，粮食衣物无数。在抢劫李安林家财物时，把家物抢得净光，李安林感到生活无望，上前阻拦，被匪兵用刺刀往身上捅了数刀，当时昏了过去，幸亏村邻及时抢救，方才保住了性命。

在解放聊城战斗中，先后在西北角、东门等地俘我战士3名，其中有一个姓李的战士，被赵振华亲手枪毙在观街坑处，死后又用洋刀将头砍烂，赵的传令兵又剖腹摘出心肝。

赵振华迫害共产党人，也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凡是被赵怀疑者，就是他的部下亲信，也难逃厄运。当时在城内有个开店的高太太，她有个侄子在城内帮忙，只因名叫小八，便被赵振华怀疑是八路军，将他母子俩逮捕，把小八交郭培德活埋，高太太由赵振华在夜间拉到西北角大操场，用绳子活活勒死，可怜高太太母子2人只因一个名子便屈死在赵振华的毒手下。

在赵振华充当土匪、汉奸、国民党顽固派期间，双手沾满了聊城人民的鲜血，亲手杀害我军政侦察人员5名，俘获残杀我战士3名，杀害其无辜部下官兵9人，活埋妇女2名，勒死1名，

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18名，抢劫财物以及烧杀所造成的损失无计其数。

1946年12月底，赵振华在济南王耀武部队的接应下从聊城率残部突围逃窜。解放后被依法逮捕，经聊城人民强烈要求，公审罪大恶极的日伪头子，依法枪决了赵振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傅崇鲁罪恶的一生

冯文德整理

傅崇鲁，化名傅鉴，字镜如。1910年出生在聊城绣衣集（今属许营乡）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曾在军阀一一四旅骑兵团当排长。7岁开始在本村读书，从小受其父的影响，16岁开始到外地流荡，流窜于大汶口、莱芜等地，曾任其父所部勤务兵、职员、教员等职。1938年梁省三在堂邑扩充部队时，乘机加入该部，先后任二十六支队连长、团长等职。1940年8月率部投降日军，被任命为鲁西剿共游击第一支队第二中队长。

1940年12月，傅崇鲁带其二中队配合日军扫荡聊南抗日根据地，随后驻防周庄。傅到周庄后，大兴土木修筑围子和炮楼，把周庄建为一个较坚固的据点。当时把附近各村的枣树和其它成材大树全部砍光，用于构筑工事或当烧柴。其余所需各物，也都是强迫农民缴纳，强征各村户的财物，稍有不从或怠慢者，就抓入据点严刑拷打。重者致死，轻者被打后还要追加罚款，在短短的年余时间里，敲诈民众财物据他自己交待的就有：小赵鸭庄的花生2000斤，罚款5000元，自行车一辆，煤油一桶，好麻20斤。傅崇鲁罚款的名目极多，抓人也随心所欲。有一次到后军屯抓一逃兵，逃兵没有抓住，就诬赖本村群众王大合私藏逃兵，把他母亲和嫂子及孩子捆走，用王家的大车拉到据点押了起来，后经人说情罚款1000元，没收大车和两头黄牛，才算保住性命。

为了扩大其武装，周围村庄中凡有看家护院的枪支，必被傅强抢到手。有一次，他的传令兵说白庄姓李的家中有枪支，傅即派

兵将该户农民抓到据点，用木棍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再用凉水浇醒，硬逼其交出枪来。无奈这农民的确无枪可交，最后被打成重伤，还被罚款3000元。

傅崇鲁充当汉奸时期，先后驻防过的据点有：高围、南周庄、官路、魏庄、花牛陈和谭庄等地，以各种方式敲诈抢劫群众的财物无法统计，其手段残酷更难使人想象，凡傅崇鲁驻过的村庄，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帐。

1941年腊月二十六日，傅崇鲁率部从南周庄据点出发，配合日军对聊城李海子联防队大举进攻，兵至村庄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了联防队队长刘润常及队员刘润身、刘润都、刘锡奎、刘润坤等，更残忍的是将尸首浇上油焚烧。村民逃走后，各家东西被抢一空，临走时又放火烧了村庄。

灾荒之年，傅崇鲁对家乡同胞的生死灾难无有半点怜悯之情，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家家都无米下锅，整日以糠菜充饥还朝不保夕，可傅崇鲁还频频征粮，并且还要限时送交。每有延期者，便要招来灭顶之灾。李庄的路学成因一时拿不出粮款，被抓进据点毒打致残；琵琶王因交不出粮的有4户被抓；于才庄有4个寡居的老太太因家贫无粮可交，傅崇鲁也不放过，统统把4位老太太抓入据点，后经村邻凑够粮食，才把人放回，但是几位老人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

1944年，全国的抗日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军在各地已处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把作战的主要目标对准了坚持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汉奸傅崇鲁不但看不清日军的必败之势，反而更拼命地为其洋主子卖命。1944年7月，傅崇鲁调防到谭庄据点不久，被提升为第二警备大队副，兼任三区办事处主任职务。为感谢日军的提升之恩，他在谭庄据点近一年的时间内，镇压抗日力量残害人民群众也达到了高峰时期。

1944年7月，配合日军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时，利用林立的碉堡和纵横交错的封锁沟，封锁聊南抗日根据地一个多月，把群众的粮食和所用之物全部抢入各据点，企图饿死或赶跑我抗日政府和武装力量。在谭庄附近的几个村庄里，就抢粮2万余斤，抓鸡1500多只，猪、牛牲畜等几乎抢光，其它衣服、被褥等一是被抢去，二是给烧光。

1944年8月，由于抗日力量的壮大，傅崇鲁为防被动挨打，加强了其据点的防御，为加固围墙，修筑炮楼，树木砍光后，又扒了许多民房取材。随后又把据点围子以外2里地范围内的庄稼和青棵全部铲平，形成了便于观察射击的开阔地。在中秋大忙季节，责令青龙寺乡、白马寺乡、八里屯乡的农民青壮年出伏修工事，自带粮食修了两个多月，不但影响了农民的秋收秋种，而且残酷的强体力劳动使许多人积劳成疾、病倒卧床，造成致残者多人。

侵华日军投降后，汉奸傅崇鲁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庇护下，摇身一变成了国军，被任命为山东省保安特务四旅第一团营长，从谭庄据点逃进聊城城内，为日军效命多年的傅崇鲁，对人民所犯罪行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像这样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早该处决，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加以保护委以重任。5年多的汉奸生涯，使傅崇鲁屠杀人民、镇压革命运动积累了“经验”，现又在国民党的豢养下开始了新的“创作”。

1945年11月，被王金祥任命提升为第一团团团长后，率领全团配合旅部特务营，在旅长赵振华的指挥下，又重赴谭庄、大柳张、小许庄、杭海一带扫荡抢粮。抢掠民财无数，并抓了许多群众，谭庄20人，杜庄12人，大柳张5人，杭海4人，小许庄4人，共约50余人。把所抓民众全都押在聊城城内，由傅崇鲁负责看守，他们以押人为手段，向各村敲诈粮款，被抓人受尽了傅的折磨，整日打得死去活来，有的几乎丧命，幸亏村内群众家人及时将所

要钱粮交上，才使被抓人获生。在解放军围城之前，傅崇鲁在城池附近村庄也经常牵牛架户抢粮抓人，搞得人民生灵涂炭，不得安宁。

1946年1月2日，解放军在城西北角偷袭攻城被傅部发现，傅崇鲁即带传令兵亲临城头督战，使解放军攻城未克，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战斗结束后，傅崇鲁立即召集各营长会议，动员部下要为党国效劳尽忠，并命令拆掉民房加固城头工事，全体士兵全部派至城墙上昼夜驻守，企图利用坚固城池顽抗到底。

在解放军围而不打之时，傅崇鲁狗急跳墙，多次组织部下出城骚扰，拆烧城墙外的民房，开阔视界和射界。1946年5月的一天夜间，派其2营营长王相玉率兵百余人偷出北门，烧毁北关房子10余间，麦秸垛2个，遭解放军打击后，方才退回城里。1946年8月，傅派三连连长窦心简带兵100余人，配合郭培德前往沙镇村抢粮，回城时在城西被解放军伏击，击毙三连长等30余人，余者携带2000余斤小麦逃回城内。

傅崇鲁在聊城固守的一年间，对城内居民百姓危害极深，敲诈城内商人，强抢居民口粮，直至扒屋拆房固城取柴，使得许多居民出城投友无门，许多人夜宿街头巷尾，饥饿病死无数。

莒平县伪军头子李岐山及罪行

杜富贵 整理

李岐山，原名李本俊，别号舜卿，1904年出生于莒平县孙桥乡南陈庄，兄妹5人，排行第3。山东省公立法政专门军官教育团毕业。从小在本村上小学，毕业后先后当过小学教员，跑过大车（经商），在县城开饭馆，开轨花坊时，由于生意不景气，将全家40多亩地全部赔光。从此，不务正业，偷窃成性，遭到当地人民的痛恨。

“七·七”事变前，1928年至1931年任莒平县第四区区长，1932年2月至1933年8月任河北省政府民政厅一等科员，1934年4月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〇九旅二一八团中校团副，1936年4月任上校团长，1937年初负伤转泰安住院，伤愈后回家，随投靠国民党莒平县长葛栋华侦缉队（政务警）任侦缉队员，1939年春任侦缉队长。日军侵占莒平县城后，先后任自卫团团长，剿共自卫团副指挥，保安十二旅团长，保安三旅旅长，二十六旅旅长，山东挺进三十三纵队司令等职（时有武装5000余人），1944年10月任莒平县伪县长（身兼伪军二十六旅旅长），1945年5月，八路军解放莒平县城时，被击毙身亡，结束了这个民族败类的可耻一生。

在8年的抗战中，李岐山是个十恶不赦的伪军（汉奸）头子。日军1939年初占领莒平县城后，他就勾结土匪、恶霸地主等反动势力，组建武装，以国民党县党部为靠山，以日军为后盾，

以共产党、八路军为攻击目标。曾纠集日、伪对在南、在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轮番“扫荡”，对抗日人民残酷镇压，不断地“蚕食”抗日根据地，奸淫烧杀，横征暴敛，无恶不作。1939年、1940年抗日根据地大吕庄两次遭日伪军袭击，先后有30多名村民被杀害，20名自卫队员被残杀，500多名群众流离失所，580间房屋被烧毁，80多口锅被砸，70多头牲口被抢。1941年5月上、下旬，日伪军两次围攻大刘庄，有40多名自卫队员、群众遭枪杀，抢劫物资不计其数。1943年10月8日，李岐山勾结济南日军“扫荡”在北根据地时，我抗日武工队员刘继明、韩小贞被杀。李岐山为了消灭在南根据地抗日力量，1944年6月27日，纠集了聊城、东阿、博平、阳谷等县日伪军近千人，对在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这一天，有134名未来得及转移的党政干部和青壮年惨死在日伪军的屠刀下。在平人民不堪于李岐山的压迫，对其进行反抗和斗争。广平乡张楼人民为了反抗日伪军的剥削和压迫，1944年组织全村武装联防，多次抗击伪军、伪政府的进攻和掠夺。李岐山无技可施，于1945年3月31日，亲自组织、率领3700余日伪军和治安军攻打张楼村。张楼村被打开之后，在两小时内屠杀抗日群众333人，271人身受重伤，264人被捕，7人被抓往日本当劳工，烧毁房屋2700间，抢掠财物不计其数，其悲惨情景目不忍睹。成为震惊鲁西的大惨案。1946年7月28日《冀鲁豫日报》刊登君谦的文章——“大汉奸李岐山罪恶种种”中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来，李岐山帮助敌人掳去壮丁9298人，杀害男人1101人，残害女性1385人，失踪2249人，烧毁房屋21539间，瓦房1691间，抢杀耕牛19533头，骡马977匹，驴1710头，羊2981只，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李岐山是个亲日反共的铁杆汉奸，他时刻不忘消灭共产党人。在平县一区区委书记李树郊同志，1942年受党的派遣打入李岐山内部做长期埋伏，1943年3月不幸暴露被捕，李岐山为逼取

口供，用尽酷刑，后李歧山亲自指挥走卒，将他绑在树上零刀解体而遭残杀。中共在平县委委员许兆乾同志，1941年初被李歧山部逮捕，受尽残刑，腿被打断了，肉被烧流了，至死未暴露党的机密，后被押送伪司令齐子修的军法处，以开膛破腹而被屠杀。区委书记郝承忠、张同瑞、于波；副区长赵洪光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先后惨死在李歧山的屠刀下。

解放后，在平县人民为报仇雪恨，数千名贫苦农民汇集李歧山的老家南陈庄，对伪军头子李歧山残害群众，屠杀共产党和抗日军民的罪行进行控诉，会场庄严隆重，横幅写有“重见天日”4个大字。与会群众无比愤怒，控诉的百姓声泪俱下，遭日伪军残害的二区张家楼民兵更是义愤填膺，扒开李歧山的坟墓，将其撒骨扬尘。会上并枪毙了欺压百姓的当地恶霸张金聚。受害的群众为牺牲的烈士报了仇，出了气，也是伪军头子李歧山应得的下场。

博平县伪军头目罗兆荣及罪行

杜富贵 整理

罗兆荣，原博平县（今茌平县博平镇）罗庄人，1911年生人。文盲，少年时，父母早逝，由其伯父罗观甫抚养，长年游手好闲，逮鸽子、打围（捕兔）、赌博、打架斗殴，其间，曾两次闯东北。1929年去国民党博平县政府先后任政务警、巡长、国民党县长王家佑的副官。1939年2月16日，日军侵占博平县城后，遂参加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五大队，任中队长。因不适应共产党、八路军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艰苦作风，于是年冬初，逃离五大队，自筹枪支，后借五大队的名义，拉队伍，逐步走向投日反共的道路。

1940年冬，罗兆荣秘密勾结日军，充当了汉奸走狗，同时，成立博平县伪一区自卫团（人称三鬼子），在周庄（后迁罗庄）安设据点，任团长。1942年罗兆荣公开投靠日军，升任博平县伪军自卫团总团长，总兵力最多达3000余人，布设36个据点。1945年9月被国民党委任为山东保安第四十二旅旅长，时有3个主力团、7个分团、6个直属队，总兵力3500余人。1946年1月博平县城解放时，罗兆荣带一部残兵败将逃往济南，继续与人民为敌。

博平县伪军头目罗兆荣依靠日军，以一帮地痞流氓、土匪恶霸为骨干，对全县人民残酷统治达6年之久，先后霸占民女为妻者5人，奸污妇女多人、少女6人，讹诈良田百余亩，宅基地十多亩，无恶不作；在其血腥统治下，许多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特别是对共产党员、抗日家属及进步人士的摧残更是残忍之极。贯用的刑罚有以下9种：①活扒心（摧肚开膛）；②挖眼割舌；③活人抱地雷（人和地雷捆在一起，尔后，拉动弹弦，雷响血肉横飞）；④活靶子；⑤木锥摔人（将木棍一头削尖，栽入坑底）；⑥洋狗吃人；⑦活埋；⑧押入地窖，活生生折磨死（均以恶臭、饥饿成疾患病而死，死后抬上地面让狗吃光）；⑨铡人头等。以此毒辣手段进行屠杀。从1943年初至1945年底，被罗兆荣杀害的无辜群众、共产党员、抗日军政干部家属及抗日进步人士达300多人，其中有20多户党政干部家属全家被杀，被迫流亡家属400多户，达2000余人。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罗庄西门外杀人场，血淋淋的死尸躺路旁，鹰吃五脏，狗吃肉，昼夜啃个光，昼夜啃个光”，很形象地勾画出了罗兆荣是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罗兆荣背叛革命后，于1943年3月上旬，所领导的自卫团内部矛盾激化，李景恕、赵士良等3个中队长率部联合哗变，刺杀罗兆荣未遂，罗则怀疑是共产党所为，由此更加仇视共产党，扬言要对共产党杀尽斩绝。霎时乌云密布。我党为了不受损失，县委撤到清平县境，抗日武装到边界打游击。而凶残发疯的罗兆荣枪口直接对准了手无寸铁的抗日军、政干部家属。1944年古历十二月三十日这一天，有100多人被杀，有十几户抗属全家惨遭杀害。罗兆荣带领伪军亲自到杜庄将一区区委书记秦怀玉一家6口枪杀，随后指示部下将博平抗日政府秘书郎镜如全家9口、区队副岳志清及进步人士吉连山等（除本人外）全家杀害。地下共产党员陈少然、王玉珍、杨瑞荣、李克达、张宝理、许庆路、许庆河、陈士忠、许学春、朱永山和抗日进步人士罗希永、芦爱清、张冀氏等家属先后遭惨杀。菜园张村张登恒、张登文、张登举等6名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家属12口，一次被罗兆荣逮去全部在罗庄围子外杀人场给残杀。同时，罗捕不到我党政军干部家属

的人员，就破坏其家园。共产党员胡泮生原在博平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后升为军分区六团政委，1945年春，罗率部到高胡庄将胡泮生家的十多间房屋扒掉，并刨成坑。

在罗兆荣配合日军统治博平时期，博平人民的损失是惨重的。据统计：被敌人杀害5214人，被敌特暗杀161人，敌灾病残致死40621人，被抓壮丁13615人，流亡失踪1279人，被敌奸淫298人，被敌打残544人，被焚毁抢夺粮食3450000斤，强征粮食二百万担，抢杀耕牛9080头，骡、驴、羊4832匹（只），主要农具22250件，被烧毁房屋21031间。

罪大恶极的汉奸冯太恒

曹代岭 整理

冯太恒，字岳南，又名冯虎。1914年生于东阿县高集乡高集村。自幼冥顽，粗通文墨。16岁赶大车，来往于临清、平原、济南等地跑买卖，逐渐练成了一身投机钻营、见利忘义的技能 and 一副泼皮无赖性格。成年后，先后充任高集集头、街长，成为称霸一方、危害乡里的恶棍。

1939年，冯太恒经平阴县刘绪安介绍，结识了国民党东阿县县长朱申，适时，有土顽冯寿鹏（冯二皮）部到达高集一带，齐子修的三支队也在临近东阿的茌平马庄安上了据点，他们明里征粮摧夫，抓丁筹款，暗里牵牛架户。乡村长们穷于应付，一般百姓苦不堪言。当时任街长的冯太恒因为土顽办事卖力，得到他们的赏识，遂由朱申提名，三支队出面召集东阿四区四大乡的乡长选举冯太恒当上了四区区长。此后，他和土顽加紧了勾结，更加卖力地为土顽效劳，同时他在土顽部队的支持下，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区部武装，并自任队长。先后在周庄、旦镇安设据点，捕杀我抗日人员，破坏我抗日组织，敲诈勒索群众。1940年后更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公开与我共产党八路军为敌，多次配合日伪军围攻抗日武装，“蚕食”抗日根据地。其间，冯太恒先后被冯寿鹏委任为其二十六旅第五团团团长，齐子修委其为第三旅特务团团团长。

1942年齐子修公开投降日军，所部被编为伪“中央第五十七

军”、冯部被编为伪第三十三纵队(司令李歧山)任第三支队司令。自此，冯太恒由与日军暗中勾结变为公开充当侵略者的走狗，成为东阿有名的铁杆汉奸。他以刘旺山为据点，不断到我根据地进行抢掠，杀人放火，牵牛架户，抓人拉伏，配合日军对我进行“扫荡”，给我抗日军民造成极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日军投降，5年时间里，仅在高集、杨柳一带村子即杀害我抗日人员及群众达百余人，放火烧了老赵庄、朱海子、贾庄、赵庄、柳庄、田庄、窖上、四王集、枣棵杨、解白刘等村庄，共烧毁房屋510余间，牵牛54头，抓人378人。

冯太恒凶残暴戾，嗜杀成性，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1943年2月18日，我三区民兵朱成申被冯太恒捉去，冯太恒亲自用斧将朱成申剥死。同年11月1日，冯太恒带人到朱海子抢掠时，用砖砸死了村民朱士木的祖母，将朱全成的父亲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又将其祖母炸死。

1944年11月5日，在朱海子先亲手杀死了朱魁正之妻，又将一岁幼儿从炕上拉下，一刀刺死，随后又将其肠子拉了出来。

1945年4月间，冯太恒带人偷袭我三区民兵连驻地，抢去我大批粮食物资，将我3名被俘民兵施以剜眼、砍手、剥脚等惨绝人寰的酷刑后，悬首示众。这期间，还先后将被其抓去的民兵朱名雁、朱士俊、朱立成、娄相普等人铡为4段；指示其手下枪杀了刘兴华、活埋了王庆海、朱名元、张金山等人。其中一次就活埋了我抗日干部王振生等7位同志。

1945年日军投降后，冯太恒率残部先后逃往博平、济南等地，投靠国民党，并被委为三十三纵队司令、伪东阿县大队副大队长(县长兼大队长)之职。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冀鲁豫解放区，到达黄河东岸。冯太恒随其进占东阿县城后，积极网罗逃亡地主、恶霸兵痞流氓，扩大其反动武装，以百倍的疯狂向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指使部下捕杀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

子。同时不断到我河西解放区烧杀抢掠，破坏解放区的土改。1947年1月，冯太恒带领匪兵窜到旦镇，抓去几十名群众，并将司承芝扔到井里淹死。贝绪文被活埋。8月，配合国民党十五旅一部再次窜犯我河西鱼山、周庄、南桥地区，火烧了我周庄船厂，烧毁大船十余艘，抓去我区妇女干部孙秀珍等人，带回东阿城里，先后被活埋。10月，在洪范村将我3名干部铡为数截。在小泰山冯指使其特务队长李殿臣等一次就杀害我干部群众20多名。据统计从1947年5月至翌年春，仅半年多时间，其五中队的第三小队就抓捕杀我干部、民兵、群众积极分子达42人，其中30人惨遭杀害，他们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砸死，有的被扔进河里淹死。被冯太恒一伙杀害的我干部群众难以计数。

1948年3月，我军收复东阿县城时，冯率部再次逃往济南。10月，济南解放，冯太恒深知其罪恶深重，遂潜往南方，最后隐居在浙江吴兴县。1950年5月被吴兴县公安局查获逮捕，11月11日东阿解放，16日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在高集被处决，血债累累、嗜杀成性的恶魔汉奸冯太恒得了应得的下场。

附件

一 呈

为祈求政府逮捕冯太恒事窃东阿三区朱海子朱刘氏年49岁，兹因1943年2月18日身夫朱成甲，在抗日政府工作，不幸被匪特冯太恒逮捕，半月期经冯太恒亲用斧将我夫朱成甲剁死，请求政府逮捕处理，不胜感德，
谨呈，人民县长 武

朱刘氏 呈
一九五〇年八月

三

呈

为祈求政府允许诉愿事窃缘东阿三区朱海子朱全成年23岁，兹因1944年11月15日，特匪冯太恒带领匪军到我村抢掠，亲身将祖母用手榴弹炸死，又将家父烧死，此种杀父炸母之仇，实属难忍，恳祈政府火速逮捕，替我复仇，不胜感得之至。

谨呈，人民县长 武

朱全成 谨 呈
一九五〇年九月

三

呈

为哀求政府迅速捕获匪首冯太恒事，窃缘东阿县三区扈家庄朱田氏，年38岁，因身夫朱名雁任抗日政府武装工作路遇朱海子西洼被冯太恒俘（俘）去，到匪穴刘望山，冯太恒亲手用铡截四五段。目前全国解放，这等杀人罪魁，决（绝）不能逃脱法网。恳祈，政府捕获复仇是身再生感德。

谨呈，人民县长 武

具呈人 朱田氏 呈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

四

呈

为呈请捕获匪首冯太恒事窃缘东阿三区扈家庄朱名水 年 64

岁，身子朱立成因当时维治安工作，于民国三十四年古历七月初八日帮助解放军围攻刘旺山时被冯太恒俘去，活埋丧命，目前全国解放，此等杀人罪魁，绝不能逃脱法网，祈恳政府捕获复仇，实属感德会极矣。

谨呈，人民县长 武

具呈人 朱名水 呈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

十恶不赦的汉奸刘德超

贾兴张整理

刘德超（又名刘冠群），1886年生，东阿县刘集村人，兵痞出身。

刘德超19岁到旧东阿保卫营当兵，后到北京陆军十一师二十一旅当兵，1916年升任班长，1918年升任师部军需处办事员，于1920年回家务农，1922年在铜城区队当教练，后升任东阿县警备队分队长、大队长，1928年经国民党山东省长韩复榘批准充任东阿县大队中队长。1938年日军侵占东阿县城后，刘任东阿县保安队长，后经日军平井司令委任在东阿城里驻防，1942年刘在三区苦山村山顶上安设据点，修筑炮楼，兼任第三区区长，下设5个营，兵力扩到1500人之多。刘德超在自己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烧杀奸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时，却认贼作父，积极为敌效劳，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并带领日军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破坏我方抗日设施，实属十恶不赦卖国投敌的大汉奸。

1941年10月，刘集村在后寺上开群众大会，刘德超命其部下赵子清（外号赵二虎）带领伪军数十人，将主持会议的村干部焦学笃用三齿活活倒死，将抗日干部李之清、刘延奎活埋致死。1941年12月刘德超带领日军到官庄村扫荡，杀死该村群众4人，抢去牛80多头，还抢去粮食衣服等物。

1942年11月间刘德超带领其部下偷袭我方手榴弹工厂，并将手榴弹工厂的设备拱手交给日军。1942年冬刘德超带其部下在孙

郊、大赵、陶庄、苦山村逼迫群众修筑炮楼亲自要设以上4个据点，派兵驻防。还给日本侵略军在官庄、张大人集、西城铺、王小楼、广粮门、关山等据点派兵驻防，破坏抗日军民的抗日活动。在修据点时，砍伐树木，毁坏房屋，抓伏抢粮，逼得群众流离失所，不得安居。刘勾结日军到东阿各地，进攻我解放区，破坏抗战，杀害群众，牵牛抢粮、烧房屋、抓壮丁无所不为。在苦山据点囚死我革命干部吴福曾，杀死抗日群众娄金祥。刘德超在孙郊村安据点时，曾带领日军抓捕万庄村干部高建荣，孙郊村干部郭吉成等共产党员，采用惨酷手段，威胁敲诈，严刑拷打。该部又曾偷袭我试验区部队，并将其枪20余只掳走。

1943年刘德超部改编为县警备队，驻防县城。当年曾伙同日军组织大车400余辆到河西扫荡抢粮，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该部曾提出三不拿即：“石凌不拿，水井不拿，地皮不拿，其余只要能拿的都拿。”到官庄扫荡杀死群众赵连江、赵氏、赵连生、冯立义。到柳林屯扫荡，杀死姜楼村群众何道贞、周长安、到滚山村扫荡时杀死群众王丙秋、王丙郢、王丙三、王英林。该部抓捕我革命干部周庆科并残杀。

1944年杀死我革命干部孙梅亭之弟孙善福。刘德超部盘据东阿县5年之久，烧杀抢劫无恶不做。据不完全统计共杀死抗日干部群众15名，牵牛、驴250多头，牛羊20多只，烧房屋73间，抢衣被43700余件，抢土枪42支，抢粮食326万余斤，抓人60余名。刘死心踏地为敌效劳，在东阿解放时，又跟随日军至泰安。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又投靠国民党四四五师任连副，并兼任便衣队长，继续与人民为敌。

刘德超的一生干尽了卖国投敌，坑害人民的罪恶勾当，实属民族败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上级批准于1958年3月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根据刘德超刑事案卷整理）

日伪军在在平 残害抗日干部群众罪行录

杜富贵整理

在平县伪军头目李岐山勾结日军残害群众、屠杀共产党员、抗日军民，给在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据1946年7月28日《冀鲁豫日报》刊登的君谦的文章《大汉奸李岐山罪恶种种》中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来，李岐山帮助敌人掳去壮丁9298人，杀害男人1101人，残害女性1385人，失踪2249人，烧毁房屋21539间，瓦房1691间，抢杀耕牛19533头，骡马977匹，驴1710头，羊2981只，其他物资不计其数”。现列举部分罪恶事实如下：

一、杀害区委书记郝承忠

郝承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在平县一区区委书记。1941年2月6日夜间，他在张贴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抗日的宣传品时，遭到伪连长陈兴河的逮捕，后被赎回。当年10月7日，他到在南十里铺与地下党员联系工作，在范家路口被伪军李岐山部营长吴新章、连长陈兴河再次逮捕。这时敌人已怀疑郝承忠是共产党员，为了得到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情报，敌人将他带至吴官屯家庙内，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用劈柴抽打，用香火燎，灌辣椒水，他疼得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

密。敌人无奈，最后把他拉到袁庄围子外活埋了。郝承忠就义时年仅19岁。

二、杀害县委委员许兆乾

许兆乾，1916年出生在茌平县丁块乡许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被害时担任中共茌平县委委员。

1941年春，许兆乾在王后牟庄从事抗日工作时，被伪军李岐山部营长刘爱山、连长杨以元逮捕。他受尽酷刑，腿被杠子压断了，身体被香火烧焦了，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不久，刘爱山把他送交伪旅长齐连泽，后又转送齐子修的军法处。敌人再次对他进行严刑摧残，许兆乾坚贞不屈，至死不向敌人低头。最后齐子修的部下残忍地将他开膛破肚杀害了。许兆乾牺牲时年仅25岁。

三、杀害区委书记李树郊

李树郊是茌平一区洼李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茌平县一区区委书记。1941年受党派遣，打入伪军头目李岐山警卫队长期埋伏。由于叛徒告密，1943年4月初他不幸被捕入狱。李岐山为了得到地下党员名单以及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先是对他花言巧语，百般诱惑，李树郊识破敌人的诡计，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敌人凶相毕露，将李树郊的双手反绑起来，吊在梁头上，凶残地用皮带抽打，用香火燎，灌辣椒水，往手指头里砸钉子，李树郊大义凛然，决不屈服。敌人一计不逞又施一计，将他的父母、兄弟抓去相威胁，妄图以此逼迫他屈服，然而敌人最终也不过是徒劳一场。最后，李岐山亲自带领一帮人，将李树郊押

到袁庄园子西门外，把他反绑在一棵大树上，刽子手残忍地将他零刀割死。

四、杀害区委书记张桐瑞

张桐瑞（又名张洪流）是在平一区张瓦碴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在平县一区区委书记。他长期在敌占区做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2月，在负责张瓦碴庄党的地下联络站工作期间，被伪军头目李岐山发现并逮捕，关押在袁庄园子内。李岐山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情报。结果，敌人一无所获。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将他活埋了。张桐瑞牺牲时年仅25岁。

日伪军在博平 残害抗日干部群众罪行录

杜富贵整理

原博平县伪军头目罗兆荣依仗日军权势，对全县进行长达6年的残酷统治。1943年至1945年底，杀害共产党员、抗日军政干部家属、抗日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830人，其中20多户我党政军干部家属全家遭杀害，被逼流亡的家属400多户，达2000多人。

一、杀害区委副书记秦怀玉一家

中共博平县一区区委副书记秦怀玉的家住在博平县杜庄。他家是原博平县党的地下食宿站，全家老少昼夜轮流为同志们站岗放哨。伪军头目罗兆荣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944年正月初三的傍晚，亲自带领传令队来到杜庄，突然闯入秦家，企图抓捕秦怀玉。因为没有搜到秦怀玉本人，罗兆荣一伙随即把枪口对准了他的一家老小。一场耸人听闻的屠杀开始了：敌人首先将秦怀玉的父亲秦洪岭一刺刀挑死在茅房旁；二儿子秦西忠在一旁痛骂这伙匪徒，被罗兆荣唤人毒打致死；最小的女儿秦玉兰被敌人的传令兵活活劈成两半；母亲朱廷荣、妻子李月芝、大儿子秦西庆都先后被打死在院内；嫂子被打得死去活来，扔到宅外（后被救起）。当时，尸横庭院，血流满地。就这样，除秦怀玉本人幸免逃脱外，全家被罗兆荣杀死6口，杀伤1口。尔后，这伙强盗又将秦家全

部房产，土地霸占卖掉，片瓦未留。在这之后，罗兆荣仍不甘心罢休，宣称：“一定要打死秦怀玉，斩草除根，谁逮住或提着秦怀玉的头来见我，赏给小米1万斤。”

二、杀害我地下交通站长许庆路一家

许庆路，博平肖庄乡许寨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博平县委地下交通站站长。交通站就设在他的家里，全家老小肩负着接应护送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传递文件、报告敌情等任务。

1943年春天，日伪军推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的政策，罗兆荣将许庆路全家6口逮捕，关押在罗庄地窖里，人人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谁也没有吐露党的半点机密。在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罗部20名刽子手将许庆路和他65岁的爷爷许文柱、45岁的父亲许振良、14岁的弟弟小四、9岁的四弟小群、6岁的弟弟小五，五花大绑，押进罗庄西门外（罗兆荣在罗庄的杀人场），这一家祖孙三代6口被全部杀害。敌人行凶时，6岁的弟弟小五抱着躺在血泊中的爸爸的腿哭喊“爸爸、爸爸……”敌人连哭叫的孩子也不放过，用刺刀挑出了他的肠子，残忍地将他杀死。

许庆路全家被捕后，党组织曾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为此，年仅22岁的刘庆银被罗兆荣以“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罪逮捕，先铡去双腿，后铡掉两只胳膊，刘庆银疼得在血泊中左右翻滚，直到最后断气。

三、杀害侦察班长芦清泉

芦清泉，1922年出生在原博平县韩屯区魏田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1941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博平县

大队侦察班长。

1943年春，芦清泉在一次与罗兆荣伪军的战斗中负伤，敌人捉住他后，用铁丝捆住他的双手，押进菜屯伪团长徐冠五的据点。徐冠五为迫使芦清泉供出博平县抗日力量的情况，对他施尽各种残酷手段，但仍未得到任何东西。徐冠五卑鄙地说：“你叫声爸爸，我就放了你。”芦清泉骂道：“呸，你叫俺祖宗！”徐冠五恼羞成怒，命令20个刽子手将芦清泉拉到菜屯南松树林里，把他的手脚倒绑在树上，先是挖掉双眼，尔后，20把刺刀刺进芦清泉的胸膛，掏出了他的心脏，残忍地将他杀害了。

四、杀害副班长贾庆堂

贾庆堂，1915年出生在原博平县贾寨区贾天匠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去世，他跟随母亲过着艰苦的生活。1943年参加博平县抗日大队，任副班长。1944年冬季的一天，贾庆堂请假回家探望70多岁的母亲，被敌特发现后报告给伪团长赵士良。敌人出动一个班，半夜闯进他的家，将贾庆堂五花大绑押到贾寨伪据点，他年迈的母亲连惊带吓一病不起。赵士良为了从贾庆堂嘴里得到八路军的秘密，咆哮道：“要敲不开姓贾的嘴巴，我就不姓赵。”经严刑拷打审问，但毫无结果，赵士良凶相毕露，命令几个刽子手，将贾庆堂按倒在铡刀下。贾庆堂毫无惧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敌人慌了，残忍地把他的头颅铡下，并把他的头颅悬挂在据点外“示众”，妄图用这种办法来恫吓抗日军民。

五、杀害班长朱永山的父母

朱永山，原博平县朱启虎庄人，跟父母讨饭度日长大，1942

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区抗日武装，时任班长。敌人为了抓捕朱永山，于1944年3月的一天，先抓去了他年迈的父母作人质，肆意打骂摧残。伪团长罗兆荣亲自审问：“你儿子干什么去了？”二位老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罗兆荣骂道：“老东西还装什么糊涂，你儿子不是当八路军去了吗？”“你知道还问俺干什么？他是有头有脑、有胳膊有腿的，干什么去了，我们哪里知道呢？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杀要砍请便吧。”罗兆荣恼火了，对老人拳打脚踢，把老人打得死去活来，又喊来了刽子手，对二位老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但老人始终没有说出儿子的下落。最后，罗兆荣下了毒手，把二位老人活埋了。

六、杀害区委书记王曰俊

王曰俊，1917年生于原博平县西贾村，1938年入党，历任罗庄、花园、西贾三个村（这三个村均属伪顽的老窝）的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等职。

1944年12月25日，王曰俊在西贾村从事抗日活动时，被敌人发现。伪团长罗兆荣率一个团包围了西贾村，将王曰俊一家9口逮捕，押入伪团部罗庄监牢里，用尽了各种刑罚。王曰俊坚贞不屈，同罗兆荣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兆荣无计可施，于1945年1月底将王曰俊杀害，他牺牲时年仅28岁。

七、杀害杨瑞荣一家

杨瑞荣，原博平县杨庄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和弟弟杨瑞彬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1939年四、五月间的一天，他们正在牛胡村驻防，被特务侦知告密，该村立即被日伪军包围。因队伍初建，缺乏战斗经验，加之人少武

器缺乏，队伍很快被敌人冲散，杨家兄弟二人被捕，关押进博平监狱。敌人为尽快掌握当地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情况，三番五次地审问，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兄弟二人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对他俩下了毒手。一天，20多名日伪军将杨家兄弟五花大绑地押向刑场，用屠刀砍下了他俩的头颅。

杨家兄弟二人牺牲后，家中抛下年迈的母亲、两个媳妇和两个出生不久的孩子，他们相依为命，艰苦度日，母亲因精神受刺激过重，造成精神失常，昼夜疯癫着到处寻找儿子。不久，匪首罗兆荣又将他们全家孤儿寡母5口全部杀害。

日伪军残酷围剿大吕庄

杜富贵整理

大吕庄地处茌平、长清、禹城边沿，济聊公路从村南侧通过，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当时村里有150户人家，6000多口人，是茌平抗日隐蔽根据地的中心，是我党政军活动的依托。

日军侵占茌平不久，平原纵队司令管大同率部进驻大吕庄。古历正月十五小年节这天中午，正当部队欢庆节日吃水饺的时候，日军乘我军民不备，乘坐十七八辆汽车从茌平县城出发，直袭大吕庄。在距该村不远的小王庄，敌人用机枪、大炮封锁了大吕庄的唯一出口——南门（其他寨门已封闭）。面对突然袭来的炮火，管大同迅速判明敌情，一边率部队奋勇还击，一边组织群众突围。经过一小时的激烈战斗，绝大部分干部、战士和群众脱离险境，有10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50匹战马被枪杀，50辆自行车被日军用汽油烧毁。

日本侵略军冲进村后，对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战士、群众进行大肆逮捕、屠杀，仅几十分钟，就有20余名群众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共产党员李纪正和父亲一同被敌人用刺刀捅死；李清平、赵东鲁、赵山海、侯长贵、庞大方、李根贵和他的两个儿子均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六七十口锅被砸，80多间房屋被烧，30多头牲口被枪杀。

大吕庄在经受这场浩劫之后，人民群众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筹集枪支、弹药，建立了由150余人组成

的抗日自卫队，顽强抵抗敌人不断的扫荡、派粮、派捐、抽丁等罪恶活动，并常在济聊公路出其不意伏击敌人的运输队，截取物资、弹药，发展壮大自卫队的力量。敌人恼羞成怒，急于报复，1940年10月15日傍晚，在日军操纵下，伪旅长薄光三率3000名伪军对大吕庄再次进行围剿。敌人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包围了大吕庄，以主要兵力首先向东门发起攻击。由于自卫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对东门的进攻难以奏效，便把主攻方向又对准了北门。自卫队员们以土枪、土炮、手榴弹进行还击，一次次击退敌人的攻击。伪旅长薄光三气红了眼，他悬赏重新组织“敢死队”，并动用了督战队。进入下半夜，敌人向村里发起疯狂进攻，战斗空前激烈，因敌我力量悬殊，西门被敌人攻破。

敌人在付出伤亡500多人的惨痛代价后，攻入村里，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抓，见房子就烧，见牲畜就牵，见东西就抢，真是无恶不作。李清臣、李清法、李根贞、李根顺、赵法祥、赵法忠、赵法功、吕长河、李刘柱、李根富、李炳秀、李清溪、李根显、李根泉、李根贵等20多名自卫队员惨死在敌人的枪弹下。村民李钦忠被抓去活埋；64岁的老汉李法岭惨死在敌人的监牢里；60岁的李尉氏被敌人用刺刀刺进腹部，而后又豁开，肠子流了一地；赵亮海被捉去后，敌人逼问他：“谁是自卫队长？”他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敌人凶相毕露，枪口对准了他的头颅，从面部打了一枪，弹头从脑后飞出，又从左耳开了一枪，弹头从右耳飞出，脑袋被打了个十字花。赵学海的妻子李花香年仅22岁，怀孕7个月了，被敌人捉去，为不失节，她拼死挣脱，跳进了水坑，凶残的匪徒乱枪将她打死在水坑内。

敌人的这次围攻，给大吕庄人民带来惨重损失，有30多名自卫队员和村民遇难，部分群众被抓，500多人流离失所，500间房屋被烧毁，一夜之间，全村成了一片废墟。

大刘庄血案

杜富贵整理

1941年5月间，日伪军联合攻打在平抗日中心根据地大刘庄，造成了在平最早的一桩惨案。

日军侵占在平城后，大刘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村政权，建立自卫队和抗日群众组织，修围墙、挖寨壕、筑炮台，抗击日伪军的派粮、派捐、抽丁，成为对敌斗争较强的村庄之一。敌人为了征服这一带的抗日民众，把大刘庄列为重点突破的目标，以达到其“杀一儆百”的目的。1939年初至1941年夏季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敌人对大刘庄实施多次偷袭、围攻，均未得逞。

1941年5月中旬一天早饭过后，约四五百伪军，在队长刘光国的带领下，向大刘庄扑来。村民发现汉奸来了，便把他们阻挡在村外。刘光国气极败坏地把队伍拉到百米以外的柏树林里，对大刘庄进行疯狂攻击，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天空。由于村里防备严紧，自卫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敌人没有沾到便宜，只好败阵而归。

5月下旬，敌人对大刘庄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天早晨7时许，驻在平日军纠集伪军千余人，内有步兵、骑兵，还有五匹骡子拉着重炮，气势汹汹地向大刘庄扑来。对于敌人的这一举动，党组织事先曾派人送信，通知该村党组织掩护群众撤离，但干部群众过高相信自己的防御能力，没有估计到日军炮火的威力。约

10点钟，敌人在大刘庄外摆好阵势。在日军炮火的掩护下，伪军开始向西面发起攻击。瞬间，炮声震天动地，枪炮声响成一片。西大门轰开后，日伪军狂叫着，趁着炮火弥漫的烟雾冲进村里。敌人进村后，到处乱杀乱砍，虽然自卫队员、村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搏斗，终因敌众我寡，敌人攻占了全村。

在敌人这次对大刘庄的围攻中，有40多名自卫队员、群众惨死在日伪军的屠刀下。这天夜里，收敛亲人尸体的受害者家属的哭泣声，一直持续到天亮。

日伪军在冠县的残酷统治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冠县后，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方针。从1941年3月以后，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敌人把冠县划分为三类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三类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残酷手段，企图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

敌人对“治安区”侧重于“清乡”，建立伪政权，扶植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实行编大乡制。并村筑寨、清查户口、建立门牌、颁发身份证（即所谓“良民证”）。建立伪保甲自卫团，大肆抓丁、抓伕，扩充其军队，以加强其殖民统治。在经济上，严格控制粮食、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火柴、煤油等，实行派给制度。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组建伪政府，一方面发展伪军。从1939年6月至1940年初，伪政权从县到区基本建立起来，还逐步建立了乡、村两级伪政权。冠县的伪军也发展到200人左右。对于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疯狂地进行“封锁”、“蚕食”和大规模的“扫荡”。从1940年夏至1943年秋，日伪军在冠县境内的冠堂、冠馆等公路沿线和抗日根据地周围的重要村镇安据点7个，筑炮楼35个。占用良田三四百亩。为修炮楼到处抓人、要款、砍伐林木。炮楼周围村庄的林木几乎被敌人砍光了。与此同时，敌人还开挖了冠、堂封锁沟，企图封锁、摧毁抗日根据地。如1940年夏，敌人在王庄、东古城安

上据点，分别驻伪军100余人。1941年秋，在冠县廿里铺和贾镇西庄安据点，分别由日军12人、伪军30多人驻守，有时多达100多人枪。

随着日伪据点和炮楼的建立，敌人的扫荡日趋频繁，形式也多了起来，由突击、闪电式进攻，改为长期“清剿”和“驻剿”，由小股分散兵力扫荡，进而转变为集结数10县的兵力进行“铁壁大合围”。扫荡的次数和残酷程度日益加剧，从1939年冬至1940年秋，日伪军对桑阿镇、陈庄、六庄一带进行大规模扫荡达十次之多，每次出动兵力均在1000至2000人左右，并配备汽车、坦克等车辆。仅1940年6月6日、8日、10日、12日、14日（农历五月初一、三、五、七、九日），敌人就调集冠（县）堂（邑县）莘（县）3个县的日伪军1000余人对桑阿镇一带连续发动5次大扫荡。从1941年至1945年6月，日伪军昼夜突击的大小扫荡共达700余次，仅大的合围就有7次，即冠北4次，冠南3次。

在日伪军统治的8年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摧残。

1937年11月30日，驻馆陶县的日军血腥报复冠县葫芦营附近村庄，放火烧毁了宋村房屋500余间，杀害无辜村民5人，烧死大牲畜50多头，其他财产烧、抢一空。

1942年6月，日伪军合围王史村，放火烧毁房子360间，18户人家被烧光，70头耕牛被抢走，30多名群众被毒打，有两人被活活打死。连十几岁的儿童王明兴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1942年秋，日军在冠县赵固抓丁抓伕，其中有父子，有兄弟，大多数是青壮年，同时在路上拦截了许多来往行人，日军迫使人们双双相对互相碰头，于是父子、兄弟、亲友相撞，而日军却围成一圈取乐，如哪一个不用力碰，就遭到身后日本兵脚踢、枪打、刺刀刺，直到个个碰得头青脑破、血流满面，这些日本兵才罢休。

1943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十三日），冠、馆、邱、堂、莘

等13个县的日伪军4000多人（其中日军1000人，伪军2000，齐子修匪军1000人），从早晨7点到中午，对抗日根据地孔村进行疯狂扫荡。在这次扫荡中我二十四团、马河支队和冠县一区队受到严重损失，敌人用迫击炮、机关枪、手榴弹、狂轰滥炸，杀害抗日军民200多人，整个孔村变成了废墟。

同年5月，驻冠县日伪军400余人，突然合围东吕庄，妄图抓捕在该村开展工作的抗日干部。他们将全村群众集合一起严刑拷打，威逼群众说出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全村人民群众咬紧牙关只字未吐，恶凶的敌人使用鞭抽、棍打、枪挑，18名群众被杀害，3人成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村中财产被抢劫一空。

1943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八），冠县、临清、馆陶、邱县、聊城、堂邑、阳谷、寿张、莘县、大名、南乐等县伪军15400人，分15路对冠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的“铁壁大合围”。其兵力分布是：

冠、馆、邱方面的日伪军2000余人，汽车4辆，从冠县出发，分4路出击，一路奔十里营、二路奔兆寺地、三路奔黄城、四路奔梁堂。

由临清方面出发的日伪军2000多人，配有8辆汽车，2辆坦克，从贾镇出发，兵分两路：一路奔程村，二路奔申小屯。

聊城、堂邑方面出发的日伪军4000多人，汽车7辆，战马100多匹，由马桥出发，兵分三路：一路奔焦庄、二路奔桑桥，三路奔务头。

来自寿张、阳谷、莘县的日伪军4000多人，汽车3辆，战马100多匹，由燕店出发，兵分4路：一路奔大王，二路奔杨庄，三路奔马固，四路奔蒋店（属莘县）。

大名、南乐、龙王庙、金滩镇方面的日伪军2500多人，由龙王庙、金滩镇出发，一路奔阎村、李村，二路奔罗庄、大场。把冠南抗日根据地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包围、水泄不通。妄图一举将

我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全体将士一网打尽，彻底摧毁冠南这块红色根据地。

这次合围，敌人对白塔集及其附近各村（即我党、政、军、群机关常驻村庄）进行了空前未有的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凶残之重，在鲁西北根据地是史无前例的。在突围中，我军分区警卫排30多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于冠县前李赵庄村南交通沟旁。此外，敌人在前李赵庄村西将20多名无辜农民，剥光衣服推入井中害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水井”惨案。

1943年9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日伪军到斜店抢走抗日公粮2000余斤，冀南票子两麻袋，打伤了大批村民，抓走青抗先队长杨延祥，商店主任王胜武，村长郭金河、村干部郭增高，抢去耕牛数十头，枪支7支。凶恶的敌人将杨延祥折磨死于冠县狱中。

1943年12月20日，影庄据点日伪军100多人，夜袭柳行头，打死民兵班长王志江和5名群众，打伤致残多人，抢走粮食10000多斤，把全村洗劫一空。

1944年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驻冠县日伪军300多人，到菜庄集扫荡，抢走粮食28000斤，耕牛40头，打伤群众近百人，有140人被带走，抗日群众杜少荣、赵桂廷和菜庄集村除奸团长赵丹峰惨遭杀害，全村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1945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初十），冠县日伪军偷袭程村，打伤群众多人，1名民兵被杀害，村农会长潘连增、青救会主任王凤岭等13名抗日青年被捕入狱，72间房屋被烧毁。23日（农历三月十二日）潘连增、王凤岭在冠县北关被敌人砍死，并把2人的人头悬挂在树上。

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从1941年到1943年，全县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灾荒。仅1943年，在不足20万人的冠县就有21106人被夺去生命。据调查，大花园头村90户400

余人，逃荒要饭达90%以上。12人被抓丁，32名妇女改嫁，6名不满4岁的女孩子被卖掉，14名婴儿被遗弃，64人活活饿死家中，12户死绝。尤其严重的是冠县东部桑阿镇一带，蓬蒿蔽径，饿殍遍野，33个村就死亡了11000多人，广大农村被日伪摧残成罕见的无人区。

日伪军三次袭击官庄村

刘振生回忆 朱成震整理

官庄地处原东阿三区西部，与聊城相邻。全村有四百多户人家，两千多口人，1933年就有地下党员，1935年建立了支部，至抗日战争爆发全村已发展了20余名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官庄村抗日政权巩固，民兵组织较好，是支援抗日、反对资敌远近闻名的堡垒村。敌人视官庄为眼中钉，肉中刺，曾三次派军队前来攻打，大肆进行烧杀抢掠。

1941年秋，因官庄不向敌人交粮，敌人便调集300多名日伪军，于一天傍晚突然包围了官庄。由于民兵组织刚刚建立，战斗力较弱，敌人突破防线攻进村里，烧毁房屋100多间，抢去耕牛30余头，抢走衣服被褥等其他财物难以计数。

1942年古历十二月二日夜間，日军30余人、伪军100余人又一次包围了官庄。敌人遭到村自卫队、钢枪班的顽强抵抗。三区区队和军分区三团部分主力闻讯前来支援，打死日军3名。在战斗中，我三团团长梁仁魁负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向村外转移。敌人攻进村里，打死村民4人，打伤11人，牵走耕牛80余头，烧毁房屋十余间，其他财物也都被抢劫一空。拂晓撤走时，捕去我抗联主任刘殿楷。

日军为报上次遭打击之仇，在官庄安上据点，当月8日拂晓，又纠集东阿城里，广粮门、王小楼等据点的日伪军千余人，

再次包围官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党支部组织群众突围转移。在敌人的这次袭击中，敌人又打死村民3人，抓走十儿人（后来有的花钱赎回，有的被送往东北煤矿当苦力），抢走财物不计其数。敌人还扬言：“除石滚不要，其余全要”。

日伪作恶郭铁村 群众受尽阎王罪

韩育明回忆 朱成震整理

1940年端午节前几天，日伪军在东阿四区陈店子安上据点。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一支30余人的便衣特务队骑着自行车，携着长短枪来到郭铁村。他们自称“执法队”，进村后找到村长秦林儒（石匠），命令他交出村里的八路军和枪支。因为没有，所以也交不出来，特务们便把他捆起来打得遍体鳞伤，20多天不能下床。这天还放火烧了郭恒武开的医院，三间房子和药品、价值两千银洋的财物全部化为灰烬。从此，秦林儒不敢再当村长，全村人摊钱又请雷玉春、韩永泽当正副村长。

伪区、乡政权建立后，又成立敌特外围组织“新民会”。群众不愿参加，他们便威胁、利诱。凡不愿参加的按私通八路军论处，不发给良民证（此证出门必须随身携带），如外出经商、赶集、串亲访友，被日伪军特务查获，便遭逮捕，甚至有生命危险。有良民证，可领取为数不多的食盐、火柴等。群众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扫碱土熬小盐吃，用火镰、火石这种原始方法打火做饭。

村新民会长多数是汉奸（也有被推举的）。郭铁村的新民会长就是汉奸（土改时被镇压）。就是他把村里八路军家属的名单报告给伪区长王玉功的。也是他从陈店子据点带信回来要村长雷玉春通知八路军家属，限期把在外当八路军的亲人叫回来，如到时交不出人，就抓他们家属，家属不在，就抓四邻。闹得全村人

心惶惶，鸡犬不宁。最后村长和村民商定，给他们送些钱，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每家按地亩摊钱，每亩两块大洋。我家最穷，只有亩半地，交大洋3元。这样把钱交上，才免了一场大祸。

一天，伪区长在陈店子召开各村村长会议，威胁说：“皇军要每个乡交几个青年妇女（供这帮禽兽玩乐），如果交不上，皇军和执法队就到各村去抓。”结果各村商定，按地亩凑钱到济南去买几个妓女充数。四区共敛了多少钱、买了几个妓女不清楚，但常见到的有4个，每星期在陈店子、铜城两据点往返一次。

由于村长雷玉春、韩永泽对敌人所要粮、款想尽办法应付不交，不是说村里驻了八路军不好办，就是说收的粮款在往区里送的路上被八路军劫去了。这便引起了敌人的不满。1941年阴历十一月，伪区长王玉功以召开村长会议为名，把韩永泽抓起来，用尽酷刑进行折磨。直到春节，韩永泽才勉强起床。

敌人在占领我家乡期间，除要款要粮外，还抽夫抓丁筑碉堡、修公路、挖封锁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段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

疯狂的“四·二九”大扫荡

赵广善整理

1942年春，华北日军集结第十二军和独立第一、七、八、九混合旅团各一部及南宫、清河、枣强、武城、临清等县的伪军共3万余人。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岗村宁茨直接指挥，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此次扫荡，日军搞了两个包围圈，一是武城县以北的武官寨、饶阳地区，重点合围我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直属队以及新七旅旅部、二十一团和特务团、骑兵团等部队；另一个是邢济公路以南的临清县西部、邱县以东地区，重点合围我冀南四分区、四地委、四专署机关和新四旅。

在敌人进行扫荡以前，我对敌之动向和意图已有所察觉。冀南四分区根据冀南军区的指示，已经做好了分散兵力进行反扫荡斗争的准备。4月28日下午，孙毅民、张世盖率三十六团三营和军分区受训的3个县大队（威县、南宫、广宗）转至邱县邢济路以北活动，当晚到达威县南郭庄。

4月29日深夜，日军集结了万余人，北起邢济路，南至邱馆路，东至临清城，西至曲周城，秘密组成了包围圈，逐步向我抗日根据地摇鞍镇、贺伍庄一带缩围。29日拂晓，正在孝固村西头出操的四分区部队突然听到西边枪声大作，赵鹤亭团长立即率领该部增援西孝固村，杨宏明司令员命令部队掩护机关向东转移。敌人则尾随其后，枪声不断。与此同时，我其他部队也发现了敌人，孙毅民、张世盖率三营向临清务头村方向撤退。3个县大队

则向东北方向迂回，七七一团和十团在驻地与敌交火，杀伤敌百余名，遂分别向北、向西南方向冲击。十一团与敌人接火以后边打边向旅部靠拢，而旅部此时已经往东转移。上午10时许，军分区、地直机关和三十六团等部队先后聚集临清县杏园村附近。此时发现四周都有日军，我军被置于东西10余里，南北20余里的合围圈的中心，情况万分紧急。杨宏明司令员当即立断，命令部队分散突围，孙毅民、张世盖率三营向西南方向冲击。杨宏明、赵鹤亭率一、二营和分区直属队向东南梭庄方向冲击。而当杨、孙率部分别向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冲击时，均遭到了敌之重兵阻击，几次冲杀都被挡了回来。之后，杨宏明、孙毅民又向北冲击，当部队回冲到姚尔庄村东时，杨宏明司令员不幸中弹牺牲。袁鸿化率部继续向北冲杀，当行至摇鞍镇与西大屯两村之间3华里长的交通沟时，又遭敌密集火力封锁，几经冲杀均未成功，部队伤亡很大。下午3时许。突然天空狂风大作、战尘飞扬，天昏地暗。我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一阵猛冲，终于冲开一条200余米的突破口，尔后向北突围。转战途中，孙毅民主任不幸牺牲于务村东头。5时许，突击部队先后到达下堡寺安全地带。

在此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荣、十团团团长陈子斌、十一团政委桂承志等200余名干部战士。四专署秘书长宁心力被捕（后牺牲在东北），同时还抓去我基层干部、青年群众百余名。由县委书记刘殿臣率领的临南游击大队，在临清贺伍庄一带也遭到日伪军的合围，突围时死伤、被俘战士10余人。

在武城以北、饶阳地区战场，在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的率领下，我军与敌之战斗也十分激烈。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战斗中，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王一夫、武城县公安局长梁振芝、清河县大队大队长张利民等干部、战士200余人，在武城霍庄一带壮烈牺牲。

“四·二九”大扫荡以后，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从此，冀南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面对敌人的分割和封锁，我各级党组织和抗日军民，改变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并依靠革命的两面政权与敌人周旋，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日伪军在阳谷的残酷统治

崔衍峰整理

抗日战争进入到 1939 年，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进攻频频得手，我华北绝大部分领土已处于日军野蛮蹂躏之下。聊城、莘县等地均告陷落，日军以德州为中心，向我鲁西、鲁西北地区进犯。日军在正式占领阳谷县城之前，即于占领范县老城之后，对阳谷县境西南一带进行骚扰破坏，制造了“子路堤惨案”。1939 年阴历二月二日，日军及伪军千人携大炮、汽车进攻阿城，守军激战后溃退，无辜群众 112 人遇难，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二月二惨案”。

1939 年 8 月，日军在汉奸郝师温策应下，占领了阳谷县城。建立了日伪统治机构，组织了大批汉奸武装，从此，阳谷人民在日伪法西斯统治之下屡遭劫难。

日军中队

日军 300 余人占领阳谷后不久，大部调走，只留一个中队。他们分为 3 个小队，其中 2 个小队驻阳谷县城，1 个小队分驻安乐镇、七级、阿城、张秋、郭店屯、石佛等地，共计百余人。中队长分别为细木大尉、神崎中尉、渡边中尉、露木中尉、清川中尉、国井中尉。

日军中队在阳谷的任务是执行殖民政策，“讨伐”抗日力

量，奴化人民，企图建立理想的“皇道乐土”。1944年下半年，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日军为适应国际、国内战争需要，绝大部分兵力撤走，留下顾问1人，指挥汉奸武装及傀儡政权继续与我为敌。1945年7月，阳谷县城解放，其顾问川崎少尉被俘，日军势力全部清除。

日军在县城周围“讨伐”情况：

1940年1月，日军驻聊城丹羽部队率驻茌（平）、博（平）堂（邑）各中队计兵力300余人对聊（城）、阳（谷）、莘（县）3县边境进行反复“扫荡”，所到之处，人民备受骚扰。

1940年4月，日军驻聊城吉川部队率茌、博、聊、堂中队计300余人，在阳谷县安乐镇、胡楼一带“扫荡”，烧杀抢掠。

1940年夏，日军驻兖州师团集合所属各部队联队到范县“扫荡”1个月，途经阳谷，与我抗日力量发生激战，无辜群众备受灾难。

1941年春，驻阳谷神崎中队在阳谷古柳树一带游动，与我军遭遇，发生激战。

1941年秋，日军驻聊城吉川部队联合汉奸齐子修部队在阳、聊、莘边境“扫荡”4天，所到之处抢掠成风。秋后，吉川部队并临清联队一部，率日伪鲁西“剿匪”司令赵荣寿（赵长显、赵二虎），在七级、阿城一带“扫荡”，后赵二虎部驻防七级、阿城一带。据伪县长董政华称：“此次扫荡，人民受害甚烈”。

同年秋，日军驻阳谷国井中队在郭位陈一带骚扰村民。

1942年春，日军驻兖州柳川师团，命驻聊城土田部队，对七级至张秋一带“扫荡”

同年秋，日军驻阳谷清川部队30余人，在郭位陈与我军遭遇，大部被消灭。

同年秋，日军进行“九·二七”大“扫荡”，抗日武装受到严重损失，基层政权大部被冲垮，人民饱受劫难。

1943年10月，日军集结聊城、东阿、阳谷、莘县及济南日军各一部，对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在聊阳阿边区大杨庄、小冯庄一带将阳谷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包围，我方受到严重损失。

日本宪兵队阳谷分遣队

1939年10月，日伪占领阳谷县城不久，即在县城西街成立“分遣队”这一宪兵特务机构，直属德县宪兵队领导兼受聊城分遣队指挥。队长：管秋彦、中山良一；宪兵伍长2人：何川、小野；补助宪兵2人：西里麻、艾一哥；翻译1人：桂林熊（朝鲜人）；另有3名中国人，均有调换。1941年10月，聊城日军宪兵分遣队撤走，阳谷分遣队就此垮台。

阳谷日本宪兵分遣队是日本侵略军设在阳谷的特务机构，负责搜集我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对全县人民施行殖民政策，领导汉奸政权摧残抗日力量，以保证其部队“讨伐”的胜利。这是日军侵占阳谷期间日伪方面的最高权力机构。

该组织直接领导日伪警察所，其势力可达每个系统。在1940年6月至11月，日本宪兵队与日伪警察所特务系大肆残杀我党地下人员和革命群众，曾先后在阳谷城内西北角苦奶奶庙处，残杀我党政人员及无辜群众30余次，440多人，使我遭受极大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

1、1940年6月的一天晚上，日宪兵队与伪警察所特务系长王文山率30余人，从监狱提出我方人员18人，在苦奶奶庙外，由日本宪兵用刺刀刺死12人，王文山等刺死6人。

2、同年6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12人，其中，日宪兵用刺刀挑死7人。

3、同年6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11人，其中，日宪

兵用刺刀挑杀6人。

4、同年6月，上述人员中由特务系警卫，在相同地点，日宪兵用刺刀挑死6人。

5、同年6月，日宪兵队指派王文山率剿共班10多人配合，用刺刀挑死5人。

6、同年6月，日本宪兵队在苦奶奶庙处用刺刀挑死2人。

7、同年6月，日宪兵队在相同地点用刺刀挑死4人。

8、同年7月的一天晚上，日宪兵队在相同地点杀死4人。

9、同年7月，日宪兵队在相同地点用刺刀挑死3人。

10、同年7月，日宪兵队及王文山剿共班在苦奶奶庙处杀死10人，其中，日军挑死6人。

11、同年7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9人，其中，日宪兵挑死4人。

12、同年7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日宪兵队用刺刀挑死8人。

13、同年7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7人，其中，日宪兵挑死4人。

14、同年7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16人，其中日军挑死11人。

15、同年7月，日宪兵派王文山带剿共班20余人，杀死15人，其中，日军挑死10人。

16、同年7月，日宪兵队与王文山剿共班杀死20余人，其中日军用刺刀挑死14人。

17、同年8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23人，其中，日军挑死16人。

18、同年8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22人，其中日军挑死16人。

19、同年8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21人，其中日军

挑死14人。

20、同年8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19人，其中日军挑死14人。

21、同年9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24人，其中日军挑死18人。

22、同年9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由日军将我方44人全部挑死。

23、同年9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13人，其中，日军挑死8人。

24、同年9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17人，其中，日军挑死12人。

25、同年10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杀死11人。

26、同年11月，上述人员在相同地点，由剿共班将我7名人员活埋。

阳谷县新民总会

1939年日本侵占阳谷后，为全力施行殖民政策，摧残我党地下组织与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强化其反动统治，即于1939年8月在阳谷城内东街成立了“大日本宣抚班”，内设5人，班长日本人林浩美，班员冲田竹史，另华籍人3名。是年12月，改为新民会指导部。1941年初根据省新民会指示，进行组织与人员改编，新民会指导部改编为“中华民国新民会山东省阳谷总会”，伪县长董政华兼会长，次长林浩美。下设三个科，总务科长徐仲德、宣传科长贾振远、训练科长高鹤清、直属东临道管辖。1943年林浩美调走，由日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派及川忠男任顾问。为进一步扩展壮大力量，摧残我地下组织，严禁进步力量活动，按照伪省新民会指示，进行了组织改编。会长仍由董政华兼任，

及川忠男任顾问，事务部长贾振远。内设3个科，第一科长徐仲德，下设人事、会计、庶务文书3个股。第二科长李清白，下设组织、经济配给、宣传3个股。第三科长张云峰，下设情报、保家自卫2个股。是年9月，日本顾问及川忠男和第二科长李清白为了加强搜集我军政情报，控制我党地下组织活动，及时全面掌握可靠情报，即将阳谷县的10个区域划为3个片，把接近县城的一、二、五、六、七这5个区称为“治安区”，把离县城较远的我力量较强的三、四、八、九、十区称所谓“匪区”。各区建立区分会，并设立新民会办事处。该组织曾先后发展人员45名，公开职务为新民会会员，其发展对象多系伪政府的党团政人员、商人和考入训练的学生等。其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我军政情报，进行反共宣传，组织各分会支会，制定反动计划，协助日军收集钢铁制造军火，招募劳工，组织成立伪合作社实行配给制度，掌握粮食，检查货物流通，随军讨伐抢劫民财等。1945年1月，直属东临道管辖，当1945年7月阳谷解放时，顾问及川忠男及贾振远、李清白等人分别被我捕获，该组织崩溃瓦解。

罪恶活动：

1943年3月阳谷新民会改编后，及川忠男经常向其组织布置搜集我军情报、进行反动宣传等任务，给我方造成很大危害。该组织曾搜集情报200余次，抢劫民财、粮食、牲畜等不计其数。

1943年4月，新民会成员密报我县大队和区队在城北土山寺一带活动，致使敌人对我偷袭，我军死伤5人。

1943年7月，其成员侦察到我三团和县大队、区队活动在簸箕柳一带，报告日伪后进行偷袭，我军死伤50余人。

1943年9月，其成员到坡里侦察我军情况。当夜，敌伪出动500余人袭击我军驻地，致我军被俘11人，后送到城内监狱，不久，送到日本服劳役3人，后来1人死在日本，其余2人日军投降后回家；押往济南4人，至今生死不明；用钱赎回3人。

1944年9月，及川忠男和李清白、丁兴珠等新民会员配合汉奸大队到七级一带“讨伐”，抢粮700余斤，牵牛11头，抓捕群众6人送往外地当劳工，至今生死不明。

阳谷新民会曾举办了3次青年训练班，招100余人，向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其内容是：如何建立保甲，组织情报网，学习日语、东方文化，进行乡村教育等，训练后派到县总会或区办事处进行活动。

1944年10月，及川忠男和李清白、郭长秀、丁兴珠等配合保安队催粮，至安乐镇区一个村上，以“八路嫌疑”为借口，抓捕群众4人，后用钱赎回。

1945年4月，张云峰报告七级东西金庄一带有杨勇部队一个营和县大队计500余人，敌治安军一个营、保安队一个大队及驻安乐镇伪军进行合剿，被我击退。

日伪阳谷县警察所

日伪阳谷县警察所成立于1939年10月，它是日本宪兵分遣队统治人民依靠的“柱石”，是彻底的反共反人民的极端反动组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正牌的日特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我方情报，缉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及抗日干部群众。它的爪牙遍布全县各个集镇角落。

警察所编制如下：总所（设在城内），下设督察室、警务所、警法系、保安系、特务系；特务系下设剿共班、经济班、内勤班。1943年7月，设立经济系，同时特务系改称特务保安系。外设4个分所：一分所驻城内，二分所阿城，三分所安乐镇，四分所郭店屯。又下设7个分驻所，分别驻阿城、张秋、龙王庙、张楼、七级、仓上、司庄。以下又设了13个派出所，分驻曹寺、古柳树、石佛、簸箕柳、龙王庙、徐楼、定水镇、阎楼、邵楼、

北关、赵伯升、汽车站、王子仪。

其头目分别为：

所长 曹鸣彦（1939年10月～1941年冬）

代所长 啜允南（1941年冬～1942年3月）

所长 傅世华（1942年3月～1942年6月）

王嗣连（1943年6月～1945年6月）

阳谷警察所在它存在的几年时间里，以王文山为头子的特务系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自1940年6月至11月，以王文山为头子的特务系剿共班积极配合日军，在城北苦奶奶庙处，集体屠杀我党政军民30余次，440余人。其暴行据不完全统计，计有：

1、1940年1月，特务系长王文山率特务十余人到城南孔庄，企图抓获我方人员孔庆兰未逞，将其房屋全部烧掉。

2、1940年3月，王文山率20余人搜捕张海村我情报站长张俊田。

3、1940年3月，王文山率众至岳海村，企图抓获我抗日县长岳舜卿未果，恶毒地将其房拆毁拉往县日伪警察所。

4、1940年3月，王文山率众抓获抗日群众商××，后花钱保出。

5、1940年4月，王文山率十余人到陈村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李成文。

6、1940年6月，奉伪县长董政华命令，王文山率众滥抓我高庙王村百姓百余人。

7、1940年6月，王文山率众20余人，抓捕高庙王村共产党员、战士刘福林，后送往济南杀害。

8、1941年4月，特务系齐长甲、金如祥等抓捕抗日村干张振华严刑拷打，后张遭惨杀。

9、1941年5月，孟虎臣等特务抓捕白庄自卫队长胡凤来，

后花500元赎出。

10、1941年6月，孟虎臣等特务抓捕冯集抗日村干冯洪峨严刑拷打，后由村保出。

11、1942年7月，王文山率众到高庙王抢麦子万余斤，并以“八路嫌疑”威胁，坑骗群众。

12、1943年秋，我军驻孟楼、于便村时，特务侦知后报告日伪军，致使我军临战处于被动状态，牺牲4人，受伤4人。

13、1943年9月，我军驻坡里一带时，伪警察所配合治安军、保安队700余人围攻，致我一个班11人被俘，10人被押往阳谷，后送日本服劳役，其中5人死亡。

阳谷县警备大队

1941年，阳谷伪政府秉承日军旨意，组建日伪阳谷警备队，该组织作为日军帮凶，屠戮我抗日军民，对我抗日力量是一个较大的威胁。从其成立到阳谷解放，警备队经过几次改编，达到2000多人。

1941年到1943年，伪县长董政华兼大队长，长田（日本人）任指导官，于卓然、刘继春任大队副，下辖5个中队。1943年经过第一次整编，编数为2个大队，共辖6个中队和一个骑兵团。1944年第2次改编，县长朱璞如兼大队长，辖5个大队，计24个中队。1945年第3次改编，辖7个大队，计24个中队及一个骑兵团中队。

1944年2月，汉奸刘继春在其主子授意下，建立了隶属警备大队的便衣队，又名暗杀队，负责对共产党、八路军、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暗杀活动，对解放区进行骚扰，这是一支顽固的反共反人民的特务队。它大部分在夜间活动，装备是一色短枪，特殊情况下也使用长枪，穿便衣。全队共11人，5月，增加一个小

队，共20多人，分为两个班。队长分别为石福带、李德成、郭守坤。

1945年正月初二，便衣队在门庄东门打死抗日群众许钟田，在城关王家坟，打死我地下工作者杨万林。

1945年2月，便衣队诬陷大年锅的李方泉是农会干部，私通八路，将其砍死在门外围壕里。

1945年3月，刘继春率汉奸大队和便衣队全体到张湾村，抓捕农会、模范班队员12名，在城内砍死6人。

1945年3月，便衣队砍死了抓来的群众徐士慙；3月26日，用标枪挑死八路军战士侯继成。

附件

山东省阳谷县 冬防军警自卫团联合办事处总结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一日起至三十年一月三十日止)

.....

(3) 三月来剿匪次数

查该县最近3月来蒙友军之协助派警察警备自卫团官警士兵情报员宣传队通译等多由知事带领宣抚及讨伐次数及地点状况列后。

10月13日，警备队指导官孔队长带士兵16名赴郭店屯一带讨伐未遇。

10月17日，警备队指导官率中尉小队长孔海亭带官兵19名，友军50人宪兵队2人警察所官警6名，自卫团21名赴三区一带讨伐，在方庄遇徐翼、王大鼻子、刘保镜三匪徒400余人，服装不一杂色枪支，激战2小时之久，匪不支向东逃窜，获马4匹，自行车两辆，友军获步枪4支，我方无损伤，匪伤33人。

10月24日，警备队指导官率孔队长带士兵30名赴三区定水镇乡殷坡一带讨伐，系王本昭匪徒，闻信远窜未遇。

10月28日，驻石佛庄少尉分队长潘松林带官兵8名自卫团员35人，早8点30分由石佛出发游击在沙集庄遇葛传祥匪徒10余人，杂枪便衣，激战40分钟，毙匪1名，获匪枪一支，匪即溃散，鼠逃无踪。

10月30日，驻安乐镇警察所一等巡官房振东带警8名，警备

队分队长李泽禄带兵8名，自卫团员30人在义和乡蒿铺庄办案遇徐翼、王子恒2匪徒50余人，下午2时相遇，激战半小时，匪不支向东逃去。

11月15日，驻安乐镇中尉队长周长安带士兵14名，驻石佛调来士兵10名，警察8名，自卫团8名，共计120名，在四区康平乡刘庄青法寺与伪县长徐翼匪徒400余人激战5小时之久，匪势不支向东北一带窜逃而去。

11月16日，警备队少尉小队长潘文章带士兵36名随友军赴朝城南甄庄与八路军毛泽东部万余人战斗3日夜，敌退，随友军回县。

11月20日，驻安乐镇王系长带警9名，会同警备队自卫团在安乐镇东门外迎击夜袭徐翼伪四区长王子恒、刘保镜等匪徒70余人，混战一小时，匪不支向东方逃窜而去。

11月21日，县知事率警察警备自卫团等70余人，赴三、七两区检阅，在郭店屯乡李庄遇伪三区长王筱湖50余人，战一小时，匪不支向西北逃去。

11月22日，驻防安乐镇一等巡官房振东带警9名，会同自卫团巡查在安乐镇东遇徐翼匪徒50余人，激战一小时，匪不支向东方逃去。

11月23日，驻防安乐镇中尉队长周长发带士兵会同友军6人自卫团40人共56人赴第四区武安乡周庄与八路军肖华部及伪县长徐翼、伪区长王子恒、王筱湖等匪徒50余人战2小时，方将歼灭，该敌大部增援约500余人，至复战1小时，匪即向东移退，因众寡悬殊，未便追击，即回防次。

11月29日，县知事顾问会同友军司令官宪兵队长警备队警察所自卫团官兵60余人，赴二区勾庙乡常楼讨伐，伪县长徐翼及伪二区长徐亚洲等匪徒300余人，激战3小时，匪不支，向东方逃窜，因众寡悬殊，未便穷追。

11月29日，驻防三区石佛庄班长孟抚卿带队11名会同自卫团副徐清泗灭共清乡队队长贾守仁率领自卫团员、黄沙会员200余人，在店东张庄一带与王魁一匪部400余人作战，战斗激烈，3次冲锋，历5小时之久，率将抗匪击溃向西北逃窜而去，查事后匪部伤亡约数10名。是日晚8时，徐团副清泗率团丁20余人，赴孟庄一带巡哨，适遇该匪大败后，旧仇发生遭遇战，匪势浩大，我方团员移徐庄，据守该团众四面包围，掷弹如雨，激战通宵，四面火起，匪即呼哨而去。事后查实，我徐团副手部受伤，团员伤亡40余人，匪部伤亡十余入，惟百姓受害及损失甚重业已呈报备案。

以上三个月来，计治安肃清出剿数74次，讨伐遇匪16次，随友军押车赴朝城5次，莘县会哨2次，赴寿张接伤兵1次，宣抚8次，应援2次，检索12次，其余系游击巡查，护修公路及防修电网等工作。

日军在阳谷罪行录

阳谷县政协文史组整理

1938年4月4日（农历三月初四），日军百余人路经子路堤，发现村里有红缨枪，便蛮横地把群众赶出，把枪刀收起来捆在一起，强行把该村自卫团和枪刀一起带走。刚到村南头，臧佃信、臧景文等乘敌人不备，抽出刀枪猛向敌人刺砍，肉搏战约1时许，当场刺死日军10余人。后敌人开来铁甲车增援。在敌人猛烈火力下，臧佃信等23人壮烈牺牲。

1939年1月25日，范筑先抗日二支队（高团）驻薛寨，给群众演剧进行军民联欢。日军乘机进犯，遭到激烈抵抗，日军死伤多名（其中军官1名）。部队转移后，日军占了薛寨，烧毁房屋400余间，杀害群众十余名，伤2名。

1939年3月，日军从莘县出发向阳谷一带扫荡，走到胡马庄，强迫农民张景海、孟宪忠带路到安乐镇。走到岔路口时，张、孟把日军引向了岔道，还没来得及找人给安乐镇送信，不幸被其发觉，敌人用刺刀将2人挑死。

1939年3月22日（农历二月二）日军由聊城、东阿等地出发侵犯阿城。当时驻防阿城的三十九军冯寿彭部死伤百余人，群众被杀112人，房屋被烧千余间。

1939年农历二月二，日军在阿城大屠杀之后，乘机进犯寿张，打死打伤阻击日军的区队和保安队12名，杀害我无辜群众岳修林、吴景福等多人，并将从阿城带来的17名冯军俘虏全部刺死。

1939年农历三月，日军2次进占寿张城。农历五月十九日，日军第3次进占寿张城并长驻下来。日军这两次进城，照例烧杀抢掠，闹得乌烟瘴气。占驻寿张的日军，还经常下乡骚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甚至将妇女轮奸后杀死取乐，灭绝人性。

1939年农历六月，日军300多人由细木中队长率领，又一次从莘县向阳谷扫荡，并占据了阳谷城。驻阳谷日军向城东龙虎寨、华陀庙一带骚扰，敌人把全村男女老少集合到场里，威逼着交出我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当场挑死农民梁登月、刘佃作，教师钟本成等7人。

1939年农历八月初四下午，日军在安乐镇周围大扫荡，晚上住在西李楼、郭庄、赵庄等村，到处抓人抢东西，奸淫妇女。对逮捕群众拷打审问，逼着说出八路军在哪里。李梅田被炮弹炸死，李中华被机枪射死。共抓群众42人，杀死5人；牵走马67匹，烧毁房屋34间。附近村里的群众都逃往古城屯东南赵王河滩躲避，李玉亮妻分娩三天也跑出去，因受风寒惊吓得病，小孩受风死掉。第二天天还没亮，青年农民李西方、郭小方回村打探消息，被日军抓住，日军说他俩是八路军的侦探，用刺刀刺死。

1939年8月，日伪在郭店屯安上据点，住日军三五人或十余人监督，并经常带领伪区队下乡扫荡。1940年2月在黄庄抓人打人，严刑审问打死农民徐俊民。又一次在后梨园住了一夜，抢走群众财物，将一没法逃走的女盲人打死。

1941年1月20日，日军500人，伪军1500余人由聊城出发围攻大杨庄，用刺刀挑死杨学正、杨学敏、杨庆保、杨建化、杨庆起5人，烧毁房屋200间，财物损失甚多。走时，又从阿城带走30余人，家属花了1000多元才将人赎回来。

1941年农历四月初七，日军和汉奸特务连在寿张城西门外把逮捕的我4个同胞绑在4根柱子上，作为练刺杀的靶子。4个日本兵各持刺刀，站在10丈多远处一条线上，听到口令猛窜上前，

“嘿嘿”两声，明晃晃的刺刀刺入我同胞胸膛，然后把刺刀再插在水桶内涮去鲜血，这样反复轮刺，直到我同胞死去。

1941年10月，日军百余人由济南经东阿来阿城一带扫荡，赵二虎带汉奸队随同。下午到达朱楼，把衣服财物抢光，鸡鸭猪羊等连吃加糟踏都给毁掉，缸盆家什砸个粉碎，轮奸没跑掉的妇女，还屙屎在锅里，烧得四处冒起黑烟。

1942年6月16日，日伪千余人扫荡大杨庄，抢去耕牛50余头，大车6辆，粮食5千余斤，并带走56人，后来花了1万余元才赎回。

1942年7月12日，日军由济南出发，加伪军共700人扫荡大杨庄，杀2人（井福代、杨庭掌），挑死1人，伤一人（郑保甫），烧毁房屋6间，带走10余人。

1942年7月17日夜1时，东阿、阿城、阳谷日军约200余人和剿共班一起包围大杨庄，周云章全家被打，内人受伤，周被捕去，我情报员杨明亮被日犬咬死在七级东门外。

1942年“八·二三”大扫荡，日军搞“铁壁合围”，四面压缩。十五里园未跑得及的张乐文被敌人用枪壳砸得不能动，他的黑毛驴也被牵走。张圣伦酒铺的酒被喝光，纸烟拿去，还被痛打一顿，八九岁的孩子张君珍吓得哭了起来，也挨了一巴掌。张君跑到东洼地里，被追上挨了一刺刀。在王堤口南金堤上，敌人抓住王传信，用刀杀死，刘海、刘宗贵在村前藏粮食收包袱被枪打死，20多岁的贾小头被用刺刀挑死，50多岁的贾怀福藏在院中夹道里被翻出来，打得头破血流。白区长因掩护群众逃避，自己来不及躲藏，被抓住用刺刀刺死。被抢去东西、宰杀鸡鸭羊猪无数、日军还在锅里拉屎，在水缸里撒尿。

1942年“九·二七”（农历八月十八）大扫荡，日军向我根据地全面合围。在张秋地区钱楼、窟窿石、桑段营一带，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40多人。在堤南的顾庄、

金庄一带用机枪打死打伤群众60多人，敌人还用汽车载走好几百人。在朱庄、东邵庄一带用机枪扫射，死伤群众70多人。在寿张地区玉皇岭和苗口大洼，不少群众也死在日军刺刀、机枪之下和烈火之中。在旧城，日军把群众赶到猎圈里、土坑里，除了实行屠杀外，还把青壮年用汽车运去做苦工。

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合围圈压缩到阎楼一带时，古柳树、张楼据点的汉奸出来接应。双庙苏4个青年来不及跑，藏到东屋里，被日军堵住用机枪射死。王中穿一身紫花衣裳，被抓住后硬说他是八路军，后用汽车载到聊城严刑拷问，活埋了。关庄杜金钱在地里做活，日军抓着就摔跤，摔不过他就用刺刀挑了。温碾村霍兆平、霍兆雷、朱佃彭等5人也被枪杀。粮食、家具、大车都被集中起来烧毁，翻箱倒柜，抢走细软衣物，家畜家禽一扫光，连几斤的小猪都给吃了。

1943年正月初四，日军汉奸24辆汽车扫荡毛坊，吃、拿、烧，屎尿在锅里、面缸里，连棒槌也给抢走了。又一年8月，日军汉奸闯进毛坊，挑死了王怀如，吓死王文田，抢走14头牛，走时还放了一把火。

1943年10月12日，日军纠集聊城、东阿、阳谷、寿张、莘县及济南一部分兵力，进行最后一次大扫荡。在聊阳阿边区大杨、小冯一带包围了阳谷县抗日政府和基干大队，将我军政人员和群众80余人，用铁丝穿透胳膊，装汽车载到济南埋了。专署民政科长吴亚乌、县委宣传部长张冠军被枪杀在小冯附近沙滩上。群众死亡53人。这次扫荡，敌人采用合围、蚕食清乡等毒辣手段，从“准治安区”（游击区）开始，慢慢向我根据地压缩。在寿张一带，到了距寿张城8里的赵升白就开始抓人，抢东西；在岳楼、西鲁强奸幼女1人、妇女3人，把3个老乡毒打之后，栽到水缸里饮足水，又用皮鞭打，用皮鞋反复践踏，弄得死去活来。敌人到了裴城寺北边朱那里附近，受到我军阻击。我军转移后，敌人

便向群众进行报复。从朱那里到曹岭10华里的路上，就杀死烧死10余人。这次敌人扫荡，群众死伤近百人。

1943年一天，日军骑马在阳谷东关把1个孩子的头踏烂。驻周庄日军拿活人当靶子，把1个老大爷的头打烂，他们却狞笑起来。

1944年的一天，日军汽车在阳谷街上横冲直撞，轧死1个老人，连车也不停就飞驰而过。

据以上材料不完全统计，日军在阳谷烧杀抢掠20多起，即杀害我同胞五六百人，烧毁房屋、抢劫财物无法计算，对阳谷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原载1982年8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三辑）

日伪军在聊东南的罪恶统治

梁金忠回忆 冯文德整理

1941年，齐子修九旅副参谋长王克庄和该部营长赵振华、朱耀武、傅崇鲁率300余人公开投降日军，被编为“鲁西剿共第一支队”，王克庄任司令，下设3个中队，赵振华、傅崇鲁、朱耀武分别担任中队长，后被派到聊东南抗日根据地三区（顾官屯一带）柿子园、东赵庄、马海子、小姚庄、高屯安设据点。1942年春天，齐部八旅的团长田福州，率一营营长李寿朋、二营营长李顺德600余人投敌，同年秋调往抗日根据地二区（于集一带），在魏庄、姚庄、王希庄安设据点。以后齐部六旅旅长王奎一的团长郭培德，也率部投敌。由于齐子修部三次投敌千余人，这就大大增强了日伪军的军事力量，对筑先县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的威胁。

陈玉怀还勾结日军，暗地投降后，首先在花牛陈安设了据点。1939年秋，冯庙村的反动分子冯玉柱（1941年6月被活捉枪决）也投靠了日军，被任命为前高乡乡长，后来在孙堂枪杀了抗日人员董杰山，纵使日军在刘道之村安设据点。1940年8月，又带领日伪在周庄、王官庙安设据点，同时将乡公所由刘道之移往周庄。由于齐子修部九、八、六旅部分人员投敌，日伪力量增强，相继在周店、前高香坊、赵鸭庄又安设了据点。至此，二区西、北、东部尽是日伪据点，只有前高香坊据点以南连海、孙堂、刘南皋、八大寨、东西太平等不足20个村方圆10华里左右的抗日根据地。

1942年10月，赵振华（解放后被处决）带领驻聊日军六七十人，伪军千余人，在蓝枪会数百人的协助下，在占领区强行抓民夫几千人，乘大“扫荡”之际，在我抗日根据地要塞之处魏庄、刘皋、太平庄3村之间安设了3个据点，在姚庄、王希庄也筑起炮楼。至此，二区抗日根据地内，也出现了碉堡林立、一片白色恐怖的景象。敌人据点之间的距离，远者四五里，近者二三里，整个聊东南统统变成了敌占区。筑先县抗日政府和县大队活动在敌人的间隙地带，在群众的掩护下坚持对敌斗争，环境是相当残酷的。在1941年至1944年底期间，筑先县二区人民遭受日伪蹂躏之苦，不堪回首；日伪之罪恶，罄竹难书；人民损失之大，难以计数。我的祖籍在聊东南乡，现将我在筑先县二区（于集）所见所闻日伪残害百姓、镇压革命的罪行简述于下。

（一）

凡日军安设据点的村庄，四周都筑有二丈多高的土围子，围墙外面有两道一丈多深的沟壕，寨门修有吊桥。在据点内，伪军认为无用或不利防守的民房一律拆除，把农民驱之村外；据点外，一里以内的枣树和成材树木全部锯掉，用枣树枝制作鹿寨，木材修筑据点，加固工事。建筑一个据点，往往需要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据点附近村庄的群众，天天出夫修寨打墙。冬天水结冰没法和泥，就用群众的柴草烧开水和泥，群众稍有怠慢，就用棍子打，甚致扣押起来。

伪乡公所的人员，按各村地亩多少，向各村派民夫、要给养、烧柴等，对群众横征暴敛。哪个村稍有欠缺，即扣押民夫或扣押村长，并且还要罚款。

二区在抗战前，是聊城有名的产枣区，枣树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自日军在这一带安设据点之后，全区

枣树所剩无几（栽一棵至少需要30年才能高产结枣有收入）。在聊东南地区仅此一项，不知要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

（二）

日军为了消灭抗日政府和抗日游击队，在据点星罗棋布的二区地面上，又挖了交通壕、封锁沟，在交通要塞又修筑了炮楼，以阻止我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从聊南谭庄至周店、魏庄、王官庙、东阿西程铺、花牛陈到聊东南王虎庙，相连有100多华里的封锁沟。因封锁沟之故，两村虽只相隔几里路，却年余路断行人绝迹。如我村赵庄与太平庄、魏庄、杜庄几个村相距只有三五里路，从1942年秋到1943年秋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相互之间都没有人来往过。稍有不慎被日伪发觉，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三）

日伪军和土匪一样糟踏百姓，据点周围的群众家十室九空。老百姓的家具房屋，日伪军随意拆烧，衣服食物全被拿走，多数群众被苦难生活所迫只得求亲告友流落他乡。记得一天，王官庙的十几个伪军到我村抢掠，他们挨门串户，抓鸡抢东西，大包小裹满载而归，临走时还牵走了几头大黄牛。

1942年秋末的一天下午，魏庄据点的几个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我村，在村西头逮了几个人，回到据点后对他们严刑拷打，逐个审讯，逼他们说出我村谁是八路军、抗属，谁家有枪有粮，他们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没有一个人吐露真情。其中受刑最厉害的是赵学法（现年81岁），因他性情耿直，不畏强暴，敌人先把他

吊起来毒打一顿，又用香火烧他的胳膊窝（腋内），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敌人怀疑他家有枪，逼他交出来。赵学法虽受重刑但不胆怯，他分辩说：“我从小混关外，家很穷，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枪啊！”穷凶极恶的敌人咆哮道：“没枪就要交钱，老子不能白白放你出去！”就这样，村里的人有的卖地，有的变卖财产，花了很多钱才把这几个无辜的人赎了回来。我村农民赵学孔到顾官屯去赶集卖粉皮，在路上被伪军抓去，扣押20多天，不给饭吃，饿得喝泔水，最后花钱买回，人已奄奄一息。

在敌占区内，碉堡像凶神一样到处耸立，封锁沟弯弯曲曲像蛇一样纵横交错，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天天忧心忡忡，出夫挖沟修寨还得提心吊胆，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棍棒、皮鞭的毒打。我村农民白同柱被伪军打得犯了傻，一天听到又让他出夫，竟然吓得屙了一裤子屎。不少有钱的富户人家，以高价雇人去出夫。受苦出力的只有穷人。

以上只是我村群众遭受日伪军残害的一些情况，附近的村庄也无一幸免，有的村遭受的祸殃比我村还厉害。

日伪军在堂邑迫害抗属罪责难逃

冯文德整理

由于我党和抗日政府积极领导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狠狠打击敌人，因而敌人对我党我军及抗日工作人员极端仇视，他们为了扑灭抗日的火焰，瓦解抗日军民和工作人员的斗志，敌人穷凶极恶地迫害抗日家属，有许多家属被抄家，财产被抢得干干净净，房屋被烧成一片废墟，片瓦无存，家属被抓、被杀，从而激起了抗日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

日军占领堂邑县城后，敌人为了控制广大农村，积极发展伪军，建立了伪区、乡政权。我党和抗日政府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亦迅速采取果断措施，相继建立了区乡政权和抗日武装。1940年1月，共产党员李善亭当了抗日区长后，迅速发展了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日军、伪军，镇压了敌探、土匪和恶霸地主，并配合主力部队打跨了顽固分子刘中孚，驱散了封建势力李子俄等，从而斩断了敌人魔爪，挫败了帮凶，有力的震慑了敌人。而敌人更加仇视我党我军，特别对李善亭更是恨之入骨。

1940年春天，日伪在城南李大庄安设了据点。一日凌晨，日伪军百余人窜到林里村，企图抓李善亭的家属。李善亭的二哥发现敌人进村，立即逃出村外，敌人随后追捕，打枪百余发，险未击中，结果跑到2里外郭子祥村前沙丘林带，才得脱险。敌人没有抓到，便将李家的马车、牲畜、衣物、家具等所有财物洗劫一空。时隔月余，日伪又2次闯进村里，纵火烧了李家房屋，日伪撤出村后，群众紧急出动救火。日伪听到群众的呐喊声，又返

回村中，镇压救火的群众，致使李家20多间房屋化为一片灰烬，从此李善亭的家属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全家10多口人迁居外地，过起流浪生活。

中共堂邑县委组织部长刘喆是个参加革命工作较早的领导人，他积极领导抗日工作。在刘哲的影响下，担任当地民团团长的哥哥刘光祖当上了区抗日游击队队长，经常到城关打击日伪军。这样一来，刘家两兄弟便成了敌人的眼中钉。1940年春的一天，堂邑伪军数10人，窜到城南于庄抓刘喆的家属，由于家人躲避不及，敌人将刘喆的母亲、妻子、孩子等6人逮捕押至堂邑城内，作为人质，以此逼迫刘家两兄弟脱离抗日队伍。敌人劝说刘喆的母亲动员两个儿子回家，不要抗日，当即遭到老太太的严词拒绝。然后对老太太进行打骂威胁，老太太不畏强暴，大义凛然，质问伪军：“鬼子到中国杀人放火，我儿子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有什么不好？”日伪军被问得哑口无言，争取刘家两兄弟的计划破了产。他们仍不甘罢休，又多次前去抄家，把全部财物抢掠一空。

当时许多抗属，特别是县区领导人的家属，大都遭到敌人的迫害，堂邑县委武装部长任明和县大队教导员解长厚家里房子被拆除，聊堂县长王筱湖、区武委会主任柳长淮家里房子被烧光。从而更加激发了广大干部对敌人的无比愤恨，进一步坚定了革命意志。李善亭的家被抄，被烧以后，他感慨地说：“敌人迫害我的家属，妄图动摇我的抗日决心，他们的算盘打错了，这样更加坚定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李善亭和弟弟参加抗战，自从李家被敌洗劫以后，他的大哥、二哥也都参加了抗战，老父亲已40多岁也拿起枪来参加战斗打击敌人。刘喆在家属遭敌迫害后说：“敌人抓我的家属，企图使我们兄弟两人脱离抗日队伍，那是痴心妄想，头可断，血可流，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绝不罢休”。

日伪军在堂邑残害无辜群众的罪行

李善增回忆 冯文德整理

日伪军在占领堂邑县的日子里，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许多无辜群众，包括老人、孩子惨遭杀害。其手段之残忍，真是令人发指，骇人听闻。

1937年11月27日，驻临清日军敌酋高桥率步、骑、炮兵300余人进犯堂邑，范筑先闻讯亲自率第三营，政工队传令队，在堂邑西北的界牌村进行阻击。日军在攻占界牌西南大杨庄时，被范部击伤七八十人。日军遭受重创后，当日逃回临清。次日，日军返回报复，因找不到范筑先的军队，就血洗了大杨庄，杀死大杨庄群众48名。当一个屠户（宰杀耕牛）见全家老幼被敌人杀害，怒不可遏，随即操起屠刀，杀死两名日军，后被日军乱刀刺死。

1945年5月份，临清日伪军出动100多人，袭击堂邑北王二寨。王二寨是远近闻名的抗日模范村，群众基础好，民兵武装也较活跃，因此，日伪军把它视为眼中钉。该村距临清影庄敌人据点八九里路，为了防御敌人突袭，村民在地下挖了地道。这天发现敌人前来，群众都钻入了地道。日伪军进村后，挖开了洞口，将锯末和辣椒在洞口点燃后，用风车向地道内吹烟。敌人挖开了部分地道，捕捉到了一些无辜群众，日伪军用刺刀挑死和用枪打死37人，其中有村干、民兵和群众。最残忍的是，日军用刺刀挑死一个孕妇后，又将腹中的胎儿挑了出来。王二寨这一个仅有40余户人家的村庄，一次即被杀30余人。其惨景目不忍睹，群众

无不痛心疾首，悲痛欲绝，对日伪军的暴行恨之入骨，义愤填膺。

当时投靠敌人的伪、顽、杂、匪，也趁机到处烧杀抢掠。吴连杰在堂邑盘据时间较长，人数较多，这帮匪徒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杀人如麻。如1940年，由于吴连杰横征暴敛，群众被逼起来抵制，乔庄的群众不给其送粮交款，气急败坏的吴连杰就带领2000余人攻打乔庄，群众奋起自卫，与吴连杰部战斗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敌人攻入乔庄，杀死群众几十人，并抢走妇女60余人，无人放回，都被霸占为妻妾。吴连杰对拿不起粮款的贫苦农民，不问青红皂白，都要抓去严刑拷打，筹交上粮款后才能放回，对交不上粮款的就活埋。吴连杰的军法处住路堂，他们经常把抓到的欠款户打得死去活来，吓得当地群众失魂落魄。被活埋的群众有七八十人之多，大部分被埋在路堂村外的地里，闹得村里的群众因害怕夜晚不敢出门，白天下地时又怕踩着死人。吴连杰的官兵随意抢夺民财和杀害村民，吴匪的一个教练在墩堽一次就活埋了5人，并将一颗人头割下来挂在村上示众。因此，在吴连杰统治的地区一片恐怖，人人自危。

吴连杰不但欺压残害百姓，还积极反共，杀害我党政军干部。曾在堂邑任独立营营长，后在军分区任敌工旅长的荣连超，深入敌区作吴连杰的工作时，被阴险狡猾的吴连杰诱骗到齐子修驻地，借齐子修之手把荣连超活埋。

齐子修是鲁西北一带最凶残的土匪汉奸头子之一。该部投靠日军后，到处烧杀抢掠，齐部到张柳邵去抢掠，群众奋起自卫，因抵不过匪众，该村有103名群众被打死。在堂邑一带提起齐子修的残暴行径，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周正刚，又名周二虎，是个有名的杀人刽子手，他充当伪军后，在堂邑一带不仅杀人多，而且手段也十分凶残，如狼似虎。1941年古历五月十日，辛集西石庄农民因抵制周匪征粮，周二虎

带二十二旅数百人占领该村，竟把50余名群众活埋到一个井内，其中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更惨无人道的是，周二虎攻打辛集南白官屯村，逮捕群众30多人，趁5月11日辛集大集时，将抓到的这30多人带到集上，摆上口铡刀，扬言要铡死他们。赶集的群众无不震惊，吓得四处逃散，有些人被阻拦未能走脱，在场的群众纷纷跪下求情，但仍未奏效，敌人凶狠地用铡刀铡死4人，其余20多人用枪打死。当天正遇上天下大雨，满街血水横流，其凄惨情景不寒而栗，死难者的家属和全村群众痛不欲生，发誓与周二虎不共戴天。

栾省三（栾小秃）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伙家，在日军豢养下，他在堂邑城西定远寨一带杀人甚多。有的杀了人还要碎尸，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地步。1937年12月25日，栾省三闯进石庄收缴民枪，抢掠民财，因群众不从，当即用铡刀铡死五六名农民，有的竟被铡成三段。事隔3天，栾省三带部下又攻进了洼刘村，杀死群众三四十人，焚烧房屋几十间。栾省三对八路军极为仇恨，1943年马颊河支队战士魏××（吕铺村人），被栾省三抓获后绑在村上，浇上煤油，名为“点天灯”，把这名战士活活烧死。当地群众对栾省三动辄杀人的野蛮行径，无不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在人民政府处决栾省三时，数十里外的群众都带着刀子剪子等赶到刑场，欲亲手报仇雪恨。

伪军坚决与人民为敌，是日军的忠实走狗。1945年2月5日，堂邑伪军五六十人，在地主勾结下窜到营屯，对贫农积极分子下了毒手。在黄启功家，杀了他的妻子，黄启功4岁的小儿子被一枪打死，7岁的大儿子黄双兴也被打死在炕上。黄福江被一连砍了数十刀，肚子被戳穿，活活疼死。接着又包围了贫农组长崔金斗的家，崔的母亲和3个弟弟都被砍成重伤，幸亏得到及时的抢救才得以生存。伪军们的屠杀，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誓报此仇。

日伪军在高唐推行“强化治安” 维护反动统治的部分罪恶事实

张金洪整理

日伪势力为了扑灭高唐人民的抗日火焰，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在加紧进行军事扫荡的同时，竭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他们采取了罪恶手段有：

（一）大兴土木，修据点、建碉堡。日军占领高唐8年间，在全县8个区共建立16个伪团，扩充伪军6000余人，修据点，筑碉堡共计60余个，控制了全县大部分地盘。其中日军据点设在县城，即日军司令部，有大炮楼一座、小炮楼4座，营房30间，占地30余亩，最多时驻日军1000余人。1940年日军司令部迁往临清。据点内减至一个中队约100余人。1943年，因兵源紧张，又调走大部日军，改驻一个小队30余人。其他55个伪军据点，分布在县境八个区。其中较大的据点有：一区孙屯；二区三官庙；三区大董庄、殷楼；四区徐官屯、南镇；五区西郭庄、邱庄；六区梁村、盖洼；七区小刘庄、明新寺；八区濉河。筑碉堡5个，建在高禹、高夏、高恩公路沿线。各据点驻兵几十人至几百人不等。一时县境内据点、炮楼林立，给我军民的抗日活动构成了极大威胁。敌人修据点、筑炮楼，强行拉伕派款，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全县修筑据点、碉堡共强行拆毁民房1000多间，占地7000余亩。1940年春，伪县长李九在其家乡——打渔李庄修建炮楼、寨墙、私宅等占地150多亩。由群众出钱出工，百姓苦不堪言。

庞长中任四区伪团长以后，即开始了修营房建据点，1939年仅在团部驻地就修起了一座有3层楼、30间平房的3个套院，内有伙房、澡堂、仓库等设施一应俱全。在徐官屯村内赶走20多户群众，修起兵营200余间，以及“造枪局”马厩、车库等。为修“葛针寨”，竟把方圆5里之内的枣树全部伐光。其后经过几年的修建，又在共盘踞区内先后修起了10几个外围据点。在据点修筑中，他不顾群众的死活，只要需要，就强行霸占并逼迫群众扒房拆屋。四区许多群众因此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五区伪团长郭进诚为强化其反动统治，倾其全力修据点、筑巢穴。强征民工在其中心据点——郭庄修了一座像堤坝一样厚的围墙，挖了双层寨壕，设扭头门，建筑5座炮楼，还安设了电网。五区群众为修据点深受其苦，北王庄的一个农民因捧着糠窝窝上工修围墙，竟被负责监工的伪军头目鞭挞至死。

（二）修公路、架电线，加紧封锁抗日武装。从1938年起，日伪反动势力先后修通了高唐至禹城、聊城、夏津、恩县的4条公路干线，1939年又修整了县城通往各区的8条公路支线。在通讯设施方面，架设了通往8个区的电线达300多华里。日伪军通过这些措施，加强兵力的部署和联络，进一步加紧了对抗日力量的控制和封锁。

日伪反动势力还在公路两旁组织“爱护村”，强逼群众为其护路、护杆、护线等。如发现公路毁坏，电杆、电线等设施丢损，则责罚沿线村庄的群众。如1941年8月，曲庄附近公路的电线、电杆有损坏，竟罚款该村群众300元。

（三）建立警特机构，实行白色恐怖统治。在县里设立了伪警察所，各区设立了分所，每个所有伪警察20人，全县共有伪警察200余人。在县警察所内还专门成立了特务组织——“剿共班”，有特务30余人，专事搜集我军情报，秘密监视、搜捕、暗杀我地下党员，为其反动统治服务。

“剿共班”成立后，日伪特务猖狂活动，我许多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遭敌跟踪、逮捕或杀害。我党我军的活动也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

1941年，我军30余人，在高唐六区征粮，日特发现后，李九即派伪军90余人前去围攻，我军被迫撤走，致使征粮计划未能实现。

同年6月，日伪特务侦知我军在高禹交界地区活动，李九即派伪县警备队两个中队前往袭击，致使我军遭受损失。

同年秋，我县委领导人，在城西房庙活动时，被日伪特务探知，日伪特务股长姚俊堂准备带人前去抓捕。幸被我打入“剿共班”的地下党员王洪达事先得到消息，提前派人送信让我县委领导人迅速转移，敌人的这一罪恶计划才未得逞。

1942年春的一天，日伪特务跟踪逮捕了我地下党员刘本贵、柳本良及两名党员家属。敌人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他们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后经我党多方营救，加之敌人始终未弄清他们的真实身份，刘本贵、柳本良及两名党员家属方先后得以获释出狱。

同年，日伪特务李××经常化装成羊倌到高唐城北一带刺探我军活动情况。一天，他发现腰站一带驻有八路军部队后，即向姚俊堂作了汇报，姚派其进一步秘密监视，以便采取行动。我打入“剿共班”的地下党员王洪达根据党的指示，在紧急关头制定了一个“以敌制敌”的方案，借敌之手开除了铁杆汉奸李××，才保证了我军的安全。

同年冬，打入六区任伪团长的我地下党员张春岭，在从事党的活动时被日伪特务发觉，伪县长李九在县城设计诱捕。张进城后发觉，率警卫人员向南突围。至东罗寨洼，遇到二区伪团长陈耀泰部的堵截，被敌杀害。

1943年2月，日伪特务侦知我军准备夜袭五区庄桥伪据点，

李九即派50余名日伪增援，致使我军的袭击计划未能实现。

同年秋，我打入五区伪团的地下党员乔云岚、李华卿，在开展党的工作时，被日伪特务发觉，惨遭杀害。

（四）清乡搜查、经济封锁。

在强化治安中，敌人为了隔断高唐抗日群众同冀南、鲁西、冀鲁豫、渤海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联系，在高禹、高夏、高荘、高恩交界地带封道设卡，禁止群众携带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物资出境，对食盐、煤油、火柴等日用品限数购买以防外流，从经济上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同时，日伪军还经常清乡查户，发现有私藏棉花、食盐、煤油、火柴等物资物品者，即按“通共嫌疑”予以逮捕或关押、或杀害。

（五）、推行“保甲制”，发放“良民证”，对群众实行严密控制。

日伪反动势力为了限制我党和抗日军民的活动，在清查户口、封道设卡、盘查行人的同时，还采取了查验“良民证”，推行“保甲制”的两项反动措施。“良民证”自1941年开始在日伪统治区内实行，规定每人一证，随身携带，以备查验。如发现缺件少证或人证不符时，即按“不良分子”或“可疑人员”当即扣留，轻者遭关押，重者被杀害。每年因此而遭关押或杀害者数以百计。

与此同时，日伪反动势力还在日伪统治区内实行“保甲制”。每村设保长1人、甲长若干人，保甲长均由日伪新民会和日伪特务机关进行培训之后再任职。他们是日伪反动势力安设在乡村基层的耳目和爪牙，负有其征收所需的财物，监视、探听、汇报我抗日群众的活动情况等职责。敌人采取如上措施后，高唐的环境更加恶化。

（六）、组建日伪“新民会”、“宣抚班”，开展奴化教育。

日伪势力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于1939年3月，在高唐成立了日伪“新民会”、“宣抚班”等组织，新民会由伪县长李九任总会长，按照日军的旨意，该组织在高唐城乡四处进行奴化宣传，到处张贴标语、演讲，竭力鼓吹所谓“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还逼迫一部分教员集训学习日语，在一些学校强行开设日语课。李九强令各区向县城送学生共计200名，接受奴化教育，妄图通过这种手段，来毒害广大青少年，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

日军侵华期间，由于日伪反动势力在高唐推行以上种种“强化治安”措施，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给高唐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日伪军在高唐进攻抗日武装 摧残进步力量的部分罪恶事实

张金洪整理

日军侵占高唐后，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他们疯狂镇压民众的抗日活动，大肆屠杀无辜的人民群众，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1937年11月中旬，8名日军在高唐解庄以北的高禹公路上架设电话线，遭到我抗日游击营的袭击，击毙日本兵一名，缴获摩托车一辆，其余日军仓惶东逃。次日，大批日军从禹城出动，对解庄一带村庄实施报复，日军杀害我村民5人，烧毁房屋100余间，给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8年1月27日，120多名日军从禹城出动，经张大屯向高唐南镇一带扫荡。28日，日军驻扎在南镇。当天夜里，日军遭到南镇村自卫队及茌平地方民团的袭击，50多名日军被打死。29日凌晨，受到严重打击的日军恼羞成怒，对手无寸铁的南镇村民进行了疯狂报复。敌人首先杀死村民郭、邢两家10口人，随即窜入各胡同搜查，屠杀群众，并把搜捕到的群众押到村北集体屠杀。在这次惨案中，敌人杀害南镇村民及外乡群众100多人，烧毁民房数十间。

坟台村民赵克芳因组织抗日武装，伪县长李九怀恨在心，急于寻找机会杀害赵克芳。1938年11月，日军出动30多人，配合李

九率领的20多名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坟台村。敌人攻进村后，凶残地打死村民赵玉楼、赵金堂2人，打伤5人，烧毁民房数十间，抢走群众自卫用的长短枪25支，抢掠财物无数。并把村民赵希悦、赵希红2人押到城里，后来用刺刀活活扎死。赵克芳因闻讯逃走幸免一死。

1939年3月5日，中共鲁西区党委，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在高唐琉璃寺与日军激战。当天中午，直属部队转移时，在许楼遭敌袭击。区党委秘书赵伊坪在乘马突围时负伤坠马，因丢失高度近视眼镜，行动困难，不幸被俘。日军对他施尽酷刑，逼他供出部队的去向，赵伊坪宁死不屈。最后敌人把他捆在枣树上，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同时，敌人还残酷杀害了10余名无辜村民。

同年3月，伪县长李九探知打渔李庄长工李化养与范筑先的部队有过联系，便派爪牙李曰瑞、李曰明将李化养枪杀。

同年9月初，伪县长李九带伪警备队100余人，伪治安军一个营，到北镇攻打积极抗日的刘化溥部。刘转移后，李九下令烧毁民房160余间，抢走粮食73000斤，棉花6400斤，该村受害群众达31户。

同年9月11日，日伪联军在腰站与我八路军游击队作战4小时，打死我军战士13名及一些抗日群众。其中尚知姓名者，有腰站街的耿金荣之子，马金玉的母亲，并烧毁民房100余间。

同年10月，伪军到城南徐家河口，围攻我八路军徐宝珊部，徐率部转移。伪军到徐宝珊家，抢走八路军军粮（小麦）5000余斤，另被博平日军抢走5000余斤。

同年12月间，我八路夜袭濉河据点，伪县长李九立即派二区陈耀泰伪团前往增援，严重破坏了我军的行动计划。

1940年12月19日，日军山口部队与陈耀泰、曲捷清等伪军分别从王架子庄、杨官屯、李明桥、辛家楼等地出发，向抗日村——官道朱庄进犯。朱庄男女老少纷纷拿起刀枪和农具英勇抵抗

敌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朱庄被敌人攻占。村民朱友堂、朱九洲、朱九余等40余人在战斗中遇难，鲁其秀、朱九常等数十人负伤。日伪军进村后，枪杀村民、掳掠财物，焚烧房屋，把朱庄村化为一片废墟。

1941年4月间，伪县长李九派二区伪军100余人，到茌平禹城边界一带袭击我军，致使我军受到一些损失。

同年秋，八路军干部房雪蓑（房庙人）回家探亲，伪县长李九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伪警备队20人前去搜捕。由于房雪蓑已有防范隐蔽起来，李九仍不罢休，将其家属马秀文逮捕押往县城，后侥幸逃脱。

1942年，打入日伪警察所负责签发“良民证”的我地下党员刘本贵被敌人察觉。伪县长李九将其逮捕，敌人同时还逮捕了我地下党员柳本良及两名同志家属。敌人为了从他们口中得知党的秘密，对他们严刑拷打。但刘本贵、柳本良拒不吐露真情，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刘本贵、柳本良及两名同志家属才获释出狱。

同年11月13日，平原日伪军百余人，携带迫击炮、掷弹筒、轻机枪，于晨4时乘大雾进犯七区贺庙村，遇到抗日群众的抵抗。日伪军施放毒瓦斯数枚，幸大雾该村才未受大害。

同年冬，打入敌伪六区保安团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张春岭（高唐县皮户李庄人）被敌人侦知，伪县长李九设下诡计，以“看戏”为名，将其骗至伪县公署。当张春岭发觉受骗情况危急时，立即带领数名警卫员突围。李九一面派人紧迫不舍，一面打电话通知二区伪团长陈耀泰派人堵截，在罗寨洼以东、钱庄以西，张春岭等人遭敌枪杀。李九随后收缴了张春岭部队的枪支，致使我党掌握的这支武装解体，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1943年1月17日，高唐、平原两县日伪军联合出动，进犯高唐七区崔庄一带，杀害村民数十人。

同年，夏津伪县公署被我八路军包围，伪县县长王康侯慌忙打电话向高唐日伪军求救。高唐伪县长李九立即派出150多名伪军增援夏津，致使我军夜袭未成，被迫撤出战斗。夏津伪政权得以保存。

同年2月，我八路军100余人夜袭五区庄桥据点，伪县长李九派伪军50余人前往增援，在侧背袭击我军，致使我军伤亡10人而被迫撤出战斗。

同年秋，伪县长的爪牙郭进诚率五区伪军在西郭庄村头逮捕我八路军联络员1名，李九命令立即杀害。

同年秋，打入伪五区郭进诚部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乔云岚、李华卿，被敌人发觉，敌人将他俩逮捕后杀害。

1944年秋，六区伪保安团20人去高庄抢粮催款，与我游击队遭遇。伪县长李九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兵增援，联合向我抗日武装发起进攻，给我军造成一定伤亡。敌人还在高庄周围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

1945年农历七月，四区伪团长庞长申探知三区伪团长殷传业在我党的争取下准备起义，于是在当月23日夜里，率领一个团的伪军突袭殷楼。攻进村后，大肆烧杀抢掠，并将38名群众掳走，押至牛官屯据点。后除4人被保释救出外，其余34人全部遭杀害。除此外，伪团长庞长申还于1940年至1945年期间，在徐官屯一带肆意杀害无辜群众100余人，仅在唐楼村一次就活埋了10余人。因此，人们把他所盘踞的据点斥之为“庞家宰坊”。足见四区群众受难之深，庞团罪恶之大。

同年，我8名八路军战士到三区王庄，对伪军开展劝降活动，该地伪军不但不接受劝告，反而向我军开枪射击，造成我军伤亡6人。

1939年4月与1943年7月，日军在高唐两次抓劳工70多人，交给所谓“日本劳工协会”。这些劳工有的被送往东北煤矿挖

煤，有的被押往日本做苦役。生还者所剩无几。1943年7月间，城南五里铺的刘德顺被抓劳工，后偷偷逃回家，伪县长李九竟让伪区长郭隆元残忍地将刘德顺脚铡掉，使其终身残废。以后只能在大街上爬行乞食度日。

日军在占领高唐期间，残酷镇压人民，屠杀群众的罪行不胜枚举，日伪反动势力先后杀害中共党员，我军战士及抗日群众达数千人之多。

“九·二七”大扫荡概述

孙孟来整理

1942年9月27日，日军为了消灭濮范观中心区和湖西根据地的抗日有生力量，对这里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我冀鲁豫党政军民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密切配合，顽强作战，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了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现将这一历史情况概述如下：

(一)

濮（县）、范（县）、观（观城县）地区，地处冀鲁豫3省的交界部位，交通便利，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地区的人民历来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相当窘迫，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他们具有浓厚的反剥削，反压迫意识，因此，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地利人和，是建立我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这一带经常活动和驻扎的有：鲁西军区、鲁西行署、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行署和冀鲁豫军区以及回民支队、南下支队、赵谭支队等机关和部队。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冀鲁豫地区的抗日中心区。

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2年下半年，随着日军在华北即将进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为了消灭我冀鲁豫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荡平鲁西抗日有生力量，他们纠集日伪军三万余人，于9月27日对我濮范观和东平湖地区进

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敌人的这次行动是蓄谋已久的，经过周密的部署和安排的。敌人的总指挥是土桥军司令官。日军约投入10个大队的步兵对范县和东平湖西分别采取了第一期作战和第二期作战。参加扫荡的敌军为：石田支队（第三十二步兵团长石田保忠少将指挥的步兵5个大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大熊大队（第五十九师步兵第五十三旅团长大熊真雄少将指挥的步兵5个大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高原支队（骑兵第二十五联队长高原孝大佐指挥的骑兵两个中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骑炮兵一个中队）。此外，他们还勾结、纠集了周围17个县的伪军，共计三万人，配有坦克30余辆，汽车100多辆，飞机10多架。

日军合围的中心地区就是范县附近的单堂。

9月25日，敌大熊支队在东昌（今聊城）、莘县附近集结了兵力，石田支队在鄄城、巨野、济宁集结了兵力，同时，高原支队在濮阳附近也集结了兵力。敌人经过26日夜间的秘密行军，27日拂晓到达了预定展开线，在以单堂为中心的半径约30公里的地方形成包围圈，然后逐渐向中心地区压缩——开始了第一期大扫荡，至29日结束，日军在结束第一次扫荡之后，于10月2日形成了对东平湖西地区的包围——开始了第二期大扫荡，到10月5日结束。

（二）

9月26日夜晩，我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以及教三旅主力、回民支队主力、南下支队主力、赵谭支队主力大部等先敌行动，机动转到外线，跳出了敌人包围圈，抗大分校——冀鲁豫陆军步校、南下支队的后梯队、赵谭支队的一部分因情况不明，被包围在旧范县的甘草固堆一带。当时，教三旅政委曾思玉同志和该旅八团参谋长王晓波同志在为期一周的训练比武大会结束以

后，于9月26日带领七、八团的第一连和两个班长训练队到鄄城以北的李楼，准备召集当地的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开会布置秋征任务，也被敌人包围在当中。被包围进去的还有当时的中心区各县、区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和冀鲁豫行署办的《挺进报》社以及后方工厂、医院等等。

9月27日中午时分，日军开始向包围圈内进行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敌人每到一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四处逃难。下午3点多钟，敌人的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最后都集中在甘草固堆附近，在这块不到30平方公里的旧范县的沙滩上，军队走到哪里，群众就像找救星一样跟到哪里。战士们望着这相依为命的人民群众，又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的惨状，个个义愤填膺，誓和敌人决一死战。

为了尽快突破敌人的合围，在曾思玉同志的指挥下，由寿张县基干大队密切配合，一方面保护群众，一方面伺机突围。

曾思玉和王晓波同志冷静地观察，分析着敌情：东北方向有敌人的骑兵和坦克；西北和西南有敌人的主力，没有突围的可能；从敌人的第一线直到战术纵深，均有红、黄、兰、白、黑不同颜色的大小旗子，西南方向的黄旗，是敌人的炮兵阵地，步兵正在向合围点运动。只发现在甘草固堆东北角距曾思玉他们千余公尺的地段上，有日本的“膏药”旗和几面红小旗子，插在荫柳棵里停止不动，再往纵深看没有其他旗帜。曾思玉同志发现敌人的弱点后，立即命令王晓波同志带领八团第一连和班长训练队，沿着正南道沟，接近敌人，对甘草固堆东北角的敌人，实行猛冲猛打，坚决突破这个缺口。又命令七团第一连和班长训练队及九团一个排（他们是到后方领棉衣的，也被包围在当中集中到这里了）组织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以准确的火力压制甘草固堆东北角柳棵下的敌人，支援突围部队。这时，正在手忙脚乱地挖工事的日本兵，发觉了我军的意图，便立刻向我部队射击，子弹、炮弹

象雨点似的落在部队的交通沟前沿。

突然，在部队的正南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响声过后不久，通讯员来报：第一次突围没有成功……

正在这个时候，敌人以更加密集的炮火向我部队开始了轰击，阵地上硝烟弥漫。战士们亲眼看到，怀抱婴儿的妇女被炸得血肉横飞。战士们眼睛红了，头发直了，决心要和敌人拼命。曾思玉望着战士们，略作沉默之后，立即下达了命令：“同志们，我们都是硬骨头、钢铁战士，一定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决突围出去，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从法西斯的屠刀下解救出来。一切轻装，一直向黄河南岸杨集、李集方向突围前进，只许前进，不准后退！”

10几分钟之后，一切准备完毕。

随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响，各种武器一齐向敌人怒吼了，战士们跳出道沟，如猛虎下山，以一当十。经过一阵短促而激烈的浴血奋战，战士们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人民群众象潮水般地随部队踏着敌人的尸体涌向了黄河南大堤，又有小股敌骑兵追截，亦被我军机智打退，敌人的铁壁合围被打破了。日军在濮范观进行了3天的清剿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便转向昆山、张秋等东平湖地区进行扫荡。

为了粉碎敌人对东平湖西的扫荡，我转到外线部队和游击队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敌人，迫敌撤退。郓北军民曾与扫荡之敌500余人进行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鄄城联防武装的有力战斗，也迟延了敌人的行动，最后同样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三）

敌人的这次扫荡，给我抗日中心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们每到一村，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其残酷程度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军将儿童或婴儿挑在刺刀上“点天灯”，把妇女扒光衣服当活靶子打。……在短短的几天中，我数以千计的骨肉同胞就惨遭不幸，敌人退走时，还从濮范观掳走五六百人，后辗转到东北当苦工。

扫荡结束后，我上级党委及时向这一地区派驻了工作组，处理善后工作。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扶贫济难，安顿人民群众的生活，恢复农业生产；二是重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扩大党的势力，这一工作直到次年的夏季才基本恢复了正常。

敌人这次的扫荡使濮范观的人民群众遭受了空前的劫难。在敌人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天热，尸体腐烂，气味熏得人不能进入。同时，我们部队及机关的损失也是很惨重的。

七、八团的两个第一连及九团的一个排牺牲了四五十人；

八团作战参谋陈国栋同志壮烈殉国；

抗大分校陆军步校被打散，该校训练处长孙厚甫同志光荣牺牲；

八团一连副连长王清山同志壮烈牺牲；

八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山同志遇难；

……

但是，我英勇的指战员，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甘草固堆突围一战，大长了我军的士气，打破了敌人的美梦，敌妄图一举歼灭我冀鲁豫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目的变成了泡影。

“九·二七”反扫荡的胜利，大大激发了根据地中心区的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和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在冀鲁豫平原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杨集七英烈罹难记

沈廷梅

聊城失陷后，根据抗日需要，我来到北杨集，以北杨集中心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聊城东北地区工作委员会。我担任工委书记，赵春华同志任民运部长，孟筱澎同志任组织部长，袁兆文同志任宣传部长，并组织了一支秘密武装，在聊城、茌平、博平3县边界不断割电线，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打击日军汉奸的活动。

日本人对这一地区的“治安”十分恼火，责令聊城伪县长李汉章限期找到共产党在这里的活动线索。大地主翟东成也随之疯狂起来，他天天把红枪会集合在佛堂里，烧香、磕头、画符、念咒、练武，还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狗腿子唐庆云说：“哈哈，李汉章是我翟家的人，真是天不灭曹哇！我翟东成不会倒的。哼哼，赵春华呀赵春华，4指的小条叫你上西天！”随后，他写了北杨集党员、积极分子的名单送给李汉章。

一天伪县长问伪区长张洪恩：“北杨集有个叫赵春华的没有？”张洪恩说：“有”。

伪县长李汉章说：“有人告他，你把他叫来，我见见，绝不扣他。”

张洪恩来找赵春华，告诉了他，并问他去不去见李汉章，赵春华说：“让我考虑一下，我如果要去，明天就去找你。”到晚上，春华同志召集党支部的几个负责人赵春湖、翟修安、王宪伦

等3位同志，把张洪恩说的情况给他们讲了一遍，大家很担心，怎么办？去好还是不去好，如果不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也会来抓我的，那样就更不好了。我还是去，如果他们扣留了我，我就给他打官司，绝不向敌人屈服，也绝不会出卖组织。我走了以后，由修安同志负责，如果不扣留我就更好了。”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春华就和张洪恩一起去见伪县长李汉章。这个老奸巨滑的伪县长，见到赵春华，装出一付伪善的笑脸问他：“你就是赵春华吗？”“我就是赵春华。”“有人告你是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春华回答：“听说了，可我不是共产党，只是范司令在时，参加过抗日救国会，翟东成也参加过。”

伪县长问：“那为什么他还告你？”春华答道：“他就是为了想当村长没当上。”李汉章说：“既然是这样，你们再选一次行不行？”“行啊。”“那么，我们就定个时间好不好？”就这样，定下了于北杨集大集后第二天选村长。

我当时正在地委开会，开完会的那天夜里我回到了北杨集，立即召集党支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开会，传达了地委的指示精神，并提出在第二天召开工委会会议。春华同志说不行，开不成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行，春华说：“我们已经决定在明天改选村长了。”我觉得很奇怪，不是有村长了吗，为什么又选呢？我就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春华同志就把翟东成告他的事跟我讲了一遍。我当时有些疑心，会不会是敌人耍的什么阴谋，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也就没有马上表示什么意见。这时大家见我沒有说话，就说：“我们还不怕，你怕什么，我们的人多，选举一定能胜利。”春华同志说：“现在你也别走了，我们多放两个岗哨。明天你就去耿玉明家里听候消息，有事的时候也好商量。”听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就同意了，决定把工委会的时间推迟到选村长以后再開。

第二天早饭后，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几十公尺外就看不清人。八九点钟，太阳才上树梢的时候，忽然3辆满载着日军汉奸的汽车开到了村边。我们的岗哨发现情况不好，撒腿跑向会场报信，但是已经晚了，村子被包围了。敌人一面在村内搜查，一面向会场包围过来，一架架机枪在墙头瞄准会场的群众；一柄柄刺刀闪着寒光。龟田嚎叫着，汉奸翻译南云成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在他身边，龟田叫喊一句，南云成就象哈叭狗一样翻译一句：“太君告诉你们不要怕，他是来看望你们的。我们来到中国是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共亲共荣。你们里面有八路反对太君，反对大东亚圣战，反对日本帝国，抓住死了死了的！”

这时候，他们把翟东成假逮捕，捆起来推上汽车，然后，日军让群众在汽车跟前——走过，只要翟东成闭一闭眼，这个人立刻被敌人抓走。

春华看到这种情景，考虑到突围是没有希望了，有翟东成这个坏家伙在眼前，回避也不可能，敌人抓不到我，是不会罢休的。我是共产党员，决不能眼看着群众惨遭杀害。翟修安一把没抓住，春华虎步走向前去，怒视着龟田和南云成：“你们不是找我吗？”“你是谁？”“赵春华！”南云成翻译给龟田，龟田拉着战刀，围着赵春华转了一圈，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个有名的、使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人都感到头痛和扎手的共产党人，然后伸出手指，作了个八字：“好，好的，你的这个？”

“我是八路军。”春华昂首挺胸，声音铿锵有力的回答。

龟田嚎叫一声，南云成翻译一次：“太君问你还有谁是八路军？”“就我一个！”“嗯？”龟田龇牙裂嘴一笑，摇摇头，把南云成手里的名单拿过来晃了晃。

人们被日军汉奸押着，一个个走过，南云成逐个问着名字。当翟修安走过时，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翟敬申。”翟修安临时化了个名，南云成看看名单上没有这个名字，正在犹

豫，只见汽车上翟东成闭了闭眼，翟修安立刻被拳打脚踢，押了起来。就这样，北杨集党支部的7名党员和60多名积极分子全部被抓住了。

当敌人包围村子的时候，我正在耿玉明家里打听开会的信息。忽然，耿玉明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说：“沈五哥，鬼子包围了村子，春华让我告诉你，赶快离开这里，只要敌人抓不到你，我们就好办。你要通知各村干部马上转移！”接着就传来了日军的叫喊声。我来不及多想，连翻了几道墙，跳进王四叔家，钻进柴禾堆里藏起来。日军汉奸喳喳呼呼来到柴禾堆前，连扎了几刀，几乎扎到我的头。直到敌人走了，我才从王四叔家里出来，直奔距北杨集七里路的袁楼，让那里的同志向周围各村党组织送个信，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并回到地委汇报情况，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和群众。

凶狠的龟田逮捕了赵春华等人以后，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他们。在刑堂上，龟田指着各种刑具对他们说：“那边是死路，这边是生路，你们无论是谁，只要供出党员和你们的领导，就放他回家，还在家里给他个差事干，谁要不说，就让他尝尝这些刑具的厉害。”等了好长时间没有人回答。龟田咆哮着说：“你们说不说？不说我就要动刑了！”还是没有人回答。龟田气得龇牙裂嘴，恶狠狠地把王宪伦拉了过去，喊道：“你的快说！”王宪伦毫无惧色的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龟田说：“我的知道，不动刑你是不会说的。来呀，给他点颜色看看！”几个日本兵上来，把王宪伦又是皮鞭抽，又是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灌了又用脚踩出来，踩出来再灌。反反复复，一连几次都未能使王宪伦屈服。敌人又把王宪伦吊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烙得他浑身冒油，汗似水一样直流，死去活来，昏倒又浇凉水，但始终也没能从他的口中掏出一点情况来。龟田

无可奈何的哀叹说：“好小子，真不愧是个共产党员。”

龟田无法，又把赵春华拉出来审问：“你说谁是共产党？”赵春华说：“就我一个是共产党，别的人都不是。”“你的上级是谁，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气得龟田暴跳如雷：“你的死了死了的。”春华正气凛然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谁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你们能杀死我一个赵春华，但是还会出来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尽的！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被推上人民的审判台，受到应得的惩罚的。”龟田听了，气得直打颤，想要马上杀掉赵春华又怕断了线索，只好把他押了下去，又去审问别的人。几个同志先后都经受了同样的酷刑，但是，龟田始终什么东西都没有捞到，落了一场空。法庭，反而成了斗争龟田的场所。

春华同志回到敌人的监狱里想到：龟田这个野兽妄想在我身上突破，那是井底的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当晚，赵春华同志为了不让敌人从自己身上得到一点东西，也料到敌人不会轻易放过，就为革命而自尽了。

敌人把汉奸唐庆云塞进监狱来劝降，遭到同志们的怒骂。

黔驴技穷了。敌人最后把赵春湖、王宪伦、张子杰、翟林臣几个同志一齐杀害了。

当时耿玉明同志也被敌人抓住了，敌人用尽各种刑具，始终未能从他身上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只好允许取保回家，但由于伤势过重，不久也牺牲了。

1940年4月的一天，敌人把翟修安押往济南。1944年冬，翟修安同志在济南被敌人杀害。

屠杀，永远吓不倒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雄的北杨集人民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烈士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解放后，为了纪念烈士的光辉业绩，在北杨集村头立了一座纪念碑，在青松环抱的碑楼上刻下了烈士们的英名：

赵春华 翟修安 赵春湖 王宪伦 张子杰 翟林臣
耿玉明

巨大的石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浩气长存”。

1951年和1965年，先后在纪念碑前，枪毙了血债累累的翟东升、翟东成。

每逢清明佳节，一队队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来到这里为烈士们扫墓。那五彩缤纷的花圈不就是烈士们不死的英灵么！

回忆堂邑“无人区”

杨香圃 魏长捷

1942年下半年至1944年初，在地处鲁西北的堂邑境内，由于天灾人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悲惨荒凉的“无人区”。

1942年下半年因天旱不下雨造成严重干旱。干旱区域涉及到附近几个县，致使农业普遍歉收。而且，这一年一般没有把小麦种上，特别是堂邑县境内沿马颊河两岸，不光干旱较重，而又地多盐碱，秋收甚微，群众生活困难，加之日伪顽杂的横征暴敛，因而加快加深加重了灾情的发展。当年日伪顽杂的盘踞情况是：在堂邑城内及城周围大约15至20华里以内，由日军及伪乡政权、伪警察所、伪皇协军控制着；堂邑县城北部的斗虎屯、垢壩、柳林一带，由伪杂吴连杰部控制着；马颊河乔集、梁水镇一带，由伪齐子修部控制着（伪齐部在运河以东博平境内和聊城北部村庄还占据很多村庄）。1942年春季，伪齐子修部薄光三旅在冠县桑阿镇安设据点以后，对堂邑抗日县政府及县区武装进攻更频繁，斗争更激烈。此时，堂邑抗日政府的活动范围逐步撤到冠县境内，只有县、区武装人员在夜间才能进入堂邑边境以内活动。

由于天灾人祸，到1943年春天，这里的人烟很少了。日伪顽杂小股分散出动，到处抢粮，见到能吃的东西就拿，闻到老百姓家里有一点粮食的气味就翻箱倒柜，强逼少数留家的老年人交出粮食。群众为争取活命，从1942年底起，就开始外出逃荒谋生。1943年的春、夏季，“无人区”内就已“十屋九空”，几乎没有人

了。当时，凡属能吃的树叶、野菜、野果，都已采摘吃光，甚至连树皮也都剥下来充饥。那时灾民逃荒逃难的去向是：少数人低价变卖家产房屋和土地后，携儿带女逃向东北辽宁、吉林一带农村种地谋生；一部分人带领一家大小逃到山西省条件稍好的地方靠乞讨或找临时短工下苦力谋生；多数人扶老携幼带着家中仅有的一点衣物、家俱等逃荒逃到黄河南的东平、汶上、梁山一带较为丰收地区兑换一点粮食吃，有劳力的尽力找点“短工”做零活，老弱妇孺多数靠乞讨度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家把未成年的女孩子嫁给当地农民作“童养媳”，以安身求生。

对于堂邑境内“无人区”范围，就当年比较严重地区村庄而言，大概划分如下。当年实际情况是：凡抗日游击区（敌我拉锯地区）以及敌我结合部或伪杂盘踞结合部地方，灾情都比较重，因为敌伪横征暴敛，勒索抢掠厉害，凡处于根据地以内或深陷敌占区受敌干扰破坏少些的地方，其灾情也相应轻些。所以，造成“无人区”应是天灾人祸两个因素。而地瘠民贫村庄灾情更为严重。堂邑县境内“无人区”的严重村庄按片说，三区：辛集以南以东鲍庄、石庄、五岔路一带，1944年春季建立区政权时，多数是“无人区”（极为人少，并非一个人没有），少数是“半无人区”。六区南部：如龙王庙、阎围子以及马颊河北岸一带，当年属于“无人区”。五区东部：如陈家坊、宋家堂一带，当年属于“无人区”。七区北部靠马颊河南岸，如乔集、芦庄一带，属于“半无人区”。聊堂一区：如定远寨、黄寨子、王朝营、栾付桂村、魏庄一带靠近冠堂路两侧，属于“无人区”。

1943年至1944年，“无人区”和“半无人区”的村庄灾民，因断粮，不少人活活饿死在屋里、路旁、地头……。有的村庄死人无人埋，任其腐臭，其惨状目不忍睹。造成田地荒芜，野草丛生，长草半人高，灾民没粮吃，只好打草籽，挖野菜，捉野兔充饥。现在回想起那时的凄惨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目不忍睹的灾荒年“无人区”

沈廷梅

1943年，位于鲁西北地区的武训（堂邑）县，由于天旱不雨加入祸，造成了前所未有、目不忍睹、闻名全国的“无人区”。当时这个县东北以斗虎屯为中心的周围20多个村庄尤为严重。这个地区北靠临清、清平两县，东靠博平，东南靠聊城。这片土地肥沃，广大农民在正常年景是能过上富裕生活的，但是祸国殃民的土匪汉奸吴连杰，却以抗日为名，把这一带的枪支都集中在他的手中，专门以反共反人民为能事。因而日军也不打他，致使他独霸一方，残害百姓，经常横征暴敛，抢掠人民。在向农民敛东西时，这些土匪汉奸在村里又吃又喝，如交纳东西稍有怠慢，就会遭受皮鞭的毒打。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在天灾面前，这些土匪更加穷凶极恶地对农民群众进行敲榨勒索，只要交不上粮款，就遭到皮鞭劈头盖脸的抽打，逼得无法生活，因而，有的投亲靠友，有的逃荒外流，出走者的房屋就全被土匪汉奸给拆烧掉。当时这一带村庄的民房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没了门窗，只剩下个房叉子。

灾民们为了充饥，挖野菜、采树叶，连树皮也都剥光吃净了。后来下了透雨。群众千法百计开展生产自救，可是祸国殃民的吴连杰匪部却把耕牛给牵走，种子抢去，有的群众无奈只得晚上偷着种地，那也难免遭匪兵们的抢劫，一旦被听到动静，先打骂，然后把牲口、种子给抢走。由于这些匪徒们如此作孽，终

于形成了土地荒芜，加剧了灾情。没有逃出去的群众，白天不敢做饭，只要被土匪汉奸发现哪家一冒烟，就去把那家的食物抢走，真是逼得群众走投无路，难以生存，早走的走了，晚逃的再也走不动了，饥寒交迫无力抵御，有些人饿死在家里，有些人拖儿带女饿得走不动，只好忍痛丢弃，甚至趁孩子睡觉未醒时偷偷走出，更有的虽已外出，但因为求生而卖儿卖女，卖老婆，我曾亲眼看到有个十来岁的男孩在赶集讨饭的路上，走着走着摔倒在地，一会工夫就断气了。一路上饿死的有三四个人，肉皮已变成了黑色，真是惨不忍睹。在位家湾集上，逃荒的见人家吃花生，立即伸出两手去接花生皮来充饥。

“无人区”形成的开初，饿死的人还有人埋，以后饿死的就无人埋了。任其尸体烂在那里臭得人喘不过气来，长尾巴蛆有一寸多长，爬得院中和街上到处是。荒草长的一人多高，野兔就在屋里生小兔。有的百十户人家的村只剩下十来个人，甚至有的村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在反扫荡时期，只要我们驻扎在这样的“无人区”，日本兵就不到那里去。“无人区”仅剩下的少数人为活命只得靠吃草种子度日，我们在这样的“无人区”往往连一口锅也找不到。老百姓贫穷到这种地步，可是那些汉奸土匪竟把群众搞到的一点草种子也给抢走。真可谓“雁过拔翎”。因此，临清一带向黄河南逃荒的灾民，为免遭抢劫，只得绕道位家湾以东再转向南走。直到1944年我八路军消灭了吴连杰匪部，那一带的老百姓才得到解放。但是只到这年底，逃荒回归的灾民还不到三分之一。于是那个区的区长要求博平六区的群众前去种地，谁种归谁。八路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为扶持农民生产自救，不光帮助群众从外地运来一部分粮食和种子，还帮助灾民拉犁拉耙搞耕种。

记得那里刚解放时，一天有个六七十岁骨瘦如柴的老大爷牵着一头山羊再到位湾集去卖。正在成交付钱时，老大爷突然悲切地哭起来，买羊的人不明原因，便说：“你不愿卖不要紧，为什

么要哭呢”？老大爷悲伤的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终于哽咽着对买羊人说：“我是念这只山羊救了我的命啊！它曾生下两只小羊都让我给吃了，白天我和它藏在屋里，不敢出门，怕被土匪抢去断了我的生路，晚上才牵出来偷偷放羊，我每天挤点它的奶吃，这才过了生死关，要不是它，我早就饿死了，今天它要离开我，我怎么不心疼呢？”老大爷的话悲切动人，催人泪下，谁人不同情灾民的苦难，谁人不恨奸匪的残忍。

屠杀抗日志士的魔窟

冠县日伪警察所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1939年6月日军占据冠县。不久，第二任伪县长周薪传组织了冠县日伪警察所。该机构不仅是伪政权伸向抗日群众的一只魔爪，也是日军进行侵华战争的特务情报机关。日伪警察所机构庞大，门类齐全，下设警务系、保安系、特别保安系、警法系、特务系、经济系、看守所、拘留所、由几十人组成的剿共班和遍布全县的便衣情报网。在主要交通部位设立了城关、清水、大柳邵、西提固、贾镇五个分所。

1939年至1945年7月，所内职务更换频繁。特别保安系更迭71人次；警务系、保安系、督察长、督察员各换了5任。各分所所长一般更迭三四次。总所初建时有特警人员20余名，1941年增到50余人。各分所设警士十二三人。总所下设系，系下设所员，所员下设书记，职责、分工严密。

冠县日伪警察所盘踞冠县6年之久，残害了不少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抗日民兵和无辜群众，在冠县犯下了滔天罪行。

1、1939年古历十一月十七日，我党情报员周进功与赵健民的通讯员张纪功秘密联系工作，被日伪警察所张××发现，接着被抓到所内，经严刑拷打后活活被日军挑死。

2、1940年古历十一月十四日夜間，冠县城南谷子头村抗日基干队长李进堂、队员吴法禄正在李尽堂的岳父家召开会议，不幸被捕，在日伪警察所内受酷刑，最后被杀害在文庙后边。

3、1940年古历十一月九日安村抗日农会会长许书善、抗日民兵队长董占秋等4人被抓到日伪警察所，经过长时间严刑拷打、审讯，1943年古历正月二十七日被日本特务人员挑死在冠县文庙后边。

4、1943年，我抗日敌工情报员张成聚被特务崔××、牛××抓到日伪警察所，经严刑拷打后送到日军司令部，于当年6月10日惨遭杀害。

5、1943年，我八路军班长小崔被伪中队长刘××派出的沙××等3人抓到日伪警察所，严刑拷打后被日本兵活活挑死。

6、1943年古历八月二十一日，我二区青抗先队长杨延祥在斜店被伪军抓住送到日伪警察所，因受刑过重惨死在狱中。

7、1944年古历正月二十八日夜間，日伪警察所特务便衣张××、刘××、安××带领伪军到蔡庄集搜捕我抗日工作人员、抢夺我抗日公粮，将我锄奸团团长赵丹峰、群众赵桂廷、杜少荣抓住并押往城里，当路过北皇城时被我军截击。在战斗中，赵丹峰被日军挑死，赵桂廷、杜少荣被枪杀。

8、1944年古历二月十五日，便衣特务张××侦察到北盘里有我抗日工作人员，当天夜里与朱××带领伪军200人偷袭盘里，我抗日民兵张洪敬、张国祯、群众许长印被伪军挑死或枪杀。

日伪朝城县特务系的罪恶活动

马世祥整理

1940年6月28日，与日军达成密约的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向濮范观朝一带大举“扫荡”，日军一个中队占据了朝城县城，石友三部盘踞在濮范观朝一带，此后，活动在莘朝边界一带的土匪刘金岭率部投靠了驻朝城日军，被委任为朝城县伪县长。12月，“石高事件”后，石部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又率部投靠驻朝城日军，被编为伪第三十一师，委任文大可为师长。日伪合流，深沟高垒，向抗日根据地步步蚕食。至1942年底，朝城县大部地区沦为敌手。1943年1月，日伪朝城县警察所进行整编，下设三系两所，即警务系、保安系、特务系和白庙、罗屯两个警察分所。特务系网络地痞流氓，组建了10人的特务班（又称剿共班）。警察所长白彩章，特务系长吴佐臣、特务班长、副班长各一人，特务班在系长吴佐臣的亲自指挥下，在朝城周围地区进行秘密特务活动。

特务班主要任务就是秘密搜集刺探共产党、八路军及县、区抗日地方部队的活动情报，搜捕共产党员、八路军指战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为此，除系长、班长外，其他9人分别负责刺探朝城周围及城内“赤匪”的情报。

他们每人带有一小块白色方布，上面用毛笔写有各人身份的字样，加盖所长白彩章、系长吴佐臣的手章，随时携带身边，作为身份证件。他们每天早饭后携短枪、骑自行车、穿便衣出发，分别到各自负责的区域内，或进集镇或入村庄，利用狐朋狗友，

秘密刺探抗日情报。他们无论出城多远，当天晚饭前都必须赶回城内，首先向班长简单汇报一天的“收获”，然后再由班长带领，亲自向系长吴佐臣作详细汇报。如遇有重大情报，随时赶回报告。最后由吴佐臣一式二份书面报告给警察所长白彩章和伪师部第四科科长林仲堪。

1943年4月，系长吴佐臣召开特务班全体人员会，要每一个特务人员“都要把情报探清、摸实、搞准确”，如八路军是哪一部分的？驻什么地方？何时来？何时走？走哪里？有多少人？多少武器？各种武器的数量等，都要搞清楚。并恫吓道：“如果谁搞得情报不实，小心脑袋搬家！”

他们刺探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情报，真可谓无孔不入。一天下午，八路军七十八团驻朝城西南主卜营，负责城西南情报的特务分子钟四，几次想进入村内刺探都未得逞，他就到邻近的小寨村借来一副菜挑子，装扮成为八路军送菜的菜农混进村，把七十八团的人员构成、武器装备等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回城报告给了系长吴佐臣又迅速向警察所和文大可师部作了汇报。他们经过一夜的联络和筹划，第二天天刚亮，就从阳谷派出两辆满载日伪军的卡车，与驻朝城日伪军相配合，饿狼扑食般地向七十八团驻地主卜营一带包剿而来。由于我七十八团趁黑夜将孙庄据点拔掉，早已销声匿迹，敌人扑了个空。

吴佐臣还曾两次带领特务班到城西土陈家一带捕捉朝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及通讯员，在群众的掩护下，我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及通讯员均安全脱险。

日伪特务机关还利用突袭手段，极力破坏我抗日地下交通线和联络站。日伪占据朝城后，刘继延、杨梦祥等合伙在朝城小隅首路西办起了“北强书店”（后改名为北强文具茶叶店），后来他们与抗日民主政府的参议员申祥峰取得联系。申祥峰通过秦庙开明士绅秦宝斋结识了文大可的第四团团长王占奎，杨梦祥结识

了一营营长徐廷选，经过多次交谈，晓以民族大义，二人愿弃暗投明，为抗日出力。这样便建立了王占奎、徐廷选与申祥峰、杨梦祥至朝城敌工站的秘密联络线。冀鲁豫军区部队根据这一渠道提供的情报，在吉祥寺、周海等地截击了外出“扫荡”的敌人，奇袭了砖庄据点，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正当申祥峰、杨梦祥来往于王占奎、徐廷选和朝城敌工站之间进行传达联络，王占奎积极策动部队起义的时候，被特务分子侦知。1942年7月，吴佐臣派其3名特务配合伪文大可的特务机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刘继延、杨梦祥、申祥峰等，捣毁了“北强书店”。敌人对申祥峰、杨梦祥等严刑拷打，但二人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于7月11日将他二人枪杀于朝城西关外。

1941年7月的一天晚上，八路军新八旅二十二团驻朝城西北西常庄。特务吴法振探知后立即报告给上司吴佐臣：“百余匪军（指八路军）驻在西常庄，有长短枪80余支、机枪2挺、小炮2门，手榴弹一批……”。第二天拂晓，朝城日伪军倾巢出动，奔袭西常庄，我二十二团虽顽强战斗，击敌大部，但仍牺牲指战员22人。

1943年的8月间，特务班抓住八路军的一名联络员。一天晚上，特务系长吴佐臣等对他进行了严刑逼讯。下面是审讯的经过：

吴佐臣：“你说不说你们的联络员都是谁？说了你不受苦，不说？受了苦也得说！”

联络员：“就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别人。”

吴佐臣首先令特务把联络员的手铐取下，用绳子将他捆绑结实，悬空吊在了房梁上，吴佐臣及特务用棍棒朝着联络员身上乱打。联络员仍不说。吴佐臣又令特务把他从房梁上松下来，脸朝天绑在了凳子上。吴佐臣手提一把白色花茶壶，对着联络员嘴里灌水。不一会儿，联络员窒息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吴佐臣令特务将联络员从凳子上解开，架着他在院子里跑了几圈，联络员苏醒过来。

吴佐臣：“你说吧，不说还有一回哩。”

联络员：“你把我枪毙了，我也是不知道。”

吴佐臣令特务再次把联络员捆上，把他头朝下倒栽在盛满水的水缸里。停了一会儿，把联络员捞出，联络员已再次窒息昏死过去。特务们就把他脸朝下横倒在凳子上。联络员吐出喝进肚子里的水后，才苏醒过来。

吴佐臣：“这回你该说了吧！”

联络员：“不管你怎样审我，也是我个人！”

吴佐臣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未审出半个有用的字来，就把联络员送进了监狱，两天后又将联络员交给了文大可的第四科杀害了。

日伪朝城县特务系残害抗日军民的罪恶活动不胜枚举，群众也深受其害。但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朝城人民并没有被日伪特务的暴行所吓倒，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与日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4年2月28日，在我军强大攻势的威慑下，朝城日伪军残部向东逃窜。特务班多是本地人，不愿随往，遂如丧家之犬，各自逃散了。

东阿的日本特务组织及其罪恶活动

王 玉

一、东阿日本宪兵特别工作队概况

1938年夏，日本侵略军攻打东阿，国民党残军闻风而逃，东阿遂被日军占领。日军侵占东阿后，日本特务接踵而至，随即成立了东阿日本宪兵特别工作队，由日军东阿城防司令平井（人称“大胡子”）自兼队长，日本人松勇（人称“二胡子”）任副队长。东阿宪兵特别工作队属兖州（当时东阿属兖州道管辖）日军红部（司令部本部）领导，其组织机构相当庞大，该队除设日籍队长、副队长外，又搜罗了一个叫庞统华的中国的民族败类任华籍副队长，以下还有情报员孟广福、杨玉明、于广信等10余人。东阿宪兵特别工作队除在东阿城内设队本部外，又下辖以下一些分支机构和派出机构：

（一）剿共班。这是一个专门对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搞侦察、刺探等情报活动的特务组织，班长为华籍特务高学言，下有特务人员庞家祥、李延年等。

（二）突击队。这是一个武装特务组织，有300余人，全部是日本武器装备，队长为华籍特务赵子清（外号“赵二虎”）。该队驻扎于东阿、茌平、平阴3县交界处的陈家店子，打家劫舍，横行无羁，人民不堪其扰，对我方的抗日活动威胁很大。

（三）童子军。该队完全由18岁以下的思想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组成，原为国民党军石友三部的一支武装侦察队，石友三投

降日本后，这支小队伍遂归东阿日本宪兵特别工作队队长平井所辖。平井对这支小部队十分重视，除每人配备一支步枪外，还配备了3挺轻机枪。他们经常随日军下乡讨伐，骚扰百姓。

（四）派出机构

1、铜城宪兵特别工作队。队长为东阿宪兵队本部情报员孟广福，此人借日本人的势力横行乡里，助纣为虐，行人侧目，孩子听说“孟广福来了”就吓得停止了哭声。

2、姜楼宪兵特别工作队。此队负责人为华籍特务周寿。

3、苦山宪兵特别工作队，负责人为华籍特务张宪舟。

4、杨家河宪兵特别工作队。负责人为东阿宪兵队本部情报员杨玉明。

二、日伪特务在东阿的罪行

东阿宪兵特别工作队及其下属机构，自1938年成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7年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现择其为众人所周知者略述于后。

1938年日军侵占东阿后，奸淫掳掠，横行肆虐，平井的宪兵特别工作队更是无恶不作。1938年夏，一群日本兵在东阿城内隅首见到一个卖炸鱼的妇女，即群起百般戏弄，欲行奸淫，女坚拒不从，夺路而逃，日军围捉堵截，终将该女劫持，遂群相奸淫，女被轮奸致死。东阿东城三官庙西街住有一个60余岁的吴大奶奶，一天几个武装日本兵闯进了她的家门，哇里哇拉地比画着叫老人给他们干事，吴奶奶以为这些日本兵可能口渴，于是赶快给他们烧了一大锅开水，可是他们却叫嚷着“老妈妈的！”便把吴大奶奶投到开水锅里，活活煮死。老衙门后街庄承元夫妇笃信佛教，是“皈依道”的坛主。他们夫妇两人认为，日本人信佛，日军来时，只要盘腿打坐在佛堂里，合什念佛，便可无事，可是日本兵

进了他家，看见庄氏夫妇在佛堂念念有词，便把他一枪刺死。东阿城西范庄农民范貽韶，一天，几个日本兵闯进了他家，抓住他的两个女儿便要强奸，范一见怒火中烧，大喊一声，向日本兵扑去解救两个女儿，两女趁机逃跑，而范却被日兵一枪刺死。1940年夏，汉奸诱捕了我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平阿基于大队司务长李兆松，押往东阿日本宪兵特别工作队，交给平井，因李兆松拒绝投降，平井即对他使用各种酷刑，灌辣椒水，让狼狗撕咬，最后平井用铁条穿透李兆松的肩胛骨游街示众，后牵至东阿大桥，当时适逢盛夏，骄阳似火，李兆松伤痕遍体，又几天没进饮食，以致被活活晒饿而死。一次东阿日军讨伐归来，将大批被俘的我抗日军民交给平井、松勇审问。在这些人被严刑拷问后而没有屈服时，便把这些押往东阿南门外残杀，平井亲自执刑。杀人时他先用酒精擦擦东洋大刀，再用酒精擦擦受刑人的脖子，然后挥刀砍杀。一次连砍3人，一次7人，一次3人。何洪吉、刘道青二人系国民党游击队情报员，1938年秋他们被日本特务捕获，两肩被穿上铁丝，带至北门外真武庙前，日酋一声令下，一群日兵将何、刘二人用刺刀轮番刺死。东关外有一个叫何传耕的70几岁的老人，一天他到教坊坑去赶回自己的鸭子，日特竟随意把老人作为射击的靶子射死在水坑边上。日本特务机关有一个姓刘的翻译，此人更是狗仗人势作恶多端，他常常替日本特务找“花姑娘”，还常常因敲诈不遂而诬人为“八路”或“私通八路”，拘捕后送日本特务机关审理，光是这样被杀的就有冯云璧、齐明阳等多人。

正由于日特平井、松勇及其所豢养的走狗如此残酷和暴戾恣睢，所以东阿人民对这些屠夫们恨之入骨，可又敢怒不敢言，但当时却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大胡子狠，
二胡子恶，

妇女见了赶快躲！”

“说声孟广福，
孩子不敢哭！”

日本投降后，平井、松勇这些日本特务以及他们的走卒们虽都从东阿溜走了，但他们给东阿人民留下的伤心往事，却至今未被人们忘却。

（平阴县政协供稿）

转载《济南日特机关罪行录》

· 日伪时期的聊城县特务组织

冯文德整理

特别保安系是伪聊城县政府的特务情报机构，它隶属日军宪兵队和警察所双重领导。其任务是专门搜集和侦探我军政活动的情报，破坏我党地下组织和捕杀共产党人，为日伪军扫荡作战提供情报线索。

聊城县日伪警察局是1939年成立的，内部设有督察股、警务股、司法股、特务股、保安股。1941年由警察局改为警察所，五个股分别改成五个系。在这次改编中，扩大了警士人员编制，特别是加强了特务系的力量。在特务系，除设有系长一人、系员二人外，又添设了剿共班。其组织为：

系长 1 人 { 系员 2 人——内勤警士 3 —— 5 人
剿共班长 1 人——班员 5 —— 20 人

1943年2月，为配合日本宪兵队活动，特务系又改名为特别保安系。

特别保安系系长 { 内勤（系员 4 名）
外勤（系员 7 名）
剿共班（10—20 名）

内、外勤的分工是：

外勤分别在各区、乡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系汇报情报，

一般是口头面向系长或内勤汇报，有时用电话报告。外勤配有短枪，外出时大部分穿便衣行动，人们称之为“便衣队”。

内勤负责整理文件、档案、接收电话、综合整理、汇总各方面的情报，上呈系长和日军司令部、宪兵队等。

特务系和剿共班的分工是：

特务系的活动范围大部分是在城内，主要负责系内一切公开来往的文件收发，汇总有关情报，呈交伪县府、警察所和日军等。

剿共班主要是秘密活动在城关各街头、集市及各区、乡之间，利用集市、茶馆饭店、街头巷尾等场所，探听我党政军活动的情况；有时还盘查农村进城人员的证件，查户口、搜旅店、逮捕知情人或嫌疑人员，逼供、诈取情报；并为日伪军出发扫荡提前侦察地形、充当向导，配合日伪军行动。其行动直接受日本宪兵队指挥，在业务活动上还受特务系领导，在办理其他事务时由系长和剿共班长共同商议。

特务系和剿共班驻在聊城东门里路北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非常保密，特别是密件从不让外人经手，有时连普通文件都不经过收发室，有专人直接送达。他们的办公室都用绿纸糊着，特别是剿共班，整天关着门，门上写着“闲人免进”几个大字，就连他们本班人员入内，也必须在外喊“报告”，经许可后方可入内。

特别保安系建立以后，经常派人以走亲戚作掩护或扮作商人等，打入我抗日根据地，在周店、蔡庄、前高、刁海、谭庄、杜庄等村秘密埋下钉子，刺探我军政情报，侦察我抗日武装力量的编制、装备情况及活动范围等。日伪特务的活动对我抗日政府人员、革命家属、乡村干部危害极大，有的抗日人员被捕惨遭杀

害，有的抗日群众被抄家敲诈，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日伪特务在聊城犯下的罪行，是谁也无法抵赖的。

堂邑县新民会从事特务

情报活动的调查

冯文德整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南侵，于1938年底侵占了堂邑县城。日军到处烧杀抢掠，肆意蹂躏中国百姓，群众被迫得背井离乡，四处逃生，白天蜷伏在田林之中，夜晚栖身于贫民窟里。由于当时日军忙于侵略战争，战线过长，人力不足，因此未能及时在所侵占的县、区、乡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只好威逼利诱部分原区、乡的职员为日军服务。日军为了笼络人心，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有利于他们的侵略战争，于是到处网罗培植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和组织反动势力。

1939年3月，堂邑县维持会正式成立。堂邑肖庄的肖恩普，充当汉奸，卖国求荣，被日军委任为维持会长。随后，肖恩普按照日本主子的旨意，名义上组织群众“安居生产”，实则对群众进行横征暴敛，积极为日军的侵华战争出力效劳。

日军为达到长期统治占领地的目的，于1939年3月，在堂邑南门里小学，以维持会的名义，由日本人永田长吉、长七友二、村松恒雄，朝鲜人普翻译等举办了青年训练班，专门进行奴化教育，规定每个月举办一期，每期训练30余人，先后举办3期，共训练100多名青年。受训者大部分是由各区乡强迫参加或花钱雇来的，受训后他们返回家乡进行反共亲日宣传。

日军为控制堂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于1939年冬，由日本长田中、部员广福、翻译、教官等在堂邑东街路北建立了特务机构——堂邑县新民会，后其组织逐渐扩充，设立了一、二两科，分情报、人事、会计、宣传、收发、文书、配给、组训等8个股。

1941年6月田中为了扩大其反动势力，又成立了新民会指导员训练班，即特务情报训练班，由各区乡抽人参加训练，时间为6个月，共训12人，训练内容是：日语、日操、政治（包括中日亲善、中日友好及反共宣传教育）、情报（研究八路军化装活动的特点、搜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报、掌握搜集情报的方法和汇报的方式）、强化治安等。这期特务训练班人员于1941年11月毕业后，分别被派到阎营、郭关庙、温集、后李、乔集、城关6个据点，每处两人，为便于活动，他们都住在据点外，但直属据点内日军领导，以新民会指导员的身份活动，并戴有“指导员”的袖章。活动最猖狂的是阎营、郭关庙、温集3处的情报员，他们以访问村长为名，绑架群众诈取情报，有时还以经商作掩护侦察我军游击队、抗日政府的活动区域和去向。阎营据点的情报员主要活动于堂、冠一带，搜集桑阿镇南大小张庄的我马河支队、二十团、基干三团、堂邑县政府的活动情况。他们还选择重点村庄发展训练一至两名情报员，专门搜集所在地的我军活动情况，而后再报告给据点的日军负责人。日军将各种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一方面时刻惕防我军袭击，一方面随时准备出动围剿我抗日武装力量。

1943年3月，日军派张继武任新民会事务部长，张积极效忠于日军，于当年10月又举办了青年训练班，从各区乡抽调人员进行训练，共训20余人，训期为一个月。其训练内容分为：日语、日操、政治、公文呈式等。毕业后分配到各区、乡从事特务活动，建立和发展新民分会。其分会直属县新民会领导，负责供应汉奸

各据点的生活费用，协助日伪军队骚扰杀害堂邑人民，围剿袭击我军政人员。

新民会虽然在名义上是以中国人为主体，但实际上是日本顾问一手把持，日本次长直接控制全县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特务组织。新民会各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与日本司令部驻军进行秘密联系。新民会的情报股由日本次长直接掌握，每天向日本顾问和日本司令部汇报情况，并与日伪警察所特务系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互通情报。在政治上，对青年进行奴化宣传、开办训练班，以扩充其势力；在军事上，秘密刺探我军政情报，推行清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三光政策”，残害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对敌占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必需物资实行严格控制，以村、户、人进行配给，对我解放区所需煤油、火柴、食盐等物品则实行封锁禁运，企图造成解放区物资缺乏，生活困难，不攻而自破。

1942年秋收微薄，又逢1943年大灾荒，加之日伪军的疯狂掠夺，堂邑一带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无人区”。此时，靠吸吮人民血汗生存的日伪军队因抢掠不到粮食，不得不减少或停发薪金，分设在6个据点的特务情报分子见势不妙，也于1943年春季四处逃窜，各谋生路。1945年6月，堂邑县新民会在我军解放堂邑时崩溃瓦解。

日伪在临清推行奴化

教育的情况

赵广善整理

1939年春，日伪临清县政府教育科成立。之后，临清沦陷区的中小学教育得以恢复，相继恢复和建立临清初级中学1处（1941年8月建立）、临清县简易师范学校1处（1941年建立）、完全小学10处（其中城内完小有县立模范小学、鳌头矶小学、三元阁小学、私立武训小学、育才小学、育英小学计6处）、初级小学46处（其中临清城内初级小学有东夹道小学、东营小学、皇城庙小学、东门里小学、竹竿巷小学、浮桥口小学、南水关小学，计7处），学生总计7164人。

在此期间，日伪政权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方针，鼓吹“东亚共荣”、“中日和善”，并在各学校建立思想指导委员会，从精神上麻痹和瓦解中国青年学生的斗志。

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具体表现，首先是在各校强设修身一科，该课程以“恢复东方固有的伦理道德”为幌子，以中日“唇齿相关，敦睦邻邦”为课题，大肆贩卖“亲日至上”、“日中亲善是中国生存的唯一保障”的反动货色；其次是强设日语课，美其名曰“中日同文同种”、“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胡说什么“学习日语是中日睦邻的首先问题，是携手御敌的有力武器”；再就是设立军事课，该课程的教师多系伪警官兼任，他们在课堂上公开叫嚷：“日军的操练法是最科学的，最先进的，要以日军为榜

样，一丝不苟地学习、演练”。一旦发现有的学生动作不够规范，除了拳脚相加之外，还辱骂他们说：“这是对友邦不尊重的表现。”不仅如此，日伪推行奴化教育，在其它课程方面也有许多表现。在历史教学上，公然删去中日不平等的二十一条以及“五四”、“五三”、“五卅”、“一二·九”、“九·一八”运动等篇章；甚至在数学教学中，也要编一些诸如从中国某地到日本旅行坐飞机或坐火车各需多少时间一类表示中日亲善的题目。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奴化教育甚至连体育游戏也不放过，当时在运动场上或大型运动会上经常看到一个“三条脚竞走”的比赛项目，该项目的具体做法是：把甲的左腿和乙的右腿用绳子捆住，然后在统一口令，两个人步骤一致地行走，先到终点的一组为优胜。一旦某一组人动作不协调，或摔倒或落后，便引起哄堂大笑。其实，这是个很普通的一个比赛项目。可是，奴才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却也要借此大发一顿议论，说：“这种活动犹如大日本帝国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一样，两者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之后，这个比赛项目干脆就叫做“中日亲善竞走”。

1945年8月中旬，日伪政权垮台。9月1日，临清县城光复，日伪教育彻底终止。

日伪新民会在莘县

马世祥整理

1939年2月18日，“剿共司令”刘仙舟在日军一个中队的配合下，从聊城出发经马桥直接侵占莘县城，刘仙舟被委任为莘县伪县长兼保安司令。日本侵略军在“征服支那”强烈欲望的驱使下，不仅大肆践踏莘县大地，而且还带来宣抚班，大搞奴化教育，毒化莘县人民，企图使莘县人民蜕变成甘为其效命的“顺民”。随日伪来莘县的宣抚班由日本顾问山本、浦步直接操纵，办事人员都是日军在东北培植豢养的所谓“民族精英”。1940年3月，根据日军司令部的指示，宣抚班改称为“中华民国新民会山东省莘县总会”，伪县长刘仙舟兼任总会长，下设总务科，主要负责收发文件、会计、计划等。组织指导科，主要负责宣传、情报、组织等。青少年训练所，主要负责对青少年进行奴化培训，使他们成为其鹰犬。后又设立了配给所，主要负责生活必需品的配给，配合日伪军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山本、浦步、井上、和田利兵卫等先后任日本常驻新民会顾问，直接驾驭新民会的活动。新民会还设置了五色会章、五色会旗，会旗上印有一红一黑大小两个“亚”字，意为“东亚团结”，制定了五条会纲：1、发扬新民精神。2、实行和平反共。3、完成国民组织。4、团结东亚民族。5、建设世界新秩序。并编写了会歌，以此约束新民会员的言行，教唆新民会员为“大东亚共荣”而战。

新民会对莘县人民的奴化教育首先从青少年入手。1940年4

月，新民会从其占领区各乡村抓买有一定识字能力的12至18岁的青少年到青年训练所受训。训练青少年的目的是为“变换青少年的头脑”，让他们明白“日军来中国是为了帮助建设新中国，并不是来灭亡中国”，并要他们学习日本语，进行军事训练，日本顾问和伪政府长官亲自训话，青年训练所的教官主讲。一个月后，这些受训的青少年结业，大部分被遣回家乡进行反动宣传，个别被留到新民会青年训练所。

1941年，日伪在莘县先后三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莘县大部地区为敌侵占，随着日伪占领区的逐步扩展，其奴化教育也在加紧进行。1942年4月，新民会从其占领区招考8人到青年训练所受训，受训科目主要有“新民主主义”、“调查情报”、“国家形势”、“军事训练”等，日军司令官、顾问、伪县长刘仙舟等都多次到训练班训话并讲课。6个月后，受训期满，其中两人留到新民会刚成立的配给所，控制洋油、洋火、食盐、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和供应，配合日伪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其他6人分别被委派到城镇区、铁塔寺区、燕店乡、王化区、马厂区、十八里铺区任区指导员，全面负责本区的反动宣传、情报事项。

1943年，由于连续两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上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抗战形势进入最严峻的时期，这也是日伪最猖獗的时期。解放区越来越小，沦陷区更加扩大，日伪为加紧控制日益扩展的地盘，大力强化其毒化莘县人民的宣传工具。7月，新民会又组建乡指导员训练班，从各区乡共招选18人进行培训（另有一人考取未参加受训。一人因不会立正、稍息等基本操练动作，3天后被除名），时间一个月，主要培训科目有：军事——包括下操、口令、军容风纪等。宣传——主要是如何向群众进行亲日反共宣传等；情报——如何搜集抗日军民的活动情况和群众的动态；以及“会纲”、“会旗”的意义和物资分配等内容。结业后，

4 人被留到新民会总务科和组织指导科，随新民会参加破坏抗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1 人被任命为新民会卫兵班班长，带领三四个卫兵负责保护日本顾问的安全；其他受训人员全部分配到各乡任乡指导员，其中赵庄乡、盛河乡、王炉乡、位庄乡、黄楼店乡、杨庄乡、张屯乡、单庙乡、城镇乡各 1 人，马厂乡、王化乡各 2 人。

这些经新民会培训“变换了头脑”的青少年，被委派到各区、乡后，就各自充分发挥在训练班学到的“基本技能”，到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活动，利用各种手段搜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他们宣传的内容主要是“中日友善”、“日本来中国是帮助我们”、“日本是友帮”、“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安居乐业”、“八路军杀人放火、共产党共产共妻”、“大日本万岁”等反动言论，对群众施行奴化教育。宣传的方式主要是在日伪军“扫荡”时将群众集中起来进行训话，或秘密到各村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漫画、将抗日标语涂掉再刷写上反动标语等。他们还充分利用伪乡长、乡丁、保长等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地搜集共产党地、县、区抗日政权及抗日部队的领导人员、驻地、人数、装备、活动等情况，并且执行人员调查、训练青少年、发展新民会员、分配生活必需品等任务，填写好地图、表格，按旬、月上报给县新民会，有些重大情报随时上报，再由日本顾问上报东临道、省新民会和日军司令部。

新民会也经常随日伪军“扫荡”时出动。他们曾先后随从“扫荡”的日伪军到燕店、甘寨、张鲁、李园、豆村、马厂等地进行反动宣传。一次，日伪军来到甘寨“扫荡”，他们将群众集合到一个大场院后，留部分日伪军维持秩序，就由新民会员对群众进行亲日反共一类的训话，其他日伪军则到群众家中抢掠财物，仅小麦就抢走 5000 多斤。一天夜里，马厂乡指导员探得有八路军一部驻在南沈庄，就飞速报告了新民会和日军司令部，天亮

后，日伪军火急赶到南沈庄“清剿”，但放了一阵枪炮，却没发现一个八路军的人影。如若发现八路军大部队行踪，他们就紧闭城门，龟缩在城内，以防攻城。

1944年8月1日，我八旅二十二团在分区基干团和各县大队的密切配合下，一举攻克莘县城，伪县长、新民会总会长刘仙舟被活捉，新民会员遂如丧家之犬四处逃散，反共反人民的新民会组织彻底分崩瓦解。

冠县日伪政权的苛捐杂税

马子江 郭广民整理

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冠县后，为了巩固其罪恶统治，达到长期霸占中国的目的，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方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对其占领地区的人民则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对人民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现就调查到1941年秋至1942年春半年中日伪县政府和伪区部所征赋税的情况加以说明。

一、一角五分和二角四分团费。这两项团费是由各村按地亩摊派的。名义上是成立自卫团、购买枪支弹药用，实际上统统入了日伪官吏们的私囊，用于吸食鸦片、吗啡等。虽规定每亩交纳一角五分或二角四分，但人民群众实交数目已不下一元五角或二元四角。往往是用一要三，即：县里要一元，到区里的时候就加到三元或五元，下村收款的人，再把它变成七元或十元，这样层层加码，没有定数。有的村因无款可交，便以鸦片、吗啡代替。

二、建护费。每亩征收三角六分，用于修筑碉堡、挖封锁沟用。实际上这笔款也全部装进县区警卫人员的腰包。不仅如此，监工人员还对民工进行打骂，苛求快速，甚至采取扣留、关押等毒辣手段进行敲榨勒索。每天总有数十人被打伤，十余人被关押，逼其家属用钱款来赎，才予以释放。有的民工经受不住折磨，只好东拼西凑借上几个钱交给监工，以求少遭毒打。监工们一看有

财可索，便变本加厉，诡设圈套，进一步搜刮民工。如1941年初春挖冠堂路封锁沟时，伪建设科故意把沟影测到民房和坟墓当中，直到居民或坟主交了巨款之后才另行改道，交了钱、受了屈，还得置办酒席酬谢所谓“关照之情”，有的甚至把自己家的妇女献给监工们任意淫乐才算完事。

三、支应费。所谓支应费，是专为招待过境的日伪军用的。每次每亩交纳五角到一元，每月少则交纳两三次，多则八九次。

四、情报费。这是供给敌人情报人员出探军情用的。这种按次数随时摊派下来的费用，没有定数，一般说来每次每村交纳50至100元。还规定，每天从村里要四至六人出探情报，每人每天费用按四至五元计算，均由村内支付，如果稍有怠慢，就罚该村加倍出探。

五、日军娱乐费。这也是一笔无定数的费用。每有日军、伪军扫荡过后，或本县驻军外出抢掠归来，都要进行所谓“慰劳”向各村要很多牛、羊、猪、鸡、鸭、鹅，大摆酒席。每次“慰劳”还得要各村选送有姿色的妇女，任凭日本军官、翻译官等人蹂躏玩弄，甚至酒后公开宣淫。

六、联络费。这是用于上下互相请客的费用。如各伪区长联合请伪县府职员、日本军官、翻译官的客；伪军警、伪职员请上司的客。就连警长、传达人员也要出面请客。而被请者事后要一一回请。因此，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接连不断，每次请客都要摆七八桌。总之，不论谁请谁，是请客的，还是被请的，这些宴请费用全部由各村摊派。如有一次，冠县伪警长乔治亭、伪县府传达赵旭东联名请各伪区长及各机关职员的客，花费1000多元，结果由各区摊派给各村人民群众来拿。

上述税赋，仅是半年中交纳的钱款，除此，各伪区公所还要向人民群众征收粮食等实物，以供伪县府职员及各区伪区长吸毒享乐之用。征收的粮食基本上是小麦，其数量不等。有的区按每

亩10斤征收，有的区则达20斤，甚至更多。

日伪的县大队、区队每次下村催交税赋，都要烧杀抢劫一番。尤其是对那些交款迟缓的村庄，其凶残程度已达极点。当时敌人把所占领区村庄分为三类：

一是照章纳税赋、出夫做工者，为已克服村。伪县大队、区队将予以保护，不加烧杀。

二是对税赋交纳推委或缓慢，不能经常出夫做工者，为半克服村。如有日军扫荡过境、烧杀、捕人、索拉牲畜时，伪区、县政府予以保释，但需另外筹纳保释费或暗交巨款送礼才行。

三是拒绝交纳税赋、不出夫做工者，为未克服村。伪县、区政府则请日军讨伐，实行“三光”政策。

面对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村人民群众也采取了一些应急办法。每当敌人下村催交粮款时，有些敌占区或接敌占区的村庄，不得不暗自集款行贿，求其上报列为已克服村。但这笔贿款要多于催交数目数十倍，否则虽交了也称没交。对所谓未克服村，敌人坚持推行“三光”政策，企图以此恫吓群众向其屈服。所以，接敌占区的许多村庄，都要被迫交税出夫。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白天在家做活，晚上男女老少纷纷逃到野外露宿，以免遭到敌人的杀害。

以上仅仅是日伪政权敲榨勒索群众的手段之一，而实际上全县人民所承受税赋重压的程度是惊人的。如1942年6月一个月中，冠县伪五区部向烟庄村所征税赋就有：

- 1、买兵款80元；
- 2、给伪县大队长、中队长付丧、喜礼费20元；
- 3、修城墙费50元；
- 4、招待日军费（15次）90元；
- 5、修电杆费60元；
- 6、建炮楼用砖6000块，椽子、檩条各70根；

- 7、修工费（三次）100元；
- 8、汽油费（每五天送一次）120元；
- 9、请客招待费（21次）100元；
- 10、被服费60元；
- 11、菜金费（五天11次）60元；
- 12、灯油费15元；
- 14、牲畜费100元；
- 15、鞋袜费30元。

以上仅仅是杂税，所谓正税不在其内，其正税有：

- 1、麦季每亩征麦10斤或30斤；
- 2、秋季每亩征麦20斤或10斤，款2元；
- 3、村长待遇粮，每亩每年40斤或20斤。

总之，敌人巧立了各种各样的名目，对人民群众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前来要款逼粮的人从无一日间断，有时一天当中要来三四次，可是广大人民群众连吃的都没有，哪里去筹款交税呢？交不起钱或晚交一会就要遭痛骂和毒打，甚至枪杀。如该村农民田之成老汉，因一时交不起苛捐杂税，被伪村长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多次，最后，又将其唯一能煮食物用的铁锅抢走，不久老汉含冤而死。

在日伪占领期间，敌人所收苛捐杂税根本也没有什么限制。今天张班长开了个纸条，明天李班长也开了个纸条，凡是敌伪的小头目喽罗都可伸手要钱。不仅如此，日伪军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村大抢一次，每次就像刮地风一样，连老百姓的锅碗家具也囊括一空。

1942年春，驻冠县城里的一个日本军官，带领一个小队在贾镇住了7天，就有4天要“花姑娘”陪着饮酒睡觉，每天要各村拿款供他们享乐。又如翻译官吴国贞生了一个小女孩，强迫各区、乡的群众随礼。翻译官唐阳修为了享乐，要修一所公馆，一

些汉奸爪牙、伪区长、伪村长等人到处催逼修馆费，弄得群众纷纷外逃，家破人亡。

八年来，冠县人民饱尝了日伪军的扫荡、烧杀、奸淫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苦。冠县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血泪斑斑的民族恨史。

日伪军在高唐

横征暴敛、掠夺经济的部分罪恶事实

张金洪整理

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掠夺，是日军侵华的主要罪恶之一，在高唐，以伪县长李九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更是助纣为虐，为日军充当了经济侵略的帮凶。

1938年，高唐伪政府成立后，日伪反动势力就开始了对高唐人民的经济掠夺。1939年2月，日军修筑高禹、高聊、高恩、高夏公路及通往各区的公路，强迫全县民众按地亩出资、出夫、出车。历时达8个月之久。同年5月，李九在县城内专门成立一个为日军购买干草、马料、劈柴等物资购买所，所购物资均按半价强迫群众出售。1940年10月日伪成立农业合作社，李九任理事长。他伙同韩松亭、王辑如等人，巧立名目，对全县农民进行敲诈盘剥。如对农民必需的食盐、煤油、火柴等日用品，限制数量，高价出售。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特别是棉花。1944年，李九下令每亩棉花征收四十斤籽棉，当时全县棉田128000亩，仅这一年就掠夺棉花430万斤。其他方面，更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诸如给养费、子弹费、修建费、壮丁费等等，不胜枚举。使农民难以负担。

在四区，伪团长庞长申为了扩大其势力和满足其荒淫奢侈的生活，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达到无以复加程度。当时

四区只有24000多人口，养活着庞长申部2000多伪兵，不管年景好坏，农民收与不收，都要照常按月交纳其名目繁多的“花销”。不论农闲或农忙，都要抽壮丁为他修筑据点围墙。计在1939年到1944年的5年中共修了11个村庄的寨墙，碉堡和沟壕，施工量浩繁巨大。纳“花销”和“出民工”两项，则使农民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他置群众生死于不顾，强拆民房数百间修兵营，使百余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筑“葛针寨”把方圆5里之内的枣树几乎全部伐光。1943年，农民刚度过天灾荒年，四区群众就被迫交纳每亩30斤籽棉，逼得群众走投无路。

在七区，伪区长刘宝善，自1942年1月起，先后在小刘庄、明新寺、双庙、徐官屯等村强征民工，强征物资，修建十几个据点，给周围村庄的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刘宝善乘机敲诈群众钱款数千元。1944年，刘宝善派伪军到焦庄、张庄强敛花销，因两村群众生活困苦，无力交纳，抓走村民10余人，迫使不少群众弃家外逃。刘宝善还在小刘庄雇佣了40余名劳力，为他代种土地100余亩，代养骡马30余匹。

除此外，日伪军还利用“扫荡”“清剿”的名义，在全县范围内大肆抢掠农民财物，多达数百次。其手段之恶劣、其范围之广泛，其后果之严重，令世人共愤。仅举数例即可见一斑。

（一）1940年7月13日，数千日伪军进犯朱庄，烧杀抢掠，杀害村民40余人，将民房一律烧光，凡一切有生命的包括牛羊骡马、鸡兔猪犬全部掠走。民众物资被掳夺一空。

（二）1941年1月初至7月，日伪军进犯三区蛮子营，并大肆抢劫。将抢劫的民众物资连日用20余辆大车向县城拉运。事隔两日，日伪军再次出动进犯该村，遭到村民的抵抗，日伪军恃武力冲进村后，逮捕村民10余人，并再度实施抢掠。又掳走牲畜120余头，财物百余车。

（三）1941年3月间，百余名伪军，每日到各村逮捕无辜

村民，强逼村民按每亩一元七角交纳赋税。并借机敲诈勒索财物。

（四）1941年11月9日，日伪军联合出动骚扰七区，向尹集村群众摊敛馍馍1500斤，勒派大车20余辆，将抢劫的物资全部拉走。

（五）1942年1月29日，高唐伪县长李九强迫全县群众向日军缴纳飞机献金，全县共交纳铜1500余斤，生铁5000余斤。

（六）1942年2月2日，300余日伪军由聊城、博平、堂邑一线退回高唐县城，在城内肆意抓伏。城内居民纷纷外逃。日伪军乘机抢劫财物。

（七）旧城乡的张庙村，原属清平县。这千户大村是清平日伪团长左连喜的辖区，当时只驻有30多人的小分队，是日伪统治的薄弱地区。庞长申修起西部的几个据点之后，早就觊觎这一地区，试图向此扩展。1944年冬，曾派其走卒李文卿带两个连攻打张庙，遭到该村群众的奋力抗击，由于工事较坚固没能攻进，并有一个叫郝麻子的排长被打死。因此，庞长申怀恨在心。次年8月，截击治安军时得炮4门，于是凭借机枪加大炮的优势，于是年8月23日组织两营兵力第二次攻打张庙。用炮轰开该村东门，左连喜部的守兵及大部分群众弃村而逃。庞长申部进村以后，即宣布全体士兵“随便”三天。于是，一场空前的大抢掠发生了。全村被洗劫一空。光是交至所谓“旅部”的物资就装了17大车，牲口42头，粮食2500斤，交至李文卿营部的有包袱两大车，牲口19头，而匪兵们个人所抢的东西不计其数。

在日伪反动势力敲骨吸髓的盘剥和无休无止的抢掠下，高唐人民如处水火，苦不堪言。由于生计无着，许多群众被迫弃家外逃。有的地方如徒骇河东岸一带形成了十几个村的无人区。尤其是1942年夏至1943年夏，由于连续干旱330天，赤地百里，颗粒不收。1943年秋又逢蝗灾。高唐灾区面积达131000亩，灾民达48400

人，大灾之年，日伪军盘剥依旧，掠夺无减，天灾加人患，致使粮食奇缺。一时饿殍遍野，逃荒要饭者比比皆是，仅1943年春，全县就饿死30000多人。

就在高唐人民饥寒交迫，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时候，日伪军头目却搜财自肥，中饱私囊，大兴土木，广置田产，肆意挥霍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1940年，伪县长李九让群众出钱出工，去他的老家——打渔李庄建房39间，两层楼一座，炮楼4座，修筑了环绕全村的围墙，还先后买地150余亩。

四区伪县长郭隆元为了满足他荒淫奢侈的生活，8年中重修了他的住宅共瓦房40余间，新建住宅两处共瓦房55间。为了他家的风水好，赶走他旧宅路南的群众，在别人的宅基地上人工挖掘“月牙湾”，并修上“望月亭”，湾畔还修了花园，供他玩赏。在村东占地15亩，修了他家的祖坟地，栽上柏树，并在林边的路口上，为其父立碑建亭。他用霸占和强买等手段，扩大田产达480多亩。

五区伪县长郭进诚暴敛民众的财富之后，在恣意挥霍上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除了大兴土木，建房筑楼修围墙之外，还在据点内安装发电机、拉设电网、安电灯，装电话，将巢穴布置的富丽堂皇，不可一世。为了玩乐，他还重资聘请了名演员，组建自己的戏班，长期为他演出。遇订婚、完婚、祝寿、立碑、挂匾，逢年过节，宴请宾朋等，必点剧目，热闹非凡。真是看不完的戏，吃不完的宴，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一时，郭庄据点成了罪恶集聚，淫秽污浊之地。郭进诚还乘人之危，置地数顷，横跨马颊河两岸，成了五区的头号地主。

日军侵华期间，日伪反动势力掠夺高唐人民的财富之多，是难以计算的，仅从两个伪军头目身上就可看出他们掠夺之巨、之大。1945年8月，五区伪团长郭进诚看到末日已临，急令其走卒郭来春用汽车运票子和金银财宝到济南置买产业，为自己准备后路。日本投降前夕，伪县长李九从打渔李庄逃跑时，光银元就堆

满了一床，还有布匹两大车，逃往北京后，在东四六条用伪币120万买瓦房32间，在鼓楼街方砖厂内小厂7号，用黄金30两买瓦房9间，平房7间。直到他1953年被捕伏法时，尚存人民币（旧币）170万元，布60匹。由此可见日伪在高唐掠夺经济方面所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罪大恶极的日伪据点影庄

赵广善整理

影庄，是临南一带有名的封建堡垒村。按战前旧制，该村位于馆陶县三区境内，抗日战争期间划归卫东县一区。时该村共有百余户，五六百人。

该村最大的封建地主是高登科，外号高五。“七七”事变不久，他便以“防范土匪骚扰”为名，在本村组织起封建自卫团，自任团长。之后，高登科役使村丁、民伏在影庄村四周筑起了高3米、宽1.5米的土围子。土围子的四周，则是一圈深2米、宽3米的壕沟，壕沟之外还有用一道树桩、荆条等插栽而成的鹿寨。为了便于控制出入，该村一条沿袭多年，南北走向通向外村的道口，也被堵住了，仅留下了沿东西走向一条通路。平日，在村东、西两头寨门外均有民团队员把守，可疑人等很难入内。

1943年春，我八路军东进支队和敌后武工队开辟卫东时，高登科自恃本村有民团把守，工事坚固，便紧闭寨门，拒不让我军政人员进村。后经我方反复做说服工作，虽然他的态度一度有所转变，并在一段时间内与我建立了联系，但是，他的反动本性不改，至1944年夏，高登科又只身跑到临清城内投降了日军。在日军的资助下，他很快拉起了一支150余人的队伍。日军命该部为“东临道反共自卫团”，高登科任团长，范以德、李智信任副团长。同年11月在日军的保护下，高登科率反共自卫团返回影庄安插据点，很快在村东、西两头建立了两座碉堡，并将村内一家

地主的民楼改建为伪团部。驻该据点的日军多则100余人，少则30余人。伪军总计有300余人，编为3个中队，其中，有两个中队分别把守村两头的炮楼，其余的人驻伪团部。驻该据点的敌人火器配备很强，除300多支长短枪以外，还有重机枪两挺，轻机枪6挺。

影庄据点建立以后，该村日伪军经常对我卫东抗日根据地进行袭扰，截取我运粮、棉车队，夜间到附近村庄起我埋藏的枪支弹药和棉花等军用物资，还相继枪杀、活埋了赵塔头村中共党员赵文华、区民政助理员刘明启等多人。特别是1945年3月影庄日伪对王二寨村的扫荡，更使我抗日军民遭受重大损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二寨位于影庄西南10多华里（现位于冠县甘谷屯乡境内），这一带是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特别是该村的一条户户相连直通村外约三四百米长的地道，更为我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方便条件，为此，我卫东抗日政府人员经常在这里住宿活动和打游击。某日，该村的一个外号叫张六猪头的地主暗中向影庄敌人告密，影庄日伪军二三百人立即出动对该村进行围剿，敌人进村后很快查清了地道的方位，然后用铁锹将地道截成数段，紧接着便将点燃的拌着辣椒的麦草等物塞进地道内，直呛得人们咳喘不止，有的甚至窒息而死。在这次劫难中，有23名无辜群众丧生。我卫东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因事先得到情报，于事发前两小时进行了转移，故未遭受损失。

为了尽快消灭该据点的敌人，在我加强军事威慑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敌人的政治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6月，影庄伪团部范以德率伪军120余名携枪反正，日军见势不妙也迅速撤往临清城内。自此，影庄伪军元气大丧。8月底，我军对影庄据点敌人发起进攻，伪军一部立即缴械投降，另一部分人则迅速溃散、潜逃。

临清县七区伪据点——台庄

赵广善整理

台庄位于临清县七区境内之临（清）尖（冢）公路的北侧，这里是一个有百余户人家，近千人的大村。

1939年夏，临清县伪军在台庄建立据点。该据点位于村庄的西北部，它是经过对该村一个外号叫台三偏巴子地主的一处宅院进行改建而成的。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伪军在该院四周筑起了高3米、宽1米的高大围墙。在围墙的四个角上，各筑有一个大碉堡，站在碉堡上可以俯瞰村内和公路上发生的情况。紧贴围墙四周的四周是一条宽6米、深3米的封锁沟，封锁沟的外侧还有一道鹿寨，该鹿寨全部是用树头、树桩、红荆条和蒺藜铁丝网编插而成的，相当坚固。行人、车辆根本不可能从这些地方通过。在据点的东门外建有一座吊桥，这是该据点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每天早晨有人将吊桥放下，一到晚上又将吊桥拉起。平时把守吊桥的有一个班的兵力。

在该据点驻防时间最长的是以中队长冀慎修（冀简斋，东阎庄人）为首的临清县伪十三中队，该中队共有100余人。冀慎修是一个死心塌地的伪汉奸，一贯作恶，民愤极大。1942年，敌人为了垄断经济和进一步控制临尖公路，强行将在黎博寨沿袭多年“逢五排十”的集市迁至台庄，并决定在台庄建立伪区部（此前伪七区政权已在临清城内白玉阁街建有七区办事处），具体任务即是作为台庄伪据点的四合院的一溜北房全部拆除，另建一座

两层楼房。当时正值荒年，天旱无雨，庄稼欠收，老百姓维持生活都很困难，但是伪政府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硬是把这一耗资巨大的款项摊派在老百姓头上，同时还强拉民伕数百人，不分黑天白日地为其干活。在此期间，伪军头目还经常借故打骂群众，巧立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如工头看见一个村的人来晚了，便信口说：“你们一定是八路军派来的，光会磨洋工！”当看到一个村的人来早了，他又会说：“来这么早干什么？你们一定是八路军的探子！”甚至看到一个带好铁锹的人也要借故敲诈一番：“昨天晚上你一定跟八路军破路去了，不然你的铁锹咋会这么快，这么亮！吊起来给我打！”及至等到有人出面说情，对方答应赔礼，送钱才算作罢。内中有一个外号叫“吓死人”的伪军班长刘东举更是打人成性，以致连从未见过的小孩，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发抖。

根据对敌斗争的实际需要，我地方党组织一面加紧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如通过关系将我中共党员傅振桥、邢金彪、姜洪涛等打入该据点，同时决定对于顽固不化的伪军头目冀慎修等伺机予以坚决打击。1943年秋，临清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扶植和发展生产，明令发布“不准私自宰杀耕牛”的文告。冀慎修看到后不以为然，并有意向我发难，他公开扬言：“老子偏要宰头牛煮肉吃，我看谁敢挡！”某日，趁冀慎修带随员2人在台庄集上闲逛之际，我七区武工队当即将其击毙。此举，使伪据点的敌人受到了一定震动。之后，我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七区伪区长王保林和台庄据点伪军的工作，此后，在张西林、台家普（中共党员）许光武等相继任伪中队长期间，伪军对我的态度便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945年8月，七区区长郭华轩、政指王希平（王际志）率领七区地方武装，对台庄据点伪军发起围攻，31名伪军全部被俘，伪据点被我克复。

花牛陈日伪据点

冯文德整理

花牛陈位于聊城东南，是个约400余人的自然村庄。1938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聊城后，中共筑先县委、政府及抗日武装经常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聊城日伪军为了封锁、扼杀抗日根据地，对聊东南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扫荡”，之后，又实施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以碉堡为中心，由封锁沟相连接，逐步形成一个火力点与封锁沟相互配合的交叉封锁体系，企图以此来摧垮和消灭抗日根据地内的抗日武装。1939年初，日伪军开始抓夫修建花牛陈据点。

花牛陈伪据点是聊东南日伪势力的中心堡垒。该据点工事坚固，火力配备系统与兵力部署都较完备，并能与附近的据点遥相呼应，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该据点占地约60余亩，高大坚固的围墙绕村庄一周，围墙高7米，厚约3米，墙头外沿有垛口相连的女墙，女墙内有供士兵巡逻用的二道台阶，战时便于隐蔽机动兵力。在墙的四周拐弯处，安有便于观察射击的小岗楼，在四个方向上各设有大门，大门上又设有二层门楼，门外围沟上架设有吊桥。墙上各处的射击位置都能互相联络并便于观察，对围墙外各处目标都能形成交叉射击火力网。

围墙外还设有数道障碍。紧靠围墙的是一条挖掘而成的沟壕，宽5米，深3米，沟深坡陡，行人很难攀越，雨季沟内还存有污水。沟外一周斜插有宽约3至5米、带有刺的枣树枝鹿寨。

鹿寨外50米内严禁耕种庄稼或生长其他青棵之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便于观察、射击的开阔地带。

在围子内，日伪军分别在重要位置驻扎，防守地域和各自分工的任务都很明确，并有一定的战术协同计划。日军约30余人驻在围墙内的西北角，他们在大围墙内又筑起一个小围子，其目的就是对外防备游击队袭击，对内对付伪军哗变。小围子占地约3至4亩，墙头上安有铁丝网，在小围子中央又建有一个较大的炮楼，在炮楼的不同位置上设有对准各个方向的机枪射孔，其火力能控制整个村庄和村西外的大部开阔地带。平时日军对小围子戒备森严，中国人包括伪军士兵也不准轻易入内。它的内部设有电话，与聊城日军司令部及各据点保持联系。

花牛陈据点是日伪军在聊东南一带较大的一个据点，开始时驻有日军30余人，后来减少到10余人。驻有伪军一个中队，约500余人，他们和其他据点的伪军经常流动换防。红枪会头领陈玉怀也驻在里面，因此该村的青壮年男青年都被迫参加红枪会组织，为日军效命，凡遇有军事行动，即召集邻村的红枪会配合。伪聊城县六区的乡公所也设在这里，乡长陈万士率领30余人，负责向各村催粮派款，保障日伪军的战勤供应。因此，该据点对我抗日根据地形成较大威胁。

修建花牛陈据点的过程中，他们强行拉夫派工，当时周围村庄中16岁至50岁的男人全部被抓去干活。在严冬季节，天寒地冻，他们强迫民夫筹柴烧水化土和泥施工，百姓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忍饥挨冻，在日伪军刺刀的威逼下从事繁重劳动，稍有怠慢，即棍棒加身。在整个花牛陈据点的施工中，因冻饿和被敌人殴打致伤、死亡的民夫，不知其数。

修筑炮楼、围墙、住房及鹿寨等，工程浩大，所需的一切材料，如砖瓦、木材、白灰等，都取之于附近村庄的群众之中，给这一带的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到各村摊派、强行逼

交，在各村的树木伐光后，就摘门扒屋，取砖用檩，致使多户家破人亡，无家可归。

1944年，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日伪军在聊的势力到处遭到打击，至11月份聊东南的日伪军大部分被歼，多数据点已被我攻克。花牛陈据点的日伪军已孤立无援，不久，他们即逃往聊城。至此，花牛陈据点即告覆灭。

附:

茌平阳谷等十一县

八年抗日战争人口损失统计表

1946.5

县别	被敌 杀害	敌特 暗杀	敌灾病 残致死	流亡 失踪	被抓 壮丁	合计	现有 人口	被敌 奸淫	染病者	现仍患 病残者	少食 缺衣者	被敌 打残	合计
茌平	11551	357	58256	1235	8854	80753	210000	343	4754	75900	615	81612	
博平	5214	161	40621	1279	13615	60890	304713	298	7206	53258	554	61316	
筑先	7334	226	63960	3675	13315	88510	107519	169	2182	54928	364	57675	
东阿	4281	147	42758	1347	8141	57174	228525	263	4928	44825	385	50341	
阳谷	12380	282	92329	3280	17512	125883	247000	318	4429	86215	684	92646	
濮县	3145	165	9193	1015	3835	17353	133000	113	2650	3718	215	6696	
寿张	879	46	7789	367	664	9745	225139	324	3970	1565	604	6463	
范县	259	14	1036	131	1290	2730	180442	86	3618	909	195	4808	
观城	401	21	693	184	817	2116	103675	60	2050	1262	114	3486	
张秋	1145	60	1177	800	862	4044	140942	203	2794	1332	315	4644	
朝城	746	39	1350	600	700	3435	86800	118	1545	9600	218	11481	

说明: (1) 被抓壮丁系指被敌俘去长期未归者; (2) 少衣无食者系指目前即没法维持生活者; (3) 遭敌灾致残的孤儿及贫苦难民; (4) 遭敌灾致残者系指被敌打残, 打伤致残, 不能恢复健康者, 已痊愈者未统计在内; (5) 被奸致疾病者系指妇女被奸淫传染花柳病或其他伤疾, 至于被奸淫未残疾之妇女未统计在内。

八年抗日战争物资损失统计表

县别	原有地	敌占 损毁地	荒芜地	损失 粮数	原牲口	有损失牲口	失原有牲口	原有损失牲口	有损失牲口	原有房屋	有损失房屋
在平	814160	2060	167080	7.3388亿	27310	12000	7540	2980	1230	4500	317700
博平	678112	1720	139056	6.1788亿	22700	9080	6578	2950	1160	4300	365655
筑先	315031	865	50501	3.1711亿	10000	3000	2985	698	6990	1580	129077
东阿	530573	1350	63264	5.2915亿	17680	5890	5068	1230	7890	1560	274230
阳谷	740693	1880	74813	6.0818亿	24660	8200	6890	1380	16900	3200	296400
濮县	494094	390	12546	2.9446亿	16414	3694	5054	769	8590	825	351510
范县	542826		570	2.6583亿	18133	3332	3488	804	6570	580	200200
观城	365136	310	372	1.74亿	15360	2662	4015	512	6860	608	124400
寿张	692420	620	673	4.6亿	34914	15637	8048	948	18040	1607	270000
张秋	302107	610	3450	1.94亿	8970	1875	4662	498	8864	976	124160
朝城	422396	480	480	2.6亿	14380	4393	5056	576	10565	998	169206

附:

日伪军在鲁西北据点明细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聊 城	双 庙	驻日军15人	聊 城	周 庄	驻日军10人
	朱 老 庄			赵 鸭 庄	驻日军20人
	毛 营			朱 庄	
	老 槐 阴			花 牛 陈	
	潭 庄			王 官 庙	
	韩 垌 堆			军 王 屯	
	赵 岗			陈 口	
	周 店			姚 庄	
	庄 东			庄 东 边	
	姚 庄			王 虎 庙	
魏 庄	驻日军30人	土 山 寺	驻日军50人		
马 庄	驻日军50人	刘 集			
前高香坊		梁 闸			
王 西 庄		堂 邑 城			
刘 道 之		王 堂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聊城	沙 镇	驻日军50人	聊城	吴 海 子	
	侯 营			张 樊 庄	
	温 集			王 枣 棵	
	南北辛庄			唐 家 堡	
	后 哨 营			龙 王 庙	
	堠 堤			小 袁 庄	
	斗 虎 屯			冯 家 庙	
	板 桥 吴			八 甲 刘	
	土 闸			大 陶 庄	
	任 香 坊			大 蒿 庄	
	阎 围 子			南 关 寨	
	贾 庄			梁 水 镇	
	乔 集			东 围 子	
	邢 屯			程 范 庄	
	许 庙			小 蒿 庄	
	大 王 庄			白 渡 口	
	杨 天 红			李 回 庄	
	大 阮 庄			关 厅	
				郑 营	

县别	据点名称	备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注
聊城	堤庄关庙楼庄 什古雪庄 梭长东聊小朱王王小郝李印任蝗楚田李白侯		聊城	王孙化化庙屯庙铺集镇房墩家堡 后王前后盛王尔镇口炉双瓦里十八里 刘道张李朱五谢	
			东阿	山岭沟县 岱山姜旧 少西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东	大 吉 城		东	黄 胡 同	
	胡 椒 口			苦 孙 山	
	南 丁 市			陶 官 庄	
	东 鱼 口			曹 孟 庄	
阿	张 斑 坊		阿	曲 芦 集	
	斑 代 店			陈 店 子	驻日军
	西 台			铜 城 庄	
	钧 城 铺	驻日军		尹 凌 山	
	陶 秋 山			杨 水 坡	
	张 关 门	驻日军		前 刘 屯	
	广 粮 德 铺			张 汉 吴	
	归 小 楼			教 场 铺	驻日军
	王 东 庄	驻日军		张 大 人 集	
	姜 楼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东 阿	洼 李 牛 角 店 毕 庄 湖 溪 渡 大 窑 大 黄 庄 董 庄 东 新 庄 旦 镇 周 庄 烧 瓜 赵 县 城	驻日军	阴 谷	朱 庄 司 庄 草 寺 后干河营 西 孙 庄 邵 楼 费 楼 周 庄 王 庄 王 子 仪 青 杨 李 定 水 镇 王 营 赵 园 官 桥 三 里 庄 胡 楼 七 里 河	
	县 城 郭 店 屯 安 乐 镇 七 级 阿 城 石 佛	驻日军70人 驻日军 驻日军 驻日军 驻日军 驻日军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阳谷	东刘庙		临	郝村	
	丁庄			四家务	
临	古柳树		清	小王庄	
	东各庄			王官庄	
清	董庄			老官寨	
	洪官营	驻日军10至30人		马店	驻日军10至30人
清	白庄			龙旺村	
	花牛张庄	驻日军10至30人		童水坡	
清	卫罗庵	驻日军10至30人		东孙庄	
	高村	驻日军10至30人		太阳庙	
清	隋五里			司家庄	
	大十二里	驻日军10至30人		枣园	
清	于庄			大营	驻日军10至30人
	云冯庄			常圈	
清	田裴庄			尖冢	驻日军10至30人
	于堂			台庄	驻日军10至30人
清	焦堂			赵圈	驻日军10至30人
	郑集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临	丁 村	驻日军10至30	清	代 湾	驻日军
	龙 潭	驻日军10至30		旧 城	
清	乔 屯	驻日军10至30	平	侯 寨	驻日军
	侯 寨	驻日军10至30		于 庄	
清	西 温	驻日军10至30	馆	康 庄	驻日军
	朱 庄	驻日军10至30		辛 集	
清	万 寨		陶	申 街	驻日军1个
	孙 庄			山 村	
清	影 庄		陶	马 厂	驻日军司令
	小 辛			铺 上	
清	大 辛		陶	刘 圈	驻日军1个
	高 辛			马 头	
清	大 元		陶	康 庄	驻日军1个
	杏 元			徐 村	
清	什 场		陶	南 馆	驻日军1个
	吕 桥			北 馆	
清	魏 湾		陶	尖 冢	驻日军1个
	孔 集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馆陶	花园庄 周于林 南于林 法寺 拐渠 张寨	驻日军1个班 驻日军30余人 驻日军1个小队	冠县	东十里铺 李八里庄 多庄 二十里铺 贾镇西庄 高庄铺 北台村 县城	驻日军1个 小队 驻日军1个 小队 驻日军司令 部
冠县	召村铺 万善庄 北么庄 李才庄 王庄 赵固 西提固 东古城 铺尚 唐寺 唐固 东三里庄	驻日军1个小 队	莘县	务头庄 小赵头 安头庄 姬头庄 燕店 铁佛寺 王化 张屯 县城 豆城 村	驻日军 驻日军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莘 县	马 厂 十八里铺 毕 屯 张 义屯 年 占营 妹 冢集 胡 集屯 栾 屯 罗 屯 节 村 沙 河 白 庙 五 后 安 寨 豆 楼 李 村 朝 城 江 楼	驻日军	莘 县	兹 营 北 郭庄 郑 庄 谢 集 束 馆 福 堪 千 口 吕 村	
			茌 平	施 屯 云 庄 乜 集 张 屯 太 庄 大 平 刘 庄 要 寺 蒋 庄 郭 庄 郝 庄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平	桑坊	驻日军	平	姜庄	驻日军
	刘马			常楼	
	南辛			北大	
	刘集			韩阁	
	邢庄			郭庄	
	陈庄			小孙	
	七里			刘望	
	县城			东草	
	袁庄			小马	
	东刘			三十里	
	胡庄			沙土	
	白衣			王鄂	
纪庄	牛嘴				
陈范	铁吴				
普陀	前娄				
王屯	金牛				
郝集	金场				
菠菜	高庙				
			博平	高庙子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博	袁家营 清凉寺 寺后刘坊 韩糖坊 寺西王 寺后王 小刘庄 韩官屯 菜屯 许庄子 王麻坊 后道口 渠庄 丁教堂 三铁沟 王刘 枣尹庄	驻日军	博	毛庄 赵庄园 花园庄 罗庄 北关 博平 郭谢 史胡 陈义茂 贾寨 程庄 王庄 陈铺 杨官屯 堤头 袁刘 閤成 老民庄 回李	驻日军
平			平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博平	老 范 庄			马 寨	
高	县 城	驻日军	高	王 庄	
	孙 屯			高 庄	
	吕 寨			长 郭 庄	
	田 楼			苦水郭庄	
	杜 庄			张 庄	
	周 官 屯			徐 官 屯	
	三 官 庙			牛 官 屯	
	谢 庄			五 里 铺	
	后 辛 庄			大 董 庄	
	尚 官 屯			纸 房 头	
	天 官 庙			坟 台	
	殷 楼			郭 庄	
	姜 庄			王 楼	
	蛮 子 营			葛 屯	
唐	祝 庄		唐	倪 堂	
	夹 滩			寺 后 刘 庄	
	李 官 屯			南 镇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县别	据点名称	备 注
高	郭 庄		高	十五里铺	
	丘 庄			小 刘 庄	
	王 签 庄			明 新 寺	
	蒋 官 屯			双 庙	
	蒋 家 铺			彭 庄	
	曲 庄			徐 官 屯	
	辛 兴 店			唐 洼	
	三十里堡			四 姑 庙	(四新庄)
	梁 村			杨 寨 子	(后刘庄)
	赵 楼			刘 湊 庄	
唐	苦水李庄		唐	刘皮子庄	
	盖 洼			吴 官 屯	
	北 镇 庄			贾 庄	
	张 庄			涸 河	
	黄 圈			前窑子坡	
	打鱼李庄				

编后记

在中共聊城地委、聊城地区行署的关怀下，在各县、市、地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一书同大家见面了。

为做好《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的征编工作，于1991年初成立了《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征编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侯继唐任组长，地区公安处处长刘伯华、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刁立山、地委党史办公室副编审谢玉琳任副组长，财政局局长王廷正、档案局局长王同山、统战部副部长魏尚宏、民族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家训、政协文史处负责人周大全、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吕保明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征编事宜，吕保明为办公室主任，王立军、吴银居、栾居瑞为副主任。征编工作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91年全面发动、广泛征集，1992年上半年整理核实，精心编辑。

全书由吕保明主持统编修改，并撰写综述，王立军、阴元昆参加执笔修改，领导小组审定。全书约25万字，收入本书的材料，按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所在籍贯等，以现辖区为主由各县市提供。该书收入日伪军在鲁西北制造的罪行材料20篇，日伪军头目材料21篇，日伪军罪行材料20篇，敌特材料5篇，奴化教育材料2篇，苛捐杂税材料2篇，日伪据点材料3篇，附件材料2篇，共计75篇。各县市参加此书材料征集整理撰稿为：聊城冯文德，临清赵广善，冠县马子江，莘县马世祥，阳谷崔衍峰，东阿朱成震，茌平杜富贵，高唐张金洪。

《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之所以能够顺利征编成书，是

地委、行署和各县市委、政府直接领导，公安、法院、档案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关人员密切协作以及参加征编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力求真实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但由于年代已久历史资料散失不少，见证人大多去世，虽然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征集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加上编辑人员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知情人与读者批评指正。同时向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向热心提供资料的单位、同志致以深切谢意。

1992年6月12日